

李克农传	5
第一篇	5
巨人的成长地	5
创办民生中学	6
民生成为革命据点	8
闯入青帮	9
石城遇救脱险	10
从事文化宣传活动	12
成为“红色特工”	13
“龙潭三杰”的首次相聚	15
窃取情报	16
第二篇	19
顾顺章叛变	19
对顾顺章采取措施	20
一场大搜捕	22
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	23
人生新的起点	24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	25
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	27
通过老部下沟通与红军的联系	28
洛川会议	30
会上激烈争锋	31
延安会谈	33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效	35
第三篇	36
西安事变	36
办事处的“红小鬼”	38
李克农的儿女们	39
骨肉分离的痛苦	41
营救关押的“政治犯”	42
奋力救战友	44
喉舌怒斥敌势	45
第四篇	47
抓机要保卫周恩来	47
严厉的工作制度	48
赴武汉车站智截叛徒	50
张国焘泄密	51
桂林“八办”	53
机要秘书谢和赓	54
谢和赓和王莹的爱慕	56
平生最爱是“九秘”	57
《救亡日报》	58
文化供应社	60
设法解决桂林“八办”	61

“皖南事变”	63
“皖南事变”后	64
第五篇	66
中共情报史上的重大转折	66
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68
排演苏联话剧《前线》	70
《前线》试演	71
《前线》深入基层	72
整风运动的强权势力——康生	74
张克勤被审	75
审干的反思	77
审干后的“补救”行动	78
“抢救运动”的反思	80
第六篇	80
王实味案（一）	81
王实味案（二）	82
王实味案（三）	83
王实味案（四）	85
一根不怀好意的“橄榄枝”	86
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	89
军调处的内部思想	91
秘书处的严密	92
经历一段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	94
第七篇	96
撤离延安	96
陕北转战	97
亲自指挥东北战场（一）	99
亲自指挥东北战场（二）	100
全力策反云南	102
形势下的傅作义	103
安全第一	106
第八篇	107
与国民党谈判	107
为蒋介石“把脉”	108
两航的困境	110
两航的讨论	111
“两航”起义	112
访问苏联保卫工作	114
对毛人凤的侦悉	115
粉碎毛人凤的诡计	117
第九篇	117
幕后出良策	118
赴朝鲜谈判	119
带病坚持谈判工作	121
僵持的谈判	122

最后的谈判	123
日内瓦会议的会前工作	125
抱病出席会议	127
侦悉毛人凤的阴谋	128
再次挫败毛人凤的阴谋	130
第十篇	131
严抓干部问题	131
“潘汉年案”	133
平反“潘汉年案”	134
疾病中的李克农	136
病逝	137
悼念李克农	138
第十一篇	140
附录一：李克农将军生平	140
后记	142
中国红色特工的“前三杰”和“后三杰”	143
前三杰解救周恩来	143
后三杰攸关大决战	144
间谍战的道德问题	145
间谍战情报战，国民党也输了	146
无论军统中统，统统打不进中共	147
国民党间谍战输在何处？	148
最为关键，间谍存身的环境	149
归总而言，国民党亡命台湾后也开始整肃	150
秘密战线上的红色特工--李直峰传奇	151
破译密电弃阎投杨	151
为杨虎城筹组密电室	151
周恩来器重参加革命	152
顺利潜伏“特工总部”	152
潜入“军委会”冒险赴延安	152
白色恐怖下的特殊警卫部队--中共中央特科	154
第一章	155
第二章	157
第三章	166
第四章	175
第五章	185
间谍最高境界--国民党要员身边的中共秘书和随从	193
记侦破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系统的特务组织“华北督察组”始末	196
神秘的“景福汽车行”	197
追捕“漏网之鱼”	201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超级间谍.....	202
中共历史上的三位红色女特工(组图).....	207
张露萍：打入军统的女情报英雄	208
陈修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市委书记	211
朱 枫：牺牲在台湾的女情报员	215
戴笠后代今何在.....	218
长子戴善武被枪决	218
孙女戴眉曼 生活幸福平静	219
孙子戴以宏工作积极	220
后代台湾聚首	220

李克农传

第一篇

1917年9月，李克农18岁时，与芜湖一家颇有名气的照相馆老板的女儿赵彩英结了婚。赵彩英出身于小康之家，父亲虽然经商，但思想相当开明，他不顾周围人们的议论，毅然将赵彩英送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使她成了芜湖历史上第一批进学堂读书的女性之一。

巨人的成长地

安徽芜湖，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

青弋江、漳河、运漕河从中悠然而过，浩荡的母亲河——长江，在她身旁安然流淌。她，头枕赭山怀抱，雄踞大江之滨，历来被誉为“长江巨埠，皖之中坚”。古人曾留下“大江烟外动，春鸟渚边鸣”的诗句，来描绘这里宜人的景色。

这颗长江之滨的璀璨明珠，古往今来，养育出中华民族多少优秀的儿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夏大地云遮雾障，黑云压城，英、法、美、日、德等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抢占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中国北方正涌动着反对外来侵略的义和团运动的怒潮。而中国的南方，却显得相对平静。

1899年9月15日(农历己亥年八月十一日)，江城芜湖仍然笼罩在一片盛夏的余威中，人们心情焦躁，烦闷不安。

“哇——哇——”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从鸡窝街(现吉和街)马家巷1号传了出来，这户姓李的人家添了个长子。全家老小个个笑逐颜开，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的父亲——一位名叫李哲卿的中年人，他给男婴起名“李克农”。

李克农的先辈是从巢县杨河中李村辗转来到芜湖谋生的。到了李哲卿这一辈时，家境已经较为富裕了，李哲卿在芜湖海关供职，收入相当可观。

李克农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座江南小城度过的。

1910年，李克农11岁时，父亲送他到芜湖安徽公学附属小学读书，在这儿，他结识了日后成为著名作家、文学史家的阿英(即钱杏)，并且成为终生好友。

1914年，15岁的李克农考入当时芜湖最有名气的教会中学——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圣雅阁书院。

李克农读书期间，中华大地上军阀割据，政潮叠起，局势诡秘难测：

1914年1月，白朗起义军由豫入皖，攻克六安、霍山，转战一月余。同年8月，在袁世凯政府大兵围剿下，起义失败；

这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国民党员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宣布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开始反袁斗争；

1915年1月，日本政府为独占中国，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妄图把中国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他做皇帝，于同年5月基本上接受了“二十一条”。12月13日，袁世凯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并定下年为“洪宪”元年，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在日本发表《讨袁宣言》，蔡锷在云南发动讨袁的护国战争；

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第二卷改为《新青年》)，宣传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抨击以孔孟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揭开了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新旧交替的时代，它不断地呼唤着巨人，也每时每刻在铸造着巨人。

李克农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里。他所在的学校，一直弥漫着革命的空气，黄兴的好友赵声、进步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进步僧侣苏曼殊都曾经在他就读的学校执教过。他的伯叔兄弟辈中，也有不少人同情或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年幼的李克农深受影响，他曾经写过一篇以鸭子场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发表在上海的一揭刊物上，反映了要求革命的思想倾向。1917年9月，李克农18岁时，与芜湖一家颇有名气的照相馆老板的女儿赵彩英结了婚。赵彩英出身于小康之家，父亲虽然经商，但思想相当开明，他不顾周围人们的议论，毅然将赵彩英送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使她成了芜湖历史上第一批进学堂读书的女性之一。赵彩英后来改名赵瑛，她既是一位温柔善良、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又是一位刚烈机警的女性。婚后，她生育了三子二女(女李宁、李冰，子李治、李力、李伦)，同李克农安危与共，相濡以沫，走完了漫长的一生。

创办民生中学

从1917年到1924年，李克农先后在北京、上海、安庆、六安等地辗转。他在北京《通俗周报》社做过发行工作，在安庆《国民日报》当过副刊编辑，他还担任过安徽省政府职员、秘书及六安县政府第二科科长等职。这段经历，使李克农增长了阅历，扩大了眼界，接触了许多新思想。特别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在他内心引起了极大震动，他以青年人特有的敏感和朝气投入到这场洪流中去。他在《新青年》、《新潮》和《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中如饥似渴地汲取养分，其间，他还结识了文学家蒋光赤、共产党员柯庆施等人，世界观有了很大变化。年轻的李克农逐渐认识到：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才能把粪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走向独立和富强。李克农还常常把一些进步书刊赠送给阿英。阿英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总之，我们的思想，是愈来愈倾向无产阶级革命了。”

1925年，李克农返回芜湖。这时的芜湖学界，正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斗争。芜湖开教较早，西方列强在这里设立了不少教会学校，如福音堂美以美育才中学、后家港励德中学、周家

山女学、来复会小学、青山女学等，其中尤以美国人办的圣雅阁书院和萃文中学规模最大。这些教会学校在传播近代文明的同时，也大肆地贩卖“宗教鸦片”，用基督教教义的蒙昧主义来麻醉学生思想，渐渐引起进步学生的强烈不满。3月12日，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不幸去世。噩耗传来，江城一片悲戚。各学校、团体纷纷举行追悼活动，而这些教会学校，不仅禁止组织任何追悼活动，而且不准学生参加校外组织的悼唁。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早就对奴化教育不满的热血青年们，终于忍无可忍。5月11日晨，圣雅阁书院的初中及高小学生在学生领袖甘天沐的带领下，拒绝参加学校规定的祷告仪式，由此拉开了芜湖教会学校反帝斗争的序幕。

萃文中学旋即表示响应，全体学生罢课声援。不几日，其他几所教会学校也相继表示支持。

李克农积极支持并且参与了这场斗争，他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在这次斗争中初露锋芒，赢得了许多爱国青年的尊敬。

恰在此时，震惊中外的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了江城，青年学生中充满了悲愤之情。为使反教会奴化教育的斗争向纵深发展，李克农同阿英、宫乔岩等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引导学生投身到“五卅”运动的洪流中去。

反教会斗争大快人心，教会学校也没了往日的嚣张气焰，真是江城学界的一大盛事！

然而，在这次斗争中，有近500名进步学生坚决退出了教会学校，虽然这一度使得圣雅阁书院和萃文中学等教会学校几乎无法再办下去，可这些青年学生们毕竟面临无学可上、无书可念、嗷嗷待哺的困境，成为当时芜湖教育界的一大难题。

为了解决这些莘莘学子的失学问题，李克农和阿英、宫乔岩商议，决定筹建一所新式学校。依靠亲戚朋友的解囊相助，凭借进步力量的鼎力支持，李克农等人在赭山之麓、大观山之巔，办起了“民生中学”。李克农后来回忆说：“曾有人反对。问我为何选用‘民生’两字。我说‘民生’既是三民主义，也是共产主义。”

9月10日，民生中学正式开学，一面红底白字的“民生中学”大旗在大观山上高高扬起，迎着江风“呼呼”作响，一所深受广大爱国青年拥护、被群众称为“水泊梁山”的新型学校，终于在李克农等人的艰辛筹划下诞生了。

宫乔岩担任了民生中学的首任校长兼教务主任，李克农任事务主任，以后又任第二任校长，第三任校长是王伟侠。在几任校长任内，学校繁杂的实际工作几乎都是由李克农具体负责。那时的李克农，已经显示出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本领，学校的一切校务都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条。

学校建立伊始，经费相当困难。幸而有进步士绅不断捐款，学生踊跃缴费，教师欠薪也不来索要，因而民生中学不仅能顺利地开办，而且能越办越红火。

学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爱国进步的青年，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如革命志士甘

天沐、建国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副书记的张恺帆等等。

民生中学在李克农的要求和督促下，很快形成自己团结友爱、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独特校风。在教育中注重向学生传授新思想、新文化，强调学习和劳动、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鼓励和支持青年学生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

民生成为革命据点

学校设有芜湖国民外交后援会主办的文艺刊物——《苍茫》半月刊。芜湖国民外交后援会是6月7日成立的，民生中学的国文教师阿英担任该会宣传股编辑组组长，并被聘为杂志主编。其他教师也常常撰稿。善于言谈、待人热情的阿英，大力提倡白话文，为办刊物不遗余力。他的读书日记《到民间去》、高语罕的诗《到西湖去》等作品，都通过这个刊物传播给学生，使《苍茫》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艺园地。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质锻炼，李克农专门聘请了一位身材高大、出身行伍的霍邱人王振武担任体育教师。

李克农是在一次偶然的巧遇中结识王振武的。正是这位王振武，以后同样也是在一次偶然的巧遇中搭救了李克农。

一次，王振武因事到了安庆，适逢李克农和一位朋友也在安庆，同住一家旅馆。李克农的那位朋友不慎把票夹丢失，内有委任状和两百元银票。票夹被王振武拾到，王振武是个很侠义的人，他写了一张招领启事，使物归原主。失主为感谢他的豪爽，设宴款待。李克农入席作陪，从此结识了王振武。

王振武担任体育教师后，将全校学生分成三个大队，统一穿上灰色制服，按照军队的训练方法，从操练、劈刺、投掷手榴弹等基本动作做起。经过训练，学生们个个精神抖擞，动作整齐划一，在江城名声大震。

李克农自幼爱好文艺，对话剧更有浓厚兴趣。他模仿别人的语言和动作，形神兼备，惟妙惟肖，令人叹服。学生们在这位“艺术家”的组织下，常常利用节假日，公演话剧或活报剧，向附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李克农亲自导演的《李克用卖国》、《春闺梦里人》等剧，颇受人们的欢迎，显示了他在文艺方面的才能和天赋。李克农还曾组织学生送戏下乡，以演戏借道具为名，向地主“借”来枪支弹药，转而秘密送给农民武装。

离民生中学不远，有一家外国人开办的亚细亚煤油公司代办处，这里人少房多，而民生中学创办伊始，条件极为有限，人多房少，甚至连一间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

怎么办？学生们想来想去，打算向亚细亚煤油公司代办处借两间空房，可这家公司不同意借房。正巧李克农正领着学生们军训，他们大清早对着代办处的小洋楼吹军号，又在楼下挖厕所，气得这家公司的买办干着急，没办法。

学校课桌短缺，学生们又从不远处的修道院借了些来，可修道院的神甫不放心，三天两头跑到学校催还。学生们打开《圣经》，向神甫念道：“施——比受更为幸福。”

“人家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要给人家打。”“仁慈、博爱，阿门——”

神甫越听越气，而李克农呢，总是在这时候替学生讲话，为学生撑腰，赢得学生阵阵掌声。

就在李克农等积极筹建民生中学的时候，中国南部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自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后，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一举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革命军阀势力，实现了两广统一。1926年7月，震撼全国的北伐战争打响了，北伐军在“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口号声中，一路势如破竹。10月，攻克华中重镇武汉；接着，兵分三路，向安徽、浙江、江苏迅猛推进。

1926年12月，李克农由杨士彬、余昌炯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党的事业紧紧地联在一起。遵照党的指示，他和阿英等人积极筹划，为北伐军的到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27年3月，随着国民革命的隆隆炮声，以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抵达芜湖。革命形势在江城高涨起来。不久，国民党的芜湖县、市党部相继成立，李克农以国民党左派身份，担任了县党部农民部长。

此时的民生中学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据点，学校党组织由李克农具体负责。这里不仅传播革命思想，而且开展革命活动。学生们被组织起来，参加“济难会”、“芜湖市学生联合会”等革命组织，气氛相当活跃。

正当北伐战争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天空中隐隐显出一片阴云，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面目逐步暴露出来。这时的民生中学也常受到国民党右派的监视、干扰和流氓帮会的捣乱。

闯入青帮

在国民党右派势力尚未侵入芜湖时，青帮是地方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一支。

青帮，又称“安清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秘密社团之一。这个封建的帮会起源于明代的罗祖教，最初分布在北直(今密云)、山东一带，后由北直、山东沿运河发展到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对外号称“潘门”或“潘家”。内分两派，一为“主帮”，系浙东温州、台州人；一为“客帮”，系皖北、江北人，因此也称为“巢湖帮”。从清初康熙至嘉道年间，其成员大都为运输工人，主要活动是为清政府承办漕运。青帮中也有一些其他的手工业工人，总之，这是一个以运输工人为主的下层社会秘密团体。青帮的组织很严密。它按辈份收徒，长期在运河漕运中保持封建行帮的地位，其成员恪守“帮丧助婚，济困扶危”的原则，使得大批粮船水手参与其中。清末因漕粮改由海运，粮船水手大多失业，沦为游民，便“密行贩盐，或以偷税为业”，出没于皖江、江北，并逐渐向太湖流域及上海扩展，转而成为以贩私盐为主体的游民无产者团体。其成员不仅有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还有不少被裁革的兵勇。此时芜湖青帮的头子，名叫马玉伯。

马玉伯，译名马二疤子，在青帮内，他属“通”字辈，本来并不能坐上龙头老大的位子。1927年3月，马玉伯在国民党右派的扶持下，网罗一批青帮流氓，组织了一个“芜湖市工人统一委员会”，他自封为委

员长，时常带领手下同中共领导的总工会和店员工会作对，颇有要称霸江城的势头。

为了及时掌握情况，组织反击，李克农和阿英等奉党的指示，打入了青帮内部，和他们建立了关系。马玉伯虽知李克农和阿英有“赤党”之嫌，但因这两人也都是江城名人，前来投拜到自己门下，他感到面子很光彩。李克农和阿英在青帮中排行“悟”字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完全撕掉了左派的假面具，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戮。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紧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共”为名，大规模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一时间，扬子江暗流汹涌，赭山上乌云密布。

马玉伯——这位掌握地方局势的青帮头目，一时成为各派势力争夺的对象。

蒋介石的人不时在马宅进进出出，而马玉伯呢，因局势还不明朗，尚在观望之中。

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出李克农和阿英，去做争取马玉伯的工作。时逢马玉伯父亲去逝，李克农精心准备，前往吊孝。

马宅的大门被叩开了，李克农递上了名帖，当然，按江湖的礼节，李克农没忘备上丧礼。

有人吊孝，马玉伯焉能拒人于千里之外？

李克农被请了进去，他恭恭敬敬地走到马玉伯父亲的灵前，行礼如仪，一席吊词直说得马玉伯感动万分，他向李克农深鞠一躬，替先人受礼。

这次吊唁，使李克农受到了马玉伯的信任。此后一段时间，马玉伯对国民党的说客采取了不疼不痒的态度，李克农等中共党员暂时有了安全保障。然而形势还在不断恶化，安徽军阀陈调元悬赏5万元通缉李克农。李克农和阿英等一些曾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处境日见艰危。小小的马玉伯也无法左右局势，他们只得被迫撤离，起着革命据点作用的民生中学最终也被反动当局封禁。为躲避追捕，李克农、阿英、宫乔岩等人急离芜湖，到江北李克农本家经营的一座农场里去避难。不料却被国民党军警侦悉。赵瑛得知消息后，拖着怀孕的身体，抢在敌人前面，冒雨渡江，向李克农等通风报信，终于化险为夷。

石城遇救脱险

这段经历，阿英在1927年4月2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生动详尽的记载：1927年4月20日雨

在下午，连续着一个星期的大雨就已停止，但田埂上泥深过尺，仍旧是不能行走。晚饭后，我们已在书房里谈天，突然稼轩(李克农别名)的夫人来了，遍身被泥污涂满了，脸上满布着恐慌的神情。她通知我们即刻就要离开这村庄，说地址已被敌人侦悉，逮捕的火轮就要开来。她是冒雨乘着划船过江的。上岸后，走了八里的烂泥埂。她这时还在病中……于是，经过一个短时间的讨论，我们各人便又换上草鞋，匆匆的把比较不重要的文件烧毁了，跳上系在屋后小湖旁的小划船……我们什么都没带，五六个人只有一床行李，一个箱子，还有几件极重要的公文。

随后，一行人经过商议，决定由阿英率领一部分同志取道皖北，千里步行跋涉到当时还是革命中心的武汉。而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李克农几经辗转周折，于1928年1月到达南京。

古城金陵，巍峨苍茫，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此时此刻的石头城，却是钟山无语，大江落泪。一派萧瑟肃杀的景象。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城内的丁家桥前江苏议会举行典礼，成立了“国民政府”，建立了以他本人为中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大开杀戒。

这是一个灰蒙蒙的阴天，南京下关街头，热闹喧嚣，身穿长衫、躲避通缉的李克农，在这里被几名军警给“钉”上了。怎么办？跑！

说时迟，那时快，李克农脚底生风，穿大街，过小巷，想方设法甩掉那几个尾巴。没想到那几个军警竟像魔影一样，死钉不放，穷追不舍。

李克农一阵猛跑，一不留神，撞在马路中间一个黄包车上。车里坐着一位国民党上校军官。这位军官刚想发作，抬头一看，不禁失声惊叫道：“曼梓(李克农别名)，是你？”

话音刚落，李克农向后吮吮嘴，这位军官会意地把李克农拽上了车。赶上来的几个追兵，发现他们即将到手的猎物，仿佛上了天，入了地，忽然没了踪影，一个个提着枪站在马路上四处张望……这位军官，就是王振武。

民生中学被迫停办后，王振武和李克农依依惜别，回到家乡霍邱。此刻，他已官居国民党霍邱县党部筹委、霍邱县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要职，同时还在国民党暂编第六军中任政治部主任，在小小的霍邱县城，算得上是权倾一时的人物。他是专程来南京办事的，没想到在这样的气氛中遇上了李克农。王振武很诧异地问李克农：“他们为什么追捕你？”

“你知道，”李克农说：“我在芜湖搞地下活动，后来被发觉，国民党通缉我，才到了南京，谁知到处都有抓我的通缉令，如今困在下关难以出去，幸亏遇见你。”

为人豪爽的王振武得知李克农的处境后，决定帮老朋友一把。他随后“任命”李克农为他的“政治部中校秘书”，并让勤务兵拿了一套军服，把李克农从上到下“武装”起来。

1月23日，王振武带着自己的“中校秘书”李克农回到了霍邱县城。王振武的家离国民党县党部不远，李克农就被安顿在王振武的家中。有王主任这把遮阳伞，李克农安全地度过了三个多月。不久，风声走漏，王振武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个晴朗的早晨，两乘小轿从王振武家静静地抬出来，前面坐的是王振武，后面坐的是李克农。王振武放出话说：今天天气不错，要带家属出城游玩。

两乘小轿刚走到城东门，就被守城的士兵拦了下来。“站住！检查！”

轿夫正要停下，王振武把轿帘一掀，喝道：“混蛋！连我都不认得了？”

王振武?在霍邱，王振武的大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原来是王主任。对不起，对不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请!”

两乘小轿顺顺当当地过了城门。

一路上，岗哨林立，有王振武开道，他们顺利地出了霍邱县境。接着，二人出霍邱，抵蚌埠，搭上东去的列车，安抵上海。王振武亲手把李克农交给春野书店中共地下党联络点，让李克农接上党组织关系，他才返回故里。

为这，王振武被人在背后“奏”了“一本”。从上海回来后不久，他在国民党内、军内的官职被一抹干净。淡泊名利的王振武微微一笑说：“我毕生视功名富贵如过眼烟云，而视友情如泰山。”对王振武的这次义举，李克农始终铭记在心。建国后，两位老友再次相逢，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还亲切地称“王振武老先生是我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患难与共的老朋友”。

从事文化宣传活动

上海外滩上，耸立着层层叠叠的高楼；马路上，大大小小的汽车在往来穿梭；黄浦江中，横竖排列着各国的军舰，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在江风中飘扬；码头上，汗流浹背的搬运工背负重包，在工头的皮鞭下，奔忙于轮船与码头之间。这，是一座“冒险家的乐园”!

1928年春，已近而立之年的李克农踏上了这块土地，看着这座既繁华而又黑暗、既喧闹而又险恶的城市，李克农内心涌现出一个念头：用共产党人的意志去征服它!

李克农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被安排在太阳社支部过党的生活。太阳社是1927年冬在上海成立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李克农的好友阿英和蒋光慈、洪灵菲等都是创办人，它的成员也全是共产党员。

正在太阳社从事革命文学活动的阿英，见到久别重逢的李克农，真是大喜过望。两人又像在家乡时一样，经常白天走上街头举行飞行集会，深夜又一起提着浆糊桶，走上大马路张贴革命标语。

这段时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潘汉年等人一起进行文化宣传活动。李克农本人也曾在党的领导下，创办过《铁甲车》和《老百姓》两张报纸，都因言辞激烈，被国民党当局戴上了红帽子，两张报纸的寿命都不过三个月左右。

李克农刚来上海的时候，同他的好友宫乔岩一起住在景林堂寄宿社的一间小房子里，宫乔岩此时也被编入春野支部。不久，李克农过去在民生中学的学生、共产党员宋季仁，因为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受通缉，由中共党组织安排转往上海春野支部，也搬来和李克农他们住在了一起。由于房子太小，宋季仁只得搭上一个临时的小铺，早拆晚铺，伙食也两份分作三份吃，过起了“共产”生活。

后来，宫乔岩从小房间搬了出去，同弟弟住在了一起。此后，宋季仁就开始为李克农跑交通、送情报。

由于经济拮据，李克农和宋季仁每天只能买上几只大饼充饥，好在他们都是乐天派，以茶代酒，倒也兴味十足。

为填饱肚子，李克农开始典当起自己的生活用品来，宋季仁看不过去，很想为他分担一些生活的担子。有一次，宋季仁上街，看到乍浦路桥上有几个“瘪三”帮着推人力车上桥，可以弄到一点施舍，也上前试着推了几趟。不料这几个“瘪三”竟上前将宋季仁团团围住，一顿猛打，直打得宋季仁鼻青脸肿，口袋里刚刚挣来的几个铜板也被一抢而光。值班的巡捕不闻不问，宋季仁只好自认倒霉，回到住所。

李克农看见宋季仁这副模样，大吃一惊，一个劲地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宋季仁就是不说，李克农最后终于动怒了，说：“小宋，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这里我们不能再住下去了，必须迅速离开。”事情到了这一步，宋季仁只好将实情和盘托出。李克农听毕，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他动情地说：“上海这地方，是洋人、阔人的天堂，是穷人的地狱。推车的瘪三要给巡捕交‘拔头’，推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的世界，总有一天我们要叫它底朝天！”不久，经中共党组织安排，宋季仁进入中共地下党开办的新华印刷所当排字工，生活算是有了保障，不过晚上的时间仍然给李克农跑交通。

李克农初到上海的这段时间，正是党的秘密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迁到上海。

1928年早春的一天，上海云南路与四马路交叉的447号一处二层小楼房里，一家“福兴字号”的商行开张了。这幢楼的楼下，是沿街面的私人诊所，“福兴字号”则租用了楼上的三间大房。“老板”熊瑾玎是位经营湖南土布的行家。半年后，“老板娘”朱端绶也被从汉口接来。在上海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里，“夫妻”二人苦心经营着自家的买卖。

这里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秘密处所。熊瑾玎的真实身份是中央机关的会计，朱端绶则在机关里担任显影、抄写、传送中央文件和处理机关里的事务等工作。熊、朱二人实际上是一对假夫妻。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几乎都在这里举行。周恩来差不多天天来此办公，邓小平、邓颖超、瞿秋白、李立三、任弼时、邓中夏、彭湃、陈赓、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也都经常在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

离此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二楼，是中共中央军委的联络点。戈登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和1141弄的一个地点，则是中共中央领导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遭受重大损失和严重破坏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终于重新建立和恢复了起来。中共中央的心脏在上海跳动起来。这里是远东第一大都市，地广人杂，便于隐蔽；帝国主义列强在此设立了庞杂的租界，不查户口，易于找住房，对设立党的中央机关、开展秘密活动十分有利。这，是一个任苍龙遨游的大世界。

成为“红色特工”

然而，上海毕竟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中心，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阵地，国民党政府驻有许多军、警、宪、特机关，黑社会势力也相当猖獗。这，又是一个险恶之地。中共中央要在敌人的虎口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保卫工作。

蒋介石也把目光盯向了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的蓬勃发展，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他一面组织大军对中央苏区这一“心腹之患”反复进行“围剿”，一面积极筹建他的秘密特务组织，企图利用各种特务手段，搜索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欲将其一网打尽。蒋介石的阴谋是毒辣的，绝不能让其得逞！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特别任务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保卫和秘密工作。这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先后设有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四个科，其中，情报科由陈赓负责，其任务是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的心脏，掌握敌人动向，保卫中央安全。行动科初由顾顺章负责，下设红队(也称“打狗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不久，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派遣一至二名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情报工作。

李克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身于党的秘密战线，成为一名“红色特工”。

不过，李克农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还得从钱壮飞说起。钱壮飞，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后在京绥铁路附属医院工作，并在美术学校兼课。钱壮飞睿智多才，除精通医术外，还擅长书法、绘画，并能写剧本和当演员。

1925年，钱壮飞与好友胡底经过他同学的弟弟、安徽桐城人张暹仲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从北京流亡到上海。

在上海，钱壮飞几经周折，终于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支部，他的一位朋友、安徽舒城人胡底也在这个支部，此时在上海的一家电影公司任职。

钱壮飞初到上海时，没有找到工作，一家老少六七口人，生活难以维持。到了1928年下半年，钱壮飞在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找到了一个职业，从事画广告画和招揽生意等业务。

这个无线电管理处，原是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门替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1928年冬，时任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的CC派头子陈立夫，为了扩充势力，培植党羽，很快将手伸向这里。他将原来的头头排挤走，把自己的同乡、表亲又是留美同学的徐恩曾安插进去。徐恩曾，号可均，浙江省吴县双林镇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徐恩曾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后到美国西屋(Westing House)工厂实习，后又进康奈尔大学(Co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读工厂管理。1922年回国，初在上海南市自来水厂任总工程师，1927年转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翌年主持建立了首座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同时受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委托，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座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

以徐恩曾所学，本来是可以成为中国一位出色的电机工程师的，但他却倚仗和陈立夫、陈果夫的表亲关系，一头钻进了国民党特务机构中。

徐恩曾中等个头，方脸，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平时喜欢穿中山装或西服，外表斯文，一口普通话夹杂着浓重的上海方言，英语说得很流利，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他城府很深，善于钻营，对上司能投其

所好，特别是在手握实权的二陈面前，更是态度谦恭，小心翼翼，张口闭口“立兄”、“果兄”。二陈乘车，他亲自开门，二陈交办的事情，他办得滴水不漏，二陈对他非常信任和赏识。

手下人不敢直呼其名，都尊称他为“徐先生”。

正是这位文质彬彬、道貌岸然的“徐先生”，曾把持中统这个国民党庞大的特务组织达 14 年之久。

“徐先生”儒雅风度，颇能欺人于一时，从中学到大学，和他同班同学的邹韬奋先生，在其《抗战以来》这本书里写道：徐先生的仪表和他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

“龙潭三杰”的首次相聚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当面亲热地称邹韬奋为“老同学”、“老朋友”的“徐先生”，为了弄清邹韬奋的政治面目，曾派特务跟了老同学七年之久。

一次，徐恩曾甚至当面直接警告邹韬奋：不当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

邹韬奋面对徐恩曾的威胁，大义凛然地说：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按照法律我有这个自由！说完，愤然拂袖而去。徐恩曾的特务嘴脸可见一斑。

钱壮飞和他同乡，都是吴兴人。国民党的官场似乎更注重同乡之谊。因有这一天然的关系，钱壮飞一到无线电管理处，便受到徐恩曾的另眼相看；而钱壮飞又是如此精明能干，这就无怪徐恩曾对他器重无比，信任有加。

不久，徐恩曾发布命令：任命钱壮飞为他的私人秘书。

这关键的一步棋，自认为聪明的徐恩曾走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1929 年 11 月的一天，钱壮飞到一家电影公司去找老友胡底。在一间摄影棚里，认识李克农的胡底，介绍钱壮飞和李克农见了面。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风、胡马，1905 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 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后经同学介绍结识了钱壮飞，两人来往密切，交谊日深。1925 年，胡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 年胡底大学毕业后，与钱壮飞等人合办了“光华电影公司”，利用演员职业作掩护，开展中共地下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胡底在北京遭到通缉，被迫转往上海。

1928 年 7 月左右，周恩来指示胡底、钱壮飞参加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为扎根大上海，胡底潜入上海演艺界，他拍过一些武侠片，因演技不凡，舆论界誉之为“东方范明克”（范明克是当时美国武打片明星）。

在胡底的引荐下，钱壮飞与李克农认识了。

三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中共情报史上著名的“龙潭三杰”的首次相聚，在此后的一年零五

个月中，这三位足智多谋的“红色特工”，深入敌营，同舟共济，遥相呼应，为中共的秘密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钱壮飞见到李克农后，很是兴奋。他谈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并告诉李克农，国民党 CC 特务组织正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为名，扩大其特务组织，建议李克农想办法到无线电管理局来工作。

李克农预感到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可做，立即将情况书面报告了中共中央。周恩来批准了钱壮飞的建议，并指示李克农、胡底利用这一机会，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进去。李克农在极短的时间里，精心准备，掌握了应考的必备知识，化名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在这次考试中，李克农名列第一。

胡底也于 1929 年底打入徐恩曾在南京的特务掩护机关“民智通讯社”任编辑。

李克农的精明、干练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自以为是的明察暗访，徐恩曾终于庆幸自己觅到了一员大将。不久，李克农便升任为特务股股长，掌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官不大，权却不小。

李克农俨然成了徐恩曾的亲信。

1929 年 12 月下旬，陈立夫任命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徐恩曾随即任命钱壮飞为他的机要秘书。

徐恩曾神秘地向钱壮飞透出口风：立夫先生有一个计划，准备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扩建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活动的特务机构，其任务是对共产党的动摇分子实行软化，利用叛徒做其耳目，潜伏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秘密活动。钱壮飞很快将此消息传给周恩来，这位 31 岁的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坚决而又果断地向李克农和钱壮飞发出指示：“你们一定要把它拿过来！”

1930 年初，徐恩曾在南京走马上任。

此刻的徐恩曾春风得意，野心勃勃地想在创建国民党特务系统这桩反革命事业上大干一番。徐记“总务科”设在南京中山东路中央饭店隔壁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里，对外打的是“正元实业社”的招牌。

特务头子徐恩曾，老奸巨滑、心狠手辣；而朝中大员徐恩曾，则是吃喝嫖赌，花天酒地，无所不为。

徐恩曾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又受过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在美国留过学，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经历，使他在生活中成了一个涂满多种颜色的变色龙。他的训话中，常常引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鼓吹“四维”、“八德”，仿佛自己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化身；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时而举行私人舞会，时而邀少数亲信到野外“Picnic”（野宴），过着洋化的生活，一变而为美国人眼中的高等华人。

窃取情报

事实上，徐恩曾的私生活极其糜烂，他的姘头无数，被玩弄的女性更多。仅正式夫人就有三位。

元配梅子琴，浙江吴兴人。起初两人感情还可以，自从徐恩曾爬上了高位，在外花天酒地，两人关系有了变化。徐恩曾后来和她断绝了来往，梅氏一直在徐家陪伴婆母生活。

第二位夫人名叫王书青，辽宁人，燕京大学肄业。本来，徐恩曾看中的是王书青在南京的妹妹王书元，他和王书元姘居后，为表示对王书元的喜爱和对蒋介石的效忠，将他的办公地点特地定名为“正元实业社”。一次，王书青来看望妹妹，被徐恩曾看中，钉住不放，将王书青弄到了手。而此时的王书青已经结婚，丈夫在美国留学，徐恩曾凭借权势，强迫其写下字据，将王书青拱手让给了自己。

第三位夫人是费侠，此人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叛变。徐恩曾见过费侠一面，即对她的风流姿色动了心，于是弃王书青与费侠姘居。1938年春，两人正式结婚。由于人们对徐恩曾喜新厌旧、视女人为玩物的做法很反感，徐、费二人结婚时，前来祝贺的人寥寥无几。

一些国民党内的官员，甚至是二陈 CC 系的某些上层人物，也痛骂徐恩曾不学无术，男盗女娼，败坏党国形象，是个鸡鸣狗盗之徒。自然，中统特务机构内的很多具体事情都落到了机要秘书钱壮飞头上。

钱壮飞为总务科配备了少量的机要人员，有的负责管理电台，有的担任秘书、会计，有的则成了他和李克农进行联系的秘密交通，他的女婿刘杞夫就充任了这样一个角色。

徐恩曾是国民党官场里一个典型的官僚，凡是各地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情报，都先送给钱壮飞审阅，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再交给徐恩曾签字了事。

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所谓“绝密”文件，在中共中央的办公桌上，也同时有了一本副本。为了维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搜集有关共产党的各种情报以及国民党内部反蒋反陈派系的情报，徐恩曾委托钱壮飞以机要秘书的名义，在南京组织秘密指挥机关，在全国各地建立基层机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根据中共中央特科的指示，“帮助”他们在天津、北平、武汉和南京等地建立了一套以“通讯社”名义为掩护的半公开的情报机构。南京，建立了“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这是情报机构的心脏，两社社长均由钱壮飞兼任。

天津，建立了“长城通讯社”，社长由胡底担任。

上海，李克农升任了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成了这一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宋季仁成了李克农身边当差的伙计，每天中午，他给李克农送来午饭，而李克农呢，则经常摆出主人的架势，动不动就大骂宋季仁饭烧硬了，菜做咸了，好像从来就没有满意的时候。每当这时，宋季仁就装出一副唯唯诺诺的可怜相。而国民党秘密情报则在这样的气氛下被装进饭盒，顺利地由宋季仁带回转交中共中央。当李克农和宋季仁晚上回到宿舍时，常常掩上门为白天的精彩表演捧腹大笑。

一次，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会议，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消息，准备破坏。李克农迅即将情报交给宋季仁，由宋季仁向党中央报告，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徐恩曾经常夸耀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为他的三员得力干将，岂不知，有了他们，中共中央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成立了一个直属中央负责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单线联系的三人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党小组长，往返于京沪之间指导工作。李克农、胡底每次来到南京，都住在离总务科不远的中央饭店，三人在此碰头，商谈重大问题，党小组讨论决定后，再分头执行。

伴随着中共情报网络的逐步建立与健全，国民党大量的军政情报源源而来。中共中央得以及时洞察和掌握国民党的最新动向，掩护暴露身份的同志提前转移，制定正确的对敌政策。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二次军事“围剿”时，钱壮飞将得到的情报迅速传递给李克农，经李克农转交陈赓，由中央送往苏区，使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徐恩曾对情报的需求同样很迫切。李克农等人也给这位顶头上司提供了许多“情报”，不过，这些“情报”大多是一些经过整理的“材料”而已。

1930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拉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一时间，中原大地上狼烟滚滚，各方互相争杀。这样，屯兵关外的张学良，就显得举足轻重；谁能争取到张学良东北军的支持，谁就能把握住这场军阀大战的主动权。

蒋介石很着急，他命令徐恩曾尽快弄到张学良的情报。

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徐恩曾也曾几次派遣特务前往东北探听虚实，全都有去无回。这次，他把宝押在了自己的三员大将身上。机会难得。钱壮飞乐得接受了这个“美差”，和胡底、陈赓一起，打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挡箭牌，大把大把地花着领来的经费，一路上，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华北的工作，给中共中央带回许多重要情报。

回到上海后，为向徐恩曾交差，钱壮飞拉上李克农，一头埋在东方旅馆，把报纸上有关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新闻报道全部收集一起，以他们的想象力，用剪刀和浆糊拼凑出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这份报告，虽没有多少重要的情报，但写得相当系统和完整。报告送到了陈立夫、徐恩曾的手上，二人赞叹不已，不断地叫好：“哪来这么好的材料？了不起！了不起！”

徐恩曾信任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但狡兔三窟，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还留了一手。这，就是被徐恩曾视为“通灵宝玉”的密码本。这个密码本，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通报使用，绝对不能外传。徐恩曾看成至宝，连每次外出，他都带在身上，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有了这个密码本，就可以搞到国民党的核心机密，李克农和钱壮飞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早就下决心一定要在虎口拔牙。终于，机会来了——

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开会，李克农和钱壮飞抓住徐恩曾好色的特点，决定趁机把密码本弄到手。他们向徐恩曾大肆介绍上海滩上的美女，你一句，我一句，把徐恩曾说得心猿意马，急不可耐，忙着要走。

李克农用手指着他的密码本，忙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么个玩艺儿怎么行？”一贯诡秘的徐恩曾觉得李克农的话言之有理，当即不加思索，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保管，并嘱咐小心提防之类。徐恩曾走后，二人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

就是这个密码本，使中共中央在不久以后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电报，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第二篇

顾顺章坐着小轿车直驶中央路 305 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路上，他故弄玄虚地对蔡孟坚耳语道：“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请速将其扣留，如果他一旦逃走，整个肃清共产党的计划，就会全功尽弃！”蔡孟坚听完，叫苦不迭，他恼怒地训道：“怎么不早说！怎么不早说！”

顾顺章叛变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顾顺章叛变了！

正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小组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如鱼得水，准备大展鸿图之时，这一五雷轰顶的消息传来，转瞬间，将三人小组逼上了绝境，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逼上了绝境！顾顺章何许人也？他，原名顾凤鸣，又名黎明、张华，江苏宝山白杨人。他长得很结实，鼻梁很高，个头不大，身体肥胖，原在英商开办的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当“拿摩温”（即工头），沾染上较重的流氓习气。他平素喜爱舞刀弄棒，打架斗殴，还会耍一点魔术，曾以“华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演出过。

1925 年“五卅”运动期间，他态度积极，敢打敢拼，被上海总工会看中；1926 年，中共中央派他和陈赓一起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 年，他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担任武装纠察队队长，因为勇敢，受到周恩来的赞扬。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时，他参加了筹备工作，并担任三科（即行动科）科长，以后还担任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掌握了包括三人小组在内的中共几乎全部的机密情报。

随着中共秘密工作的发展，隐藏在顾顺章内心深处的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意识日益暴露，他不仅无视党的秘密工作方针、政策，而且骄狂蛮横、飞扬跋扈，极端狂妄。他在上海英租界威海卫路原幢石库门 802 号有座“公馆”，家具摆设极其奢华，他还抽大烟，玩女人，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陈赓曾气愤地说：“我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果不其然。1931 年 3 月，顾顺章受中共中央派遣，护送沈泽民、张国焘从上海经武汉到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工作。完成任务回到武汉后，顾顺章将秘密工作的纪律置之不顾，重操旧业，以当年“华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新市场的游艺场公开登台表演魔术，结果于 4 月 24 日在汉口被叛徒尤崇新指认被捕。

顾顺章被捕后，被押送到徐恩曾设在汉口的新建特务机关——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侦缉处。

顾顺章的被捕使国民党特务大喜过望。25 日拂晓，行营主任何成浚亲自提审了顾顺章。顾顺章当即屈膝投降，供出了中共驻汉口的秘密机关以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的办事处，还出卖了直属中央特科领导的、在英商一条运输船上当舵手、负责上海—汉口间秘密交通线的一位姓陈的共产党员。一时，武汉的中共机关纷纷被破获，十多位共产党人惨遭杀害。这，只是顾顺章的一点见面礼，他心中还酝酿着一个大阴谋。他知道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在上海的秘密地址，他熟悉中央特科的情况，他要把这一切面告蒋介石。

有奇货在手，顾顺章有恃无恐，他提出要见陈立夫、徐恩曾派到武汉的两湖“调查员”、武汉绥靖公署侦缉处头子蔡孟坚，他以老对手的口吻说道：“蔡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才是武汉对付共产党的负责人。”

蔡孟坚是武汉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因为在破坏和镇压中共地下组织中“屡屡有功”，曾受到蒋介石的当面嘉许，赏给他一万元的奖金。此刻，他正以少将参议的头衔，专事负责破坏湘、鄂、赣三省的中共地下组织的特务活动。作为中共特科的重要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自然了解蔡孟坚的底细。

蔡孟坚被请来亲自审问顾顺章。顾顺章手中握有王牌，态度十分傲慢。他狂妄地对蔡孟坚说：“本人有一个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保证可以在三天之内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当务之急，是请迅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我将当面对陈请。”

顾顺章不愿意向何、蔡二人将实情全盘托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担任过中共特科三科科长，亲自领导“红队”惩治过叛徒和内奸，中共叛徒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他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他知道三人小组就潜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本营中，一旦他被捕叛变的消息被泄露，自己性命难保，因而他恳求蔡孟坚在他到达南京以前，千万不可将他被捕叛变一事电告南京。

顾顺章说完这番话后，随即沉默不语，任蔡孟坚如何审讯也不透半个字来。后话，是必须说给蒋介石听的。

30岁不到的蔡孟坚撬不开顾顺章的嘴巴，只得作罢。为了抢头功，他和何成浚没有买顾顺章的帐，于4月25日争先恐后地分别向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发去特急密电，禀告详情。并称，迅即派特务和一个排的宪兵乘坐专轮，押送顾顺章去南京。而蔡孟坚本人，则于26日清晨，搭乘飞机先飞南京。惊心动魄的大事在武汉发生了，而南京，却一无所知。4月25日，星期六。

对顾顺章采取措施

好色的徐恩曾找美女消魂去了，而在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的大本营里，却还亮着一盏灯——徐恩曾的“心腹干将”钱壮飞，在值夜班。

六封来自武汉的特急绝密电报摆在桌上，每封电报上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

什么大事？这样神秘？如此紧急？钱壮飞心中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拿出和李克农一起从徐恩曾身上弄来的密码本，在一个无人的房间里，偷偷地把电报译了出来：

第一份电报——顾顺章被捕已自首，他要求立即送往南京面见蒋介石，面告中共首脑及所有各要害机关的驻地；第二份电报——将用军舰将顾顺章解押至南京；

第三份电报——用飞机解送，无论如何请徐恩曾不要让左右的人知道。

看罢电文，钱壮飞大吃一惊。顾顺章——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已经叛变投敌！

中央怎么办？三人小组怎么办？钱壮飞焦急万分。但他毕竟是一名战斗在秘密工作战线的勇士，他稳定

了情绪，将电文的内容仔细记下，再按照原样把电报封好。

接着，他查找了“京沪路行车时刻表”，决定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乘坐特快列车赶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李克农转呈中央。自己则赶到“民智通讯社”，通知那里的地下党员，不巧，人不在家。钱壮飞拿起小刀，在桌上摆放的一张地图上划开一道缝，暗示已经“破裂”，让他立即转移。

4月26日晨，钱壮飞照常上班，将密电交给徐恩曾后，借口回家休息，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乘火车前往上海。为防范徐恩曾派遣特务在上海火车站守候缉捕，他在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小站下了车，转道进入市区，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上海。到上海后，他又按预定暗号，给天津的胡底发出“潮重病速返”的电文，让他立即想法脱离。

刘杞夫奉命于4月25日深夜来到了上海。

位于上海闹市区东方旅馆的一间房门，被轻轻而又急促地叩响。李克农从睡梦中惊醒，打开房门一看，只见刘杞夫神情紧张地站在门口，他心里暗暗一惊。

刘杞夫将钱壮飞的密信交给李克农，李克农看罢，如五雷轰顶！情况紧急，危如累卵！

他很为钱壮飞的安危担心，不过，凭他的直觉，机智果断的钱壮飞一定会脱离虎口。对站在眼前有些慌乱的刘杞夫，他反倒有些犹豫，不断劝慰他：“小刘，要沉住气，一定要沉住气！”

问及刘杞夫今后的打算，刘杞夫表示：希望马上回南京去接妻子钱椒椒，李克农只好应允。临分别时，李克农紧紧握住他的手，关切地说：“此行凶多吉少，遇事一定要英勇沉着，望你好自为之！”送走刘杞夫，李克农便马不停蹄地去找陈赓。这天是星期六，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怎么办？

对！先找江苏省委，找到了江苏省委，就一定能找到陈赓！夜幕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微明中，他步履急迫，问了一人又一人。

老天有眼，他终于和陈赓接上了头。接着，他又和陈赓一起见到了周恩来。

这时，已是4月27日凌晨了。情况紧急，刻不容缓！

周恩来当机立断，立即会同李克农、陈赓、陈云和李强等人，采取了一系列应急的断然措施：

第一，周密地保卫并迅速转移中共党的主要负责人住址，把顾顺章所熟悉或能侦察到的党的负责人的秘书全部调换成他不知道的新人；

第二，所有原在上海的可能会成为顾顺章侦察、追踪目标的党的干部，都尽快地有计划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社会关系；

第四，立即废止和改变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应变。立即撤退！

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全部搬家，安全转移到新的秘密地点，从而避免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4月27日早上，顾顺章乘坐的军舰抵达南京，先行赶到的蔡孟坚亲往码头迎接。

顾顺章坐着小轿车直驶中央路305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路上，他故弄玄虚地对蔡孟坚耳语道：“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请速将其扣留，如果他一旦逃走，整个肃清共党的计划，就会全功尽弃！”蔡孟坚听完，叫苦不迭，他恼怒地训道：“怎么不早说！怎么不早说！”

一场大搜捕

4月28日晨，一场大搜捕开始了。

顾顺章领着陈立夫、徐恩曾如饿虎扑食，准确无误地向各个目标扑来。

处处人去楼空，等待他们的是空空如也的房子。陈立夫、徐恩曾大失所望，顾顺章呆若木鸡。

在中央机关里，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陈立夫失望地问自己的手下：“刚才四周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人？”“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只有一个女人从附近走过。”“还见到一个老头，刚刚转过拐角。”

“女人”是周恩来，“老头”是陈赓，他们刚刚离开，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远走高飞。

多险！离活捉周恩来，只差15分钟。

此时的顾顺章，悔恨交加。蔡孟坚一个劲地埋怨道：“你在武汉，太大意了，太自大了。如果早说出钱匪潜伏在我中央机要部门之事，我会立即采取措施，而不会向南京发电了。这是你的自我失败！”

事过多年，蔡孟坚在台湾发表《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的回忆文章时，还大骂顾顺章被捕后，“打埋伏”，留一手，不肯将实情和盘托出，以致功亏一篑，害得他们空喜一场。南京的蒋介石也是美梦难圆，连声骂道：“娘希匹！”

顾顺章投敌后，并未受到器重。1937年冬，他在镇江被国民党枪毙。

这是一段非常的日子。李克农心里只装着中央，他四处奔忙，顾不上妻子、孩子，也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赵瑛和孩子们紧急撤离原来的住处，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只得流落街头，夜宿菜场，直到一个多月后，风声渐息，李克农才和家人团聚。钱壮飞逃离南京时，为防徐恩曾迁祸于自己的家人，曾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他，如果家人有难，将把徐恩曾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公诸于众，让大家看看“徐主任”的真面目。

这一着很见效。徐恩曾对钱壮飞的家人始终不敢妄动，钱案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现代史上扣人魂魄的一页就这样被翻了过去。

可以设想：假如没有李克农等人，中共中央机关将被破获；可以预料：假如没有李克农等人，中共中央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王明、博古、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等等将难逃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毛泽东以后曾深有感触地说：李克农等人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

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将不存在了。

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风声鹤唳，中共中央机关分批转移江西革命根据地，李克农、钱壮飞转道进入江西苏区，胡底转道前往鄂豫皖苏区。

赵瑛和孩子们不便前往，返回芜湖老家，赵瑛从此开始了多年的小学教师的生涯。李克农告别了妻子儿女，也告别了上海——这个没有硝烟而同样是翻滚着火药味的战场。他踏上了远行的征途，心中默念道：上海，再见了！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1931年的金秋，江西的丛山峻岭层林尽染。一身风尘未洗，李克农来到了共产党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

繁重的工作又摆在了他的面前：在苏区的四周，国民党大军围困，红军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而在苏区内部，情况同样相当复杂。肃反扩大化日趋严重，不少地区在反对“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滥施刑讯，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有的地方甚至搞到“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地步，严重影响了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这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撤至江西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把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当作进入中央苏区后的头等大事来抓。

李克农到达瑞金后，经任弼时分配至江西省保卫分局任执行部部长（局长为吴德峰），奉省委李富春指示，处理江西省石城、广昌、雩都、兴国、平安寨等地大批积压的反革命嫌疑犯、所谓AB团、托派、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案件。任务完成后，回瑞金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执行部部长（局长为邓发）。

1932年，李克农奉命调前方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领导建立了一、三、五、七、九五个军团的保卫分局组织工作和红军中的保卫工作。不久，红军保卫局改为红军工作部，李克农遂改任红军工作部部长。

保卫局先后颁布了组织条例、处理反革命条例、自首自新条例，使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得到不断完善，保卫监察工作逐渐建立起来，肃反扩大化的倾向也不断得到扭转。

这段时间，李克农的工作相当紧张而繁忙。以后曾到陕北采访、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写道：李克农的“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了。另一只视力微弱。这是因为他在江西每天晚上在烛光下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所致。”李克农，几乎是一部永不停息的机器！

钱壮飞和胡底也都曾担任过保卫局的干部，他们和李克农一样，都是富有经验的行家里手，而对大多数红军的政治保卫干部和战士来说，这和扛着枪上前线打仗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这些身体结实的棒小伙子，政治上没得说，个个都对国民党蒋介石充满深仇大恨，一心只想着端起枪上前线，痛痛快快地杀敌人。对情报、保卫工作，他们很不安心，有时还嘲笑搞保卫工作的人是“胆小鬼”，没出息。

李克农又重操起当年民生中学的旧业，教育、开导周围的工作人员。他和钱壮飞等人现身说法，将自己在上海的亲身经历说给大家听：

当年在上海国民党公安局里，有这么一位侦缉队长，穷凶极恶地追捕中共地下党员。李克农和钱壮飞决心设计除奸。首先，两人在上海租了一处房子，安排几名中共地下党员住进去，并在屋里放置些党内的文件——当然，这些文件，国民党特务早就搜获到手过，已经毫无价值。接着，向侦缉队长先生透出口风，但却劝告他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要鲁莽行事。几天后，当他带着大批人马前去抓人时，早已人去屋空，只拣回几片无用的文件。上司知道后，连声大骂其无能，不多久，这位侦缉队长终于被当作“共产党的奸细”秘密处决。战士们听了“哈哈”大笑，李克农乘机对大家说：“同志们，谁说保卫、情报工作不是战斗？这，也是对垒，也是厮杀，但更艰巨、更复杂、更需要智慧。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搞保卫、情报工作的，就是要暗藏杀机，要有更大的杀伤力！”

战士们读书少、文化低，李克农他们就自编教材，并向大家传授有关情报、保卫工作的各种专业知识：怎样警戒布哨？怎样追踪？怎样摆脱钉梢？怎样识记和描绘不同人物的特征？怎样搜集和传递情报？怎样进行审讯？怎样记录、调查和分析各种资料？怎样预测天气？怎样分析地形？怎样同三教九流打交道？诸如此类。李克农妙趣横生的讲解，说得大家频频点头称是。正是有了李克农等人的辛勤工作，才培养和造就了中共历史上训练有素、精通业务的情报保卫工作队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人生新的起点

苏区的山路崎岖难行，苏区的阳光却格外灿烂。环境虽异常艰苦，但李克农埋藏已久的文艺天赋却有了用武之地，他常常自编、自导、自演节目，好戏连台。

红军学校俱乐部设有一个文艺俱乐部，赵品三任主任，他和李伯钊、危拱之等文艺活动家，拉上在红军学校工作的伍修权等人，发起成立了红军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经常为军民举办文艺晚会。

李克农眼睛不好，人们都戏称他是“只眼先生”。虽已过而立之年，并且身体微胖，可他对这类文艺活动却乐此不疲，像小伙子一样兴味盎然。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李克农与李伯钊同台表演两人自编的话剧《农奴》。李伯钊很会演戏，建国后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和她一起登台表演，李克农毫不逊色。他表演生动自然，把苦大仇深的农奴哥哥表演得惟妙惟肖，博得满场喝彩。李克农还主演过《秘书长万岁》这部戏，对当时猖狂进攻红军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嘲弄，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高层政局也在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李克农的安徽老乡、在顾顺章叛变后曾被李搭救过的王明挑起来的。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仅两年的27岁青年人——王明，倚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公开发难，一举控制了中央的领导权，大搞其极“左”的一套。顾顺章事件后不久，他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通过他的亲信——

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遥控中共政局。

一时间，“左”倾冒险主义思潮横行无忌，红色苏区大祸临头！由于严重的“左”倾错误，中央红军终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被迫从瑞金出发，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总共86000人，开始了英勇悲壮的万里长征。

李克农奉命担任了中共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负责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地面侦察，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在长征中的安全。

1935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红军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后，忽然宣布拒绝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图谋危害中央。李克农面临抉择。

他没有犹豫，断然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命令。他协助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李克农和林伯渠、杨尚昆、肖向荣等一起参加了叶剑英秘密主持召开的军委纵队干部会议，支持叶剑英提出的以“外出打粮”为名、跟随中央北上的方针。

1935年10月，李克农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调至先遣工作团工作。该团任务完成后，他又负责组织突击队驻道左铺，担任向洛川方面进行侦察游击的任务。

红军历尽艰辛，终于到达陕北。这里将是李克农人生新的起点。黄土高原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片金黄，信天游委婉动听的旋律萦绕在耳边，李克农站在高坡之上，俯看苍茫大地。

这是一幅多美的景色，他，将在这张大纸上，尽情挥洒他的人生！“红色特工”三人小组中的其他二人——胡底，于长征途中在松岗地区被张国焘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秘密杀害，时年仅30岁；钱壮飞，1935年3月21日红军长征渡过乌江后掉队失踪，下落不明。1985年，中共贵州息烽县委正式确认：钱壮飞已于1935年4月2日在当地遭地主武装袭击后殉难。他的遗孤后被中共党组织设法送到延安，曾得到李克农的照料。

既无畏暗箭，又何惧刀光，这，才是“红色特工”的英雄本色！“三杰”中仅存的李克农又将踏上漫漫征途。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

1935年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抗日救亡”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呼声，神州大地上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1935年夏，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为中华民族神圣的救亡事业而奋斗。是年底，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会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李克农就在此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由于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联络局也就自然地格外受到重视。

中央机关设在保安县(今志丹县)，城里最好的一个大院交给了李克农，用作联络局办公和接待用。

说是“最好”，其实除了几个空窑洞和一个空荡荡的院子外，要啥没啥。当时大家的处境都比较艰难，李克农二话没说，和大家一起打扫院子，准备粮草，借来家具，把院子里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联络局对外有个响亮的名字——“外交部”。但，这个“外”，是相对根据地来说的，所有进入根据地的重要人物和中共中央的外派干部，联络局都要管。

女作家丁玲、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洋医生马海德等等，都曾是联络局的座上客。

陕西地下党负责人孙作宾、高克林也受到了李克农的热情接待。经李克农的安排，他们分别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中共陕西省委同杨虎城建立秘密联系的情况。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很早就和中共进行秘密接触。孙作宾等人向中央汇报了与杨虎城秘晤的情况后，中共中央委托李克农给杨虎城的手下大将和亲信——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对杨、孙二人“抗日情殷，愿赋同仇”，深表钦佩，提出“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毛泽东在信上签了名。

为加强和十七路军的联络，李克农还安排人员在十七路军内建立了秘密电台，保持和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系。

这时的李克农又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不停息地工作着。埃德加·斯诺——这位经验丰富的美国记者，用他那独有的敏锐眼光，为这个时期的李克农留下了一张宝贵的“速写”：

“李克农有些易于激动，说话很快，富有幽默感而又善于模仿别人。”

在他那本旨在向世人揭开红军——这群战斗在西北高原上不屈的革命者的神秘面纱的名著《西行漫记》中，还记载了这么一段有关李克农的小插曲。在斯诺前往根据地保安采访的途中，一天，他被安排在百家坪过夜，由于开水很烫，口渴的斯诺就招呼一位从身边走过的小红军：

“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

那位小红军却不愿搭理这位外国客人。

几分钟后，着急的斯诺先生又去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一样。出什么事了？斯诺心中纳闷。

这时，李克农走了过来。他戴着厚厚的玻璃近视眼镜，斯诺称他“瞎子”。李克农笑话他说：“斯诺先生，你可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你可以叫他们‘小鬼’，要不你就叫‘同志’，你不能叫他们‘喂’。这些孩子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都是小革命，他们是自愿来帮忙的。只有地主家的佣人，才被称‘喂’，他们个个可都是未来的红军战士啊！”

斯诺听罢，恍然大悟。他按照李克农的吩咐去做，果然如愿以偿。这些大多是迎来送往的外事活动。此外，配合中共中央部署，联络局还有一项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任务，那就是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央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朱理治等协助工作。李克农走马上任后，首先在瓦窑堡举办了训练班。其中一个班是由红军在对东北军几次作战中俘虏的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共120人，称为“解放军官学习班”。

开班第一天，这120名军官抬头四看，见四周贴满了标语：“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突然又响起了熟悉的歌声，只听围坐在学习班周围的几十名红军小战士，放声高歌《打回老家去》，歌声震天动地，这些东北军军官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李克农给他们上的第一课。接着，李克农又请来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人来给大家讲课。毛泽东也来了，他说：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

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

东北军的军官们感动了，醒悟了，他们自发地成立了抗日同盟会。许多人还找到李克农，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要求回到东北军去做工作。

李克农也在其中精心物色人员，他要在东北军中打开一个缺口，同共产党联合抗日。

而张学良，这位东北军的最高统帅，此时，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是国民党的一支地方实力派。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听命于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将东北千里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不战而退，撤至关内，成为受人嘲讽的“不抵抗将军”和“流浪将军”，国内遣责之声四起。

1935年10月，蒋介石为了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司令，将东北军调往西北充当进攻红军的炮灰。

然而，在战场上鹿死谁手，这可是要靠枪杆子说话的。形势令这位34岁的少帅很不乐观：

1935年9月，劳山战役，东北军110师被红军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

同年10月，榆林桥战役，619团被全歼，团长高福源被俘；同年11月，直罗镇战役，109师全军覆没，师长牛元峰毙命；紧接着，黑水寺战役，106团的骑兵部队又在吴起镇遭到重创；……战场上这接踵而至的惨败，将少帅颇为自信的头脑击得眩晕不堪。才短短的三个月不到，损失已是如此惨重，赫赫有名的东北军被红军报销了近三个师，张学良痛苦万分，他长叹一声：“学良真是心中痛苦倍增！这许多优良将才没有牺牲在抗日前线，却埋身于内战的战场，真是可惜可叹！看来，共军的战斗力，决不可小视啊！”

这时，连战连败的东北军中下层官兵，对这场看不见任何取胜希望的“剿共”战争也越来越不满。劳山战役后，成千名在这场“剿共”战争中被歼被俘官兵的家属，到张学良的“西北剿总”门前哭诉。张学良一向以体贴下属著称，此时此刻，他看见黑压压的人群拥向他身边，心中也不由得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张学良这时真正意识到：中共和红军是“剿”不完的，“剿共”战争再不能打，也打不下去了！

而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军这类“杂牌”葬身红军之手，却是幸灾乐祸。1935年10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往日车水马龙的门前，忽然变得来客寥寥。对于张学良依照惯例提出的重建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损失的部队和给予补给的要求，蒋介石不仅不批准，连110、109两师的番号也给取消；甚至连张学良要求对“忠勇殉国”的何立中、牛元峰的家属特恤各十万元，也被驳回。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张学良痛苦、彷徨。

败军之将，焉敢言勇。一个念头——同共产党讲和的念头，在张学良的胸中腾然升起。一定要找到共产党！可共产党在哪里？

张学良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同共产党接上关系，颇费了一番周折。1935年11月，张学良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托故来到上海，他要在这里会见老友杜重远。杜重远是张学良的同乡，“九一八”前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秘书，两人私交笃深。“九一八”后，杜重远来到上海，一面兴办企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与章乃器、邹韬奋等一起编辑《生活周刊》，后又充任《新生周刊》的总编辑。1935年6月至7月间，由于《新生周刊》登载了《闲话皇帝》一文，被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的“罪名”判刑一年零两个月。

张学良到达上海的时候，杜重远正在服刑，被保释移住在虹桥疗养院，由法警监守。张学良秘密约见了杜重远，想听一听他在政治上有些什么高明的意见。

老朋友之间，开诚布公，肝胆相照。杜重远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张学良过去几年“剿共”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提出了在西北搞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针对张学良对共产党的种种怀疑和顾虑，杜重远强调说：只要你汉卿老弟下决心走抗日这条道，共产党一定会跟你联合的，这一点不用怀疑。杜重远言辞恳切，张学良听了频频点头。

同共产党联合，需要一位穿针引线的人物，张学良看中了刚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

李杜，辽宁义县人，1908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此后，他在东北军中几经升迁，官至吉林自卫军总司令和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1932年，他率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失利后退往苏联并同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定的联系。

这次到上海，张学良也特地拜访了李杜，同时当面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替自己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然后再设法通知他。1935年底，张学良返抵西安后，一面静候李杜的消息，一面又积极寻找新的线索。

他忽然想到：不久前发生在北平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就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而以他自己为校长的东北大学中的许多学生都参加了这次运动，或许从中可以找到同中共联系的合适人选。他命令东北大学学生会派代表来见他。

通过老部下沟通与红军的联系

果不其然，以中共地下党党员宋黎为首的三名学生代表前来西安见张校长。当宋黎向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一二·九”运动的详细经过以及要求打回东北老家的心愿时，聪明的张学良几乎可以肯定，眼

前的这位能言善道的小伙子必是共产党无疑。不过，宋黎毕竟年纪太轻，张学良不放心寄以心腹，于是他将宋黎留在了身边当秘书，打算日后再作计议。

张学良还想到了另外一个线索——即通过东北军的前线部队沟通与红军的联系。他将这一主意告知心腹大将王以哲，这位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自然心领神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共产党联系的这根线，最后还是由他的老部下、被红军俘虏的 619 团团长——高福源给牵上了。

1935 年榆林桥一役，高福源所辖团悉数被歼，高福源本人被红军生擒。

高福源 40 岁出头，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一眼望去，一副标准的军人形象。和东北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禀性爽直，浑身透出一股东北大汉的血性。在被俘的两三个月生活中，他参加过李克农主持的“解放军官学习班”，亲眼看到了红军的互助友爱、生气勃勃，体会到红军对他的宽大政策和热情照顾。和这样一支军队交战、被俘，使这位强烈要求抗日的军人痛悔不已。终于有一天，高福源忍不住了，他突然提出要见红军的负责人，说有要事相商。

李克农来了，他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身份来见高福源的。两人坐定后，话匣子就打开了。高福源不把李克农当外人，将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变化，一古脑儿全向李克农抖了出来。

这次谈话令李克农欣慰，一方面，说明“解放军官学习班”是有成效的；另一方面，李克农确信高的立场转变是深刻而真实的。临别时，高福源拉住李克农的手，非常诚恳地说：“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衷心佩服。我相信，这些做法主张，不但我完全同意和佩服，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也会佩服，并且可能愿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贵方合作。我现在抗日热情很高，愿意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李克农当即表示：你的这个建议，符合我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待我请示中央后，可以放你回去。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本人倒很为你回去后的生命安全担心哩！

高福源很自信，他拍拍胸脯说：“没问题，再说，即使杀头我也不怕。”

李克农很快把这一情况上报了中央，中央十分重视，迅即批准了高福源的建议。

临别之际，李克农反复叮嘱高福源，让他回去后，先用自己的身份试探一下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真有和平诚意，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和他谈判。

1936 年 1 月初，获释的高福源踏上了返回东北军的归途。他先到洛川去见东北军 67 军军长王以哲。王以哲随即给张学良发去一封密电：“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接电后，次日就亲驾他的波音专机飞抵洛川，去见这位突如其来的红军使者、过去的老部下——高福源。

高福源见到自己的最高统帅后，“啪”地一个立正：“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这次，是红军派我回来

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随后，这位七尺汉子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中国要是继续内战下去，不只是东北军有灭顶之灾，东北失地没有收复的日子，就是整个中国也危在旦夕。……我们应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合起来与全国人民携手抗战，洗去背在身上的历史罪名。副司令应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啊！”

话说完了，高福源双膝落地，长跪不起。他知道，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性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他在等待少帅的裁定。高福源哪里知道，他的担忧与恐惧是多余的。一席话，把张学良和王以哲说得双双落泪。张学良走上前去，一把扶起高福源，恳切地说：“你回来很好！你谈的很对！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今后可放心做这一工作，如果你遇有不测，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1月16日，心情振奋的高福源奉命回到陕北苏区，把详细情况一一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很高兴，领着他去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中央领导十分赞赏高福源这一举动，毛泽东当场拍板，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李克农出发前，高福源又被派往洛川，同王以哲约定与红军电台通讯的呼号和电码。2月中旬，双方电台正式叫通。2月19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和红军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将李克农等中共代表的出发日期由电台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

洛川会议

2月21日，漫天大雪，黄土高原上原驰蜡象，一片银妆素裹。在从瓦窑堡到洛川的羊肠小道上，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李克农率领四名随从人员，在高福源的陪同下，前往洛川秘晤张学良和王以哲。李克农身穿中山装，四方脸上架着一付圆形厚玻璃眼镜，显得气宇轩昂、严肃庄重。秘书长钱之光也身穿中山装，紧随其后。译电员戴镜元，个子不高，只有17岁，穿着学生装，像是要出远门的学生娃。警卫员和马夫，头上扎着白汗巾，身穿对襟白布衫，腰上扎根布腰带，一副陕北汉子的打扮，做向导的高福源也是一身便装。

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绝对保密。

25日下午，李克农一行踏着盈尺深的积雪，终于来到离洛川不远的 县。早就奉命准备的东北军 67 军某团团长亲自出城迎接。李克农一行在此稍事休息后，又向洛川方向前去。

深夜时分，李克农等安抵洛川。这里已是寒气袭人、滴水成冰的世界了。

洛川是东北军 67 军的驻防地。军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蕃希望和红军合作的愿望非常迫切，他们热情迎接了李克农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为防消息泄露，李克农一行被安排住进一个紧靠军部的三进四合院里，高福源的同学、参谋处长佟道和一名副官陪住，院外哨兵把守，戒备森严，形同“软禁”。当然，招待没话说。

王以哲、赵镇蕃将李克农一行安排妥当后，即密电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本答应亲自参加会谈，但因临时去南京有事，不能前来，电示王、赵二人妥为招待，先谈具体问题，重要事项待他回来相商。

2月26日，会谈正式开始。根据张学良的意见，李克农和王、赵二人主要就67军与红军局部合作问题进行了谈判，经过开诚协商，双方达成口头协定：

1.确立红军与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包括67军在甘边区及关中区的防地)；

2.红军同意恢复67军 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3.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延安、甘泉两地67军所需粮食、木柴等物，一是67军自己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二是红军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送粮、送柴进城出售，以便利东北军；4.双方都可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双方对办货人员要负保护之责，并给予方便。但为掩人耳目，办货人员应着便装；5.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达半年之久的67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挠；

6.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以全面停战促全面合作，是这次会谈的最重要的成果。

会后，李克农即电告中央。中央批准了这一协定，双方约定自3月5日起秘密下达执行。

而王以哲在会后，除了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两批物资外，还收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各一份赠送给红军。他知道，处于西北一隅的红军很需要这些东西。可见，王以哲对与红军合作，态度是真诚的。

张学良也不例外。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飞返西安。4日，他顾不上鞍马劳顿，亲驾飞机抵达洛川，赶往李克农的住地。对这位西北“剿匪”副司令，李克农在上海就曾有过一番“研究”，只是素未谋面。只见眼前站着的这位30来岁、英俊洒脱的年轻人，身穿一件做工精致的长衫，手里拿着根司的克(英文stick，指“手杖”)，不像是统领千军的统帅，倒很像是一位商人。张学良一步上前，紧握着李克农的手，半开玩笑地说：“你和老王、老赵搞的那几条，我都知道，完全同意。不过，这次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说罢，就“哈——哈——”大笑起来。

李克农打趣地说：“张将军，莫非你解甲从商了不成？”李克农心里清楚，张学良想打一张大牌，他要同红军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会上激烈争锋

下午3点，会谈开始。

张学良首先发言：“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抗日，就得联合他，否则很困难。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提反蒋抗日，不要蒋介石，是个很大的失策。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蒋抗日，你们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呢？”

李克农说：“蒋介石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不许抵抗；对主张抗日的红军却全力‘围剿’。我们现在号召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仍然专打内战，死不抗日，他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我们又怎能把他列入团结的对象呢？所以，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李克农之所以说出这番话，是因为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提“反蒋抗日”。这个提法张学良不同意。双方就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这个问题，展开了坦率的争论。

李克农尽力解释，也没能说服张学良。最后，李克农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放弃反共政策，解除对人民的压迫，愿意团结全国人民抗日，中共对他的态度可以重新考虑。

张学良又问：“要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李克农说：“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另外，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胜，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张学良接着问道：“共产党既然抗日，为什么要走山西去东征？从山西走，一定会遭到阎锡山的有力遏制，何不走宁夏、绥远？那里与外蒙、苏联靠得很近，不是更顺利些吗？”

李克农解释说：“红军东渡抗日，一是为了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二是为了解决红军军需和兵源问题，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至于为什么不走宁夏、绥远，李克农未多作解释，张学良也没有深究。张学良还提出红军与东北军分别派出代表与苏联接洽有关援助中国抗日问题，并与李克农商定，由张学良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盛世才此时与苏联关系较好。

最后，张学良提出要求，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中推出一位来再作一次会谈，会谈地点在肤施(延安)城，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和张学良还商定，由中共派一位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掩护，以便与各方联络，推动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等活动。

李克农言语机警，口若悬河，张学良谈笑风声，潇洒自如，会谈气氛十分热烈。

5日凌晨4点，会谈结束。

会谈结束后，李克农立即发长电给中央，报告会谈内容并请示以后的行动。

6日，中共中央复电，对谈判结果深表满意，对李克农一行表示慰问，并请李克农即日赴山西石楼晤谈。

7日，李克农一行三人，取道延长河，前往石楼中共中央所在地。当天，中央召开会议，李克农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人报告了此行经过及张学良希望会见中央负责人的要求。事实上，李克农发电回来当天，中央即已研究，认为张学良的要求是真诚的，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要，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我方全权代表，再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

此前的4月6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联名给张学良和王以哲打电报，内称：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

六时前到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请预告为盼。

双方电报往来，最后确定于4月8日在延安会谈。周恩来、李克农带着电台和一个小分队于约定时间来到延安东北二十里的川口。不料这天天公不作美，雨雪交加，道路泥泞，和张学良的电台联络又中断了。直到9日上午，才得知张学良亲驾飞机，带着他手下大将王以哲和在其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已到延安。张学良在上海的时候，曾授意李杜秘密探询共产国际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设法接上关系，刘鼎就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介绍给张学良的。

刘鼎，四川人。1924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后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他被派往赣东北苏区工作，在方志敏率领的抗日先遣队遭蒋介石围攻失败后被俘。后从九江俘虏营逃出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经友人介绍曾暂住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1935年12月张学良到上海会见李杜和杜重远时，表示要找共产党关系。李杜和宋庆龄有联系，提出过此事，宋庆龄知道刘鼎住在艾黎家中，她对刚到过瓦窑堡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说，艾黎家中就住了一个共产党员，可介绍他到张学良那里去工作。董健吾见了刘鼎，告诉他张学良急于找共产党的关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希望他能去西安见张学良。刘鼎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

延安会谈

1936年3月，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了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学良说：“寻找的朋友找到了。”张学良大喜，立即派其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将刘鼎接到西安，秘密安置在张学良公馆的东楼内。刘鼎在西安和张学良长谈数日，张学良对刘鼎的高论颇为赞赏，盛赞刘鼎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位可以交心的朋友。因而这次和共产党谈判，张学良带上了刘鼎，委以心腹。9日晚上8点，周恩来、李克农一行进入延安。为防走漏风声，红军小分队在延安城外做了周密布置。

延安清凉山下的桥儿沟一座天主教堂里，张学良和周恩来、李克农的会谈将在这里举行。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加会议的只有五个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刘鼎。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周恩来，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就已赫赫有名，此刻，刚毅的脸庞上蓄满长长的胡须，更显得神采飞扬。

会谈伊始，周恩来热情地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我就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1913年秋周恩来曾在沈阳读书）

张学良说：“这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起过。”周恩来奇怪地说：“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笑道：“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就是听了张伯苓的劝告后才戒除的，从此拜张先生为师。我们

可算是同师了。”

一阵笑声过后，张学良坦率地说：“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能够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认为当前的中国，必须实行民权主义，才能唤醒民众。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中山先生积 40 年的革命经验，我们不能放弃。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约请周先生当面谈一谈。”

周恩来说：“好嘛，多接触接触，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接着，双方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会谈。

张学良坦率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实际的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冯玉祥)先生一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来冷静地说：“蒋介石集团，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力量确是很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很大损失；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可是蒋介石奉行的是‘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的政策。对日步步妥协，对内残酷镇压群众的爱国运动，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国家权益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只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张学良应道：“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来争取。”周恩来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所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有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谈了。”

张学良回答道：“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仇恨。但他有个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周恩来听罢，站起身来，严肃指出：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罪行累累，难以尽书。最后，张学良问周恩来、李克农：“你们共产党是否真心抗日？”周恩来答：“真心！”“是否倒蒋方能抗日？”“是的！”

张学良听罢心一沉，痛道：“你们的抗日和蒋委员长的攘外，如果都附带倒蒋或安内这些条件，我实在不能苟同。因为，日本人是绝对不会干等着你们去倒蒋或是剿匪的啊！”说完，易动感情的张学良大哭不已。

周恩来看着张学良一片赤心热胆，也不禁陪着落泪。他随即表示：“如果蒋介石能放弃剿共政策，我个人表示同意联蒋抗日，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新受他的领导。旧帐，我们不愿再算了！”

不过，这一问题事关中共的方针政策，周恩来提出须将意见带回中央请示，再作最后决定。

张学良听完，由忧转喜，他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会谈相当成功。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效

10日清晨4点，会谈结束。张学良一片报国之心，给周恩来、李克农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一行人同张学良挥手告别，依依而去时，一抹朝霞已经飞上了延安的宝塔山。

4月12日，周恩来、李克农回到瓦窑堡，刘鼎也同行。第二天，留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立即开会，听取周恩来在肤施与张学良会谈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刘鼎到张学良处，任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邓发作为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在肤施、宜川、洛川、西安等地建立通往白区的交通机关。并决定加紧抗日宣传工作，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

中共中央决定刘鼎担任驻东北军代表后，周恩来指示他同李克农研究在西安建立秘密无线电台以及从瓦窑堡到西安和西安到北平、天津、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秘密交通线问题。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物色一个技术较高的报务员，日后由地下交通送去西安建立电台，密码由李克农交给刘鼎带去并教他使用。

4月22日，周恩来写好给张学良的信，并和李克农一起同刘鼎谈话。周恩来对刘鼎说：中央决定你去担任驻东北军代表，这件事很重要，是我党第一次做这样的统战工作，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刘鼎到西安后，果然不负重托，着手秘密电台和秘密交通线的建设，并对东北军进行了多方位的统战工作，成效显著。

1936年6月，热衷于内战的蒋介石严令东北军从南向北分三路进攻瓦窑堡，并指令驻瓦窑堡东线的国民党中央军配合进攻。为配合中共中央对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央决定主动撤出瓦窑堡，以便张学良好向蒋介石交差。

周恩来奉命负责指挥红军抗击东线国民党中央军和组织中共中央机关有序地向保安方向撤退。为争取时间，6月14日，周恩来电告王以哲：“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将会“造成两方敌对，对目前形势实有大害”。王以哲接电后随即南撤。19日，周恩来又电告王以哲：若国民党中央军进占瓦窑堡，我方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

当周恩来正在组织中共中央机关撤退时，一股陕北地方武装于6月21日突然袭击瓦窑堡。周恩来立即指挥红军反击，掩护中央机关西撤至保安，同时，他又指挥红军第二十九、三十军包围瓦窑堡，并请李克农与王以哲取得联系，协商用“打假仗”的办法将东北军引进瓦窑堡。

李克农与王以哲商量妥当后，亲带一个排的人马，煞有介事地布置在瓦窑堡南边的山岗上，与王以哲的部队一起朝天放空枪，红军“寡不敌众”，东北军“愈战愈勇”，一直进入到瓦窑堡城内，原来占据该城的地方部队只得悉数撤出。

王以哲部占领瓦窑堡后，这里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和平共处、互相往来的地方。此后，中共中央迁往保

安。

除了做好同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外，李克农主管的中共中央联络局还积极派代表同国民党地方势力领导人建立关系。介绍信统一由联络局用复印纸复写在4寸见方的薄棉纸上，写好后送毛泽东签名盖章，再填上对象和代表的姓名，由出去的代表密藏在衣服角上带到目的地后面交。所有名单均经中共中央决定，李克农协助周恩来具体安排。介绍信的原文如下：××先生勋鉴：

日寇进攻，国家危急，亟宜一致奋起，组成坚固的抗日阵线。为着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冀、察、晋、绥、山东，与仇敌血战到底之总方针而斗争。弟等对××先生抗日决心甚为钦佩。兹派××同志前来晋谒，请予接洽交换意见，并赐指示，以期驱除强敌共救危亡。临书不胜屏营系念之至。敬致

抗日民族战争之敬礼毛泽东(盖章)月日

先后派出带有这种介绍信的有：到西安见杨虎城的张文彬，到太原见阎锡山、后又到绥远见傅作义的彭雪枫，到广西见李宗仁、李济深的云广英，到山东见韩复榘的张经武，到宁夏见马鸿逵的张子华等人。与地方势力的联系，对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李克农在这一时期的出色工作，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李克农秘晤张学良以及在同国民党地方势力所进行的统战工作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为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制造了契机。毛泽东很欣赏李克农的干练才智，夸奖说：“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

第三篇

李克农作为一名被国民党通缉多年的“共党要犯”，孩子们不知其生死存亡，而国民党的报刊上却时常出现有关他被捕被杀的消息。为了避开骚扰，孩子们上学填写表格，在“家长”这一栏里，填的不是李克农，而是爷爷李哲卿的名字。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点，西安临潼华清池沉浸在一片隆冬的寂静中。

忽然，一阵激烈的枪声从这里骤然响起，张学良卫队一营某连包围了这里，拉开了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的序幕。

1936年12月4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飞临西安，以华清池为行辕，向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部署“剿共”计划，压迫张、杨就范。

12月7日，张学良、杨虎城得知蒋介石已准备了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第一个方案：如果张、杨服从他的命令，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将全部开赴陕北进攻红军。假如不执行他的命令，就实行第二方案：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陕、甘两省由国民党中央军接管负责“剿共”。而且，蒋介石已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张、杨均不愿执行“剿共”命令，又不愿调往南方去被蒋介石分割、消灭。12月7日和8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前往华清池劝说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用政治方法解决红军问题。结果蒋介石不仅不为所动，而且大发雷霆。

蒋介石的顽固态度终于迫使张、杨作出断然决策：兵谏蒋介石，迫其停战抗日。

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蒋委员长被扣留起来，张、杨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建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二人分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惊天地，泣鬼神，名垂青史。而西安，这座位于渭河中部、有着三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都，一时又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遽然发生的事变，犹如平地一声惊雷，使错综复杂的国内政局变得更加混沌迷茫。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意见。12日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对内情尚不明了的“西安事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负责人都作了重要发言，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从民族利益的高度出发，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应张、杨两将军电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和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促使蒋介石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转向停战抗日。

不久，中共中央又指派李克农、伍修权和边章伍赴西安协助工作。边、伍二人在西安等待布置新的任务，没有直接参加处理“西安事变”的工作。李克农一到西安，就立即担任了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统管内部事务。

李克农的工作量很大，每天从早忙到晚，深夜11点以后，还要等待周恩来、叶剑英回到住地，向他们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到满脸倦容的李克农上床休息时，早已是万籁俱寂、众人入梦了。这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长期过度的劳累，加上贫瘠的西北高原上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得李克农那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他眼疾更严重了，哮喘病不断发作，整天咳嗽不止，心脏也出了问题。

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而张学良不久又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即命令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开庭审理，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不久，虽宣布“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如笼中之虎，失去了自由，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杨虎城将军，于1937年6月被迫辞职赴欧美考察，抗战胜利后返国，被蒋介石下令囚禁，于大陆解放前夕遇害于重庆松林坡戴公祠，时年56岁。

张学良赴宁被扣后，蒋介石一面施放政治烟幕，一面对西安作军事部署，大兵压境，东北军一向以张学良为核心，此时群龙无首，形势日趋混乱。

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大多握有团营实权，张学良过去很器重他们，他们对张学良也有很深的感情。他们要求抗日，有爱国热忱，但思想有些混乱，处理问题不够冷静，特别是对张学良被扣表示无法接受，强烈要求不顾一切地营救。

这批人中，为首的是张学良警卫团团长孙铭久。“西安事变”发动时，他曾亲率队伍冲入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张学良被扣后，以他为首的少壮派和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的主和派发生了尖锐矛盾。

1937年2月2日，孙铭久警卫团的一批人，突然闯入王以哲的住宅，开枪将王打死，制造了一起异常严重而又本不该发生的悲剧。消息很快传给周恩来，他闻讯立即和李克农等人赶到王以哲家。李克农看到王以哲身中九弹，躺在血泊中，他深为这位曾在古北口大战过日寇、又和自己进行过面对面对谈判的东北军高级爱国将领的惨死，发出了阵阵叹息。

王以哲的家中哭声一片，乱成一团，李克农等人协助周恩来，帮助布置灵堂，安慰家属，料理后事，使东北军许多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孙铭久等少壮派军官的严重错误几乎导致东北军内部的大分裂。然而，他们在“西安事变”中又都是有功之臣，杀王以哲的动机也是为了拯救张学良，因此，周恩来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安排他们离开了西安，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然而，西安的局势仍然在恶化。

李克农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暂时转移到西安北边的三原，那里驻扎着红军一军团，周恩来则坚守西安，并在七贤庄一号公开建立了红军办事处。

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一个师开进西安，“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也于次日抵达西安。西安的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

充满戏剧色彩的“西安事变”终于结束了它悲剧性的尾声，一个全民族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抗战局面，如黎明前的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时势造英雄。

办事处的“红小鬼”

西安局势稳定后，李克农走马上任七贤庄红军办事处处长，负责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早期筹建工作。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李克农的工作在各地不断调换，但始终都是搞办事处工作。西安办事处设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巷内杨柳满目，郁郁葱葱，景色怡人。门口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教导队通讯训练班”的牌子，这是因为顾祝同害怕中共和红军的影响扩大，采取的是“掩耳盗铃”的办法，十七路军的士兵负责门卫。

办事处是中共设在国统区的一座桥头堡，也是一个窗口。任务相当复杂、繁重。给中共采买各种物资、同中央保持电讯联络、迎来送往以及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等等，都是办事处经常性的工作。

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几乎清一色是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红小鬼”，由于他们头大个小，加上为和“通讯训练班”的学生身份相符，李克农让大家穿起了统一的学生装，所以附近的群众都戏称他们是“娃娃”，办事处自然也就成了“娃娃店”。当时西安有两家放映无声电影的电影院，对学生只收半价，办事处

的这些“娃娃”们就冒充学生到电影院去看半价电影，算是开了洋荤。一到休息和吃饭时间，院子里总能传出阵阵喧哗和打闹声。然而这些“娃娃”，年纪虽然不大，工作却丝毫不能马虎。因为李克农对工作抓得很紧，特别是对机要工作，更是随时检查，不许出漏子。

由于周恩来经常外出活动，李克农给他配了警卫副官陈有才。他除了教陈有才做好警卫工作外，还教他随周恩来到国民党机关时，如何给传达室通报、递送周恩来名片等等，并且给陈有才特制了一套呢子大衣和礼帽。

对这些“红小鬼”，李克农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教会大家如何开展工作。一些原来握枪的粗手，也在李克农的指导下，学起了如何给客人挂衣帽、如何递烟送茶之类的细活。这，也是工作。办事处刚刚成立的时候，由于工作人员大多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土包子”，不懂社会上的礼节，客人进屋，他们不知如何接待，只顾着站在一边看。周恩来说这可不行，就要李克农等人教大家怎样待人接物。李克农说，客人进来后，要先引到客厅外，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再引进客厅请坐、上茶……如此如此。

就是这样，笑话还是不时地出现。有一天，一位民主人士来办事处，一位小公务员照章办事，不等客人站好，就动手将客人头上的礼帽摘了下来。幸好这是位对我党友好的人士，客人只一笑了之。李克农得知后，将这个例子作为教材，告诉大家要等客人自己取下礼帽后，才能接过来挂上，不要抢先动手。

边摸索、边学习，“土包子”们也渐渐地适应了环境，成为彬彬有礼的服务人员了。

俗话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李克农是豪杰之士，也是有情之人。在办事处，稍有空闲，他就常常想起父母妻儿。上海一别5年来，他和家人天涯海角，音信杳然。念及此，他给芜湖的亲人写了一封家书。

李克农是个好儿子，也是个好丈夫。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用寥寥数笔为李克农勾画出这样一个形象来。1936年10月中，我在红军中呆了近4个月以后，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终于完成了。……

李克农的儿女们

“别忘了我的假臂！”蔡树藩叫道。

“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

“给我送个老婆来！”李克农责怪道。

李克农的要求不高，只要夫人送来，即心满意足矣！

其实，李克农一家人也整日为他牵肠挂肚。赵瑛带着孩子回老家后，一家人只能从国民党报纸的零言碎语中推测红军的行踪，猜想李克农的下落。

家里生活日见艰难，在芜湖颇有些名望的老父亲被迫到处借债，赵瑛当小学教员，勉强养家糊口。处事庄重、待人谦和的赵瑛，把一个人口多、收入少的大家庭安排得十分妥贴，对公公、婆婆关心备至，与孩子们的叔叔、婶婶也能和睦相处，她话虽不多，但却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就连公公也尊称她为“赵先生”。

李宁日后曾经这样回忆起那段时期的赵瑛：

母亲教学工作相当辛苦，每天晚饭后，人们都已各自休息了，唯有母亲还在昏黄的灯下，精心地为几个班备课和批改作业。有时还要为我们姐弟缝制衣服。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时我们睡醒一觉，仍看到母亲在灯下为我们缝补、操劳。这些都深深地烙印在我们脑际。真是千针万线浸透了母亲多少汗水，蕴藏着多少慈母的爱啊。繁重的教学、繁琐的家务、五个子女的抚育，沉重的担子压在母亲的肩上(当时她才三十多岁)。一九三四年，外祖父病逝，家业衰落，照顾外祖母的担子也压在母亲的肩上。

李克农作为一名被国民党通缉多年的“共党要犯”，孩子们不知其生死存亡，而国民党的报刊上却时常出现有关他被捕被杀的消息。为了避开骚扰，孩子们上学填写表格，在“家长”这一栏里，填的不是李克农，而是爷爷李哲卿的名字。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全家的生活愈见困难，有时甚至要靠典当度日，几个孩子的读书也成了问题。

一天，赵瑛将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你们也慢慢地长大了，不要再依靠家庭了，要学会独立地创建自己的生活，有机会在学校学习固然好，但不是唯一的，有些大学问家就是自学成才的，只要自己努力，辛勤地劳动，总会获得丰硕的成果。”几个孩子历尽生活磨难，很体谅家庭的困难，为不增加母亲的负担，纷纷中途辍学。

16岁的李宁高中刚读了一年，就前往南京找了一个小职员的工作，从此走向了社会。

而小女儿李冰，则在凄风苦雨中度过了难忘的青少年时光。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李冰听从母亲的安排，考入了美国教会在芜湖开办的弋矶山医院护校，这里四年包吃包住，毕业后有文凭，较易找到工作，对李冰来说真可谓一大幸事。然而，进护校要先预交50银元保证金。就是这50元，对赵瑛来说也是一笔巨款，她四处借债，还当掉了自己稍稍值钱的东西和衣服。幸运的是，当时赵瑛的娘家情况略好，靠着他们的资助，李冰才得以考进了护校，在录取考试中，李冰成绩名列前茅。当李冰收拾衣物准备去护校时，赵瑛含泪送别：“以后的日子就全靠你自己了，不管怎样你都要坚持，将来一定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做个有出息的人！”这是赵瑛对孩子们的要求和期望，此刻，她将这句话送给了年幼文弱而又即将挑起社会重担的小女儿。弋矶山医院——这里是美国基督教文化的一面镜子。院长是美国人，教员和职工也有不少是美国人，而且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李冰，这个血管里涌动着和父亲一样澎湃热血的少女，在这样的氛围下，显得是那么格格不入。为了不被歧视甚至是除名，李冰和几个非基督教徒的同学，也跟着这些美国人去做礼拜，参加各种教会活动，当然，她们虽然和其他人一样，跪在耶稣像面前闭眼祈祷，但心中并没有想着上帝和《圣经》，而是期盼着能早日毕业，将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由于李冰在工作和学习中非常努力，成绩优良，加上为人处事小心翼翼，受到周围人们的广泛好评，渐渐地也就习惯了那里的环境。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38年，也就是李冰进入护校的第二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芜湖，美国人的家属和一些高级医护人员都纷纷逃离医院。赵瑛也带领家人到巢县乡下避难。

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美并未交战，作为长江下游一所较大而且有些名气的弋矶山美国教会

医院，日本人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由于医院空地多，不少难民纷纷拥入医院，搭起棚子，把这里当成避难所。

赵瑛逃离芜湖前夕，和李冰商量的她今后的去向。赵瑛认为，目前医院还是比较安全的，希望李冰能再坚持两年将文凭拿到手，将来也便于找到工作。于是，李冰就留在了医院。

赵瑛带着家人走了，整整两年音讯全无。而这两年，李冰是在恐惧和不安中度过的。

弋矶山医院门口多了日本士兵站岗，不得随便出入。每次外出都必须向日本兵鞠躬，接受盘查。1940年李冰毕业时，原先招生的30个人只剩下了4人，而非基督徒只有李冰一人。第一次拿到工资时，李冰放声大哭！

由于家人没有音信，李冰毕了业也无处可去，而当时医院正需要人手，李冰被要求留下工作。不久，她就被提升为手术室护士长。1940年底，日、美关系日趋紧张，日本人开始出现在医院里，日本人的重病患者也不时送来诊治。医院里人心惶惶，美方院长和其他一些美国人开始撤离，最后只剩下了几位年老的美国医生与护士长，医院成了维持会，“到哪儿去呢？”这是每天盘旋在李冰脑海里的的问题。

骨肉分离的痛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李冰焦虑不安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医院办公室的中国主任将李冰找到他的办公室去，神情紧张地询问起她的家事来，并告诉李冰：日本人已来医院调查了李冰两次，称芜湖的共产党员李克农的女儿据说就在这所医院里。由于李冰进校时已改名“李静彬”，“家长”是爷爷李哲卿。所以院长只答应进行调查，应付了过去。

不久，日本人又来盘问，院长见事有不妙，赶紧劝李冰离开医院。可是年方20岁的李冰投奔何方呢？她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急得整天只有哭泣。

几天以后，有两个身穿老百姓服装的陌生人到医院来找李冰，说是赵瑛派他们来接她去上海的，并给了一笔路费，而且他们还告诉李冰到上海车站后有人来接她，交待了如何找到接待的人。原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初步形成，李克农终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1936年11月，赵瑛收到了李克农从北方捎来的鸿雁，李克农的这封信很长，信的最后一句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思念家人之情，你们可以想象到。”全家人得知李克农还活着，都兴奋不已，欣喜若狂。此后，李克农便常有家书寄回。

李克农就任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一职后，赵瑛和一家老少，步行来到武汉，终于得以和李克农团聚。以后随着日军进逼，赵瑛又跟着八路军办事处转移到湖南、贵州和广西。到桂林后，赵瑛决定将处于兵荒马乱中的李冰接来。于是，就出现了上文中所描述的那一幕。

恰好此时弋矶山医院有一位家住上海的大夫要回去探亲，于是李冰便与他一道匆匆忙忙地登上从未坐过的火车离开了芜湖。在上海车站，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伯伯将李冰接出了站。这位老伯伯，李冰小时候见过，他是和李克农交往甚密的共产党员。

此时李克农已经就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由于日军侵入云南，滇缅路被封闭无法通过。李冰在上海住了两个月后，在中共地下工作者安排下，被送往香港等待时机。一个月后，李冰和其他一些海外华侨中的地下工作者们，在中共地下党接引下，穿过日本及国民党的严密检查，从香港经九龙偷渡到广东淡水，由惠阳进入内地。

一个多月的昼夜行走，终于到达广西桂林，李冰见到了失散已久的父母。20岁的女儿此时此刻变成两岁的小孩，一头扎在妈妈的怀中，泣不成声。

李冰在解放后长期从事肿瘤防治工作，是新中国肿瘤防治事业的优秀领导者和具体参与者，她领导组建了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及肿瘤研究所，成立了中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在组织上为全国的肿瘤防治研究进行了准备，为中国肿瘤防治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回忆抗战初期的这段经历时，李冰充满感慨地说：李克农等一批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都是默默无闻却又最无私无畏的人，至今我对这样的地下工作者还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默默地不顾一切危险地奉献着，有些就在敌人阵营而不为人知，或是受着严酷的困苦和冤屈，家属也受尽牵连不能翻身。我是幸运者，又有什么艰难委屈不能愉快克服呢？这也是我几十年来的一种‘动力’，是自我斗争中战胜自己的力量。”革命，要面对牺牲。革命，同样要能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营救关押的“政治犯”

1937年3月，李克农抵达上海，一方面治疗眼疾，一方面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建立半公开的红军驻沪办事处，联系中共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统战工作。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交由李涛负责。大上海，又见面了！

时过境迁，景物依旧，往事历历在目，李克农心中不由地发出阵阵感慨。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经国民政府批准，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改编后，八路军即开赴华北前线，深入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李克农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和潘汉年、刘少文等人一起，在红军驻沪办事处的基础上，筹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

不久，办事处正式成立。它设在上海福煦路多福里21号（今延安中路504号），中共党内同志都爱称这幢两层小洋楼为“李公馆”，李克农、潘汉年、秘书长刘少文和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在这里办公。

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进行上层统战、联系社会团体、恢复中共党组织、运送物资器材、散发宣传品和营救中共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出狱。

李克农在驻沪办事处工作的时间不长，他的主要精力用在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的工作上，对每一个被国民党关押的同志，他都做了极其细致的调查研究，力求使营救工作卓有成效。中共杰出的文艺工作者夏衍，第一次和李克农见面，就是在办事处的那幢小洋楼里，也正是在那儿，他为李克农开展营救工作所花的功夫而折服。

那次见面，性格腼腆内向的夏衍，看见严肃的李克农，很有点紧张和拘束。但话匣子一开，夏衍不禁

被李克农那平易近人的态度和风趣的谈吐打动。

最令夏衍惊奇的是，李克农对文艺界的情况了如指掌，某人是哪个省的，某人在狱中用什么别名，某人在上海有什么社会关系，他都心中一本清帐。因为李克农正在做营救“政治犯”的工作，所以对每个人的情况一清二楚。这是详细调查研究的结果。临走时，夏衍向李克农道别，李克农让他等一等，并对站在身旁的一个人打了个手势。

“不用为我叫车，我离这儿很近。”夏衍误解地赶忙谢绝。“不，不，”李克农说，“让他先去看一看，弄堂外有没有‘狗’。”停了一会儿，又加重语气说：“听说你是‘福将’，在上海没有被捕过。但是，越是这样，越要当心。不要以为蒋介石会发善心，一边在做，一边在捉，即使国共合作了也要格外当心。”一席话，说得夏衍心悦诚服。

8月下旬，李克农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国民政府首府——南京，就任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驻沪办事处的工作改由潘汉年负责。办事处设在南京傅厚岗66号(今青云巷41号)一幢小洋楼里，是周恩来托关系租到的。叶剑英作为八路军驻京代表于8月中旬先到。不久，增加了钱之光，他负责办事处的军需和财务工作。工作人员有童小鹏、夏之栩、熊天荆、张樾霞、王凯、王超等人。8月底，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领着齐光、吴志坚、康一民、李白等来到南京，也参与了办事处的工作。

为便于工作，办事处又在高楼门29号(今高云岭29号)租了一座小楼，称“处长公馆”。

因对外联络的需要，李克农买了块少将肩章。他还印有名片，上面赫然写着：“陆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

负责机要的童小鹏等人，也依样办理，买了少校肩章，摇身一变，成了少校科长。

这一招，在只重官衔不看人的国民党官场，的确是行之有效的，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很多方便。

李克农接手工作后，营救和接待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的任务，就摆上了议事日程。他协助周恩来、叶剑英，想方设法，同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从监狱里营救和保释出几百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这中间，有从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黄文杰、刘顺元、陈农菲、王鹤寿等人；有从首都反省院出来的张樾霞、乐于泓、张恺帆、李世农等人；有从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出来的陈独秀和赤色工会国际驻太平洋工会会的代表牛兰、汪得利曾夫妇；有从和县临时监所释放的喻屏、陈春林等人。

出狱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他们有的径往外地，有的找到了地方住，更多的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像迷失的孩子找到家，个个热泪盈眶，兴奋不已。

办事处地方太小，李克农安排大家住进鼓楼一家旅馆，办事处派人登记、发钱、发衣服。出狱的人经过初步审查后，一部分由办事处直接分配工作，大部分送往西安转赴延安，总计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的，约有七八百人，全都由南京办事处买好火车票，分批组织起来，发给八路军护照走的。对那些在监狱中表现不好的，就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参加抗日。出狱的人员中，有的在监狱中没有暴露身份，对他们，李克农总是想办法安排打入国民党营垒，继续从事特殊工作。

奋力救战友

8月底从中央军人监狱被营救出来的陈农菲，就是其中的一位。8月29日，陈农菲和其他被营救出来的“政治犯”被送到办事处来。周恩来、董必武和被大家称为“参座”的叶剑英、李克农，亲切地会见了大家。李克农操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笑咪咪地和这些老相识打招呼道：“我们又见面了！”

李克农和陈农菲详谈许久，当话题转到陈农菲的工作安排时，李克农说：“农菲，你还 有一个比别的同志更有利的条件，要好好利用，这是花了代价换来的呀！”

“什么有利条件？”陈农菲被李克农一番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不是和大家一同从监狱出来的么？”

李克农看出陈农菲的迷惑，不动声色地说：“你有你的有利条件。我看了你的判决书，上面有‘被告坚决不承认有加入共产党之事实……’严刑逼供你都不承认，以后任何时候，只要是革命需要，你大可以搞你的革命的‘不承认主义’，利用你原有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到他们那里去进行工作。这呀，就是你的有利条件。要是承认了是共产党，国民党又是通报各地，又是照相、查指纹，再要隐蔽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啊！”

“哦，原来……”陈农菲恍然大悟，但又稍有失望。

他本来是憋足了劲要上前线打鬼子的，经李克农这么一说，只好答应说：“现在总算活着出来了，工作嘛，服从组织安排。”果然，陈农菲不久就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被国民党政府参军长吕超推荐给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受聘为国民党元老们办的《金陵日报》总编辑、代理社长。这家报纸正因为经营不善，销路很少，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陈农菲拿不定主意，去请示李克农该怎么办。

李克农听罢，高兴地说：“好事！求之不得的好事！我们党要办一张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发行的报纸，国民党用尽一切方法与我们为难。我们的《新华日报》现在还是有人无报，潘梓年、章汉夫同志等只好打‘太极拳’，国共合作的宣言，国民党到今天还不公布，八路军出动的消息也一点透不出去，我们党的主张不能与广大群众见面；假如这份报纸能在团结、抗战、民主的原则下，总编辑有权不受限制地工作，你便可以去，这需要与林森、吕超谈清楚。”

接着，对与《金陵日报》有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克农以行家里手的口吻评点道：“林森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是国民党元老，但对蒋介石的专横，自己当傀儡主席，内心是不愉快的，因此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他曾说过：‘我这主席不过是个监印官耳。’其实，这国民党的大印，也只有蒋介石才管得住。吕超这个空头参军长更是毫无实权。现在，他们都想利用抗战捞点政治资本。找你办报，目的便在于此，因为他们知道你过去在四川办报还有些成绩。现在他们请你，不要不答应，也不要答应，要讲点先决条件……”

李克农指点迷津，陈农菲茅塞顿开。

他去找了林森、吕超，谈了自己就任总编辑的条件：不理睬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杂志检查处每天对报纸

大样的检查，一切得由自己作主。

林森听完说：“现在是举国一致团结抗日，民主是要讲的，只要避开反独裁就可。汉群(吕超的字)，请你打个电话给检查处的那些人，《金陵日报》的大样，每天我都会过目，用不着麻烦他们了。”

吕超则进一步对陈说：“大样你看过就印，就说林主席和我都已过目。你就放手去干吧。”一切顺利。

陈农菲悉数上报李克农。李克农兴奋而又带几分调侃的口气说：“有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志将复杂的事情想得那么简单，而有时又将简单的事情考虑得过于复杂。国民党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要善于分析，懂得对什么工作用什么方法。他们不要我们办报，可他们的主席却请共产党人去当编辑，我们的子孙恐怕也不会相信有这样的糊涂事吧。”

说着说着，李克农激动地站了起来：“看吧！国民党独裁统治了十年，在他们的首都南京，即将出现一张为人民讲话的报纸。”这张报纸凝结着李克农的心血。

喉舌怒斥敌势

为把这张报纸办成中共宣传抗日的喉舌，李克农就如何利用这张报纸，甚至如何组织稿件等，都向陈农菲一一作了指示。他还介绍同陈农菲一起蹲过监狱的何云、周维以及平津流亡分子中的活跃人物朱穆之，协助陈农菲办报。陈农菲自己也专门约请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为报纸写稿，使这张原本死气沉沉的报纸，大有起色，一时有洛阳纸贵之感。

“党国喉舌”不知不觉成了人民手中的利器。

在宣传方面，《金陵日报》的出版，使中共在国民党的首府有了一块实际上的舆论阵地。同时，李克农还和叶剑英、博古等人，经常接见一些对中共友好的人士和中外记者，特别是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歼灭日军千余人以后，八路军在国统区名声大震，许多人来办事处打听消息，办事处一时应接不暇。李克农让袁超俊买了一架油印机，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战报印发，并用不同方式通过进步或中间报纸在报上透露出去。陈农菲接手《金陵日报》不久，就在该报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

此外，对充斥于国民党报刊之上的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诬陷和诽谤，李克农进行了坚决的抨击。

一天，南京一家自我标榜为“中性”的报纸——《新民报》，根据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胡编乱造地登出日寇已经打到了山西，而八路军却“游而不击”，不知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诽谤八路军的消息。

报纸摆在李克农的桌上，他勃然大怒，穿上军装，扎起武装带，佩好少将肩章，威风凛凛，气宇轩昂。

一个电话打到了《新民报》的办公室：八路军的李长官请报社总编速来办事处，有要事相商。

总编到后，李克农手指着报纸，厉声喝问：“总编大人，你说我们‘游而不击’，有什么根据？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消灭了多少日军，全世界都知道，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做想干什么？对其后果你负得起责任吗？”

一串连珠炮似的问话，问得那位总编头上直冒冷汗，一个劲地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表示明天一定更正。第二天，该报就登出了一条更正启事。

事后，办事处的同志对李克农说：“克公(大家对李克农的尊称)，您真有两下子。”李克农笑着说：“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嘛。”八路军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所要解决的困难也越来越多。向国民政府领取军饷、军械和其他军用物资；采购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所需物资，并运往陕西、山西等地，这些都是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任务。1937年10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国民党军政部的电报说：兹派职路参谋长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后所部与职路之一切军需、军械等，概由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负责署名领取，特电谨呈备案。

自那以后，凡是中共向国民政府争取过来的军用物资，都由李克农签名领取。

物资匮乏的中共中央驻地延安，缺乏纸张、棉布和其他物资，这些大多是由驻京办事处采购、运送的。战争期间，形势相当混乱，火车车皮十分紧张，但在宁、沪一带，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很高，拿着八路军的护照几乎都能得到优先照顾。

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随后兵分三路，向南京压来。国民政府决定分别迁往重庆、汉口、长沙三处办公，而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也决定分批撤往武汉。

李克农协助叶剑英为撤离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一是在京、沪、粤之间建立交通机关，以保证南京一旦陷落，中共交通联系能畅通无阻，并尽可能在敌占区建立交通机关；二是将从南京监狱营救出来的大批同志进行妥善安置和转移，或送往延安，或派往国统区工作；

三是抓紧时间从上海抢运数百吨物资到西安；四是继续着手准备《新华日报》的出版工作。

在办事处撤离前，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本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与驻沪办事处之间经常有联系，李克农指派上海他的学生宋季仁担任两地之间的交通。撤离前，李克农交给办事处的王凯一份密封的重要文件，让他在家中待宋来取。

碰巧，宋季仁另有任务去了汉口，并已在汉口获取了这份文件，就没有再来找王凯。南京沦陷后，王凯历经千辛万苦，才躲过了日本军队的魔爪，他将文件藏在裤裆里，带着妻子和孩子，扮做乞丐前往上海寻找宋季仁。但怎么也找不到，只得回家乡——福州，后来经过辗转才重新找到党组织。

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者，的确需要有铁的纪律。

12月初的一天，叶剑英、李克农、负责机要的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和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加上司机王应絮一共7人，分乘两辆旧车，从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前往武汉。这两辆旧车，原是李克农在10月间于上海用700元买的，碰上这兵荒马乱的时候，难以租到汽车，这两辆旧车就派上了用场。司机王应絮，本来在出租汽车公司工作，此时自愿留下为八路军开车。

一路上，难民拥挤不堪，道路崎岖难行，大家乘坐的两辆被戏称为“烂背骡子”的旧车，停停走走，

走走修修，走了5天才到长沙。到了长沙，两辆“老爷车”便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袁、王二人只好留下修车，其余的人改乘小火轮赶赴武汉，于12月10日左右抵达汉口。

第四篇

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情报、电报看完即毁，不得存档。对违反命令的人，李克农是要发火的。

一次，机要员朱轩正在值班，忽然日机轰炸的警报拉响，楼里的人纷纷避往附近的法租界。朱轩也和大家一起，提起装文件的密码箱躲进了法租界。

事情让李克农知道了，他大发雷霆，将朱轩狠狠地训了一通，并命令：以后遇到日机轰炸时，值班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楼梯下躲避，不准出门。令行禁止，谁也不敢犯禁了。对触犯情报纪律的事，李克农决不手软。

抓机要保卫周恩来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这是李克农新的工作岗位。

1937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二省政治局会议”，决定：为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党组织开展工作，于汉口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公开机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内秘密办公，办事处处长为钱之光。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分管统一战线工作，董必武负责民运工作，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李克农担任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此时也住在武汉。

作为中共和八路军设在国民党管辖区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武汉“八办”一时成为爱国进步人士心中的指路明灯。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等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办”人员，个个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投入抗日大潮，这种精神风貌，给来来往往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位署名“实甫”的作者，在《抗战》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

“八办”的环境很艰苦，而面临的形势却又十分复杂。当时的武汉，在政治力量上，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在共产党内，既有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又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身为秘书长的李克农，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除了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还要照顾各方，小心谨慎。大事小事，方方面面，他都尽可能地照应到。

李克农常说自己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由于工作繁重，李克农的身体越来越差。

武汉时期，国民党采取改善国共关系的一个重大措施，是邀请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8年初，蒋介石为适应抗战需要，改组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政治部。为撑起门面，蒋介石力邀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由陈诚担任)。周恩来再三推辞未果，报经中共中央同意，走马上任了这一重要职务。

蒋介石在邀请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同时，还邀请了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郭沫若是当时屈指可数的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1926年北伐战争时，他曾担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抗战爆发后，他回到上海，恢复了党的秘密关系。此时蒋介石邀请郭沫若任职，显然是为了利用他的声望为其罗致人才。

三厅成立后，郭沫若请著名戏剧家、中共党员阳翰笙做他的主任秘书，协助制定编制、安排人事和计划。按政治部规定，厅以下设两个处，每处三个科。在筹备中，蒋介石下达“手令”，第三厅还要设立一个对敌宣传处，这样就成了三个处。其中，第五处主管动员工作，中共秘密党员、文化名流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主管艺术宣传，著名戏剧家田汉担任处长；第七处主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此外，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张志让、洪深、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等都参加了进来，真是群贤聚会。

在长江局里，周恩来无疑是最为忙碌的一个人。政治部设在武昌，而他则住在汉口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里，每天上午9点前就要赶过长江到武昌政治部去上班，晚上又要过江回到汉口来，处理许多急待处理的事情，晚上9点多了还要召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由于会议讨论的问题既多且杂，常常开到深夜，有时甚至要到凌晨才能结束。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还得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或是审批李克农交来的情报，有时还要找同志谈话。他每天都睡得很晚，有时天亮才能休息。

为了配合周恩来的工作，李克农的作息时问也没有了规律。李克农原来住在长江局内，后来赵瑛带着孩子们从安徽来到武汉，办事处的钱之光处长安排他们一家到原来董必武住的安仁里去团聚。

这个情况，周恩来起先并不知道，大家也忘了告诉他。临时有事就派车请李克农到办事处来，由于周恩来事情特别多，常常叫李克农到童小鹏的房间里等着。待到周恩来同其他同志谈完话后，东方既白，周恩来疲劳不堪，就叫李克农明天再谈。李克农只得白等一夜，这已经是常事了。

照例，情报和机要工作由李克农主管。具体分工是：他的老部下张唯一、陈家康负责情报工作，童小鹏负责机要工作。童小鹏此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

严厉的工作制度

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情报、电报看完即毁，不得存档。对违反命令的人，李克农是要发火的。

一次，机要员朱轩正在值班，忽然日机轰炸的警报拉响，楼里的人纷纷避往附近的法租界。朱轩也和大家一起，提起装文件的密码箱躲进了法租界。

事情让李克农知道了，他大发雷霆，将朱轩狠狠地训了一通，并命令：以后遇到日机轰炸时，值班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楼梯下躲避，不准出门。令行禁止，谁也不敢犯禁了。对触犯情报纪律的事，李克农决不手软。

为这，他还和陶铸闹出过一段“大水冲到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趣事。

长江局在湖北省委的住处——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2号“董公馆”架设了一个秘密电台。一天傍晚，李克农来电台检查工作，刚刚走到电台房门口，朦朦胧胧中，忽见一人大摇大摆地朝电台门口走去。

此人正是陶铸。他是前一年被南京“八办”从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里营救出来的，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

李克农没见过他，以为是坏人，立即上前加以阻拦，陶铸看见一个戴眼镜的陌生人挡他的道，当即发起火来，非进不可。一个坚决不让进，一个非进不可。一个脾气倔，一个倔脾气。

结果，两个人在走廊上扭打了起来。李克农的眼镜被打掉在地。闻讯赶来的同志急忙拉开，作了介绍，李克农和陶铸二人正在狼狈不堪之际，一经点破，不由得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段时间，李克农工作很顺利，心情也很愉快。因为这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好时期，在中共全面抗战的旗帜下，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长江局和武汉“八办”一起，积极领导、组织和推动民众爱国运动的发展。

1938年7月7日，为筹集钱物，支援抗战，以实际行动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在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具体组织下，武汉地区掀起了群众性的“献金”热潮。为吸引群众，三厅在武汉三镇设立了五座固定献金台，每座献金台都由一位要人的夫人作台主，另外还有三座流动献金台，设在卡车上，进行流动献金。

中共代表团和武汉“八办”代表到江汉轮渡口献金台参加捐献，这里的台主是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由于李宗仁在3个月前，指挥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现在又是保卫大武汉的主力部队指挥官，因而，郭女士的出现，更加引人注目。上下轮渡的人群，自动集中到献金台前，纷纷捐钱。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周恩来献出了自己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个月的薪金240元；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除代表中共献出1千元外，又各自献上250元。李克农也来了。他首先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交上公函一份，并献现金1千元。公函上写着：

顷奉朱总司令自山西来电，嘱将八路军在“七七”抗战建国周年纪念日素食所节省的全部菜费1千元，代献作慰问抗战军人家属及救济被难同胞之用。

接着，李克农把叶剑英、钱之光、李涛、罗炳辉、边章伍和自己一个月的薪金也献了出来。

“八办”的其他工作人员——童小鹏、廖似光、龙飞虎、巴方廷等，也献出自己一个月的薪金。

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群众，以热烈的掌声来表示对这些民族精英的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见提高，蒋介石则忐忑不安，心有余悸，他命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严加防范。

戴笠，号雨农，小名春风，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民国初年，他混迹于上海交易所，结识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人。起初，他们视戴笠为小瘪三，让他干一些跑跑腿、送送茶水之类的杂务。后来，戴季陶打听到他姓戴，又是自己的浙江同乡，便对他多了一份关心。

一次，戴季陶问他读没读过书，以后想干些什么。

戴笠看到蒋、陈等人不似普通人，今后必将会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便答道：“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打流(指找不到职业，到处流浪)打到上海来了。”

一席话说得戴季陶对戴笠另眼相看起来，戴笠也相机老于世故地改口称戴季陶为戴叔叔。蒋介石见戴季陶器重戴笠，以后也吩咐戴笠干些事。

戴笠幸遇蒋介石，改变了他一生的经历。而他以后的发迹，也得力于蒋介石的大力提拔。

赴武汉车站智截叛徒

1938年4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把李克农叫到办公室，交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去武汉火车站迎接一位神秘人物，而且，必须迎到，不能空手而归。

这位神秘的人物是谁？——张国焘。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921年出席过中共“一大”，是建党的12名创始人之一。1930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后，先后担任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副主席等职，领导红四方面军和国民党军作战有过战功。然而大浪淘沙，泥石俱下，1935年6月红军长征途中，身为红军总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他，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竟然无视中央北上决定，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向川、康地区退却，并在卓木雕非法另立第二“中央”，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在陕北，为挽救张国焘，中共中央仍然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此时的张国焘，虽然口头上承认了错误，内心却早已和党同床异梦，插翅飞往武汉蒋介石身边去了。

1938年4月4日，正是中华民族思亲祭祖的清明节，为表合作抗战之决心，国共双方约定派代表去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合祭黄帝陵。国民党政府代表是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而中共代表则是张国焘。

祭陵完毕，张国焘撇下秘书和警卫员张海等人，一头钻进蒋鼎文的小车直奔西安。张海负警卫之责，只得跟着后面西北行营宪兵队的汽车，同往西安。

在西安，张海打听到张国焘已经住进了国民党高级招待所——西京招待所。

两天后，张国焘买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上午临上车前，张国焘让张海打电话告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负责人林伯渠。林伯渠闻讯速往车站，对张国焘不经中央批准、擅自行动给予了批评。张国焘煞有介事地说：“我到武汉，是同蒋介石面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得去。”

林伯渠劝阻无效，见事已至此，当即指示张海随同前往。回到办事处后，林伯渠马上电告中央，同时又和武汉的周恩来取得联系，告诉张国焘去武汉的车次和时间，要武汉“八办”派人好好“迎接”。

任务交给了李克农。

周恩来告诉他，一定要在武汉车站截住张国焘，然后做工作说服他，希望他留在党内，不要做出叛党的事来。最后周恩来加重语气说道，这也是中央的要求。

李克农受领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反复考虑万无一失的行动方案。他与吴志坚、童小鹏、邱南章等商量，万一遇上国民党特务阻拦甚至劫持怎么办？对，带上手枪。4月8日上午，武汉大智门火车站。

一列列火车南来北往，上下火车的人流熙熙攘攘。两辆小车驰进火车站，李克农带着总务科长邱南章、童小鹏和吴志坚等四人，从车上走了下来，径往各个出口，等候张国焘“大驾光临”。西安发出的列车来了。他们警觉地打量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不料，旅客都走光了，张国焘那又白又胖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是不是在车上没下来啊？”童小鹏问道。

李克农想了一会儿，说：“好吧，小鹏你在这里盯着，我们三人到列车上看看。”说罢，三人跳上了车。

三双锐利的目光，沿着车厢挨个搜索，终于，在靠后的一节车厢里，找到了张国焘。

张国焘斜躺在座位上，歪着脑袋，一副无精打彩的样子。张海已被特务缴了手枪，坐在对面。两边紧贴着两个国民党便衣特务，鬼鬼祟祟，像是在等人来接应。

邱南章走上前去，很有礼貌地说：“张副主席，你来了，李秘书长带着两辆小车来接你，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猛然看见李克农一行，他深知李克农来此的用意，脸一沉，色厉内荏地说：“我不要他请，我来武汉是有事的，我有地方住。”说完，急忙跟着两个特务往车下溜。

李克农见状，不便强迫，因为张国焘职务还在，只得叮嘱邱南章说：“你和吴志坚一定要跟着他，我们先回去向周副主席汇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又迅速找到张国焘。由于李克农的劝阻和邱南章、吴志坚等人的严密监视，张国焘一时间毫无办法。他气急败坏，却又无计可施，只得表示同意由武汉“八办”安排住处。不过，他死活不愿住在办事处内，最后安排住进了太平洋饭店。

张国焘泄密

为防张国焘向国民党泄露中共机密，李克农悄悄地让张海将他的行李搬到了“八办”，很可能，里面装有中央重要机密。果然，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还派人到“八办”要过行李，这，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4月17日，周恩来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找来张国焘，严肃地对他说：“中央的意见有三条：一、改正错误，回党中央工作，我们最希望是这样。二、可以向党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脱党，

否则宣布开除你的党籍。”张国焘听完，面无表情，初衷不改。

当晚 11 点左右，在国民党军将领胡宗南手下一伙特务的协助下，张国焘仓皇逃离住所。

张国焘就这样背叛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出走后，负责监视的邱南章立即电话告知李克农，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冷静地说：“张国焘不思悔改，迟早是会走上这条路的。”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被安排进入军统内部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持工作。特务头子戴笠对张国焘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只盼着张国焘能利用自己过去在共产党里的地位和关系，对中共的组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阴谋活动。

张国焘提出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自己亲自培养对付共产党的专门人才，戴笠马上为他挑选人马；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按照他的计划办理。总之，张国焘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一时成了戴笠手中的红人。

哪知一年过去了，张国焘的计划无一兑现：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分配无着，只办了两期就停止了；而策反站呢，由于中共严加防范，成绩几乎等于零。张国焘束手无策，戴笠则大发脾气：“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就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这以后，军统原来给张国焘的一些优待也渐渐取消，连以前配给张国焘的一辆专用汽车，也被收回。

一位熟知张国焘的军统人员暗地里为张国焘“鸣冤”：“戴笠骂张国焘不肯为军统卖力，实在是有点冤枉。他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成绩来。”

张国焘在军统一直过着坐冷板凳的受气生活，时常摇头叹气，心情郁闷不堪。

1948 年冬，张国焘逃到台湾，在台北租了一间房住下。由于此时的张国焘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国民党既不给他工作，又不给他生活费，甚至连房子也被国民党官员强占。1949 年冬，张国焘携妻儿移居香港，化名“凯音”，参加了由顾孟余等人组织的所谓“第三势力”的活动，并投靠美国驻香港领事馆，贩卖一些过时的“中共资料”，以资糊口。

1956 年，张国焘托人向中共中央捎话，表示想回大陆。中央转告张国焘，只要他能在报上公开承认错误，就可以回国。但这一要求遭到张国焘拒绝。

60 年代，张国焘接受美国肯萨斯大学约请，用四年时间写出了一部 90 余万字的《我的回忆》，书中对中共历史和中共领袖进行大肆歪曲和诬蔑。肯萨斯大学在其写作期间每月给他二千港元的“研究费”。书稿先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1966 年正式出版。这些稿费收入，就成了张国焘晚年主要的生活来源。1968 年，张国焘、杨子烈夫妇由香港迁往加拿大多伦多。1977 年，80 岁的张国焘因患中风，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将其送到教会慈善机关办的老人病院。1979 年 12 月 3 日晚，张国焘因盖的毯子滑掉床下，又无人护理，冻死在床上，魂断异域他乡，时年 82 岁。

桂林“八办”

1938年8月以后，日寇以30万兵力沿长江两岸大举西进，黄梅、广济、九江、马当相继失守。10月，日寇从水上和陆路三面包围了武汉，武汉三镇危如累卵。

10月21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新华日报》上登载重要启事：本处奉命迁湘，凡一切信件及临时事宜，请至界限路（今合作路）44号新华日报编辑部接洽，电话号码为24886，尚希各界注意是幸。

这以后，武汉“八办”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搬迁。

10月22日下午，李克农和潘梓年率领“八办”和《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租来的轮船“新升隆”号由长江撤离。由于该船吨位小，《新华日报》报馆的印刷设备和纸张把底舱全部塞满，李克农他们一百来号人坐在船上，显得异常拥挤。临行前，岸上忽然拥来几十名无钱买票的难民，送行的周恩来看不过去，也让他们上了船。这一下，这艘小船人满为患，严重超载，行驶相当缓慢。

10月23日，当船行至嘉鱼燕子窝附近时（现属湖北省洪湖县），突然遭到4架日机的袭击，“新升隆”号被炸起火。碰巧李克农和夏之栩等人上岸办事，得以大难不死。当他们返回时，船体已被淹没在水中，江水顿成血色，四周哭喊声震天动地。

“八办”工作人员张海青、赵兴才、徐挺荣等人和《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共16人遇难。李克农强忍悲痛，一面安抚和救济脱险的群众，一面组织和鼓励幸免于难的同志们，振奋精神，继续前进。

李克农一行辗转长沙、衡阳，于11月中旬到达桂林。李克农到桂林，是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就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一职的。早在1938年8月至9月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就作出决定：武汉失陷后，在重庆、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为此，“八办”副官刘恕，偕同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被派往桂林进行筹备。

刘恕到桂林后，先是租用桂北路138号“万祥醋坊”老板黄旷达的一幢两层楼房作为办公用房，以后又在城北灵川县路莫村和金家村，租用了几间农民房屋作为电台、仓库和接待站。

10月25日，周恩来在撤离武汉到长沙的路上，巧遇国民党副总参谋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周恩来告诉他，中共将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已派李克农担任主任（即处长），请白允予协助。白崇禧当即答应。这样，国共双方实际上就中共在桂林建立办事处的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

李克农率领大批人马抵达桂林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就正式开始了工作。桂林“八办”对外的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或“第十八集团军桂林通讯处”。

桂林，一向以其秀美的山川、碧绿的江水闻名于世，而在1938年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以后，随着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桂林又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联系华南、华东、西南乃至香港和海外的重要通道。它既是国民党中央同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桂系军阀矛盾错综复杂的地域，也是中共坚持持久抗战的一个重要据点。

抗战初期，桂系的态度比较开明，素有“小诸葛”之称在白崇禧曾说：“现在日本人虽然打下了武汉，但蒋求和之心不死，如果他要和，定要牺牲我们，所以必须提防，多与反蒋和反对和谈的人紧密联系。”这个联系的桥梁之一，就是著名的“广西建设研究会”。

该组织是1937年10月李宗仁赴南京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职前，主持成立的，李宗仁自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为副会长。白崇禧指派广西教育界元老李任仁代为延揽了一批进步人士、著名学者，充实这一组织。

“广西建设研究会”表面上是个学术研究团体，实际上是个与各种势力密切联系的政治组织。千家驹、胡愈之、张志让、阳翰笙、范长江、李达、欧阳予倩、杨东莼、夏衍、金仲华、李四光、邵荃麟等知名人士，都曾是研究会聘请的研究员。

白崇禧的本意，是藉此壮大自己的政治声势，亮出一块广西进步的金字招牌。但这样一来，不少专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与各界民主人士相继聚会桂城，客观上使这里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异常活跃，逐渐确立了大西南文化中心的地位。

李克农领导的桂林“八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工作的。办事处人员精干，事务繁重，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组织与开展、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与南方文化运动的推进、八路军与新四军后方的供应运输工作、各地人员来往交通、与香港及海外的联系、后方烈属及抗属的救济等等，都在李克农的亲自主持下，积极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机要秘书谢和赓

以李、白、黄为首的新桂系，是桂林“八办”进行统战工作的重点。周恩来、叶剑英等已对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李克农在这一基础上，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与桂系上层人物接触，和他们交上朋友，宣传中共的统战方针。

李克农新官上任，首先拜会了广西省长黄旭初。

双方寒暄过后，黄省长有意无意地问李克农：“李主任，不知我们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活动？”

李克农诙谐而机敏地答道：“有是有的，可是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如果说没有，那是在骗你，我本人就是嘛！”黄旭初默然无语，似心有疑忌。

李克农坦率地说，共产党在广西的活动，目的是支持广西的团结抗战，决不会干涉广西的内部事务，也决不会挖广西的墙角，请黄省长放心。黄旭初点头称是。

李克农对大事很是注意，小事也从不放松。

1938年10月，以总编夏衍为首的《救亡日报》同仁，在战火纷飞中离开了广州，经肇庆、柳州来到桂林。夏衍原定于11月8日只身赴长沙向周恩来和报社社长郭沫若请示报纸复刊后的指示。临行前，夏衍来向李克农辞行。

李克农建议，为争取报纸在广西的“合法”地位，让桂系当局安心，应先去走访黄旭初省长。

言之有理。夏衍在动身前，先由刘仲容陪同去拜访李任仁老先生，然后由李任仁陪同对黄旭初作“礼节性”的拜访。

11月12日长沙大火后，徐特立从衡阳来到桂林，转往重庆。李克农也请千家驹介绍徐特立去看望黄旭初。

中共态度如此真诚，国民党广西当局疑虑顿消，欣然表示愿同中共合作。

黄旭初兼任校长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就是双方合作的一个典型。该校建设之初，办学人才奇缺。黄旭初提出聘请著名教育家、中共秘密党员杨东莼担任教育长。

杨东莼请示李克农同意后，担任该职。征得黄旭初认可后，杨东莼掌握了该校的实际领导权。李克农还抽调了40多名中共党员到该校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主持政工、教学等工作，并建立了两个党支部。学校开办两年，不仅为广西当局培养了一批干部，而且还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这些人对推动广西的群众救亡运动，贡献不凡。

为配合公开的统战工作，李克农还经常通过在国民党的党、政、军中任职的中共秘密党员和与中共有关系的人，对桂系上层人物进行统战工作。

国民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就是其中的一位。谢和赓早在1926年年仅14岁时，就在其兄谢铁民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华北党组织派他赴察哈尔(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冯玉祥西北军担任吉鸿昌的秘书。察哈尔抗战失利后，华北党组织又派他回广西从事桂系上层的地下工作。

1934年秋，谢和赓通过其同乡、同学马仲孚的引荐，当上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指定白崇禧赴南京就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谢和赓随同前往，同时担任了国民政府的秘书。

作为白崇禧机要秘书和国民政府的秘书，谢和赓的主要工作是在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主持下，分管一些日常事务和做会议记录。由于他经手多种文电和材料，对国内外、前后方的情势，了如指掌，加上自己不断思考，常常会产生一些有关抗战的新想法来。抗战以来，国民党军在淞沪会战中，损兵折将，损失惨重；华北前线，70万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太原前线，国民党军防线岌岌可危，而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对日作战，屡建奇功，原因何在？谢和赓不时思索着这个问题。终于，他有了答案：对日寇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才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不二法门。

谢和赓将他的这个想法写成了厚厚的一篇长文，题目是“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并在文章的右下角注上：“白副参谋总长机要秘书并大本营秘书谢和赓呈何应钦参谋总长、白崇禧副参谋总长核呈蒋介石统帅”。

这篇长文送呈后，赢得一致好评。白崇禧还根据该文的主要内容，总结出后来成为他战略名言的两句

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谢和赓亲自把这份材料送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交到了李克农手上，请他转呈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周恩来看完这份材料，高度重视，在上面划满了记号和眉批。一天，谢和赓来到办事处，周恩来当着李克农的面夸奖道：“和赓，没想到你在察哈尔只有很短时间的作战经验，而能写出这样具体的纲领和方案来，确实难得！”李克农也走过来，笑着说：“你这个小鬼，还真行！”

这篇文章也使得白崇禧对谢和赓另眼相看，1938年元月，白崇禧下令提升谢和赓为上校。

谢和赓和王莹的爱慕

不久，白崇禧又交给谢和赓一项任务，让他起草一个题为“军队政工与群众政工之关系”的讲话稿，供他在召开国民党军师以上集训团会议时演讲之用。谢和赓接到任务后，三天三夜没合眼，拟出了初稿。为确保稳妥，他将稿子交给了李克农，请他转呈周恩来校阅。

次日，当他取回原稿时，只见周恩来将其中指责国民党军脱离群众等过火语句约两千多字给删除了。谢和赓心里很激动，一旁的李克农说：“你看看，恩来删掉的都是本着白崇禧的地位——军训部长，而不是副总长的地位指责政治工作的失误……”谢和赓连连点头：“我也看出来了，改得太好了。感谢恩来同志呀！也感谢你！”

后来，谢和赓在见到李克农时，又谈起这件事时，李克农还笑着说：“你看看，有恩来做你的‘改文老师’，这恐怕是一个两党合作中的奇事，不但老蒋和白崇禧想不到，就是毛主席他们也料想不到啊！你真幸运，有党做你的靠山，只要你谨慎而沉着，你的工作一定会成功，‘战无不胜’是我党对中国革命的最大信心，我们每个做地下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这种信心！”

和李克农有着长期秘密联系的谢和赓，此时在桂林，更直接受李克农领导。当然，这种关系由中共中央直接掌握，属于中共党内的高级核心机密。除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少数中共高层领导，任何人也不清楚谢和赓的真实身份。

一天，白崇禧叫来谢和赓，爽快地对他说：“和赓，你一直干得很不错。任上校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派你担任省党部书记长兼绥署政训处副处长，授你少将军衔，你看如何？”对此，谢和赓早有耳闻。桂系少壮派潘官之、邱昌渭等对他“紧跟白崇禧”早已不满，在李宗仁面前吹过风，建议将谢和赓提升为“少将”，明升暗降。

谢和赓心想：周恩来对自己的要求是“无论如何也要留在白崇禧的身边”，离开了白崇禧，也就是离开了桂系上层，这是中央所万万不许可的。想到此，他静静地说道：“副总长，对于您的知遇之恩我万分感激。但我不愿意离开副总长，您不是要我重视全国的回教工作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原来，谢和赓曾经以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身份，借办“西北战时巡回教育班”为名，向绥、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宣传白崇禧的思想主张，联络马鸿逵、马步青等人，以组成联合回教势力，和蒋介石构成某

种程度上的抗衡，实现白崇禧做“中国凯末尔”的幻想。

白崇禧听谢和赓这么一说，遂不再勉强：“好吧，我看你还是留在我身边好一些，你讲的这些，由我向德公(李宗仁)报告好了。”事后，谢和赓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和赓，你可真聪明，你这才是真正执行了周公(周恩来)对你的指示，‘无论怎样，也要跟在白的身边!’”

谢和赓还有一位美丽俊秀、多才多艺的妻子，艺术大师徐悲鸿曾多次称赞她为“中华女杰”。她，就是影星王莹。

王莹，1915年生，安徽芜湖人，和李克农是同乡。她早年生活坎坷，历经磨难，但心怀大志，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周恩来誉为“我们党里不多的少年党员之一”。她早年投身艺海，以其卓越的才华，崭露头角，成为著名的演员。抗战爆发后，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成立，著名剧作家洪深任队长，金山任副队长，王莹任队委，受以郭沫若为厅长的政治部三厅的领导。武汉沦陷后，队长金山和王莹一起率队来到“文化城”桂林。

金山，1911年生，祖籍江苏苏州。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被认为是同赵丹齐名的著名男演员。他也是李克农手下的一位奇兵。桂林的谢和赓，身为国民党上校军官，仪表堂堂，气度不凡。而不幸的个人婚姻却在时时煎熬着他，真是度日如年，痛苦万分。王莹来了，给他带来了青春、热情和希望。

随着不断的接触和了解，谢和赓对这位著名的女演员由尊敬而转为爱慕，王莹也对这位风流倜傥的谢秘书充满了好感。

谢秘书人品不错，可毕竟是个国民党军官啊！自己是个中共党员，怎么可以……念及此，王莹又处于矛盾和不安之中，真是进退维谷。

李克农帮忙解开了这个结。

平生最爱是“九秘”

1938年12月上旬，抗敌演剧队二队受中共委托，准备组建“中国救亡剧团”，到南洋去向华侨宣传国内抗战形势，号召爱国侨胞以财力、物力支援前线抗战和后方难民。但这需要向白崇禧申请出国护照以及批发旅费。

这件差事自然落在了谢和赓头上。在他的奔走下，白崇禧在剧团的申请报告上，大笔一挥“照此办理”，一大笔款子就到手了。手续办妥后，兴高彩烈的谢和赓带着批示原件，去找王莹和金山二人过目。

正当谢和赓拿着批件，坐车向二队驻地象鼻山驶去时，忽然，在北门至南门的大马路上，谢和赓透过车窗发现了身着长衫的李克农，只见他和王莹、金山一起，正有说有笑、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千万不能在外人面前暴露自己跟李处长的关系！”谢和赓知道，自己和李克农的关系，中央有明确指示，决不能暴露给第三者。他立即命令司机急转弯。

可到处是人流，汽车无法掉头。

无奈，谢和赓只好歪着头，假装没看见他们。可被称为“只眼先生”的李克农，这时眼睛却尖利起来，一眼认出了车上坐着的他。李克农的沉稳老练、认真严谨是出了名的，这时，却因一时激动，打着手势向谢和赓走来。

谢和赓只好磨蹭着下了车。李克农上前和他热情地握手，那种亲热劲儿，完全是党内同志之间所独有的。一旁诧异的王莹和金山顿时恍然大悟：原来谢秘书和八路军的李处长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谢和赓忙把白崇禧的批复拿给大家看，三个人都很高兴。王莹见白崇禧特批给她和金山每人各500元大洋，就向李克农请示该怎么办。李克农说：“既然白崇禧如此优待你和金山，我看恭敬不如从命，还是接下来为好，拒绝，反倒会引起人家不快。”临分手时，李克农对谢和赓说：“你穿梭式的联络，好辛苦哟！剧团能这么快就组建成，我看该给你记头功啊！”

王莹也用芜湖话亲热地说道：“谢谢你，活根同志！”（芜湖话将“和赓”念成“活根”）

从此，两人神秘的面纱一抹而去，真心相爱了。

而李克农呢，因为“糊里糊涂”地当了回红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因在王莹、金山面前暴露了谢和赓的真实身份，而受到当时正在桂林的周恩来、董必武的批评。

批评理所应当，而李克农和谢和赓夫妇的友谊却保持终身。以后，他们因工作需要去了美国。1949年12月，谢和赓夫妇历尽艰辛，辗转从美国归来后，李克农亲往拜访，并一再叮咛王莹把在美国受迫害的实况写下来，促成了王莹著名的自传体小说《两种美国人》的问世。

1957年春，谢和赓被错打成“右派”，王莹遭受重大的政治压力。李克农又两次来到香山王莹的住所，劝慰王莹。

真情一片，使王莹很感动，她曾写了一首小诗，以表心意：教导莫忘周董叶，热忱关怀有克农。

平生最爱是“九秘”，（“九秘”指谢和赓——编者）万苦滴甘也相从。

李克农的为人，可见一斑。

《救亡日报》

受职务所限，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有时活动起来并不方便。如果能有一位助手，那就好多了。

这个工作，落在了桂林行营参议、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刘仲容头上。刘仲容，留俄学生，很早就与中共取得了秘密联系。“西安事变”前夕，他奉周恩来之命，从延安秘赴南宁，通过他的留俄同学王公度引荐，拜会了李宗仁，向其传达了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以及愿与桂系真诚团结的意愿。抗战开始后，刘仲容被白崇禧留在身边工作，担任了桂林行营参议。这，也是李克农在武汉时给他下达的指示。

白崇禧让刘仲容负责桂林行营的对外联络工作，事情不多，这给他充当谢和赓与李克农之间的联系以充分的“自由活动”时间。刘仲容的办公地点离桂林“八办”很近，他和李克农之间，除了因公务有所接触外，还经常秘密来往。

李克农非常注意刘仲容的安全，经常提醒他遇事不可惊慌，要冷静沉着，提高警惕，并送给他一把左轮手枪，以防不测。刘仲容每次去李克农处接头，李克农总是派人布哨，严防走漏风声。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三青团广西支部组训组组长周可传、解放后曾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兼交际处长的侯甸等人。

1939年侯甸从延安来到桂林后，李克农指示周可传将其引荐给广西绥署政治部主任程思远，担任了绥署政治部的一名科长。一个又一个中共秘密党员被安插进国民党营垒，李克农有了许许多多灵敏的“耳目”。每逢夜幕降临，常有人力黄包车停在“八办”门口，一些神秘的人物悄然闪进大门。通过这些神秘的人物，李克农搜集到了许多重要情报，了解到桂系对中共的政策和态度，及时制定对策，使中共统战工作成效显著，桂林城里出现了抗日救亡的蓬勃发展的局面。

一时间，只有六七万人口的小小桂林，成为大西南后方的一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一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云集桂林，人数达一千人之多，其中全国知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学者有二百多人。他们在中共领导下，出版报纸，开办书店，创作文艺作品，造一时之声势。影响最大的团体有国际新闻社、《救亡日报》社和文化供应社，它们被称为桂城三大进步社团。

《救亡日报》社的总编是夏衍，早在上海，李克农就结识了他。1938年11月7日，夏衍率报社全体同仁从广州撤至桂林后，当晚就去见李克农，听取他的指示。李克农建议他们一面争取在桂城的“合法”地位，一面自力更生，自筹经费，尽快复刊。夏衍表示，不愿意和国民党那些无聊的政客打交道。

李克农说：“沈先生(夏衍原名沈端先)啊，站在外面骂娘可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那才是你应尽的本分。要把报办好，腿要放勤些，耳朵要放长些，要多听、多跑、多交朋友。你得认清这个时期，这个地方，在这里，和菩萨要打交道，和恶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们个个都怕脏……”李克农爽朗地大笑起来：“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正式复刊。

由于报社人员大多是要笔杆子的，对经营并不在行。应夏衍的请求，李克农介绍善于经营的翁从六担任经理，负责报社的印刷、发行及经济工作。以后，翁从六被调往上海做地下工作，李克农又介绍《新华日报》的张尔华接替。

李克农很注意对报社工作的指导，凡是涉及到办报原则和方针的事，他总是坚持己见，没有丝毫妥协。

一次，《救亡日报》发表了一篇国际时事分析文章，出现了政治性错误。李克农发现后，跑到编辑部 and 夏衍长谈了四五个小时。他严肃地说：“《新华日报》被扣得厉害。西南、东南乃至香港，都把这张报纸看作是党的外围，代表共产党讲话，那么你想想，把这么严重的国际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对外面会引起多么坏的影响！”

随后，李克农指出了这篇文章的错误所在，严肃地问：“怎么办？”“明天再写一篇社论，纠正过来。”夏衍答。

“怎么写法？来，大家凑一凑。”李克农把大家召集过来。社论写好，天色已晚。夏衍透了口气说：“很

好，我学会了不少东西。”

李克农抬手看了看表说：“学会了东西，能不付学费么？你看，都快8点了，阳春面也不请一碗？”说罢，他站了起来：“那好罢，我请客，我可要反客为主了。”严肃沉闷的空气随之一扫而光。

秘密工作与公开统战相结合，威力无穷。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已近8千份，在当时，这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一年，南洋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来到桂林，特地去参观了《救亡日报》社，连连称赞。这张报纸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进步思想，影响遍及湖南、江西、广东、四川、贵州、云南、香港和南洋等地，很受群众欢迎。

文化供应社

由胡愈之创立的国际新闻社以及由胡愈之、陈此生和社会知名人士40余人发起筹建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也都是在以李克农为首的桂林“八办”指导下开展工作的。

文化供应社成立于1939年10月22日，始创者是当时在文化、出版界颇有声望的胡愈之，在创办过程中得到了广西地方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李任仁老先生任董事长，广西绥署顾问陈劭先任社长，李任仁最得力的助手陈此生担任总务部主任兼秘书。他们都是桂林“八办”的老朋友，在中共的支持下，他们都代表广西当局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广西救国会。供应社编辑部主任由胡愈之亲自担任，总揽编辑出版业务。编辑中有不少人是中共秘密党员和非党进步人士，胡愈之后来回忆说：文化供应社“实际上是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的”，“所用干部大部分都是由李克农同志推荐的”，“我当时的党籍绝对保密”。

周恩来曾经单独找了胡愈之和千家驹谈话，告诫他们“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保全实力，作长期打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胡愈之在桂林一直坚持着隐晦曲折的工作方法，在他以后所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

这一时期，由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毛主席关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方针指导下，我们在桂林的活动方向明确，抗日救亡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救国会的组织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以救国会的身份活动，易与广西各方面人士接触。我们紧密团结了广西各界人士，发展了广西的进步力量；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包括对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和争取他们，使他们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这样一来，顽固势力也就孤立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分子在广西不能横行。桂林一时成了西南大后方的一块抗日文化绿洲。

然而，随着国民党政府由武汉撤往重庆，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之下，国民党内“限共”、“溶共”的呼声甚嚣尘上，抗日民主力量倍受压制。194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要求全党“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精神上要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在国民党统治区“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干部，应转移地区隐蔽起来，或调至军队工作。”中央文件下达后不久，李克农就请胡愈之来到八路军办事处阅读了这份文件。

李克农对胡愈之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隐蔽起来的方法主要有三条：一是更改姓名，到别的地方去；

二是到八路军或新四军去；三是到香港或是国外。而你是个出头露面的名人，谁都认识，第一条行不通；第二条要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也不大容易；只有第三条，先去香港，比较合适些。”

至于文化供应社的工作，李克农决定指定在新加坡新书店工作的张锡昌负责。

7月的一天，胡愈之正在文化供应社建在桂林西门老君洞的一座新楼里，准备和大家一起庆祝新楼的落成，李克农的电话打来了：约他见面。

胡愈之赶往碰头地点，只见李克农正拿着机票在等着他。李克农把机票交到了胡愈之手中，叮嘱他，第二天就得走，而且一定要保密。

第二天一早，胡愈之手提一只箱子，借口家中有急事需回去看看，从容撤离。

胡愈之到香港后，按照李克农临行前指示，找到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廖承志。廖承志告诉胡愈之，周恩来已决定派他到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实际上就是总编辑和主笔。其后，《南洋商报》在胡愈之的领导之下，用大量的篇幅报道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前线的最新消息，文字通达简练，雅俗共赏，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而桂林的文化供应社，也在随后的中共党员的领导下逐步发展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直接领导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阵地。它出版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在灌输进步思想、推进大众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是一个很有影响的进步出版发行单位。

除了统战工作，李克农还承担着为中共军队筹备军需物资、输送过往人员的繁重任务。

设法解决桂林“八办”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推行“反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处心积虑地想消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他们不仅在发放枪枝弹药上百般限制，而且还时常停发军需用品。华北前线的八路军缺乏汽车、汽油，江南新四军甚至没有过冬的被毯。

中共中央电令桂林“八办”，一定要设法解决！

李克农接电后，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人马，四处采购。不久，一批批汽车、汽油、被服、药品、医疗器械和电讯广播器材等物资，从桂林运往陕北和各抗日前线。前线物资短缺，李克农忧心如焚。

“八办”秘书科科长龙潜带着龙忠柏等人奉令出发了。目标——桂林市郊国民党军需仓库。任务——为新四军争取军用毯。

可仓库人员拒不承认储有毛毯。莫非情报有误？

聊天、谈心、交朋友，终于得知仓库内确有毛毯，但国民党军政部已下过密令，不准发给八路军、新四军使用。军令如山，仓库人员怎能违抗？

李克农出面了，略施小计，二万条美制毛毯终于运回了办事处。但一道命令传来，驻桂林的国民党军

需司不准运出桂林，毛毯必须运回仓库。怎么办？

李克农对龙潜说：“看来，统战法宝现在要同武装力量结合起来用了。”说完，他一面派“八办”的警卫武装把守汽车，谁也不准动，一面亲自找到军需司进行交涉。

两天过去了，国民党军需司只得同意毛毯运走，不过，运费要算在新四军的头上。李克农点头一笑，上万条毛毯出了桂林城，缓解了前方将士的燃眉之急。

办事处迎来送往的任务也很繁重。周恩来、叶剑英、徐特立、博古、叶挺、袁国平、张鼎丞、胡乔木等都来过“八办”，并由“八办”护送到各地。

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当时化名胡光，也在“八办”住过大半年，还担任过办事处的俱乐部主任和墙报编辑，并曾给《救亡日报》写过有关东南亚民族革命形势的分析文章，以后也由“八办”护送到了外地。

李克农的工作如此繁杂，但他却善于出主意，想办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平江惨案”发生后，桂林“八办”一方面忙着安置撤退下来的同志，一面准备开追悼会纪念死难烈士，表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抗议。李克农指导办事处的同志编辑了纪念册，以“平江惨案”的实例，教育大家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遇事要多加注意。他细致的工作态度，令周围的人佩服不已。

夏衍回忆说，一次，他和李克农谈起自己和国民党一个高级将领之间的谈话。李克农仔细听完后，问道：“你们之间……”

“现在可以无话不谈了，以前，只是泛泛之交，只听我的，不讲他的，后来，他对我很坦率，渐渐地熟透了。……”“熟透到……”

“连他家庭生活中的苦闷也和我讲了……”

“这很好，算是交上朋友了。……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态度……”“先很随便，后来越讲越激昂了。”“在哪里谈的？”“在报馆，我的办公室。”“没有旁人？”“没有。”

“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随身带了一瓶酒，一包花生和叉烧。”“讲这些话的时候，喝醉了没有？”“没有吧，他平常能喝一瓶白兰地。”

李克农思考了一下，说：“假如喝醉了讲的，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酒醉吐真言’，另一种是借酒装疯，有意讲给你听。今后要注意这种情况。同一句话，在不同的情况下讲，可以有不同含义的。”

一番话，使夏衍受益颇深，甚至使他觉得，这对他以后创作剧本、刻画人物也有莫大益处。

1940年冬，随着蒋桂矛盾的发展与激化，蒋介石下令撤销桂林行营，改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白崇禧调往重庆，李济深担任了办公厅主任，副主任由蒋介石的亲信、浙江黄岩人林蔚担任。国民党中央势力趁机渗入桂系集团的大本营——广西，广西当局对中共的态度逐渐有所改变，一股暗流向着

这座著名的“文化城”冲击而来。

1940年11月，国民党军政部桂林办事处派人来到“八办”，要求“八办”先行递交“自动”呈请撤销的公文，并限于11月19日前将办事处事务结束。

11月12日，李克农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次日，毛泽东复电指示：

一、向国民党当局申明，我皖南部队准备奉命北移，在实行北移前有事要做，暂难结束；

二、如彼方要求马上结束，请先来一正式公文；否则，则让其封闭为好。但我方内部要准备安全撤退，以防万一。

李克农接电后，以朱德、彭德怀和周恩来、叶剑英的名义，再电国民党军政部，要求缓撤“八办”，并与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疏通。

“皖南事变”

李克农心里清楚，这位李任潮(李济深)先生和蒋介石一贯面和心不和。1929年初，李济深作为蒋、桂矛盾的和事佬，由广州去南京，还曾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汤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得自由，以后一直和反蒋人士来往频繁。李任主任的头几个月，的确曾给“八办”一些方便。所以，李克农找过他。然而，现在他也无能为力了。蒋介石此时磨刀霍霍，正酝酿着一场骇人听闻的大事变。李济深只好电告李克农说：

获悉贵集团军桂林办事处奉令转饬结束，务希即通令新年终撤销，结束前如尚未经运用之资材，暂准酌量少数人员办理转运为宜，并限于1941年1月内运完，切勿再延。

实际上，李济深给“八办”又延长了一个月的时间。时间紧迫，头绪纷繁。

为了在桂林“八办”一旦取消的情况下，中共仍然能取得在南方活动的立足点，李克农化名“龙正泉”，租用了泗河别墅作为“公馆”，在此设立了新四军交通运输处。

形势逆转，速度惊人。恰在此时，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命令在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由50万人缩减到10万人。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调至长江以北，并连续电告中共华南局和军委会书记项英，趁国民党军队尚未部署完毕，迅速率部北上，防止其突然袭击。

遗憾的是，项英未按中共中央的指示行动，却与顾祝同商定新四军的北上路线，在国民党军队部署就绪的情况下，才开始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9000多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北移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预先布置的顾祝同、上官云湘指挥的国民党军队8万

多人的伏击，新四军艰苦奋战7昼夜，终因力量对比悬殊，除两千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其中包括新四军高级将领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军长叶挺被扣。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国人无不悲愤万分！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愤怒地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全国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国际舆论广泛表示对中共的同情与支持。

而蒋介石却得意洋洋，17日，他在重庆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同时，他还调集20万大军进攻华中、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些反共分子弹冠相庆，第二次反共浊浪掀起了。

桂林的风向也急剧右转，“八办”门前，忽然布满了一群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有时，特务竟大摇大摆地闯进“八办”的大门。此情此景，令李克农怒不可遏，他拍案而起。

李克农令人将大门敞开，亲自站到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特务见是大名鼎鼎的李主任，赶紧溜走了事。

国民党的宪兵、警察也时常来办事处，对房东进行恐吓和威胁。李克农听到后，总是立即从楼上走下来安慰房东说：“要坚持，不要听敌人的那一套。”

国民党特务招数使完，竟开来一辆汽车，把办事处的门墙撞倒。桂林“八办”已无望保留，李克农一面积极进行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一面迅速组织疏散和精心部署中共地下工作。

夏衍就是被安排疏散的一个重要人物。

1月22日，李克农打电话给夏衍，告诉他“皖南事变”的消息，并要他通知《救亡日报》全体党员作好应变准备。

中午，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周所长给夏衍打来电话，要求报社全文照登国民党中央社统发的诬蔑新四军“叛变”的稿件，声称此乃中央党部的命令，全国报刊必须一律照办。

夏衍马上打电话给李克农：“李主任，方才我的老乡周所长送来一份很重的礼物，我们打算不收，你看怎样？”

李克农答：“好！但得十分小心，能做得不伤情面最好。”

“皖南事变”后

根据李克农的要求，夏衍等人决定上演一出“狸猫换太子”，即先把国民党中央社的电稿全文付排，并登在头版头条上，把它送给检查所审查，等盖上“审讫”的图章后，晚上打纸型时，再将那篇电稿抽走，另换它稿，使国民党的美梦不能得逞。

这一招，可惹恼了那些检查官老爷们，他们不仅将当天的《救亡日报》全部扣押，而且还给夏衍一个

书面的严重警告。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夏衍正和同仁在报社的会客厅里打乒乓球，忽然，一个身影闪了进来。

只见来人身穿棉大衣，头上的帽子压得很低，进门就喊道：“好悠闲啊，还在打球。”

灯光昏暗，夏衍仔细辨认：是李克农！

两人走进里屋，夏衍忙问：“办事处已被包围了，你怎么能出来？”李克农笑道：“黄省长用汽车把我接出来的，大摇大摆，这叫用大鬼压小鬼啊！”

李克农掩上房门，低声说，南方来了急电，说国民党中统特务就要在桂林下手，你必须立刻离开桂林，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的据点。

夏衍问到报社怎么办，李克农说：“分几步走，第一步你先走，留下的事由林林、张尔华负责，只要国民党一天不来封门，我们就继续出版。但是，‘八办’看来也是保不住了，所以整个进步文化界人士，都得作好妥善的安排。我已经向南方局请示，建议凡有公开职业，可以得到广西方面保护者，如广西干校的教职员，都照旧坚持岗位；一些名气较大的文艺界人士，色彩不太明显者，也可以暂留桂林。《救亡日报》的骨干等到报社被封后，一律撤往香港。”

李克农还说：“这些事，都由我来处理。明天，你得去找黄旭初，坦率地告诉他《救亡日报》当前的处境，并向他表示，为了‘好来好去’，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准许你买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如果他避而不见怎么办？”

“那你就放心好了，我已和李任仁先生谈妥，他已经和黄旭初通过电话，我此刻来报社，不就是任老用黄省长的汽车给送来的吗？”李克农显得胸有成竹。

终于，夏衍从黄省长手中拿到了机票，顺利飞往香港，算是逃离了虎口。

李克农的小女儿李冰，到达桂林后，李克农夫妇考虑到她有护校文凭，可以留在桂林找个作为掩护，将李冰留在了广西工作。后来，李克农又曾打算利用中共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让李冰进入广西医学院学习。

经过交涉，广西医学院同意李冰入学。李冰非常高兴，总算可以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了。

然而“皖南事变”的爆发，使李冰的“大学梦”成了泡影。李克农夫妇见李冰在桂林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宜在桂林久留，让她随办事处的一部分同志先行赴重庆。这样，李冰又一次暂时离开了父母。

李冰乘坐的军用卡车，经贵阳到重庆。贵阳一带山路崎岖难行，来往军车很多。在途中的一次转弯时，李冰一行乘坐的卡车与一辆国民党军的运盐车相撞，国民党的车翻入深谷，盐也散落一地，车上的人全都死了。李冰乘坐的车也差一点翻掉。

带队的同志命令开车的华侨司机不要停留，加速行驶，否则将被后面的国民党车抓住。于是汽车开足马力，一夜未停，总算安抵重庆。

1月20日，桂林“八办”在寒风中被迫撤离。

临行前，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示李克农把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谈话，在桂林散发出去。

李克农让人买来许多航空信封、信纸，把材料打印成信笺式的宣传品，先用汽车经湖南到广西沿途散发；在撤离当中，又沿路分批邮寄，使得“皖南事变”真相昭示天下。

2月24日清晨，李克农率领“八办”最后一批人马，分乘一辆交通车、一辆卧车撤离了桂林，向重庆驶去。

由于桂林“八办”与房东全家相处甚久，感情很深，临行前，李克农将自己用过的景德镇小茶壶、办事处同志锻炼身体的石锁、学习文化时用过的小黑板和搪瓷记事牌、唱歌时用来伴奏用的“真善美”牌口琴以及一些《新华日报》和书籍等等，都送给了房东。这些珍贵的物品，解放后被房东一家全部赠送给了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办事处的汽车开走了。一路上，国民党交通检查站蓄意制造磨擦，多方无理阻拦，李克农虚与委蛇。当车行驶到一品场关卡时，国民党交通运输检查局的一个上校处长要搭车去海棠溪开会。秘书龙潜问怎么办，李克农微微一笑说：“这还不好办，让他上车，送我们去重庆。你去叫他上来，我来招呼他。”

上校处长上了车，一路上由他出面打招呼，免去了李克农不少麻烦，一行人顺顺当当地把车开到红岩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大门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直到那位上校处长下了车，还一直以为自己搭乘的是国民党第十八军的军车呢。显而易见，这其中免不了李克农的巧言。

第五篇

李克农是我在延安看见的文职干部中着装最为整齐的一个：他打着标准的绑腿，紧扣的风纪扣，军帽军服都极端正和整洁。初次见他时，他这种全副军人的着装就叫我注意，没想到他每天都是如此。因为在延安，所有部队以外的一般的干部，对于军服的穿着都是很随便的——虽然那里是一个接近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社会。

中共情报史上的重大转折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于1941年1月18日至20日连续两次急电周恩来，要求中共南方局准备撤销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重要干部迅速撤退。

李克农抵达重庆后，稍事休整，于1941年夏，携夫人赵瑛、李冰姐弟及八路军办事处的部分同志向延安撤退。

李克农一行分乘三辆大卡车，打着“奉命撤回”的旗子，驶离重庆。沿途国民党军岗哨林立，道路两旁随处可见阴森碉堡。当卡车进入陕西潼关时，突然国民党军的几挺机枪挡在了卡车前头，几名国民党兵登上卡车，缴了八路军官兵的枪，并扣留了李克农一行和车上的物资。形势十分紧张。

李克农镇定地对大家说：“我们有可能被扣压，大家要有进敌人集中营的思想准备。”

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非常关注。经过紧急交涉，李克农一行经过一天两夜的扣留，被国民党军“押解出境”。

为避免麻烦，三辆卡车加速急驶延安。经过重重艰辛，当大家远远看见披着老羊皮袄的八路军岗哨时，都欣喜若狂，连蹦带跳，几乎将车箱底板踩坏。

宝塔山气势巍峨，延河水清澈见底，中国革命的圣地张开了怀抱，迎接着李克农这位远行归来的战士。

李克农一家抵达延安后，毛泽东、朱德邀请他们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吃饭。谈到李克农一行在赴延安途中的经历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是冤家路窄，我们怕你们回不来了。”（当时驻守潼关的国民党负责人是徐恩曾——早年李克农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进行过情报工作）

毛泽东还开玩笑地问李冰：“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是什么人？他可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在延安期间，李克农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等职，被中央赋予情报、保卫工作的重任，赵瑛则被安排进社会部担任机要工作。

黄钢对延安时期的李克农有如下的描绘：

李克农是我在延安看见的文职干部中着装最为整齐的一个：他打着标准的绑腿，紧扣的风纪扣，军帽军服都极端正和整洁。初次见他时，他这种全副军人的着装就叫我注意，没想到他每天都是如此。因为在延安，所有部队以外的一般的干部，对于军服的穿着都是很随便的——虽然那里是一个接近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社会。

1941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的作风，采取具体方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

这些重要原则，给情报工作以有力的指导，使中共抗战时期的情报工作从单纯搜集警报性和保卫性情报转变为以搜集军政战略性情报为主。这是中共情报史上的重大转折。

李克农认真学习了中央决定，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的话，常常萦绕在他的耳边。他认为，情报工作就是搞调查研究，是一种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在他的大力提倡下，情报保卫干部中兴起了调查研究、注重实际的风气。这一时期，中共情报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这段时间，李克农参与了中共在全国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派遣了大批情工人员深入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关，获取日、伪的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

李克农一贯主张将秘密的情报工作与公开的情报工作相结合，这不仅能扩大情报的来源，而且实践证明，这也是中共情报工作能够克敌致胜的重要方法。中情部成立后，专门设立了公开的情报研究机构，李

李克农多次指示各地情报组织，运用各种办法收集国统区和汪伪地区出版的报刊，及时提供给中情部创办的《书报简讯》社，经过综合、分析研究后，提供给中共中央。《书报简讯》所提供的资料，对中央领导了解国内情况，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中共在抗战时期为揭露蒋介石的投降政策而公布的国民党中委和少将以上人员投降日伪的名单，以及在 1948 年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都是依据了中情部平时积累的人物资料，起到了打击和震慑敌人的作用。

1943 年，毛泽东为《书报简讯》挥毫题字：“书报简讯办得很好，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肯定了简报的成绩，鼓励中情部的同志更好地工作。

1942 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其任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根本目的在于“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一页，也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的创举。

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1943 年 10 月 19 日，毛泽东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这篇讲话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并反过来影响政治的观点和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对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和革命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克农长期以来就对文艺感兴趣，延安的集会较多，每逢开会，他都要指定人员出来指挥唱歌。“为什么不唱歌？”尽管有时是内容很严肃的肃反大会，他还是这么说。

学习了整风文件后，李克农决定从延安的文艺界入手，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去。

西北公学文化娱乐科成了他的一个点，西北公学直属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兼任校长，他希望以这个点带起面来。

李克农首先从西北公学的学员中挑选出杜印、吕西凡、张婷乙、严正等 20 余位文艺骨干，会同曾在国统区地下工作中与文艺有联系的简化僧、汪吉等 10 余人，合组了一个文工团体制的新型群体，下设编写组、音乐组、总务组、演员组。由于文化娱乐科长期在李克农的亲自领导下进行文艺宣传工作，因而人们都公认李克农是文娱科的灵魂。

“文工团”建立了，它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贯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于 1943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延安地区新年宣传工作会议精神，为 1944 年的新年到来准备节目。

李克农传达了会议精神，风趣地下达了命令：“同志们，你们‘用武之地’的时机来了，快写出作品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规定了党的文艺政策，指明了文艺要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要和实际结合。……方向明，面对实际，真正反映人民的心声，才可能写出受到广大群众喜爱的作品。这，就叫做用武用到地方了。”

李克农对文艺是很内行的。他的语言充满了民族的风格，言谈中常常流露出民间的俚语，他也十分熟悉上海滩上的黑幕、电影圈里的轶事以及各个左翼文艺团体初创时期的始末。李克农对当时中国著名的电影明星陈波儿特别赞赏，佩服她在上海白色恐怖的环境里，掩护过和李克农共事的中共地下党员：“她身穿

入时的短裙子，一双短袜，摇着小扇子，一遇上巡警检查我们的同志，她就挽上我们男同志的胳膊说：‘这是我的丈夫！’多勇敢的艺术家的啊！”

李克农对枣园的文化人常提这些轶闻旧事，其目的无非是要求大家吸取群众斗争生活营养，拓宽艺术视野，创作出更新更美的作品来。

1944年元旦，黄土高原换上了银装，天气寒冷，而面积不大的延安城里却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男女老少赶着猪羊，拥向中共中央领导住地——枣园，来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人，和群众一起，坐在枣园中央平坦的广场上观看演出。

忽然，西北公学文工团秧歌队扭着秧歌，欢快地走了进来，生龙活虎的表演，立刻将全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毛泽东也被感染，转身问坐在身边的李克农：“这是谁家的秧歌队呀？”

“这是后沟西北公学同学组成的秧歌队。”李克农笑答。

“怪不得呢，他们唱词里代表枣园，也是代表我们感谢乡亲们的咧。为什么不报一下单位的名字呢？”李克农还是笑了笑，没有立即回答。“就叫枣园秧歌队吧。”毛泽东说。

李克农高兴地点了点头。事后，他让总务处买了几丈红布，做了一面又大又宽的门旗，上书“枣园文工团秧歌队”几个大字。毛泽东命名的这支秧歌队，很快威名远扬了。

尽快拿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这是李克农的心愿。为这，他亲自布置重要节目的编写，并指定秧歌队创作出一个反映当时农村题材的剧本，以促进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任务布置下去了，简化僧、汪吉、陆石、严正等艺术工作者深入农村，实地采访，收集了大量生动的素材，创作了一个反映边区农民从个体经济分散经营到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的剧本。初稿弄出来，李克农看了很满意。

第二天，他亲自出面在枣园大接待室请来枣园村的干部、劳模代表和群众代表，观看排练，组织座谈，听取意见，最后根据群众意见，李克农将这出戏定名为《动员起来》。

1944年2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宣传部共同发起，将当时延安的八支大型秧歌队聚在中央驻地杨家岭会演。《动员起来》被定为会演剧目。

李克农十分重视，组织人马再次修改了剧本，并指派社会部的吴德、李逸民、汪东兴等人亲自带队，还叮嘱总务处给每位演员准备两个鸡蛋润润嗓子。

演出当天，李克农站在自己办公室前的小坡上为大家送行，他一边捋着小胡子，一边朝出发的队伍挥手：“同志们，我静听大家的好消息了。”

排演苏联话剧《前线》

秧歌队不负李部长厚望，演出引起了轰动，上至中央领导，下到庄稼汉、婆姨女子，无不拍手称赞。著名作家萧三专门撰文写道：“这是春节演出许多秧歌节目中最令人满意和最成功的一个。”为满足热情观众的需要，延安新华书店于是年6月出版了《动员起来》的单行本。

静候佳音的李克农得知演出成功的消息，高兴之余，慰劳剧组人员美美地吃了顿饺子。

10月，中央在杨家岭举行祝贺劳模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出席大会，李克农作陪。会上演出了《动员起来》。

演出结束，毛泽东对李克农说：“克农，方向对了，好戏。群众爱看，让他们多演嘛！”

周恩来走上舞台，高兴地说：“同志们，我在国统区看不到这样的好戏。你们在延安，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照着办了，才有这样好的戏演出来。这是你们在克农同志领导下实践毛主席讲话的重大成果啊！”

李克农打断说：“哪里哪里，这只能算是初步成果。”

周恩来拍了拍李克农的肩膀，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形，风趣地说：“反正是这么个成果，祝贺你们啊！”

1945年1月13日，陕甘宁边区群英会举行颁奖典礼，枣园文工团荣获团体奖。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文工团的团员们，早已是白发苍苍，两鬓染霜，但他们还真切地记着李克农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动员起来》创作成功后，李克农又开始筹划下一项艰巨的专业工程——排演苏联话剧《前线》。

《前线》是苏联乌克兰作家考尔纳楚克创作的三幕五场话剧，1944年5月由肖三译成中文，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连载。全剧揭露了一位妨碍胜利而又占据重要指挥地位的名叫戈尔洛夫的苏军前线总指挥，狭隘无知、迂腐顽固、傲慢虚伪。他不愿意追随先进的军事科学的发展，结果在现代战争的考验面前归于失败。剧本的用意是号召大家同骄傲、自鸣得意、顽固、夸耀和阿谀作不调和的斗争。

1944年6月5日，李克农召集文化娱乐科的部分同志在他窑洞前的平场上开会。

待大家坐定后，李克农操着浓重的芜湖口音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最近看了《解放日报》了吗？发现了什么没有？”

见大家不解其意，李克农点燃了一支香烟，慢慢地说：“我们文娱科创作《动员起来》闹得很红火，中央办公厅组织中央慰问团到安塞几个地方去，指名要枣园秧歌，秧歌让你们闹得更远更火了。毛主席也说了话：去年春节赵家敏同志带着中央机关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中央机关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秧歌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毛主席发表了《组织起来》讲话，我们就创作《动员起来》，这里有个重要经验……”说到这儿，李克农停下来，微笑着看了

看大家：“那么，下一步搞些什么呢？我想你们来搞这一个——”他举起报纸指着大标题《前线》两个字。

“要演《前线》？”大家都有点不太相信：困难太多，担子太重，怎么可能呢？

李克农接着说：“有些事情该怎么看？《解放日报》从5月19日到26日，连续8天登载《前线》剧本，这么长时间，占有重要版面，而且登的又是反映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剧本，这是不是件罕见的事？6月1日《解放日报》为它又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社论。党报刊登剧本和社论要经过中央审阅批准，而且要求全党都来学习，这代表不代表中央的推荐和评论啊？当然了，这主要还是反映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你们想一想，把这几件事联系在一起想想，重要不重要？”

说到这里，李克农又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气，捋着胡子说：“《前线》剧本是在我们党即将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前夕，作为重要学习材料发表的。如果能把纸上的剧本搬上台演了出来，岂不是能起更大的作用，可能这也是中央和毛主席所期望的。当然，要搬上台，困难是有不少，革命重担总得有人来挑吧！”李克农还补充说：“译者肖三是毛主席的老朋友，他翻成中文稿后便送呈毛主席阅读，毛主席读后才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李克农说完后，问大家：“我的话完了，今天召集这个会，想听听你们的想法，我等着你们的回答……”

没等李克农说完，大家不约而同地说：“这副重担由我们来挑吧！”李克农放声大笑说：“好！敢为天下先，有觉悟，有胆量，有雄心，有气概！”

《前线》试演

会议结束后，文化娱乐科的同志们便马不停蹄地着手准备起来。不久后的一天，李克农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一些领导来到文化娱乐科召开全体会议，作出了文化娱乐科要在延安首演《前线》的决定。

李克农手举《解放日报》说：“社论里提出的问题请大家多琢磨琢磨。为什么在德寇攻到斯大林格勒门前时公演《前线》呢？在战局危急时刻，当着敌人的面，批评和撤换前线最高指挥官，这一举动是何等光明正大。敌人可能借此造谣。只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才有这样伟大的气魄。这且不说，问题是在红军中确实有个‘戈尔洛夫’式的典型。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确实有功劳，有忠心，有勇敢，但没有使用头等现代化军备的能力。他们摆老资格，不学习，他们没有能力，又不进取，骄傲自满，就势必与一些糊涂虫、拍马屁的、会钻营的、说谎话的卑鄙的坏家伙结成一气，打击与排挤有能力的人。戈尔洛夫这种人成为战争取得胜利的一大障碍。怎么办？只有把他教育过来。如果实在教育不过来就只好撤换下去，保证战争的胜利。戈尔洛夫这个典型，我们把他作为一面镜子，让每个看他的人照一照，然后想一想……《前线》还有一个‘戈尔洛夫’对立面的人物，叫什么名字，我说不出了，你们可别学戈尔洛夫瞧不起他呀！”

这次会议确定将向中共即将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作为排演《前线》的目标。西北公学文娱科科长汪东兴负责剧组的筹建工作。建组后，经过10天的学习准备，全体演职员对《前线》剧本的主题有了共同的认识：

——“时代在急速奔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将转入反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

夕，怎样与时代一同前进，如何认识与把握新时代的要求？——这是剧本的总生活背景；——“人民欢喜和要求懂事的和聪明的领导者。”——这是剧本的基本核心；

——战争是一个军事科学的高级学校，战争是知识的考验，戈尔洛夫经受不了这种考验，他垮台了。因为他不愿意承认现代军事科学的力量。——这是剧本的主要矛盾；

——我们必须跟上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并把学习任务提得更高；必须提高文化科学知识；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方法；必须放开眼界，开动脑筋思索问题；必须放下包袱，进行自我批评；必须重视新生事物。其目的，努力增加我们的知识和能力，以便更好地实事求是地解决新的课题，不断改进工作，改变作风，使我们进步得更快更好。——这是演出应得的效应。

演职人员在对剧本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工作计划，投入了排演。

8月初《前线》试演，中央社会部领导邀请了李伯钊、《前线》剧本的译者肖三等延安文学、戏剧界著名人士来进行审查。谁知当晚的演出反映平平，这些专家并不满意，为了安慰大家，他们有的说：“不错，演到这个水平已经很不容易了。”有的说：“同志们还是很努力的，外国戏比中国戏更难演。”有的干脆说：“主要是剧本有深度，人物难以把握。”

演员们本来热情高涨，听他们这么一说，心里凉了半截。第二天一大早，一夜未睡的李克农和汪东兴来到西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全体会议。

看见大家无精打采的样子，李克农突然问道：“你们一夜未睡吧？好，唱个歌吧！”

说完，李克农提高嗓门命令音乐组组长程云：“指挥唱个歌，《八路军进行曲》最好。”

在李克农的鼓动下，大家心头的愁云被一把抹去，“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嘹亮的歌声在会场内回响。

“唱得好，唱得劲，唱出了革命人的志向和魄力来了！”李克农兴奋地说：“有人说昨天的演出完全失败了，这个结论我不同意。我认为昨晚的演出基本上是成功的，检阅了我们队伍的实力，给我们搞好这个戏提高了信心。第一次试演，初次检验哪能十全十美。有了信心就下决心把戏搞得更好，这点我从不含糊，你们也不要动摇，失败情绪是没有根据的，也不符合事实。比如，演出准确表现了剧本的主题思想，体现了党中央社论的指导精神——排演《前线》是为了配合抗战的全局，是为了准备大反攻。我们文艺科代表枣园排演《前线》在延安首演，向党的‘七大’献礼，是项很大的重要的政治行动，意义和作用深远的。基于这一点我们枣园机关党委才下决心，才敢于动员同志们打破旧框框，创造新局面。”

《前线》深入基层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李克农把演出不尽人意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李克农笑着说：“当然，这次演出在艺术上和技术上还没有达到要求，责任应由我来负，我要向同志们检讨。比如说吧，台上的幕布破旧不说，连一块天幕都没有；照明汽灯又少，而且大多是借来的，老出毛病；大小道具都是凑合着代用，戈尔洛夫总指挥都没有舒服的沙发椅子坐；化妆品原料缺乏，没有凡士林用猪油代替，一出汗就往下流，成了

大花脸，倒像是日本鬼子进村了；音响效果也不好，大炮像是在敲鼓，机关枪像是在敲钢板——这些，能怪谁呢？另外，我们的演员，除了少数是专业出身，大多是‘票友’，演戏是外行。‘打着鸭子上架’，平生第一次上台全身紧张，这也是难免的。只要经过重点排练，熟能生巧，发扬老战士带新战士的一帮一的精神，我们演出的业余水平就一定会突破，达到专业剧团演出的新纪录。这一炮准能打响！”李克农一席话，说得大家茅塞顿开，对演出成功充满了信心。《前线》的复排工作拉开了帷幕。李克农指定汪东兴挂帅负责，同时，中央社会部图书资料室，给剧组送来了苏联演出《前线》的资料，如《真理报》、《红军报》等刊登出的剧照和评论文章；苏联驻延安联络组送来了苏德战争中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实况照片；正在南泥湾屯垦的359旅旅长王震派人专程送来了制作苏联红军军服的毛呢料和苏联武器；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也赠送天幕一块；此外，中共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等单位领导还送来了个人所用的苏式皮靴以及其他物品。大家群策群力，支援剧组将《前线》排出。

9月中旬，复排完成。李克农穿着整齐地观看了演出。演出后，李克农主持了座谈会，他说：“今天我开门见山地说上几句。我今天带头鼓掌，为你们叫好！这可以说是我观后感的全部内容。我们干工作就是要出色地完成任务，今天的演出展现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志气。”

李克农问大家：“还有什么困难？说出来，就地解决！”

当他得知演出经费即将用完时，爽快地说：“再补充一些，无论如何困难，只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就值得，其他方面节省一些也就补上了。”

《前线》在枣园大礼堂连演五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

9月底，剧组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邀请枣园《前线》进入杨家岭大礼堂为中央和毛泽东演出。

9月29日，演出开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安坐台下，李克农在毛泽东身后作陪。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演出，一边看，还一边同周围的人进行评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转过身紧握着李克农的手，连声称赞道：“好，演得很好！”

李克农说：“主席，您有什么指示没有？”

毛泽东挥动着右臂大声说了三个字：“到——处——演！”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前线》演遍了整个延安城，一时间，‘戈尔洛夫’、‘客里空’成了延安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词汇，《前线》从台上走入了人民群众中间。

当年在《前线》中扮演军长欧格涅夫、以后成为新中国著名戏剧家的严正，在以后的回忆文章中，曾这样写道：

李克农对《前线》排演的指导要求就是：不求完美，但求真诚；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演出生活思想本质与精神。李克农无数次谈话（从理论到实际）所表的见解，除了使人对演出意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之外，艺术上严格要求，对我们导演和演员的创作也无异于一次次升华的淬火。枣园《前线》好看，也是同李克农（包括其他枣园领导）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得力领导分不开的。

而在剧中扮演《前线报》编辑梯希的黄钢，则回忆说:这个在中国延安首先排演的《前线》，它对于配合抗战的全局，在思想上准备反攻的举措，显示了枣园机关的高瞻远瞩和李克农同志敢于使用青年干部非凡的政治胆略！

整风运动的强权势力 - - 康生

一句话，对毛泽东本人，李克农是忠贞的，对他领导发动的整风运动，李克农是积极参与的。然而，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却将他卷入到一场是是非非之中……

这股神秘的力量，中心人物就是康生。

康生，原名张旺，1898年出生于山东胶南一个大地主家庭，其父张发祥，是前清禀生。1924年夏，康生入上海大学读书，该校校长于右任仅挂个空名，实权掌握在总务长邓中夏、教务长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手中，“上大”实为中共为自己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1925年元月，康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2月，上海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二月罢工”，他参加了这次大罢工，而且表现不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他担任了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在中共党内已小有名气。

按理，康生是党内老资格的党员，本应具有较高的威望。然而，他却又是一个见风使舵、惯耍两面派的人物，许多知情者往往不屑于与其为伍。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陈独秀下台，向忠发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不久，中央大权就旁落在李立三手中。康生见状，极力奉迎李立三，对李立三推行的“左”的一套，推崇倍至。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康生曾拍着胸脯说：“李立三同志是我们党的最好的领袖，谁反对李立三，谁就是反党，我坚决地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李立三听了他的话很高兴，将他调到中央组织部担任了秘书长。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李立三在会上检讨了“左”的错误，随即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中共大政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

康生早在上海大学时即与瞿秋白很熟，此刻见瞿秋白在中央主政，竭尽全力向瞿秋白靠拢。在批判李立三的会上，康生一改旧态，大骂李立三：“你李立三搞的‘左’倾冒险主义这套，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你成为历史不可饶恕的罪人！你主持中央工作，家长作风，独断专行，唯我独尊，夜郎自大。你的罪行，当全党共诛之！”这一招很见效，康生不仅没错误，反而当上了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正在康生暗自庆幸之时，风浪又起。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操纵下进行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执掌了中共大权。

王明在李立三主政时曾受过处分，而康生是支持给王明处分最热心的人。如今王明得势，康生焦急万分，他亲自向王明赔礼道歉，王明此时正想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借机拉拢康生，将其由中组部秘书长晋升为中组部部长。1933年7月康生同王明一起去了苏联，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苏联，康生紧紧追随王明。公开场合，他不忘适时地高喊几声“王明万岁！”在党内下发的文件，都是用的“王康”的名义。他还竭力吹捧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为王明摇旗呐喊。

1937 年底，康生回国，看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和影响大大超过王明，便又摇身一变，以“反王明的英雄”自居，极力靠拢毛泽东，用他老婆曹轶欧的话说：“我们一下飞机，就看到毛主席的阵势和威望，使我们想到要改变态度。”

自然，王明的那本小册子又被康生批判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了。

康生的钻营和表演，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被中央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从而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教育、审查、使用干部和情报工作的权力。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央于 1942 年 6 月 2 日成立了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刘少奇由于工作太多，只是挂个名。毛泽东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于是，康生这样一位翻云覆雨的人物，拥有了负责中共整风运动的很大一部分权力。

张克勤被审

李克农身为社会部副部长，当归康生直接领导。1942 至 1943 年间，抗日战争处于紧要关头。

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残酷扫荡，日伪和国民党特务也在陕甘宁边区大肆活动，形势异常严峻。

1942 年，康生借机抛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式：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抢救不成而自救。言下之意，只要我康某人说谁是特务，谁就是特务；即使无凭无据，起码也得“自救”。

根据对敌情的夸大估计，1943 年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干运动的决定。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 1927 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和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也是很多的。”“特务之多，原不足怪”，“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在整风审查干部的同时，要准备好“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

在对敌情作了如上估计的同时，康生趁 1943 年对干部进行组织审查之机，用“逼供信”的办法，威逼一些同志承认自己是特务，煽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致使审干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

延安的秋夜，已是寒气袭人，而延安的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康生等人正通宵达旦地指挥着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的审干运动，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被“抢救”。

书桌旁，床沿边，人们一个个苦思冥想，从自己思想上挖“病根”，从周围的同事和同志中寻觅“特务”，一份份汇报送往领导机关，一些人正在盘算着本单位取得的成绩：审出多少“特务”，揪出多少“叛徒”

等等。

一批审查对象被集中起来。被认为问题比较严重的，关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和社会部，其中保安处关押了 200 多人，社会部关押了 100 多人，而陕北当地的干部则主要关在行政学院。审干任务日趋繁重，李克农也参与了某些审干工作。

一天，李克农把社会部干部、西北公学副校长李逸民找了去，向他布置任务：“你那里已经增加了许多人，那些人的情况也很复杂，怎么办呢？康生同志和我研究，决定调吴德同志去帮助你工作。”

任务重，增加人手，这自然是件好事，李逸民心里很高兴，也没多想。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来自国统区，又蹲过国民党监狱，派吴德来帮助工作，是不是自己也已经受到怀疑了呢？

如何具体着手工作？李克农根据社会部的意见，交待先从张克勤案开始。

一份从延安鲁艺转来的材料上清楚地写着：“我们一起来延安的三个人，张克勤是受派遣来搞特务的……”

张克勤，19 岁，1936 年 10 月在西安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6 年 6 月因受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回延安，进入西北公学学习。党的组织关系手续齐全，唯一的材料就是鲁艺有位与他同来延安的人揭发了他。突然看管起来，随即在李克农向李逸民布置任务的当晚，在汪东兴的窑洞里，开始了对他的审查。

“你是怎么来延安的？”审问者们开门见山地发问。张克勤把自己赴延安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你来延安干什么？”

张克勤笑了笑，也许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荒唐，说：“我是甘肃党组织介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这方面我有介绍信。”“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吗？已经有人揭发你来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大吃一惊，但很快冷静下来，苦笑着说：“我来的手续很清楚，绝没有这个问题！”

谈话到此陷入僵局，审查者们决定曲径通幽，从张的家庭问起，以达到顺藤摸瓜的目的。

张克勤说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位名中医，家里主要靠父亲给人看病的收入过日子。“都给什么人看病？”

“什么人都有，有时也给一些国民党官员看病。”

几个审查者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功夫没白费，有点入门了，于是追问他父亲与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但张克勤一口咬定，仅仅是看病而已。

一天过去了，毫无结果。

第二天，继续审查。着眼点还是他父亲和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一阵“穷追猛打”，张克勤眼花缭乱，有点招架不住了。几个审查者轮流休息，而张克勤，则不准休息。

第三天凌晨 5 点，张克勤渐渐支撑不住了。他心力交瘁，神志恍惚，疲惫不堪，万般无奈之下，只得

承认父亲是国民党特务，自己因为父亲的关系也加入了特务组织，并乱说一通：“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说完，大哭不止。

交待完毕，几位审查者如获至宝，赶忙向李克农作了汇报。第二天，康生和李克农指示，全校召开师生大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都派代表参加，张克勤登台作了典型发言。

审干的反思

张克勤在会上痛哭流涕，讲述自己是如何参加了甘肃的假共产党，又是如何受派遣到延安来搞特务活动，以自己受骗上当的经历教育大家，表示感谢组织对自己的挽救，决心重新做人。他讲得生动感人，听者无不动容。

本来，这起甘肃地下党的所谓“红旗党”案，完全是子虚乌有，但康生却自认为抓住了审干运动的突破点，大作文章。

他得意洋洋地说：“这个案件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在一次报告会上，康生以肃反专家的姿态，振振有词地教训那些仍然“糊里糊涂”的人们：“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有的人说运动该结束了，现在不但不能结束，而且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

这个报告被印成文件发到各单位，发到各根据地。

康生如簧之舌的鼓噪和别有用心的误导，甘肃、四川、河南等许多省的党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一批又一批“特务”被清查出来，整个延安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作为康生的副手，李克农原以为他搞的一套是中央的精神。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李克农却陷入了一片茫然和疑虑之中……许多天真、热情的青年人被打成了“特务”、“内奸”，有的单位 90% 以上的人都成了“抢救对象”，而他所在的社会部几乎到了无人工作的地步，李克农的许多战友和部下都未能逃过劫难。1943 年，中央军委的陶铸被康生当作叛徒抓进了监狱，理由是曾被敌人判过无期徒刑。李克农是了解陶铸的，对此他感到不可理解。

李克农还遇到过这么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位新婚不久的同志，一天去向领导汇报工作，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了，他的妻子还在灯下等着他。没想到这位同志竟然没有理会爱人的一片深情，反而怀疑她是在搞特务活动，硬是揪着她到李克农那儿去交待问题。看着女同志哭哭啼啼的样子，李克农哭笑不得。

显然，审干审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康生得意忘形，而广大党员干部对此却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这时，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遂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之后，立即指示，不要随便作结论，谁的结论错了，就要给谁平反。要纠正扩大化的错误，他们已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左倾扩大化错误的危害性，并采取了有力的挽救措施。

1944年元旦，领导通讯联络工作的王诤，带着一批被搞错的干部向毛泽东“拜年”，反映情况。毛泽东对他们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公开承担了责任。

李克农也在痛苦地反思着：为什么会闹出这样一个局面来？他向有关领导反映，但没有下文；他有意识地与康生拉开距离，却又遭到康生的忌恨。

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帮他解了这个结。

1944年4月的一天夜晚，毛泽东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周兴、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和李克农请到自己的窑洞里谈话。

周兴是党内老资格的政治保卫干部，学徒出身，师哲兼任毛泽东的俄语翻译，他们在毛泽东身边都很随便，几个人散坐在床边和椅子上，聊了起来。

毛泽东说：“今天请诸位来，是想说一下肃反问题。咱们随便谈，有啥说啥，咱们这儿可不抓‘特务’，你们知道什么尽管说。”李克农四下打量了一番：怎么没见康生？

周兴和师哲也露出同样的疑惑——康生，他是这场运动的总负责呀！毛泽东猜出来了：“几个月前我就给康生打过招呼，肃反要注意纠偏，后来又找他谈过，可他不听嘛！今天就不叫他了，你们几个直接抓工作，就找你们谈。”

审干后的“补救”行动

毛泽东运用他那独有的循循善诱的方式，为这几位头脑一度发热的保卫干部们慢慢降温。

毛泽东说：“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也别送了。”“为什么？”师哲问道。

“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

“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毛泽东反问。

“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

“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一句话当然也难免。”

“那么可不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

“总不会全盘皆错吧！”师哲有点不服。

“我就是要说，可能全部是假的。有一字是假的，就可能有一句话是假的；有一句话是假的，就可能十句话是假的；有十句话是假的，就可能全部是假的。”毛泽东很倔强。

“你要不信，”毛泽东接着说，“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十句错了改十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贴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后，

原来的字改完了。”

接着话茬，毛泽东谈起当年在江西反 AB 团时，许多不实口供都是用刑讯逼出来的，结果一害自己二害革命的沉痛教训。强调“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他指示李克农等人，立即开展甄别、平反工作。

李克农听罢，再也坐不住了，坚定地说：“回去后要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按主席的指示办。”

此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这场康生本人无法收拾的“抢救运动”终于走到了尽头。

李克农忠实地按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甄别工作。事实表明，数千个被“抢救”的“失足者”中，真正的特务只有两三个。

出于革命需要，李克农将 200 多名“重点抢救”对象，大多数留在了社会部，这些人以后都成了中共情报战线的骨干。

在李克农组织排演的《前线》中，有许多演员都是“抢救”的对象，并未最后作出结论，李克农大胆启用他们，本身就说明，他是信任这些青年人的。

对李克农在甄别工作中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严肃认真的作风，当年“抢救”对象之一的黄钢有深刻的体会。

记者黄钢于 1938 年冬到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5 年秋至 1938 年秋，他曾经分别在南京和重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中央电影场担任过助理编剧，这一差事是由国民党文化巨头张道藩向电影场场长张冲介绍的。在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中，黄钢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严格的审查和冲击。

尽管黄钢在南京和重庆只是担任了一般性的社会职业，然而，在高压之下，他还是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张道藩派来延安搞特务工作的。在甄别过程中，黄钢又将以前自己编造的谎话推翻了。一天，李克农找黄钢谈话。

李克农说：“黄钢，我们昨天还向毛主席汇报，说你‘回来了’——共产党的亲骨肉呀，掉进了敌人的泥坑，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黄钢开始没听清楚，反问道：“昨天向谁汇报？”

“向毛主席！”李克农有些生气地说，“黄钢，你父亲是武汉与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黄负生，你是烈士的遗孤嘛，后来托给了陈潭秋这些同志，可是不幸得很，你以后竟走到敌人的窝里去了！”李克农见黄钢不说话，接着说：“怎么？前两天，你刚刚承认自己是张道藩派来延安的，昨天怎么又把自己的交待给推翻了！”“那是在困难面前说谎，李副部长，我到延安是走我父亲留给我的路，博古和夏之栩同志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给我开的介绍信，我的来历是很清楚的。”黄钢说道。

“清楚？既然清楚为什么要自己说谎？要编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你这一说谎，我们要是有人搞逼供信，那就要信以为真了！主席说，他就不相信！所以，我来找你谈一谈。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就是不老

实。你就是不实事求是嘛!好比说这把茶壶,工人阶级说它是圆的,你要说它是方的,因为工人是生产它的;你呢,你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的事物嘛!你就没有学会这一条!那回我就告诉你:阶级的属性,不脱胎换骨是不行的。”

“抢救运动”的反思

由于种种原因,对黄钢的审查并未结束,但李克农却很信任他。1944年底,李克农负责的中共枣园党组织,派黄钢到枣园邻近的裴庄去当小学教师,指定他作为派出的两人小组的小组长。1952年,黄钢在朝鲜板门店采访李克农时,对李克农说:“李部长,组织上今年上半年,在我来朝鲜以前,已经给我做出了历史审查的结论。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多么好的结论——你对我的评价太高了!”

李克农笑着说:“本来嘛,你就是祖国的优秀儿女!”说完话,李克农叹道:“都九年了!”

同样,李克农对曾经被怀疑过的李逸民,不仅让秘书罗青长作了没有问题的结论,而且还亲自报告了负责对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进行资格审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使李逸民得以拿到文件,以七大候补代表的身份顺利地参加了大会。李克农却从此遭到康生的忌恨。

毛泽东召见李克农,并让他负责甄别工作,康生迁怒于他;甄别工作的结果,使康生顿成千夫所指,康生认为李克农是在故意给他难堪;最令他恼怒的是,中共七大没安排他作重点报告,最后选举时,他由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降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不小的挫折。他对老婆曹轶欧说:“李克农这个仇非报不可,倘日后落到我的手里,必给他厉害看看!”

事隔12年之后,1955年李克农在上海休养期间,谈起“抢救运动”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当时有人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问道:‘你们打算要抢救的百分比是多少?’有人回答说:‘百分之五!’然后又降到百分之二三。毛主席坚持地反驳说:‘怎么能这样?不可能!难道特务都开了花了?’延安审干时,毛主席经常派人来听汇报。等到向他本人汇报时,他开头没说好也没说坏,一直没表态,只说了一句:‘青年人的灾难啦!’当时我体会,以为毛主席说的是青年人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受的灾难,现在,我的体会就更深了。”

可见,李克农对于延安审干运动中一时间出现的所谓“抢救”偏差,心情是歉然不安的。

对“抢救运动”,毛泽东总结说,其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1955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抢救运动是有偏向的,这个偏向就是急躁地想用简单的方法把反革命分子清出来,其结果犯了逼供信的错误。”

邓小平也指出:“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对这段惨痛的经历,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第六篇

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一连下了两个命令:一个是给他的嫡系部队,要求他们“加紧

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是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勒令他们“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两道命令赤裸裸地暴露出蒋介石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险恶用心。

王实味案（一）

“抢救运动”翻过了历史的一页，而李克农却又被牵扯进另一桩大案之中。这桩大案一直纠缠他多年，成为他心中一段隐痛。这桩大案，现已大白于天下，它，就是轰动一时的“王实味案”。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父亲王籽渭是前清举人，为人耿直，一生清寒。辛亥革命后，潢川县办了一所中学，王籽渭老人因德高望重，被聘为校长。受父亲影响，王实味从小发奋学习，他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17岁中学毕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的一位老师曾当面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中学毕业后，王实味因家贫无力继续考大学。不久，他得知开封有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招生，这所学校不收学费。王实味便前往报考，被该校录取。一年后，该校停办，王实味再度失学。不过，这一年的时间，却使王实味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为挣钱上大学，1924年，王实味去驻马店邮局投考邮务员，录取后，在邮局工作了一年。他每月只有30元的工资，除了寄4元回家给父亲，6元钱留作生活费，其余20元全都被存了起来，到1925年暑假，王实味已在邮局工作了一年，一算帐，存款已有240元了。

带着这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240元钱，王实味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去北京大学应试。

1925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一切手续办完后，手里只剩下189元了，他把180元存入了北大附近的一所邮局，其余9块钱，留作了自己的伙食费。

这位出身贫寒、历尽艰辛的青年人，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在北京大学这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里，他一头扎进了书海之中，尽情地吸取知识的养分，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在北大，王实味结识了一位河南老乡、正在哲学系读书的陈其昌(即陈清晨)。陈其昌当时已是有一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他见王实味常常进图书馆借阅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觉得他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便借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王实味读后，深受启迪，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他把自己读后的感想告诉了陈其昌，于是，陈其昌于1926年1月介绍王实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寒假开始，王实味开始了自己一直醉心的文学活动。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发表在1926年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1445期上，是一篇名为《杨五奶奶》的短篇小说。

1985年第2期的《小说界》上，评论家倪墨炎曾经这样评价这篇小说：《杨五奶奶》以短短不到3000字的篇幅，勾画出一个小镇上仗势欺人的“母老虎”的嘴脸，而这位“母老虎”终于得到了最可耻的下场。小说的作者具有鲜明的爱憎。文章文字简练，叙事层次清楚，有些段落和对话很生动，并具幽默感。这段评价表明，王实味在生活积累和艺术素养上，都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

1927年王实味因故失去了中共党组织关系。不久，他又因为家境贫寒，无法再在北大继续学习，经父亲的一个学生介绍，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找了一份当文书的工作。

王实味当时已身无分文，抱着“权当住旅馆呆它几天”的想法，到南京上了班。个头高瘦、长相斯文的王实味，性格却有些易于激动，在工作中，他见到那些令人气愤的事情，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指桑骂槐。一天，他正在痛骂的时候，忽然有人悄声问他：“小王，你是哪一派的？”

王实味听罢，将桌子一拍，说：“王派！”因为自己姓王，故所谓“王派”乃“王实味派”也。

那人未听明白，以为是“汪派”（即汪精卫派），忙说：“小王，此地不可久留，这样吧，我介绍你到山东泰安中学当语文教师如何？”

王实味本来就不想在国民党衙门里当差，看到这位同事如此热心，便将计就计，让他写了封介绍信，来到了泰安。

在泰安，由于王实味常常向学生宣传“国民党一直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所以农民仍被剥削挨饿”等等，一年后即被解聘，又回到了南京。

王实味案（二）

1929年3月，他来到上海，1930年1月，王实味和刘莹结婚。婚后，为维持生活，他开始创作小说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据统计，他创作的小说有《休息》等，翻译的作品有：美国作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记》和高尔斯华绥的《资产者》、法国作家都德的《萨鞭》、德国作家豪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等，均被收入由徐志摩为中华书局编辑的《新文化丛书》中。应该说，王实味在文艺上是有过自己的贡献的。在上海期间，王实味和王凡西、陈其昌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1930年5月的一天，王实味在大街上与王凡西相遇。王凡西在北大时即与王实味同学，而且那时两人又都是中共党员，老友重逢，显得格外兴奋。王凡西请求王实味帮忙译一部分书，因为他妻子即将临产，正缺钱用。王实味帮了他这个忙，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

同年8月，陈其昌也突然到王实味家拜访，陈其昌曾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陈、王二人过去关系一直不错，此时在上海，遇上王实味一家经济拮据时，陈其昌还主动借钱给他们，王实味也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

其实，这时的王凡西和陈其昌已经是中国“托派”的重要人物了。何谓“托派”？

在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168页中，有这么一条重要注释：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刘莹当时已是中共党员，对中共中央的反托斗争情况比较了解，当她得知王实味为王凡西翻译了《托

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后，便敏感地怀疑王凡西可能是托派，劝告王实味不要与其交往，王实味坦然地接受了刘莹的劝告，从1931年1月开始，王实味便断绝了与王凡西的联系。

1932年，王实味夫妇曾委托陈其昌介绍王实味加入左联。陈其昌明确说：“我不能办这件事了，我已不做党的工作了。”这句话使王实味夫妇对陈的政治面貌产生了怀疑，此后，王、陈二人也再不来往。

由此可见，上海期间，王实味和托派重要成员王凡西、陈其昌等人有过一段交往，王实味本人在思想上也曾接受过托派的某些观点，但他和真正的托派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的浪潮在全国高涨。1937年，王实味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向往革命的王实味，将已经怀孕的刘莹送回娘家，自己只身来到延安。

王实味来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不久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高级研究机关。院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为范文澜，下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艺、中国教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和俄文(翻译马列著作)等9个研究室。1942年初，张闻天率领一个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农村作为期一年多的调研工作。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代为负责中央研究院的工作。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王实味被调往该院中国文艺研究室工作。由于他在文学和翻译方面有一定的成就，被中央研究院任命为特别研究员。王实味这段时期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共计翻译了《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以及《列宁全集》第18卷中的一部分内容等共65万字，是当时延安一位相当有成就的翻译家。

1942年初，毛泽东亲自倡导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广泛开展起来。整风运动开始后，不甘寂寞的王实味相继写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和《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杂文，对延安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他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王实味案（三）

实事求是地说，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这些缺点进行批评也是完全允许和十分必要的，问题是一介书生的王实味看问题难免幼稚、偏激，对一些现象的批评总是夹杂着一些冷嘲热讽的味道。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王实味写道：

我们的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的灵魂。政治家，是革命的战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的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者，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文艺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心、精神、思想、意识……在这里是一个东西)。

政治家主要是革命的物质力量的指挥者，艺术家主要是革命精神力量的激发者。前者往往是冷静的沉着的人物，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纯洁和光明，后者却往往更热情更敏感，善于揭破

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

这其实是把政治家和艺术家放在了对立的两面。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实味从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的事实、尖刻的语言，把延安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歌啷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一些差别，说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个别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少数干部的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等等。

在王实味的笔下，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某些缺点与不足被歪曲和夸大了，他的观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不少人的“共鸣”，一时间人心波动，思想混乱。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全院整风动员大会。在会场上，王实味带头和主持全院整风工作的李维汉发生激烈争执。会后，他写了《我对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的头两期上，鼓吹要“绝对民主”，向“大人物”进言。这些短文贴出后，不少人赶来观看，后来它们又被贴在布上，挂在了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上，围观的人群像赶庙会一样。

王实味的言论，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的文章编印成所谓《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册子，四处散发，称“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啷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对中共及陕甘宁边区进行恶毒的攻击。

为纠正王实味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开始，一连数天召开全院座谈会，试图把整风引向正轨。在这个座谈会上，神经敏感的康生亲自插了手。座谈会初期，王实味的问题还只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不久，由于康生的介入，上升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座谈会快结束时，由于王实味以前曾向党组织交代过早几年在上海与王凡西、陈其昌等人的交往经过，王实味的问题便被作为与“托派”有关的“敌我问题”来对待了。

座谈会结束后，康生为“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入”，在7至8月份，又追查出一个与王实味相联系的所谓“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王实味”的“反党五人集团”来。

这年9月，李维汉被调离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研究院，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一职，再没有过问中央研究院的反王实味斗争。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称王实味“从一九二九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根据这个决定，王实味被当作敌人送交保卫部门审查。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

康生式的审讯开始了，王实味在“坦白罪行”和“否认自己是托派”之间，来回转圈，审讯工作并不顺利。看来，其中必有隐情。

然而，康生那一套“逼、供、信”式的审讯方法，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最后，王实味也无招架之功，最终承认自己是托派，而且还是个“自命天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抢救运动”结束后，李克农主持了甄别工作，因为甄别对象太多，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王实味的问题被排在了最后。

王实味案（四）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种种主客观原因，最终还是于 1946 年作出了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认定王实味到延安来的目的，是要进行有组织的“托派活动”。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了晋西北的兴县，王实味也随队同行。

4 月 16 日，王实味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第四科(主管审讯和看守工作)。据该科的同志 反映，王实味在从延安到晋绥的路上，“常说刺激人的怪话”，“故意找麻烦”，对他自己的“罪行”没有认识，自称是“为党牺牲的好同志”。

晋绥公安总局的有关人员认为，王实味是中央社会部交下来的重要案犯，在行军途中又“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因此“对其看押特为严密(专管，严锁(门)，不准见人，不准出门)”，比在延安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6 月中旬，兴县遭到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提出了处决王实味的请求。

7 月 1 日，国民党的飞机又一次轰炸了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为了应急，看守所要立即搬家。当晚，王实味被就地处决!命令是谁下的?

康生于 1947 年 2 月到达晋绥，在临县郝家坡村搞了一整套很“左”的土改。晋绥公安总局关于处决王实味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在晋绥的康生的“口头批准”。

毛泽东知道王实味被处决，已是 1948 年的事了，他雷霆大发，说：“你们赔我一个王实味来!”

这年 8 月 31 日，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主动承担了王实味案的责任，并请求中央处分。

9 月 1 日，毛泽东批示：“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并请中央书记处及有关同志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真、饶漱石、聂荣臻、贺龙等都在报告上画了圈。

李克农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康生。而康生呢，却也一句不吭，更没说过要担负责任的话。

1981 年，85 岁高龄的李维汉怀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对王实味案进行复查。

根据李维汉的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于 1982 年 2 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

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指出：毛主席 1950 年 7 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个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

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彻底否定，为王实味案平反提供了契机。1986 年新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最后一页注释中，赫然写上了这样一句话：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1991 年 2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指出：经复查，王实味同志 1930 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 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蒙冤半个世纪，王实味案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王实味被恢复了“同志”的称呼，这已是他被错误处决后的第 44 年了。王实味案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康生既是始作俑者，又是主要的决策者，而李克农，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环境艰险，不容李克农多加冷静思考。岁月苍桑，却折射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勇于面对错误的崇高风范！

一根不怀好意的“橄榄枝”

1945 年 8 月 10 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消息传到中国，万众欢腾，历经八年之久的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终胜利。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企望和平，中国却又重新面临着两条道路的抉择。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蒋介石却急匆匆地抓紧时间部署兵力，抢占战略要地，企图一举消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异己力量。

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一连下了两个命令：一个是给他的嫡系部队，要求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是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勒令他们“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两道命令赤裸裸地暴露出蒋介石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险恶用心。

对此，中共及解放区军民当然不会忍气吞声。8 月 13 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严厉指出：

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

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

接着，毛泽东又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介石，坚决反对他的错误命令，并表明中共的严正立场和态度。

抗战的烽火刚刚熄灭，内战的阴云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然而，恰在此时，蒋介石却向毛泽东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向中共递上了一根不怀好意的“橄榄枝”。

原来，蒋介石为避免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企图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卸到共产党身上；更何况他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后方，有的嫡系部队还远在缅甸、印度，要把全部军队调运到内战前线，尚需时日。于是，蒋介石这才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向世人摆出了一副“和平协商”的姿态。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八月十四日

电文不长，而字里行间颇有恳切之意。对毛泽东是否会应邀，蒋介石其实心中无底，他一面静听毛泽东的公开答复，一面命令国民党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设法了解毛泽东的反应。

这批联络参谋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于1938年起向八路军总部和各师派驻的代表。按规定，他们的任务应该是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八路军的联系，了解八路军在前方作战的情况，了解八路军各部在战争中的实际损耗，并使之得到及时补充等。然而，这批联络参谋实际上将主要精力用于收集中共党内和敌后根据地的各种情报，秘报重庆。有的甚至公开在延安从事破坏活动。两天后，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下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表示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铄八月十六日

朱德给蒋介石的电报，批驳了蒋介石向八路军提出的“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未放下武器的日军进攻和受降的错误命令，同时提出了中共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

在公开复电的同时，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政府在延安的两位联络参谋，明确表示，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转告重庆方面。8月20日，蒋介石又给毛泽东发出邀请电。此时，他已得到在延安的联络参谋的报告，知道毛泽东无意赴重庆，因此一反常态，反而邀请得更加热情起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

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退惠诺为感。蒋中正哥八月二十日

显然，蒋介石在此是向毛泽东施加压力，毛泽东不去重庆谈判，他尽可以借机宣传中共没有诚意，发动内战的脏水也就可以泼在中共身上。

破译密电帮助毛泽东

两天后，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进谒，希予接洽，为慰。

毛泽东未养八月二十二日延安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速驾！蒋中正梗八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以“时间紧迫”、“问题重要”为由，要求毛泽东与周恩来“偕临”重庆，同时，他在报刊、广播中大作宣传，妄想给中共造成不愿和平的事实。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周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二十四日

毛泽东在此电中，虽然通知蒋介石“准备随即赴渝”，但仍决定让周恩来与蒋介石先行接触，如果蒋氏果真有和平诚意，再赴重庆。对蒋介石不能不防。张学良被软禁南京，李济深、胡汉民被囚禁汤山，这一幕幕蒋介石导演的政治丑剧，人们记忆犹新。此次蒋介石主动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参加和谈，莫非也是一出“鸿门宴”？蒋介石究竟意欲何为？中共中央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紧张地思考着对策。

李克农的情报系统被派上了用场，他们日夜监听蒋介石和其驻延安联络参谋的来往电讯，希望能从中获取信息。然而，国民党的密电无法破译！怎么办？搞到密电码！

李克农下达了命令，情工人员四处活动。果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能人们，不负李克农厚望，将密电码弄到了手。有了密电码，国民党中央与其驻延安联络处的电讯联系就不再是秘密了。李克农日夜监听，不放过每一个字。办公桌上的电文盈尺，李克农详加分析：原来，蒋介石料定，毛泽东自秋收起义后，就没

有离开过根据地，这次，他也不敢到重庆来。如果毛泽东不来，破坏和谈的罪名正好扣在共产党的身上；如果毛泽东应邀赴会，也可以乘机拖住毛泽东，争取时间作好进攻共产党的准备。如意算盘不可谓拨得不精明。

情报迅速送到毛泽东处，毛泽东洞察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1945年8月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人与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一起开会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同意毛泽东去重庆。

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前夜的讨论意见，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自然，去谈判就必须作一定的让步。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日便向党内正式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8月28日，毛泽东要走了，李克农亲往送行。他守候在机舱口，严防无关人员登机。

毛泽东走过来，紧握李克农的手。李克农心里暗暗地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他深情地说：“主席，你要多保重……”便哽住了。毛泽东似有所察，笑着说：“克农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嘛！这回去重庆，正好和分别了20年的蒋委员长见见面，有啥子不好嘛。”毛泽东安抵重庆，李克农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蒋介石却很尴尬，他的情报网肯定地告诉过他：毛泽东绝不会来重庆。可毛泽东真的就来了！

毛泽东的专机抵达重庆机场时，蒋介石正在慌忙召集各院院长会议，紧急讨论国共和谈事宜。国共双方谈判开始时，国民党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

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极力辩解说：“国民党没提出具体方案”是“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这种借口，不能不让人感到滑稽和可笑。

这一切，确实使老谋深算的蒋委员长脸上无光！

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

经过国共双方多次的谈判和斗争，终于于10月10日签定了《双十协定》。根据协定规定，中共主动让地撤兵。蒋介石本无心讲和，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中共情报组织已获悉陈诚在国民党高层军事会议上关于“复员即动员”的讲话，意即抗日是复员，反共是动员。这其实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信号。李克农将这一情报及时上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后，发出《中情通报》，指出蒋介石正在加紧准备内战的严峻形势，使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预先准备。这是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时，中共中央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发出的最早的警报。

果然，蒋介石一切准备就绪，即以88万之众的大军围攻解放区，妄图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争阴云重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12月下旬，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特使”、陆军上将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在他的参与下，国共双方经过商议，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0日，由张群和周恩

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由双方各向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并定于1月13日午夜12时全面停火。

根据双方协议，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同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军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的郑介民、共产党的叶剑英和美国人罗伯逊代表三方组成。

中共代表团旋即开赴北平。叶剑英作为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总部的代表，主持中共代表团的工作。李克农受命担任了代表团的秘书长。

戴着黑色圆边眼镜，留着八字胡须的李克农，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草绿色呢军服，胸前佩戴着军调部标志的蓝色三连环肩章和圆形铜牌胸章，颇有军事家的风度和外交家的潇洒。他将以这样的姿态，在国民党和美国代表之间巧妙周旋。

北平，千年的古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此时，她却处在一片混乱与恐怖之中：大街上，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神气十足的国民党官兵和警察在街头耀武扬威、气势汹汹；交通路口到处是架着机枪的地堡和沙袋垒成的掩体，随处可见乞讨的老人和小孩；商店冷冷清清，连过往的行人也显得紧张而又压抑。这景象使李克农预感到：国民党是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独裁统治的，内战迟早要爆发，军调部的工作必定不会轻松。

中共代表团分住两地，一部分住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北平饭店，李克农率电台、机要科和其他有关人员则住在翠明庄。翠明庄是一座三层的典型中国式建筑，飞檐画栋，古色古香。这时门前已由威风凛凛的八路军哨兵守卫着，是一处既秀丽而又略显神秘的地方。

安顿妥当，李克农立即投入工作。军调部要处理的事情既多且繁，方方面面都少不了李克农。有人给他粗算了一下要管的事情：对外，要和叶剑英一起出席三方联席会议，主持交涉、交际、新闻发布活动；对内，统管代表团的党务、政治思想、人事、秘书、财务、机要、电台、行政、接待、通讯、警卫，以至组织追悼会、办喜事等等，几乎是无所不管。

代表团的成员以及武装警卫，大多是由各解放区抽调来的，干部有老有新，有男有女，有文有武。各执行停战小组人员前来北平赴任或汇报工作川流不息，从延安、重庆、南京、华北、华中、东北、中南各解放区来的流动人员，经北平时也由中共代表团负责接待。

各地来往的领导干部，被代表团的同志戏称为“各路神仙”。他们当中有的是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开；有的则要顺便看看北平市容；还有的希望借钱买点自己需要的东西；也有人干脆向代表团行政处提出想做一身合适的衣服。遇到这种情况，李克农总是嘱咐行政处的同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满足这些领导的要求，如果确实有困难，就婉转地加以说明，请求谅解。有些难办的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就亲自向他本人报告，这样就基本解决了矛盾。

中共代表团成员内部，也存在着一些思想问题。抗战胜利后，有人想回家过日子；有人想结婚；有人想提高自己地位；还有人想过安逸舒适的生活。这些思想问题不解决，难免会产生一些消极情绪，影响工

作。

军调部建立初期，凡是穿军服的都要佩带军衔，而中共尚未评授军衔，为便于开展工作，只能参照执行。周恩来作为三人小组的中共代表，和张治中、马歇尔一样，佩戴上将军衔。在中共代表团内部，叶剑英戴的是中将军衔，李克农戴的是少将军衔。一天，李克农听见有干部为戴衔的事情不满而发脾气，非常生气，立即到行政处去，要把他的少将军衔换个上校军衔。他说：“我们共产党员为革命出生入死，难道就是为了争这个牌牌？”代表团的同志觉得李克农说得对，但换个牌牌并不能解决问题。有的同志说：“您可以换个上校牌牌，我们都可以换个中校牌牌或少校牌牌，但我们今天佩戴军衔，是为了对外工作方便。您是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叶剑英委员的主要助手。您戴的军衔低了，同国民党、美国的手站在一起，就不相宜了。”李克农听罢也就摇摇头不说话了。

军调处的内部思想

此后，中共代表团内部开展了政治思想教育，把事情讲明，道理讲通，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使工作能顺利开展。

中共代表团建立初期，专业人员不够，一些招兵买马的活儿也落在了李克农的头上。军调部年轻的英文女翻译、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的王光美，就是这时在李克农面前报到工作的。

王光美是辅仁大学理学院的学生，思想进步，颇具才华。她当时毕业后，正准备到美国去留学。

一天，北平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找到她，让她到军调部的共产党代表团去当英文翻译。王光美略加考虑，欣然应允。按组织上的安排，她骑车来到了翠明庄。

李克农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只有 20 来岁、身材苗条的女大学生，笑眯眯地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欢迎欢迎！”说着，他把王光美领进二楼的一个房间，那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王光美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李克农询问了王光美家里和学校的一些情况，王光美直率地作了回答。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传过来一阵粗犷而又缠绵的歌声：“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王光美很爱唱歌，她听得入了迷。

“很好听，是吗？”李克农问。王光美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这是陕北民歌，歌名叫《走西口》。以后你如果到延安去，还可以听到那里的民歌信天游，也很好听。”李克农笑道。“我干什么事？”王光美忽然想起了正事，忙问道。“你是怎么来的？”李克农避而不答，却反过来问她。“骑自行车来的。”王光美说。

“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我们派车去接你。你把住址留下来。”李克农最后说。

第二天一早，叶剑英乘坐的那辆小车开到了西单的一条胡同里，把王光美从家里接走。就这样，王光美成了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中共代表团英文翻译。

翠明庄环境优美，住得相当舒适，伙食也很不错，但斗争却依然激烈，气氛并不轻松。

翠明庄对面左右两侧楼房都驻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甚至连翠明庄内部的一些服务人员，也是国民党特务乔装打扮的。中共人员举手投足，常常受到特务们的严密监视。随着军调部工作的逐渐开展，中共代表团与中央和各根据地的电讯联系大大加强，国民党特务的监控，给电台和机要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情报工作成为国民党特务破坏的重点，也是共产党方面工作的难点。拿机要科来说，科员都是从各根据地选调出来的股长以上的机要干部，政治可靠，业务精通，这没话说。但许多人并没有在国统区工作的经验。李克农很担心，他常常告诫大家：“同志们，机要和电台是美蒋妄图破坏的重要目标，他们现在已经集中了国民党和美、英、日等国 100 余名破译人员，力图破译侦收我党的密码电报，窃取我党、我军的最高机密情报。机要干部，就是要机密、准确、及时地完成机要通讯任务，确保我党密码的安全和密码电报的畅通。我们如果稍有疏忽，出了漏洞，就可能被敌人所利用，对人民犯下大罪啊！……”

他还告诉大家，代表团的每个机要人员，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都被登记造册，有像片，有职务，甚至有履历表。一定要提高警惕，要具有机智的头脑，善于斗争，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对那些特务的监视，李克农制定出反监视的方案：一是将电台和机要科集中在翠明庄的南楼，专人把守，严密防范，不准闲杂人员进入；二是要求所有人员一律自己料理生活，不允许饭店的“服务员”擅自进入楼内。

“服务员”无法进入，可他们并不甘心，总是借口今天修理门窗，明天清查家具，后天检修电话，想方设法进楼窥探。李克农命令：跟踪严防。

于是，当这些不速之客进入大楼，无论他走到哪儿，总有中共代表团专人“伺候”，形影不离，特务们有再大的能耐，也无计可施了。

“服务员”打扫房间、取换衣服、倒字纸篓都非常勤快，因为常常能从换洗的衣服口袋和字纸篓里找到的片纸只字，他们企图从中分析了解情况。李克农幽默地告诉大家，可以略施小计，戏弄他们一番，例如用小纸头随便写个数字或像是人名的字样，放在衬衣口袋里，准备他们搜去。李克农自己也时常用墨笔、铅笔在一些纸头上写写划划，然后把纸撕成小块扔到字纸篓里。有人不解其意，李克农笑着说：“这些国民党特务，既然对这方面有兴趣，就让他们拿了去慢慢研究好了，反正他们呆着也没事干。”翠明庄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李克农高兴地夸赞大家：“身在北平，心系延安，个个都是好样的。”

秘书处的严密

不过，令人虚惊一场的事情也偶有发生。

中共代表团下设一个秘书处，分管办理对外文书、电报、代替叶剑英接见来访人员以及拜访社会名流、与各界交往、了解社会情况等事情。针对秘书处的特殊情况，李克农指出：“毛主席强调在我党同国民党的斗争中要注意观察‘人心向背’的问题，我们要在各界群众对两方政策的了解和反应中认真观察这一问题。”他要求秘书处人员每次外出活动都要事先 向上级说明：到什么地方，见什么人，大约几点才能回来等等。

每次外出，李克农都要守候外出人员平安回来，了解情况后，才回房休息。大家平时都比较注意，晚上10点以前按时回宿舍。

有一天，秘书处一位姓马的同志，出去看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位国民党军官。老马在朋友家喝酒聊天，直到凌晨1点多钟才回到翠明庄。

李克农非常着急，11点过后，就派人外出寻找。由于老马事先并未留下地址，遍找不见人影，大家都干着急。

老马回来后，李克农问明情况，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有人对老马说：“你知道克公和我们多为你担心啊！有两三个小时，克公一直在他的房间里和楼道里走来走去，派几批人去找你，都失望而归。他的健康状况不怎么好，可是他却多么关心干部啊！”在李克农的领导下，中共代表团如铜墙铁壁，特务们招数使尽，便铤而走险。

一次，中共代表团正在进行电台联络时，忽然发现有可疑电波出现。有人窃听！李克农指示：慎密侦察。

原因很快查出来了。原来，为破译中共代表团密码电报，国民党特务在翠明庄的一个隐蔽地下室，偷偷地架设了一部小型电台，专门偷抄中共代表团的电报。

几天后，一份中共代表团的严重抗议摆到了谈判桌上，指控国民党特务偷抄电报，态度严厉，证据确凿，不容抵赖。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无言以对，只好连声应付：“对不起，对不起，马上查办！”很快，那部小型电台悄然撤走，神秘的电波消失了。

当国共双方在谈判桌上剑拔弩张的时候，翠明庄内也很不宁静。伙食供应像晴雨表一样反映出双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本来，这里伙食相当不错，早餐是牛奶、点心或豆浆、油条，中、晚餐都是四菜一汤，饭后还有水果供应。大家来自条件艰苦的根据地，喝惯了小米粥，李克农更是偏爱酒糟白菜炖豆腐。吃到这样的饭菜，算得上是“口福不浅”了。

然而，伴随着谈判斗争的日趋激烈，餐桌上也风波乍起，这里的伙食也越来越令人倒胃口，有时甚至到了不能下咽的地步。这就不再是简单的饭菜问题，一定是有那么一些人想借伙食发泄对中共代表团的不满。

消息传到了李克农的耳朵里，他火冒三丈。

一天就餐时，李克农把翠明庄的管理人员叫到餐厅，手指着餐桌上的饭菜，当众问他：“你说说看，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天是多少钱？”

那人老老实实地作答。

“那么，你看看，我们现在吃的实际标准是多少？与规定的伙食标准相差多少？”

“大概，大概……大概相差无几吧。”他偷眼望了一下桌上的盘子，舌头有点哆嗦。

“到底相差多少?”李克农火了。

一再追问之下，那人无招架之功，只好一个劲地点头。

李克农放大嗓门抗议道：“你们这样做是严重违反了停战协议，违反了三方规定的伙食标准，是贪污！是克扣军饷！”

那位负责人头上冷汗直冒，不住地弯腰道歉：“是，是，请长官息怒！我一定追查此事。今后保证按照伙食标准办好膳食！”说完，又转向四周的工作人员说：“对不起，请各位长官海涵！”从此，中共代表团的餐桌上恢复了“和平”。

然而，真正的和平却没有来得如此的迅捷，在蒋介石的词典里，和平只不过是一块廉价的遮羞布而已。1946年2月21日，中共代表团通过各种渠道，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将于次日煽动北平部分青年学生举行所谓“反苏、反共”的示威游行；同时，还有一批暴徒，将打着“东北还乡团”的名义，前来“叶公馆”和翠明庄捣乱。

对此，中共代表团作了巧妙安排：请叶剑英悄然离开，请一位英国记者到“叶公馆”进行“实地采访”。

22日晚8时，一群暴徒气势汹汹地闯入“叶公馆”，见恭候他们的竟是一位洋记者——国民党特务在洋人面前还顾着一点脸面，知道走漏了风声，只好狼狈地溜走了。

此时的翠明庄，李克农正紧急动员，重点保卫南楼，派专人护卫电台、密码和机要文件，严阵以待。

由于这伙暴徒在“叶公馆”偷鸡不成，最终没敢再来翠明庄碰钉子。

经历一段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

23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强烈抗议。操着广东白话的叶剑英厉声责问郑介民：“你们以‘还乡团’之名，制造事端，进行捣乱，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协议，我们决不能容忍！”郑介民狼狈不堪，只好推诿说：“本人实在不知！竟会有这样的事？我一定调查，严加惩办！”

散会后，郑介民把自己的手下叫来，一阵大骂：“饭桶！饭桶！”郑介民恼羞成怒，中共代表团则拍手称快。不久，一个更令人快慰的消息又传了过来——

1946年3月，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访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拉拢柯克，于3月初亲自陪同柯克前往北平游览观光。

灯红酒绿之时，戴笠突然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令他速返重庆参加会议，字里行间流露出撤销或改组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意思。蒋介石的命令，戴笠不敢不从，为拖延返回重庆的时间，戴笠以汇报关于所谓肃奸及遣送日侨日俘两项工作情况为由，决定先飞南京见何应钦，以期得到何应钦对他的支持。

不料在飞机到达南京上空时，大雾迷漫，飞机无法降落，遂临时改飞上海虹桥机场。而上海的上空同样是迷雾漫漫，飞机只得又折返南京。此时，机上油料耗尽，驾驶员将飞机盘空低飞时触山坠落，油箱起

火，机毁人亡，国民党的特务王魂归西天。戴笠摔死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了北平中共代表团，大家兴奋不已。李克农不住地说：“好消息！好消息！大特务头子戴笠死了！赶快买酒庆贺！”

有人知道李克农爱喝酒，专门上街买了两瓶竹叶青，弄了几盘下酒菜。李克农又吩咐将同志们都找到他的房间去，并把“服务员”叫来，让他通知厨房给弄几个冷盘，还特地让“服务员”告诉大师傅，就说一件好消息、大新闻，那个作恶多端的大特务头子戴笠死了，大家要好好庆贺一番。

“服务员”哭笑不得，只得从厨房端来四个冷盘，还带来十几个酒杯。

大家入座后，李克农请大家高举酒杯，大声说：“来，为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的摔死干杯！”

大家一饮而尽后，李克农说：“我们这不是幸灾乐祸，我们是为中国人民因此少遭受灾难和痛苦而高兴！戴笠这个坏蛋，做的坏事太多了。”

然而，在北平期间，李克农也经历了一段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1946年4月8日，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博古、王若飞因要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搭乘美军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经过秦岭上空时，因气候恶劣，飞机迷失方向，在山西境内的兴县黑茶山不幸失事，机上的全体人员，包括刚刚被营救出狱的叶挺将军以及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邓发全部遇难。

恶耗传来，中共代表团成员悲痛欲绝。

李克农神情严肃，默默地布置了一场纪念烈士的追悼会。会上，叶剑英致了悼词，李克农讲了话，他说：“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总是要死的，共产党员不怕死，但是，这次的灾祸太突然了。牺牲的这些同志都是我们党身经百战的杰出领导。当前，我们的国家、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同志的牺牲，对革命事业来说，损失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活着的人，应当把他们放下的担子挑起来。”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李克农几乎没有了笑容，身体也越来越差。他睡眠不好，咳嗽加剧，有时咳得实在太厉害，就从衣服兜里摸出一个小盒，从里面取出两粒白色药片，放在口里，以缓病势。药有镇静作用，同志们都劝他少吃一点，李克农总是摇摇头说：“不吃，又有什么法子？”

的确，李克农肩上的担子太沉太重了！

国共和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破裂告终，因为蒋介石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1946年6月，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完成了内战部署，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

8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调处”失败，北平军调部随之关闭。它的存在前后历时仅8个月。别了，北平！

李克农还会回来的，他有这个信心。不过，他也许没有想到，仅仅2年半以后，他就又踏进了这座历史名城，和眼前的对手再度交锋。而那时的国民党——这个貌似强大的巨人，已是穷途末路，不堪一击了。

第七篇

1948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和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央情报部主管对敌策反工作。

在李克农的指挥调度下，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活剧上演了：国民党军队一批批地“弃暗投明”，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康兵不血刃，和平解放。

撤离延安

和谈破裂，战火再燃。

自1947年3月始，蒋介石在向中共解放区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改变军事战略，实行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地首先成为国共双方陈兵逐鹿的主战场。

陕北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蒋介石派遣他的得意门生、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25万人马，分五路向陕北发动突然袭击。

延安渐渐处于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中，李克农的情报机构开足马力，多方搜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国民党中统山西省调统室主任缪庄林、陕西省调统室主任李茂堂，此时成为李克农手下的两位奇兵。

缪庄林，原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失去联系，不久加入国民党，被委任为晋西北党务办事处主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委任其为山西省调统室主任。

李茂堂，原来也是中共党员，1935年他在南京被捕后自首，参加了中统，后来中统派他到西安，委任他为陕西省调统室主任。

1943年，缪庄林路过延安，表示愿为中共工作，李克农同缪庄林进行了会晤，晓以革命大义，鼓励他“浪子回头金不换”。在李克农的感召下，缪庄林开始秘密为中共工作。1945年11月，怀着将功补过之心的李茂堂也秘密到达延安，李克农亲自接见，经过谈心，得知李茂堂有重新入党的要求。李克农在报经毛泽东同意后，予以特别批准。

有了缪庄林和李茂堂积极的工作，李克农获悉了国民党中统山西调统室、陕西调统室的密码，得到了蒋介石与“山西王”阎锡山进行勾结的情报以及陕西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联合会议的全部记录。这对中共中央掌握延安周边的敌情，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胡宗南部大兵压境，敌众我寡，力量悬殊，中共中央经慎重考虑，于是年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

撤离延安前夕，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安全的重任落到了李克农肩上。胡宗南大兵压境，形势十分危急，叶剑英和杨尚昆等几次催他赶快撤离。李克农却说：“毛主席不走，我不能走。”3月19日，胡宗南手中的王牌——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占领了空城延安。尽管延安城此时已空空如也，胡宗南还是兴奋

异常，他立即向蒋介石发电：

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于十九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 5 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其时，陕北的人民解放军总数也不过两万余人，且已悉数撤离，不知胡长官俘虏的“5 万”人从何而来？蒋介石接电后，尽管情知有诈，仍然欣喜地向胡宗南发来嘉奖电：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积愤，特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除了发电嘉奖外，蒋介石还下令授予胡宗南一枚大勋章，并晋升他为陆军一级上将。高兴之余，蒋介石不忘在自己的日记本上记下难忘的一笔：

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山舰事件）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

毛泽东主动撤离延安，唱的是一出“空城计”。他说：“胡宗南要来延安，那就请他来嘛。延安就是这样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破坏了，那样也好，我们将来盖大楼。人民永远都是我们的，我们怕什么！不只是延安，东北、华北，还有别的解放区，必要时我们都会让一点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多背上几个包袱。他背不动了，还是得给我们放下。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里。”

陕北转战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陕北转战。根据形势与任务的需要，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分成三个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组成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作战；刘少奇、朱德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李克农则和杨尚昆、李维汉等同志一起，在叶剑英的率领下，组成中央后委，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为确保中央前委和毛泽东的安全，李克农从原中央警备团中抽调了一个骑兵连和三个步兵连组成精干的警卫部队，随前委行动。同时，在绥德、陇东、三边等地派出了三个侦察站，配备了电台，直接为保卫中央前委服务。

1947 年 3 月底 4 月初的一天下午，北国早春的寒风钻心刺骨，在晋西北临县的三交镇，来了几位骑马的军人和警卫员。为首的身材魁梧、英姿勃勃，他是叶剑英。李克农、杨尚昆和李维汉紧随其后。他们奉中央的命令，率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一、二、三局和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调查部、中央办公厅等单位共 3200 多人在这里扎营。

叶剑英到三交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着手建立党组织，成立了由叶剑英任书记，李克农、杨尚昆、

李维汉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党委。中央后委在三交历时一年。

国民党军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延安，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似乎一帆风顺。

胡宗南宣称：“中共已成流寇。”

蒋介石也高兴得昏了头，向胡宗南连连下令：“收复陕北事小，俘中共首脑事大，如能俘中共首脑，放弃陕北亦值得，望努力为之，以创立国之首功。”

李克农的情报系统高效而又有序地运转着，胡宗南在陕北的大量军事情报被侦悉，前方转战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因而有了洞悉秋毫的眼睛。

李克农具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早在 1941 年中共中央情报部成立以后，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西安在战略上的特殊地位，加强了对西安情报机构的建设。李克农在方针上、组织上、任务上都给西安情报机构以具体指导，提出了“巩固发展、长期打算、深入敌内、精干隐蔽”的要求，不仅使西安的情报组织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使其成为日本投降后中共开展北方工作的重要基地。

此刻，面对胡宗南军的猖狂进攻，李克农命令西安情报组织把对胡部进犯陕北的侦察工作作为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以配合西北野战军粉碎其阴谋，确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在此关键时刻，打入胡宗南部、担任胡宗南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 年 3 月，熊向晖将胡宗南攻占延安、进攻陕北的作战意图、进攻路线、兵力部署等事先上报李克农，使中共中央能早作安排。胡宗南进占延安后，熊向晖又将胡宗南的一举一动及时向中央汇报，使中共中央对胡宗南的动向了如指掌，胡宗南也就不可避免地屡遭败绩。

毛泽东的“蘑菇战术”屡建奇效，陕北周旋的结果，蒋介石手中的王牌——一个又一个美式装备的旅、团一一被吞掉。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以无畏的革命气魄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李克农身在临县，心系陕北，他十分关心中共中央前委和毛泽东等人的安全，通过秘密电台指挥全国各情报系统，将有关情报及时报告中央。对此，周恩来夸奖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

这时的蒋介石却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他“重点进攻”的结果是——全面收缩。

这时，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人民解放军犹如苍龙入海、猛虎下山，摆开了战略进攻的态势。李克农具体领导的情报工作，到处开花，遍地结果。大批情工人员打进国民党的军队，深入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机构内，大量的密电被破译，大批的部队被策反投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牢牢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

1948 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和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

决定，中央情报部主管对敌策反工作。

在李克农的指挥调度下，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活剧上演了：国民党军队一批批地“弃暗投明”，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康兵不血刃，和平解放。

亲自指挥东北战场（一）

这其中，李克农亲自指挥的东北战场的对敌策反工作，就是光彩夺目的一幕。

东北地区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它工业发达、交通方便、资源丰富、粮食充足，地理上与苏、朝、蒙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胜利后，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意欲占领东北，出动了大量飞机、舰艇运送蒋军到东北。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六十军、九十三军共五个军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云集东北各大城市和重要港口，企图抢夺胜利果实。中共中央也果断采取了相应措施：由关内各解放区抽调部队 13 万人和两万干部从陆、海两路兼程进入东北，并陆续派彭真、陈云、林彪、李富春、高岗、林枫、张闻天等 20 多名中央委员到东北工作。1945 年 9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为书记。同时，进入东北的各路部队与原在东北的抗日联军共同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是年底，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委。熊熊战火在白山黑水之间燃烧起来。

为配合东北的解放战争，李克农亲自指挥了中共驻沈阳的情报组织。该组织的主要内线人员、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赵炜，早在北平军调部时期，就处于李克农的具体领导之下。赵炜主管机密室，几乎掌握了东北国民党军的全部情况。1947 年 3 月至 9 月，在东北战场战况激烈的情况下，赵炜及时准确地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国民党军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对改变东北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 年 6 月，中共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在批发中央情报部致沈阳情报组织的电文上写道：“最近你们来的情报很有价值，对中央帮助甚大。”对赵炜提供的情况予以嘉许。

李克农还把目光投向了在东北作战的国民党军事体系中的杂牌部队——滇军。

在国民党驻东北军队中，六十军与九十三军就是滇军中的两支。六十军组建于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当时，“云南王”龙云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从滇军中抽调出第一、二、三、五、七、九等 6 个旅和部分滇黔绥靖公署直属特种兵部队共 4 万余人，编成一个军，被国民政府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下辖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师，各师辖两旅。

六十军建成后，转战抗日战场：台儿庄战役，损失逾半；滇南守边，历尽艰辛；越南受降，备受殊荣。

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戡乱必胜，救国必成”的口号下，六十军奉调前往东北，投入到一场彻底改变六十军历史命运的反共内战中。

此刻，六十军雄风难再，等待它的是人民解放军暴风骤雨般的重大打击。六十军一时损兵折将，丢盔弃甲，元气大伤。

“后撤!再后撤!”国民党东北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吉林守备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不停地下达这样的命令。曾泽生，云南永善人，1902年生。他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奉龙云之召回滇，充任昆明军官候补生队副队长。抗战期间，历任新六军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是一位能征惯战的猛将。此时，“后撤”的命令从他的口中发出，一番难言的苦衷涌上心头。

六十军人心惶惶，军心不稳!

滇军中的中共地下组织活跃起来。这批人中间，有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刘浩。

刘浩，云南人，原名刘若坚，1937年入党，长期在中共云南工委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运工作和对国民党云南上层的统战工作。其妻禄时英是调往东北的国民党滇军第九十三军军长、云南彝族人卢浚泉的本家亲戚，而卢浚泉又是龙云的幺叔。因而，刘浩和云南军政要人龙云、卢汉、卢浚泉、张仲、陇耀等私交甚深，在云南滇军中常有“通天”的本事。

1946年4月26日，正在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的刘浩接到通知：朱德总司令请他去谈话。

刘浩赶到朱德的窑洞，只见还有另外几位云南籍的干部也在那儿。不一会儿，朱德走出来，和大家握手见面。朱德笑着说：“你们在坐的都是云南人，我也算是半个云南人了，我们是老乡相会分外亲啊!”朱德虽是四川仪陇人，但他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接着参加了辛亥革命中的云南光复之役，此后又在滇军中历任团长、旅长，并参加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和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朱德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说：“蒋介石已经把云南的六十和九十三两军调到东北打我们，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怎样做好滇军工作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加强对敌军工作，向来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根据东北敌军情况，做好滇军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既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又是为云南父老做一件大好事。”

亲自指挥东北战场（二）

针对刘浩今后的工作，朱德说：“中央考虑你是云南人，做过地下工作，有做云南上层统战工作的经验，对云南上层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决定派你去开展这项工作。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还要同你谈话，布置任务。”

刘浩当即表示：愿意去东北做好滇军的工作。

4月29日，刘少奇接见了刘浩，具体安排了他的工作。

刘少奇说：“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依靠我方在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好工作；二是依靠我军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三是利用各种可能，直接与滇军上层将领接触，公开对他们进行策反。总之，工作要从各方面去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或迫使滇军大部分起义。”

刘少奇还告诉刘浩，中央还将抽调一部分云南籍干部去东北开展滇军工作，滇军中地下党员的关系，

由刘浩负责联系。并要求刘浩先乘飞机去北平，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由叶剑英、李克农具体安排接近滇军的事宜。

1946年5月6日，刘浩按中共中央指示，飞抵北平，向李克农等汇报受命策反滇军的情况。

李克农与刘浩详细研究了如何安全进入滇军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东北的防护，沿途盘查甚严，最后决定：刘浩先乘飞机去张家口，再经晋察冀转冀热辽，想办法进入东北。

李克农要求刘浩首先与东北滇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然后再相机行事。

在李克农的帮助下，1946年7月下旬，刘浩辗转进入东北。此时东北上空已弥漫着战火的硝烟了。

刘浩到东北滇军后，立即与九十三军中共地下党员张士明和六十军地下党员杨重接上了头，传达了中央指示，并根据滇军中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与他们研究确立了八项工作任务：对具备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迅速分别发展入党；共产党员要争取掌握带兵实权；广泛开展交友活动，更多地团结中、下级军官；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广大官兵的不满情绪，适时地进行策反宣传，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顽敌；积极搜集军事情报，配合解放军外线作战；建立与解放区的交通联络，内外配合；为便于工作，把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分为两个独立活动的党组织，六十军地下党组织由杨重负责，九十三军地下党组织由张士明负责；积极慎重地开展对上层将领的工作，争取在滇军内部策动反蒋起义。两个军的地下党组织，按照统一部署，积极活动，迅速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了广泛的交友活动。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很有成效，很快，两军的带兵实权就掌握在中共地下党员张士明、宁坚、杨重、范啸谷、赵国璋手里。

刘浩将两军的实际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认为，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虽然为保存实力，作战消极，但对中共顾虑颇多；和国民党其他将领一样，他迷信美国的支持和手中精良的装备，不到走投无路是不会认输的。

针对这一形势，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作出决断：集中精力策反六十军。

李克农居“庙堂”之高，刘浩处“江湖”之远，策反工作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昼夜不息地运转起来。

与此同时，长春城外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城内已弹尽粮绝，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军长曾泽生哀叹：“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是自相残杀。”原先充盈胸中的“为卢汉争光，为滇军争气”的豪情壮志，已荡然无存了。

于是，在历史的日历上，记载下了这样两个振奋人心的日子：1948年10月15日，东北滇军第九十三军在锦州被全歼，军长卢浚泉被俘；

1948年10月19日，东北滇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军部和一八二师、暂编二十一师、暂编五十二师3万余人，在长春起义。曾泽生部起义后，被中共中央军委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1950年10月，五十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涌现出白云山团、帽落山英雄营及修理山、文衡山英雄连等英雄集体和一批战斗英雄，立下赫赫战功，打出了军威国威。曾泽生本人则于建国后历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长春起义，使蒋

介石东北棋盘上重要的一颗子，不战而为我所有，这对改变战局，无疑有莫大的裨益。

滇军，是国民党军链条上的一个薄弱环节，继续从滇军入手，李克农把眼光盯住了云南。云南掌握在龙云、卢汉手中。

龙云，1884年生，云南昭通人，彝族。他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曾在云南军阀唐继尧部任过军长。1927年，43岁的龙云发动倒唐政变，一举夺得云南的实权，成为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第十三路军总指挥，成了名副其实的“云南王”。抗战胜利后，早有消除异己之心的蒋介石，免去了龙云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明升暗降，将龙云闲置了起来。龙云被蒋介石夺去了军权，但在云南的一方天地，影响却还在，他不时通过各种渠道，遥控云南局势。新任云南省主席卢汉便受其影响。

卢汉，1896年生，云南昭通人，彝族。1914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是龙云的老部下。此时，接替龙云，主理滇政。蒋介石此举，意在挑起龙、卢二人的矛盾。

龙云在抗战时期，曾与中共有过接触，此刻对蒋介石将其调虎离山的一招，正愤愤不平。卢汉偏于云南一隅，手握杂牌部队，蒋介石借“勘乱”消灭非嫡系部队的伎俩，也令他大为不满。显然，蒋介石在弄巧成拙。

全力策反云南

在这种形势下，卢汉向中共发出信号——请求与中共联络。中共中央也相应作出决定：全力策反云南！

卢汉的联络人，名叫宋一痕，此人1926年入党，1928年脱党后在上海从事新闻、摄影工作。1938年卢汉北上抗日时，宋一痕投身卢汉麾下，跟随卢汉征战南北。鲁南战役中，宋一痕在突围时与部队失散，几经周折后，于1939年携妻子回到昆明。与中共联络，卢汉想到了这位老部下。1946年9月底，宋一痕夫妇被卢汉派往香港，卢汉希望他们能在香港找到与中共接触的渠道。

宋一痕夫妇下榻于“九龙饭店”，前脚进店，后边就跟来了香港“一斋书屋”的老板黄洛峰。

黄洛峰是中共党员，宋一痕参加中共后，二人曾在一起工作过，是老相识。而所谓“一斋书屋”，正是中共在香港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黄洛峰就是该联络点的总负责人。

此后，宋一痕在香港和昆明之间穿梭来往，在中共和卢汉之间传递信息。

卢汉心动了，他嘱夫人写了封起义决心书，签字盖印后，交宋一痕面交中共领导人。

1949年6月，宋一痕在中共华南局护送下，来到了北平。李克农会见了，向他布置了云南起义的有关事宜。

中共中央对卢汉的决心书作了答复，宋一痕再回香港。而北平和香港之间的电讯联络也正式开通。宋一痕要回昆明见卢汉，他夫人的二弟席宣负责与中共的联络。宋一痕临走时，向他交待了暗语，说“我们在香港的地点，北平已知道了，如果北平来了电报，你就转昆明，而昆明来的电报，则转往北平。记住，北平来电的代名是：邹明。”邹明，就是李克农。

北平的电报南来，昆明的电报北往，通过香港的中转站，中共和卢汉频繁联系。为防国民党特务窃听，电报一律用密码加暗语：来往电报谈的全是有关汽车买卖的事。连席宣自己也弄不明白，只是照转不误。

终于水到渠成。1949年8月，先期避往香港的云南省“老主席”龙云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集团，拥护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9日，一个更具爆炸性的消息传出：云南省“新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偕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和潘文华，同时在昆明和彭县通电起义，宣布即日起率所部与国民党集团脱离关系。云南、西康和平解放！

据史料记载：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50年海南岛解放，中共策动国民党军起义、改编、投诚近500起，整师156个，舰艇74艘，飞机26架，官兵177万。起义投诚官兵占解放战争中被歼人数807万余人的1/5以上。这一业绩，在中外军事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在战火硝烟的背后，李克农参与策动了部分地区的和平解放工作，并组织了多起起义，功不可没。

形势下的傅作义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神州大地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国共双方摆出了战略决战的态势。经过两年多作战，双方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勇，由战争初期的12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万人；而国民党军则大量被歼，仅1948年7月至11月间，就丧失了100万部队，总人数则由发动内战时的430万人下降为290万人，元气大伤。对此，蒋介石神情黯然，手足无措；而毛泽东却充满了自信，他说：“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1948年底，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围困的北平城中南海居仁堂内，一位体态魁武、神情严肃、身着黄布军装的国民党将军在室内默默徘徊，疲惫不堪的脸上露出忧虑的神情。此人，就是国民党军中名声显赫的傅作义将军。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今临猗县）人。1895年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青年时期，他抱着救国的理想，投身军营。1918年，傅作义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阎锡山的晋军中任职。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阎冯反蒋战争、抗日战争。1939年，傅作义脱离阎锡山部队，到国民党第八战区任职。

1948年5月，国民党军在华北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后，为挽救败绩，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剿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傅作义走马上任后，绞尽脑汁，期望有所作为，不料，就在他刚刚上台不到两个月，华北人民解放军在保定以北的涞水、庄町一役，重创其“王牌”第三十五军、歼灭他的新编第三十二师和第一一师，给傅作义以极大的打击。

在正面战场给傅作义部迎头痛击的形势下，针对傅作义已陷入兵临城下的艰难处境，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傅作义部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一方面傅作义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的所作所为有较深的矛盾，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傅作义是反共的，长期与共产党兵戎相见，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有60万国民党军队，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

接受和谈。因此，中共中央在立足于打、准备打的同时，力争和平解放北平，以保全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为胜利后在北平建都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配合中共中央的部署，李克农领导的情报系统积极活动起来。当时担任傅作义机要秘书的阎又文，就是李克农领导下的一名秘密党员。

阎又文原是 1938 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往傅作义部的一名情报人员。由于他与傅作义是同乡，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深得傅作义器重，长期在傅作义身边隐蔽。1947 年冬，李克农提出要尽可能地发挥阎又文的作用，决定将阎又文直接划归中共中央情报部领导，并将与他联系的王玉调入情报部。

傅作义被蒋介石委任为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李克农两次约见王玉，亲自布置工作，要王玉秘密进入北平，向阎又文安排进一步了解傅作义的思想动向，提供傅作义部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随时报告中共中央。

1948 年 12 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后，李克农又多次指示阎又文要随时掌握傅作义的一切动向，并不失时机地向傅作义做一些影响工作。阎又文按照李克农的指示，开始积极而谨慎的工作，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矛盾心理都适时地向中央汇报。甚至连傅作义焦躁不安、想乘飞机逃走又怕蒋介石整他以及解放军一旦用武力攻下北平后，自己将成为毁坏这座历史名城的罪人等等矛盾心情，都作了详尽的汇报。

这些情况，对中共中央及时掌握傅作义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1949 年 1 月 31 日，在中国共政策党的强大感召下，傅作义终于决定率部起义。北平——这座驰名中外的古都、饱经忧患的历史名城和平解放，重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北平的安全工作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 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2 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

会后，中共中央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准备——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次进发。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

3 月 23 日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分乘汽车前往北平。临上车前，毛泽东诙谐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一席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周恩来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信心十足。

这支由 11 辆小汽车、10 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平常而平静地向北平驰去。

23 日当晚，毛泽东一行住在唐县淑闾村。24 日到达涿县。

24日晚，中共新任北平市长叶剑英专程从北平赶到涿县，同毛泽东、周恩来商定从涿县出发的具体事宜。最后商定3月25日凌晨2点，毛泽东等先乘火车进北平。

平、津解放前夕，李克农指示公开的情报研究机构，编写了平、津概况，供即将入城的干部阅读。这一做法，对他们了解情况、研究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以后上海、南京、西安、武汉、重庆等地的情报组织，也都推广了这一方法，编写了各城市的概况，有利于入城人员顺利接管。

为确保顺利接管城市，李克农还在河北省平山县黄村举办了“西黄训练班”，学员有从各解放区挑选出来的有斗争经验的地、县公安局长和县委书记，有经过中组部和华北城工部调集来的刚从平津到解放区来的青年党员和大学生。这些人都有过从事地下工作和民主运动的经验。巧得很，训练班的总人数刚好108人，后来被人们戏称为“一百单八将”。

1949年9月，训练班正式开学，在李克农的组织下，训练班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讲形势、讲情况、讲政策。李克农有时还亲自授课。这个训练班虽然为时仅仅3个月，但收获不小。北平解放后，这批受训的干部，跟随李克农进入北平，协助中共中央接管北平。

按中央部署，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先期到达北平，安排打前站的工作。为安全保密起见，中共中央机关被代号为“劳动大学”。在“劳动大学”的名称下，李克农设立了三个临时机构：即劳动大学筹备处（办理交涉和备置用具）、劳动大学收发处（调查社会情况和布置警卫及办理中央机关来京人员的住宿介绍等具体事宜）和劳动大学招待处（负责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布置和租借等任务）。

为保卫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叶剑英和李克农对沿线铁路做了周密的布置。3月22日，两人联名致电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并报中央：

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60余公里，两小时内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两名，一守电话，一盯道叉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3个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开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5个客车和3个行李车，开到前门车站。

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这个方案。

按计划，毛泽东和中共高级领导人将在北平西郊的清华园火车站下车，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则从西直门火车站下车。这两个车站成为安全保卫的重点。

西直门火车站由中央警备团先入北平的一部分和北平纠察总队负责。而清华园火车站的警卫工作，事关毛泽东的安全，则由李克农的中央社会部便衣队负责，车站外围由北平市公安局配合。清华园车站是个废弃的旧车站，过去基本上不用。此时，作为毛泽东进京的停靠车站，24日一整夜，灯火通明，一派繁忙景象。李克农不敢大意，亲自和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到清华园车站检查部署情况，直到一切稳妥后，他才松了口气。

为防途中有变，李克农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在前门火车站也安排警卫，以防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前门站

临时下车，避免保卫工作措手不及。

安全第一

25日凌晨4点左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安抵北平。火车进入站台，周恩来立即下车去找李克农。见了李克农，周恩来问：“克农同志，这里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李克农将中央领导进京的安全保卫工作向周恩来作了大致的汇报。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根据李克农的安排，毛泽东等人下火车后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益寿堂休息。

颐和园里本来住了一些和尚和工作人员，因为北平刚刚解放，国民党潜伏特务很多，破坏和暗杀活动十分猖狂。为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李克农安排人员将颐和园里的人都打发走了。哪知道毛泽东来了后，要水没水，要饭没饭。由于当天下午毛泽东还要去西苑机场举行入城仪式，此情此景令他很生气：“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吃去了？”

旁边社会部的同志赶忙解释，一切的一切都只为两个字：安全！毛泽东听罢，更气了：“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社会部的同志无奈，只得跑到颐和园外面的饭馆买来米饭和三菜一汤，才算解决了吃饭问题。

入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香山，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这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北平毕竟解放不久，毛泽东如果住在北平城内，一旦出了问题，后果确实不堪设想。而香山地处北平西郊，山峦叠嶂，清泉幽幽，不仅景色怡人，而且易于安全警卫。

早在2月5日，李克农就指示：“由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尚山羽等组成中央社会部工作组立即去北平西郊，为党中央打前站。”

根据李克农的指示，中央社会部的工作队以北平西郊为重点，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摸底调查，一份份报告送到了李克农的手中：《北平西郊概况调查》、《香山概况》、《颐和园工作报告》、《海淀区工作报告》、《青龙桥情况调查》等等。同时，北平市公安局也抽出力量协助调查。

中央社会部的工作队到达香山时，在发现他们准备安排毛泽东居住的双清别墅里还住着200多名从保定来的流亡学生，香山寺等地方也住着一些东北的流亡学生，附近还有一所香山慈幼院，也住着人。为安全起见，这些人全被安排迁出。等到毛泽东住进香山时，北平西郊已基本上算是平安无事了。

毛泽东所住的双清别墅，是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曾两次出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的住所，香山慈幼院就是他创办的。这里环境非常幽静，清朝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双清”二字，清楚地印在别墅中的石壁上。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住在双清别墅北边的香山寺中，和毛泽东的住处只有二三百米距离，有一条石头铺成的小路相连。毛泽东在香山，集中精力抓了几件大事：同南京政府和谈；指挥渡江战役；筹建中央人民政府等。毛泽东在香山住了近5个月，是年7月，他离开香山正式搬入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在香山，毛泽东还就中共中央进京的安全警卫工作，召集了总结会。他批评了警卫工作，说：“你们搞得我进北平比蒋介石进北平还厉害。”

周恩来也说：“像你们这样搞法，交通断绝，枪口朝外，还叫不叫我们接近群众？人民领袖哪有这样进城的？”负警卫之责的同志，上上下下都作了检讨。

事后，李克农也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前站的总结报告。认为自己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只考虑安全第一，而其他的一些问题则考虑较少。

批评归批评，检讨归检讨，但李克农心中却很高兴：毕竟，这是多少年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大城市，一切平安，自己的劳作终于没有白费！李克农的挚友杨尚昆在多年后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党与傅作义将军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后，克农同志又担负起为党中央进城打前站的任务。当时北平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为确保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亲自布置警卫，安排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他会同北平市委同志，领导警卫部队和公安部队，为整顿社会治安，建立革命秩序，为保卫首都安全，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

第八篇

黄、李之间往来的电报悉入李克农掌中的同时，在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中，有一位李克农的手下大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金山。金山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无人不知，他怎么会成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呢？

与国民党谈判

1948年秋至1949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歼敌154万人，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和长江中下游江北地区已彻底解放，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面临全面崩溃。蒋家王朝内外交困，走投无路。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声称：

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民国15年，由广东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全民族，实现民主，康济民生为职志。……现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又是一篇官样文章，又是一次故伎重演。李宗仁被推上了前台。

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达到所谓“划江而治”的目的，李宗仁宣称，愿同中共谈判。中国共产党本着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减少人民痛苦的诚意，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国民党进行谈判。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国共和谈又一次拉开了帷幕。

蒋介石的“下野”并非真心，他声称“和平”是假，借机卷土重来才是他的真正意图。

蒋介石下野后，循以往两次下野惯例，迅即返抵故里——浙江奉化溪口。他虽一再声言“沉思与自省”，实则不断接见国民党党政要员，插手政务，操纵和谈，拆李宗仁的台，为其第三次上台做准备。

1月25日，蒋介石电令参谋总长顾祝同指挥北平中央军，对中共作战，同时令国民党中央军作好空运南撤准备；

1月28日，在溪口密晤党国要员张群、陈立夫、郑彦棻3人；2月12日，召见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着手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先行迁往广东，其后加以整顿；

2月12日，电令顾祝同，命刘安祺死守青岛；

2月17日，召见阎锡山，讨论国民党党政军今后改造及政务问题；

2月19日，召见刘为章，称“李宗仁以毛之八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对此，美国合众社称：

据今日讯，形式上暂时引退之蒋介石仍发号施令，渠仍保持充分之总统权利，以否决与中共将来之一切谈判。目前渠每日尚施行其此等权力以保持其视事途径洞开。在渠任中国领袖之二十一年间，曾两度辞职，两度复起。渠是否准备历史重演甚成疑问。

的确，蒋介石并未真正“下野”，他稳稳地坐在溪口，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控制着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各部门。

和谈要进行，而蒋介石却不愿真谈，他对共产党恨之入骨，他和李宗仁桂系集团也积怨甚深。李宗仁上台后摆出一副“惟和是务”的架势，如果和谈一旦真的成功，那么李宗仁就有可能坐拥半壁江山，美国转而大量援李，自己就可能完全丧失复起的机会。这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中共虽然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形势无疑是有利的，但和蒋介石这样一个阴险狡诈的人打交道，却历来不轻松。

为蒋介石“把脉”

李克农并非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但他却在幕后，指挥他的情报网络，为蒋介石“把脉”，向中共代表提供各种信息。

黄启汉——这位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国民党驻北平联络处联络员，此时受李克农的领导。黄启汉与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关系颇为密切，李济深反蒋、反独裁、拥护中共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逐渐地，他同中共接上了头。

1949年1月，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攻势面前，焦虑不安的李宗仁找到了黄启汉。他知道，黄启汉同中共的关系一向不错，请黄趁北平被中共占领的时机，前往北平求见中共领导，表达他李某人的“和平诚意”，以望中共能早日停止军事进攻。黄启汉被李宗仁委任为驻北平联络员。

为便于联络，李宗仁叫机要科给黄启汉编了一本专供黄一人使用的电报密码，并把他自己所居住的南京傅厚岗官邸的电台呼号也抄给了黄启汉。李宗仁指示他去北平后，向中共方面提出，允许其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李宗仁通讯之用。

黄启汉到北平后，曾向刚刚起义的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提出设立和李宗仁通讯的电台一事。傅作义表示，电报可以交给他，由他转发绥远，再由绥远转拍南京。

黄启汉恐有不便，没有接受这一方案。他想到了共产党。北平军管会交际处长王拓前来和他联系，王拓是共产党方面派来专门和他接头的。黄启汉将自己从南京带来的电台呼号、密码，统统交给了王拓，由王拓转交给李克农。为不让李宗仁起疑心，黄启汉还托人向李宗仁撒了个谎，说已得到傅作义的支持，在北平设立了电台，以后的收发电报都径直交这个电台办理。李克农指定专人收发、翻译黄启汉和李宗仁之间的往来电报。通过这部电台，中共代表团得以了解李宗仁和国民党集团内部有关谈判的最新动向。

当然，电台也有差点走漏风声的时候。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后，中共代表团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宴后，黄启汉去拜访张治中。张治中忽然问：“德公(即李宗仁)说你在这里设了一个电台，所有同南京来往电报，都是经过这部电台收发的，是吗？”黄启汉事先毫无准备，只好应付道：“是的，我们是有一个电台，代表团要和南京通电，就交给这部电台好了。”“电台设在什么地方？”张治中又问。

“就在东单附近，离此不远。”因张治中是国民党要员，黄启汉不便透出实情，只好含糊作答，心里不免一阵紧张。所幸张治中没有继续追问，此事也就被敷衍了过去。

黄、李之间往来的电报悉入李克农掌中的同时，在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中，有一位李克农的手下大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金山。金山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无人不知，他怎么会成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呢？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一是国民党江河日下，人才奇缺，而金山知名度高，为人又精明干练，活动能量颇大；二则也是更重要的，是金山的大哥、二哥都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他的姐夫潘公弼，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名大员。在国民党官员眼中，金山无论如何是可靠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金山早已在李克农领导下秘密工作多年。北平和谈期间，金山参与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一切重要讨论。每当一轮谈判结束，国民党代表或是研究下一轮的谈判方案、或是向李宗仁请示报告、或是传达李宗仁的最新指示时，金山总是不显山，不露水，一边“认真研究”，一边暗暗牢记在心。

夜幕降临，金山悄然走出驻地，穿街过巷，来到指定的联络地点——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向等候在这儿的李克农汇报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情况。第二天，一份有关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详细情况的材料，就送到了周恩来手中。

李宗仁他们哪里知道，此时正由李克农执导、上演了一出共产党人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的历史趣剧。

在北平和谈中，李克农坐镇幕后，搜集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尽快促使全国和平的早日实现。然而，

在国民党的词典里，“和平”永远都是一块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1949年4月20日，是谈判的最后签字日期，南京政府宣称：“中共所提之要求，政府已无考虑余地”，拒绝在“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至此，南京政府的和平骗局宣告破产。

1949年4月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强渡长江，于22日胜利突破国民党军近千里的江防阵地。4月23日，南京解放。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重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两航的困境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一年，毛泽东的心情特别舒畅：国民党败局已定，新的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一张白纸正任他去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很兴奋，说：蒋委员长一直叫我“土匪”，前一个时期才不这么叫了。他还称什么“剿匪”，现在也不这么叫了。我这个“土匪”的名字，丢的时间并不算长。

而和他苦斗了22年的老对手——蒋介石，这时却被毛泽东冠上了“蒋匪”的美名。蒋介石兴味索然，无奈之极。当毛泽东宣告新的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正在台北——广州——重庆之间疲于奔命，力图挽救败局。

然而，国民党军队还是如潮水般地溃退、再溃退。

蒋介石徘徊于日月潭边，苦闷于阿里山麓，满腔“英雄的末路悲怀”。他的忠于党国的黄埔嫡系哪里去了？他的誓死效忠领袖的门生子弟又在何方？1949年11月9日，一张香港《工商时报》被摆放在蒋介石的桌上，蒋介石扫了一眼，忽然，头版头条一行醒目的大字直刺他的双眼：

本港中央中航公司传有惊人变动两公司负责人今晨乘机飞沪今日飞往各线班机全部停航蒋介石一时头晕目眩，惊愕不已。

而在北京朝阳门内一个古朴典雅的四合院里，李克农却开心地大笑起来，这是我党的又一次成功策反。

所谓“两航”，就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仅有的两家航空公司，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运输企业。在蒋介石时代，中国的天空，只属于它们。

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于1929年4月15日，为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同美国商人合资经营的民用航空公司。中航下设董事会，由二名美籍董事与三名华籍董事组成。起初规模并不大。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撤往重庆，为与外界加强联系，除打通滇缅公路外，开辟国际航线是唯一办法。中航乘机得到了发展。抗战胜利后，中航总部迁回上海。

1947年5月，河南人刘敬宜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航总经理兼董事长。

刘敬宜，1897年生，父亲早逝，自幼由母亲抚养。刘敬宜饱尝艰辛，立志苦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去美国留学，考入密西根大学攻读航空工程学。1922年，刘敬宜谢绝美国底特律大陆动力公司邀请，毅然

归国。他只有一个心愿:开创中国人自己的航空事业,以航空救国。1945年8月14日,为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为中美关系及培训飞行员所作的贡献,国民政府授予刘敬宜云麾勋章,美国政府授予他一枚杜鲁门勋章。

在刘敬宜的精心管理下,到1949年止,中航已拥有大小飞机56架,工作人员2000多人,其中在香港工作的有近千人,物资基础和技术力量都居东南亚之首。

中央航空公司成立时间稍晚,它的前身是由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于1930年2月合股经营的中德航空公司。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并于翌年对德宣战并断交。中德航空公司随之倒闭。1943年,国民党交通部接管了该公司,更名为“中央航空公司”,国民党空军将领陈卓林被委派为总经理,交通部官员查镇湖任副总经理。

出身于华侨巨贾的陈卓林,广东台山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1923年回国。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大沙头创立广东军事飞机学校时,曾聘陈为飞行教官。陈卓林在国民党军界中几度沉浮,此时被委以重任。和刘敬宜一样,陈卓林志在蓝天,报效祖国之心深藏于胸。他接手央航后,励精图治,到解放战争末期,中央航空公司已拥有飞机34架,员工1700多人。蒋介石挑起内战后,两航被他奉为至宝。

军运、投粮、掩护撤退,成了两航的主要任务,大部分飞机被征用,往返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成为蒋介石军事部署中赖以生存的交通命脉。空军本就有“天之骄子”之称,而两航此刻更有“骄中之骄”的美誉。然而,刘敬宜和陈卓林心中却忐忑不安:局势动荡不安,严重威胁着两航的生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特别是三大战役后,蒋介石手中的地盘日益缩小,两航业务急剧萎缩。

更令他们担忧的是,蒋介石并不甘心让两航80多架飞机和几千亿元的资产,拱手交给共产党。他连番下令,要求中航速迁台湾,央航则迁往尚未被中共解放的昆明。这一招,引起了全体员工的强烈不满。

前途莫测,两航陷入从未有过的困境。

两航的讨论

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同时引起刘敬宜和陈卓林的注意。这个英国占领下的殖民地,是两航外避中共攻势、内求自身发展的绝好空间。

中共进攻上海前夕,中航迅即将机航基地和业务重心迁到香港,还从美国预订了大量器材,计划在香港启德机场建立新的基地。而央航先是南撤广州,随后也将大部分飞机集中香港,也希望能在香港寻觅到常驻之地。

两航众多的飞机静静地停放在启德机场,英国人慌了。

会不会招致中共的不满?或者会同英国人自己的民航搞竞争?英国人不能不担心。

英国航空大臣来到了香港,一下飞机就大发脾气:“这些飞机是怎么回事?这里到底是中国的机场还是

英国的机场?”

香港当局一道命令下来:因驻港英国空军需要,需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的发动机厂和仓库,同时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的基地。两航内部,波澜迭起。生意萧条,人心浮动。

为人耿直的刘敬宜困惑了,内战的烽火已令他对国民党失望至极,而眼前的情景更令他不安;陈卓林连喊头痛,数千员工的薪水要发,飞机的正常维修需要维持,这笔巨大的开支又从何而来?台湾他不愿去,为此和蒋介石闹翻了;而香港又不能留,他又存身何处?

两航的员工也困惑了:他们都是身怀一技之长的基层工作人员,对国民党的腐败深表不满,希望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献身于自己所热爱的航空事业,报效祖国和民族。蒋介石频频施压迁台,港英当局拒绝不速之客。何去何从?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

中共中央周恩来、李克农对两航的处境了然于胸,他们要来为两航的飞机“领航”。

1949年8月的一天,李克农被周恩来请来。一封中共中央华东局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递到了李克农的手中:

关于国民党“中国民航”和“中央民航”在上海的资产处理问题,华东局再次发生争执。陈毅、粟裕等同志认为:“两航”总经理撤往香港时,曾嘱咐过上海留守处,让其把“两航”留下的资金、金条等登记造册,送交新政府,这说明他们对新政府既是试探又是信赖。我们建议,对这些官僚买办资本,不采取没收方式。另,据了解,“两航”中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且多居大陆,有回归之心。而蒋介石撤台立足未稳,急于解昆明之围,还顾不到“两航”,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做“两航”回归工作。但有的同志认为,“两航”属于官僚买办资本,政策规定不可随意更改,如不对他们采取没收之政策,何以服人。保留“两航”资产是右倾之举,万不可造次。以上两种意见,望军委早日果决,不可再拖了。

“克农同志,你的意见呢?”周恩来问。

“我同意陈毅、粟裕的意见。”李克农说,“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蒋介石正在拉拢‘两航’去台湾,并开始了台湾与香港的通航。‘两航’呢,过去与我们地下工作者有过联系,但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甚了解,不完全信任。刘敬宜和陈卓林尚犹豫不定。现在,他们二人正处在十字路口上,我们只要走错一步棋,就可能把他们推向敌人。我建议,对‘两航’应采取特殊政策——保留他们的原职、原薪,原机构不动。这是一项敏感的政策措施,可以立即影响香港‘两航’人员,用事实给刘、陈二人吃定心丸。”周恩来微微点了点头,显然早已成竹在胸,他对李克农说道:“克农同志,我已向主席推荐了你,决定由你来协调各部门,共同完成这项使命。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我们需要自己的民航事业;新中国,没有民航是不行的。”

“两航”起义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决定安排查夷平去香港。查夷平是李克农的老部下,他还物色了一位 27 岁的青年人吕明随同前往。

李克农把周恩来写给“两航”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的亲笔信，交给了查夷平，同时将另一封给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张铁生、乔冠华的亲笔信，交给吕明，叮嘱他在港的地下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查夷平的安全。

1949年10月11日，“两航”起义的最高决策会议在中南海周恩来的家中举行。与会者除李克农外，还有解放军代总长聂荣臻、华东军区司令员粟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蒋天然等人。

会上，周恩来宣布：报经中央同意，任命李克农全权负责“两航”起义事宜。为确保起义成功，组成由李克农领导的由空军、华北军政委员会有关人员参加的领导小组，具体指挥。华东局、华南局、香港地下党和在港民主人士积极配合，共同打好这场特殊的战役。同时宣布，刘敬宜、陈卓林二人起义成功来北京后，接待谈判事宜由李克农安排。

查夷平和吕明奉命前往香港——这个各派势力激烈争夺的特殊而又神秘的地方。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他们在同香港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在“两航”内部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周恩来的亲笔信通过吕明交到了刘敬宜、陈卓林的手中。信上写着：刘总经理敬宜：陈总经理卓林：

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名义请你们回到祖国来，共同建设我们的新家园。过去“两航”也曾为蒋介石做过一些有害民族的事情，但这不能全怪你们，因为你们要生存。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爱国不分先后。我们热切希望两位总经理回国。回来吧！人民盼望着你们，家乡盼望着你们……

周恩来的信写得情真意切，勾起了刘、陈二人的思乡之情。两人看完信，双双落泪。经过“两航”内部激烈的斗争，刘敬宜、陈卓林最终作出决断：北飞！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电令查夷平、吕明，协同两位总经理组成起义指挥部，确保起义成功。

1949年11月9日中午12时15分，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长啸，央航刚从美国购置的“空中行宫”610号四引擎客机，缓缓地降落在北京西苑机场。

中航的11架飞机几乎同时安抵天津机场。

在港的“两航”员工4000余人宣布：脱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投身新中国的怀抱。

11月12日，周恩来宣布：两航资产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刘敬宜、陈卓林面带微笑走下舷梯，李克农箭步上前，几双大手紧握在一起。新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民航！

“两航”起义带来了一股旋风般的冲击波——残留在西南各省抵抗的国民党军顿失空中接济，胡宗南部溃不成军；紧随“两航”公司之后，国民党的香港中国银行、招商局轮船公司、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驻港机构等也纷纷弃暗投明。

毛泽东对李克农的干练才能，十分欣赏，他说：这一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访问苏联保卫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等职。1955年7月，经中央特批，李克农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

1955年9月，李克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外交部成立初期，任务相当繁重。周恩来总理虽兼任外交部长，但无暇处理具体事务，副部长有王稼祥、李克农和伍修权等人，王稼祥因为兼任中联部部长，也很少到外交部来上班。外交部的组建工作主要由李克农负责。

由于外交部是一个全新的部门，干部来自四面八方，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原来随周恩来在重庆、南京工作的同志以及解放战争时才成立的中央外事组；

曾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从各部队选调上来的同志；从地方部门选调上来的同志；

一些知名的国际条约法律专家、学者；新从大学毕业的西语系学生。

对这些年龄不同、经历各异、级别悬殊的干部，李克农注意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对调进外交部的干部，他都要谈话了解情况，亲自分配工作。

外交部成立后，对外进行建交谈判，向建交国派出大使、公使，建立使馆等，任务十分繁重，但在李克农等人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很快走上了轨道，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建国不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出决定：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第一件重要的外事活动。毛泽东首次访苏的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 70 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和两国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问题。

毛泽东和斯大林将在莫斯科会晤，全世界都把焦点集中在这两位巨人身上。

一定要做好毛泽东访苏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是中央的命令。对国民党特务不能不防，台湾孤岛上，特务头子毛人凤正精心策划着一个又一个针对中共新政权的破坏行动，刚刚侦破的妄图炮轰北京天安门破坏开国大典案、保密局天津特别组特务案等，都和他有关。

毛人凤，浙江江山人，1898年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5年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任武昌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股长。1938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本部主任秘书。1945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局长。毛人凤为人城府极深。初入军统时，他态度特别谦恭，见了任何人总是面带笑容，极少有发脾气的时候。无论是受戴笠斥责，还是被同僚部下耍态度，他都能平心静气地忍受。戴笠是军统说不二一的“暴君”，凡事稍不如意，就会大发雷霆，手下人整天提心吊胆。

而毛人凤常能代人受过，向戴笠引咎自责，戴笠曾当面说他是“菩萨心肠”，难成大器。

等到毛人凤执掌了军统大权，他的狠毒才渐为人知，其阴险毒辣甚至连当年的戴笠也难望其项背。这可以从他对族侄毛森的态度上略见一斑。

毛人凤原本对他这位族侄信任有加，凡事都与他商量，有意栽培为自己的心腹。有毛人凤这张虎皮，毛森在国民党特务营垒中一帆风顺，先后担任了军统浙江省站杭州分站站长、行动总队长、中美合作所爆破训练班副主任、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主任等职。上海解放前夕，毛森升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进步人士，被人赠了个“毛骨森森”的绰号。上海解放后，毛森逃往福建，任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此后，他同美国人勾搭上，直接从美国人手中获得了一批武器和电台，在东南沿海一带进行反共活动。

毛森羽翼渐丰，又受到美国人的器重，这引起了毛人凤的不满。他命令毛森把和美国人制订的一套计划全都交出来，由保密局统一管理。然而，毛森不买帐。

叔侄俩从此闹翻。毛人凤竟决心派人将毛森暗杀掉。毛森也是特务出身，熟知此道，防范甚严，毛人凤无从下手。最后，毛人凤公开通缉毛森，由于全国即将解放，最终才不了了之。

毛人凤不仅凶残，也相当迷信。蒋家王朝逃离大陆后，毛人凤去了台湾。他曾经自以为是地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是由于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因为这面“国旗”象征着国民党将被共产党全面包围。他甚至准备向蒋介石正式建议，将“国旗”改为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到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共产党。

对毛人凤的侦悉

毛人凤的这一想法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可笑，但他策划的一系列特务活动，却实实在在地危害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李克农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毛泽东首次访苏，可千万不能在安全上出问题。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向苏联驶去。作为情报部长，李克农深知自己身上担子的沉重，因此决定亲自护送毛泽东出国。

北京前门车站，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因为北京刚刚解放，保卫部门心里没底，安全工作实行的是人海战术。

毛泽东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将换乘苏联专门来接他的专列，而从北京去满洲里，则坐中国自己的专列。

这趟编号9002的专列，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解放战争期间被人民解放军缴获。卧室、会客室、会议室甚至浴室一应俱全，十分高级。

专列经天津时，有报告送来：铁路线上发现一颗手榴弹。公安部长罗瑞卿不敢大意，亲自下车处理。

旅途漫长，火车迎着呼啸的寒风在北国大地上飞奔。

一次，李克农和毛泽东在车厢里闲聊了起来，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工作的首脑和专家，谈着谈着，话题自然就扯到了情报工作上。李克农问毛泽东：“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毛泽东“哦”了一声，没说话，好像在等着李克农的下文。“第一件事，就是看情报要点，不然，这一天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李克农不紧不慢地说。

毛泽东一笑：“你呀，给我上起课来了。我和他不同，随来随看，不怕多，只怕少。这回去莫斯科，我还要和斯大林谈谈你们情报方面的事情呢。”

李克农将毛泽东一直护送到了中苏边境的满洲里，才返回北京。毛泽东安抵苏联，李克农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

果不其然，在毛泽东出访前夕，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在其头子毛人凤的主持下，精心策划了一个颠覆毛泽东专列的详细计划，企图暗杀毛泽东。

毛人凤自恃手中握有两张“王牌”：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和直属保密局的秘密武装——东北技术纵队。

北平潜伏台专事与台湾的秘密电讯联络，为毛人凤与其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网牵线搭桥。而东北技术纵队，则从事重大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其成员均经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严格训练，熟练掌握射击、爆破、投毒等各种特工技能。国民党溃退到台湾前，他们有的奉命潜入国民党起义部队，经过改编混入人民解放军；有的散落在社会上，隐藏下来，伺机而动。

毛人凤精心策划的这场阴谋中，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保密局北平潜伏台特务、刚刚由毛人凤从中尉提升为上校的计兆祥。这个计兆祥，集台长、报务、情报、译电于一身。潜伏电台就设在计兆祥自己的房间里。计兆祥的住处位于天安门附近的南池子，这里过去是王公要员的住宅，解放后则有不少高干住在这里，防范较严，也相对成了真空。计兆祥从事特务活动十分卖力，他的这个潜伏台被毛人凤称为“万能潜伏台”。

毛人凤的阴谋很快被李克农侦悉，而计兆祥自然也早在中共情工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中。

毛泽东出访前夕，曾在公安部有关此案的报告上批示：“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李克农从边境回来后，立即领导了侦破工作。

一天上午，在情报部的会议室里，李克农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计兆祥一案。

李克农说：“潜伏电台就设在计兆祥的屋内，现在就要破案。但要统一认识，不能只抓一个计兆祥，要打歼灭战。今天开会，就是要统一这个认识。”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李克农下令：逮捕计兆祥。

一天，计兆祥被带到李克农面前，李克农很严肃地对他说：“小计，你替我发个报给毛人凤，我这个报，你可得给我发好哟。”计兆祥在中共保卫部门的审讯下，早已坦白，此刻在大名鼎鼎的李克农面前，更是

紧张地连连点头：“是！是！”

粉碎毛人凤的诡计

一份电报传到了台北，毛人凤日夜守候在电台边，等候着计兆祥的电报。此时，有计兆祥的电报信号传来，他兴奋不已。译电员将电报送到他面前：

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能台，你向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发报只有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有雄厚的群众反特力量，你们活动到哪里，哪里就陷入人民的包围之中，我们的专政机关就会立刻侦破你们。你们如果执迷不悟，来多少，就歼灭多少。保你有来无回。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你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好好地听着：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你们有丧师八百万、逃往海岛的教训。你们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会长久。人民政府对你们有国人共睹的政策，立功受奖、不咎既往。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台长计兆祥。

李克农——这是个令他心惊肉跳的名字！连毛人凤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的确确是个奇才，他无法对付。

此刻，正是李克农给他毛人凤发来的电报，咄咄逼人，令他不禁恼羞成怒。“万能电台”算是完了，毛人凤只得把希望寄托在东北的技术纵队身上。

时隔不久的一个夜晚，一架无国籍标志的飞机低低地盘旋于离哈尔滨不远的山林里，两只降落伞从飞机中缓缓落下。

当他们刚刚落地，就在地面中共监视人员的枪口下，束手就擒。根据从计兆祥处截获的电讯情报证实：他们二人就是由毛人凤派来领导东北技术纵队进行暗杀活动的两个特派员，从他们的随身行李中，搜出了美制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预测器、炸药等特工用具。

两人名叫张大平、于冠群，他们供认，将于次日上午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与东北技术纵队接头，并代表国民党保密局，给有关人员颁发委任状，以鼓励反共有功人员。

翌日清晨，在松花江饭店一个高级客房里，毛人凤的特派员张大平和于冠群与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接上了头。不过，此“张大平”非彼“张大平”，乃中共情工人员乔扮而成。

寒暄几句后，马耐交出了东北技术纵队 170 人的花名册，以备“张大平”按名单向毛人凤邀功请赏。后话不表，毛人凤的另一张“王牌”自然又败在了李克农的手中。1950 年 3 月 14 日晚，毛泽东安抵北京，蒋介石、毛人凤的幻想彻底破灭。

第九篇

按情理，重病缠身的李克农完全有理由申请回国休养，无需继续为停战谈判劳心费神。可李克农很倔强，他不愿向困难低头。为减轻病痛，他常常一面看文件，一面将药片一小把一小把地送进嘴里，只是当

喘咳得无法忍受时，他才将手头的活儿暂时搁下，休息一会。

幕后出良策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

然而，就在此时，李克农的身体状况却突然恶化了。1950年5月14日，一份有关李克农病情的报告摆在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毛、刘、朱、聂、杨：

李克农的病状书，现由杨尚昆译出送阅。今晚已照主席指示，立即停止工作入院治疗。战略情报会议，由邹大鹏主持。关于经常工作，分别向聂、杨请示，重要的可与我接洽。周恩来 5.14

李克农哮喘病复发了，并且很严重，要用药物控制，晚上只有注射镇静剂才能入睡。

可就在此时，太平洋西北角上爆发了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美国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部队越过三八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起猛攻；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同时命令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战争伊始，北朝鲜军队在金日成统帅下，以重炮密集轰击南朝鲜军队，苏制T—34坦克成群地开向南方，很快解放了汉城，大军南下直逼洛东江三角洲。这时，只要把位于朝鲜最南部的“釜山环形防御圈”拿下来，朝鲜战争就可告以结束。

金日成认为形势十分乐观，他估计8月份就可完成解放朝鲜国土的任务，并早早地给中国领导人打了招呼。

7月5日晚，周恩来把李克农、章汉夫、乔冠华、陈家康和雷英夫召集起来开会。

“总理，有什么问题吗？”李克农问道。

“你们对朝鲜战争有何看法，金日成打了招呼，8月份要结束战争，8月份能结束吗？”周恩来静静地问。

李克农说：“人民军的战斗力强于李承晚的军队，装备也是苏制的，而且每个师还有十五六名苏军顾问，如果就单打李伪军来说，人民军没有问题。但现在美国插手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美军有绝对优势，朝鲜战争恐怕不会这样简单结束。”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也表示赞同李克农的意见。

周恩来点点头说：“是呀，不经过反复较量，不消灭美军的力量一直到他不能支持的时候，朝鲜战争是不可能轻易结束的。”果然，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要求会员国给李承晚政府提供帮助，随后又决议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授权美国指派司令官。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麦克阿瑟是美国五星上将，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国

武装部队总司令，他指挥过一些重要的战役，被美国军方称为“天才的、杰出的军事家”。不过，美国总统杜鲁门或许更加了解他手下的这员大将，他曾经这样描述麦克阿瑟：

他的个性富有吸引力，他讲起话来快而巧妙，……他看起来似乎对他的历史知识极为自豪。但在我看来，尽管他读了不少书，他的历史知识仍然是浅薄的，他只知道许多事例，而不甚明了这些事例所蕴含的逻辑和哲理。对于远东他知道得很少，在他的历史知识中除了对历史的歪曲，剩下的就是一种渺茫的希望，他希望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方法对同共产主义斗争的那些人有所帮助。

9月15日，15个国家的军队在这么一位对东方历史知之甚少的麦克阿瑟统帅之下，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这次行动的代号是“烙铁行动”。仁川其实是朝鲜东西海岸最不具备登陆条件的地点，它航道狭窄，潮汐落差达30英尺，这是一个海军最看不上眼的劣等港口。而麦克阿瑟——这位70岁的倔老头，却出奇制胜，在此冒险登陆成功。

朝鲜半岛南北长，东西窄，三面环海，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南北战略联系，斩断了后方补给线，并在人民军主力背后与洛东江的李承晚军队呼应夹击，从根本上改变了战略态势。人民军主力部队被迫后撤，命运危在旦夕。9月26日，美军经过一周激战，占领汉城。

三天后，麦克阿瑟和李承晚飞抵汉城，重建起“大韩民国”政府。在重建政府的简短仪式上，麦克阿瑟兴奋地说：

我高兴地代表联合国把贵国政府所在地送还给你(指李承晚)总统先生，从这里你也许可以更好地履行你的宪法职责。我热切地希望，仁慈的上帝将给你和你的共和国的所有官员们以智慧和力量，以仁慈和正义的精神去解决你们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经过过去的艰苦努力，在朝鲜人民面前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黎明。

这或许是麦克阿瑟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是他55年戎马生涯的顶峰。

赴朝鲜谈判

贺电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杜鲁门也在华盛顿为麦克阿瑟叫起好来：军事史上没有任何军事行动能同你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迟滞战相比拟，正是通过这一战役(指仁川登陆战役)，使你的部队得到了加强；也无法同你的最终解放汉城的功绩卓著的作战行动相比拟……我向你们大家致敬，并代表我们在国内的所有人对你们大家说：“干得好，干得漂亮。”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作出判断：共产党中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可能性有，但不干预的可能性更大。麦克阿瑟也这样预言道：

(中共的干涉)可能性很小。假如他们在第一个月或第二个月进行干涉，那可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我们不再害怕他们的干涉了，我们也不必再必恭必敬了。中国人在满洲有三十万部队，其中很可能不超过十万到十二万五千人部署在鸭绿江边，只有五万到六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既然我们的空军在朝鲜已经有了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

李克农指挥的情报机构也紧张地运转起来，通过各种公开报道，进行大量分析，掌握了美军许多重要情报，有的还提供给了朝鲜人民军。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

中共中央最终作出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向朝鲜派兵。10月19日，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中朝军队团结一致，并肩作战，以运动战的形式，把美李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附近。

战争态势的根本性扭转，使停战谈判成为可能。

1951年5月3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通过其顾问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透露，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6月23日，马立克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停火谈判，把军队撤离三八线。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演说，表示同意马立克的建议。至此，朝鲜战争就由单纯的“武仗”转为“武仗辅助文仗”的阶段。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李克农被中央送往苏联养病。在苏联，他每天都通过报纸分析局势的发展。随着战争不断升温，李克农再无心疗养，他迫不及待地返回北京。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里，他通宵达旦地工作，一双眼睛在大幅的朝鲜半岛军用地图上来回“扫描”。朝鲜谈判的信息传来后，他以一位老情报工作者的特有预感察觉到，轮到自己上台“唱戏”的日子不远了。果然，在确定赴朝鲜谈判的人选上，毛泽东点兵点将又点到了李克农。

1951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 him。

就在去年的11月，毛泽东的长子、在志愿军总部担任秘书的毛岸英，在朝鲜平安北道的一次美机轰炸中，不幸遇难牺牲。毛岸英曾经担任过李克农的俄语翻译和机要秘书，李克农很喜欢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毛岸英牺牲后，李克农很难过，毛泽东委托他把这一噩耗告诉了他的儿媳、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不过此时，毛泽东已一扫老年丧子的悲痛，他果断地对李克农说：“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外交部组成一个班子，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有人参加。”

“我马上准备出发！”李克农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过，李克农还是向中央如实地反映了自己的病情，使中央能有所准备。毛泽东在考虑之后，依然定下来：还是李克农去。也许，只有李克农是他心目中的最合适的人选。随同李克农前往的还有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国家新闻局局长的乔冠华。大家都称他“老乔”，其实是年他只不过38岁，正是挥斥方遒的青春年华，他作为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前往开城。临行前，毛泽东专门接见了李克农和乔冠华，同他们进行了长谈，并要李、乔二人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李、乔二人随后组建的这个班子，人才济济，有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浦山和新华社的丁明、沈建图等人。李克农还特意选调了几位同志带两部可接收各大通讯社新闻的收报机，以便了解各方面的反应。他还请志愿军派出一个参谋班子前往开城，使谈判班子能够及时了解战场情况的变化。周恩来也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详谈，并送给他们

一句意味深长的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带病坚持谈判工作

7月2日，朝鲜志愿军总部收到毛泽东从北京发来的电报：李克农率乔冠华及其他助手将来朝鲜参加停战谈判，于7月2日22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今丹东），7月4日傍晚由安东去平壤，大约5日早上或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处，请朝鲜方面派人到适当地点去接应。

7月5日，李克农一行到达中国边城安东，柴成文专程由平壤来此迎接，谈判班子改乘吉普车过江。

7月6日晨，李克农前往平壤东北约15公里的根地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新设的作战指挥部所在地，拜会金日成。金日成已经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他热情地接待了李克农。李克农是主持谈判的实际负责人，自然要向金日成请示工作和保持联系。随着交往的增多，二人的私交也越来越浓，以至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每次来北京，总不忘给李克农送上几坛他爱吃的既酸又辣的朝鲜泡菜。

经与朝鲜方面协商，李克农为中朝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协助其工作，对外公布的名单则是人民军的南日、李相朝将军和志愿军的柴成文、邓华、解方、杜平等人。南日大将，曾在苏联留过学，此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是金日成指定的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由于李克农的身份很特殊，他既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又担任了代表团的党委书记，不便公开，大家都称李克农是“队长”，称乔冠华为“指导员”。

7月7日，中朝代表团抵达开城。

谈判的会址定在了离开城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市区房屋密集，不利安全警卫，而这里较为清静安全。来凤庄的西南，有几家民房，再靠西南，有一幢别墅式的平房，志愿军代表团就驻在这里。

开城谈判代表团，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指挥三线。第一线是直接出面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南日、邓华等人；第二线是乔冠华、柴成文，由柴成文负责联络；第三线则是幕后坐镇的李克农。李克农负责将每天的谈判情况上报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

7月10日，来凤庄一间长18米、宽15米的大厅，成了全世界为之瞩目的焦点，艰难异常的朝鲜停战谈判从这里开始，一谈就是两年。

这两年，在李克农眼里显得是如此艰难而又漫长。这，不仅是他建国后所接手的最庞大、最艰巨、最复杂的一项任务，而且摆在他面前的，还有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难关。

在志愿军内部，真正懂行的外事工作人员严重缺乏。像乔冠华这样对国际问题素有研究的职业外交家，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欠缺外交头脑”，他们不惧怕敌人的枪炮，可对于和敌人谈判却心中无数。大家纷纷请李克农“传经送宝”，李克农总是谦虚地说：“我们八路军的传统就是组织起来。军事外交我们谁也没搞过，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干中学，干中提高！”

每次谈判之前，李克农都要和谈判班子一起熟悉文件，商讨对策，模拟实习，使大家每次谈判都能胸

有成竹。针对一些同志心急气盛、感情冲动的缺点，李克农反复强调：“我不担心哪位同志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还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言教辅以身教，大家渐渐地入了门，工作开展得也越来越顺利。

随着谈判的深入，李克农的身体也日渐恶化。他是拖着即将崩溃的病体来到朝鲜的。这时，他视力微弱，眼睛几乎要贴在炕桌上才能看清东西，哮喘病经常发作，疼得气都透不过来，加上房子里生了朝鲜式的地炕，十分闷热干燥。他隔不到一会儿，就要到房子外面去大口大口地吸上几口潮湿阴冷的空气，才会好受一些。长期伏案工作，胸口被挤压得十分难受，又引发了心脏病。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了过去，幸亏在场的人抢救才苏醒过来。病痛的折磨，使得他的双手常常发抖，手中的笔不时从炕沿上滑落下来。

按情理，重病缠身的李克农完全有理由申请回国休养，无需继续为停战谈判劳心费神。可李克农很倔强，他不愿向困难低头。为减轻病痛，他常常一面看文件，一面将药片一小把一小把地送进嘴里，只是当喘咳得无法忍受时，他才将手头的活儿暂时搁下，休息一会。

尽管这样，李克农还是想给大家留下一个身体挺不错的印象。李克农身体健康，代表团就有了主心骨。他一向注重仪表，酷爱整洁，即使在身体快要垮了的情况下，也仍然保持着超凡的魅力和迷人的风度。一副黑边眼镜架在他那宽大的国字脸上，留着神气的短胡须，脚踏马靴，一身戎装，风度翩翩，完全是一副外交家的派头。

僵持的谈判

大家很为他的身体担心，提醒他要多注意身体，他却总是笑眯眯地鼓励大家道：“现在我们站在兄弟国家的土地上，背负着党和祖国人民的希望，让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出色吧！”为不让大家担心，工作间隙，他还不断地开些玩笑，逗得大家乐不可支。李克农的身体状况很差，但却非常关心同志，他总是和大家打成一片，随时听取每个人的意见，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如此，所以，中朝代表团的所有人员都视他为师长，有些朝鲜工作人员在个人生活上受了委曲，不去找自己的直接领导，而是跑到李克农这儿向他倾诉。

段连城——一位年轻的中国翻译，在他 1951 年 8 月 31 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队长上年纪了，蹲在阴湿漏水的防空洞里，脑海里还得思考问题，如何对付敌人。这些同志啊！他们从长征起，而陕北，而抗战，而解放战争，今天又在朝鲜。他们毕生在艰难危险中度过。然而他们却是如此谦逊，虚怀若谷，像我们这些后生小辈的一言一语，他都认真地倾听。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是那样的豪放通达，像小孩子似的说笑。……这些同志，他们真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人。

中共中央还是很快了解到了李克农的身体状况。根据中央决定，1951 年 11 月，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奉命去朝鲜接替李克农，让他回国休息和治疗。

伍修权一行夜以继日急奔朝鲜前线，到开城见到李克农。伍修权给李克农他们带来了一批慰劳的水果，哪知由于天冷路遥，加上路途颠簸，全都烂了。

伍修权很有些过意不去，李克农却装着叹息地笑道：“这事谁也不怪，只怪我们的口福太薄，不过你们的心意我们全领了。”当伍修权向李克农谈了要接替他，让他下去休息和治疗时，李克农固执地说：“临阵不换将。”

李克农自有他的道理。他熟悉这里的工作，也摸清了各方面的规律，中途换人，不利工作。但伍修权看着李克农的病体，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结果两人一起电告中央，中央来电同意仍由李克农主持工作，伍修权暂留朝鲜，如李克农病情无发展就不换人，事情才算有了了结。

从1951年7月10日到26日，经过半个月时间的唇枪舌战，双方代表团终于达成了谈判的5项议程：
一、通过议程；

二、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

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职司；
四、战俘的安排问题；

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当谈判进入第二项议程时，很快便僵住了。中朝方面反复提出应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而美方却以“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为由，断然加以拒绝，并以沉默不语的冷场战术来拖延时间。到8月10日第20次大会时，这种沉默达到了高潮。大会开始后，中朝代表发言完毕，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却率其部下拒不作答，结果，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的死一般的沉寂。秘书长柴成文有点急了，他悄悄走出会场，来到会场外的一座帐篷里，问李克农该怎么办，李克农冷静地写了三个字：“坐下去！”柴成文将纸条带回会场，从中朝代表手中传递过去，大家看到李克农的指示，一个个都沉住了气，和美李代表比赛起“打禅”来，终于以整整2小时12分的沉默对抗创下了谈判史上的空前纪录。当然，“闪电战”也有，有的会谈25秒钟就宣告结束。

可见，朝鲜停战谈判的确是一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白刃战”！10月25日，谈判地点从开城移至板门店。这个日后名扬世界的地方，当时却连一个小村庄也算不上，它距开城东南约8公里，贫瘠荒凉的土地上，只有4间无人居住的小屋。随着双方谈判代表云集此地，这个偏僻的不毛之地很快“硝烟四起”。

11月22日，停战谈判的第2项议程达成原则协议后，双方参谋人员于22日起按照实际接触线的方位和座标，确定军事分界线并划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

11月20日，李克农在志愿军代表团驻地召开中朝代表团小型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谈判情况。李克农侃侃而谈，边章伍、乔冠华、解方等人围坐在四周，静静地听着。

最后的谈判

“这次谈判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是胜利者同失败者之间的谈判。平心静气地讲，只是战场上打了个平手的谈判。可是，对于这个特点，对方是不肯承认的。他在打的时候想到谈，谈起来达不到目的又想打，打不出名堂来再来谈，谈起来又想拖，总不能痛痛快快地达成协议就是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切不可急躁，

急也没有用。二是针锋相对。我们背后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不求别的，只求和平，争取和平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压力。当然，说针锋相对并不是不讲灵活性。谈判是打文仗，不是打武仗，单凭一股盛气是不行的。今天这种僵局当然是双方造成的，但如有机会，总要抓住机会予以‘诱导’才好。”中朝代表们连连点头称是。李克农最后说：“中央把底盘都交给我们了，时机也比较好，问题就看我们如何组织力量和执行了。要做好两手准备，在实际工作中，要为迎接协议的达成做准备，也要为经过努力达不成协议做准备，这样才能做到‘和固有利，拖也不怕’。至于战场，不用我们管，彭老总早就讲过，‘打得坚决打，谈得耐心谈’，我们的任务就是谈判。”

在解决了军事分界线这一关键问题以后，自1951年11月27日起，谈判转入了讨论第三项议程。

当时，中朝方面的一些代表认为，既然军事分界线这一棘手问题已经解决，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李克农在全面分析了形势、任务和敌我双方的对策以及敌人可能设置的障碍后，认为不能放松警惕。

李克农叮嘱大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向我方代表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有关和谈的指示：“原则要坚持，策略要灵活。和固有利，拖也不怕，只要涉及到朝鲜人民的主权，我们决不让步！”果然，谈判开始后，美方无理取闹，中朝方面虽作了必要的让步，但美方对他们所提出的战后限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国土上修建飞机场等无理要求始终不愿放弃。代表团成员按照李克农的指示，坚持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方的险恶企图。经过力争，终于迫使那些宣称“到地狱结了冰”才能放弃其无理要求的美方代表服了输，于1952年5月2日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随着谈判的继续进行，美方代表越来越相信，在中朝谈判代表中，有一位巨大的“隐形人物”在策划、指挥着一切，正是此人，才是他们要与之较量、却又难以战胜的真正对手。这位足智多谋的“隐形人物”是谁？

杜平将军战后所撰写的《在志愿军总部》一书中，给了这些充满疑虑的美国人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们谈判代表团的分析会经常开到深夜。平时每一天这样的预备会，大都由乔冠华主持。会上大家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分析敌人明天可能会提出些什么问题，我们该怎样回答。最后由秘书处的几个同志整理综合，经李克农过目后，连夜向上级汇报。待上级答复后，即打印成文，参加谈判的正式代表每人一份。每天到会场都是拎一大叠纸条。这样，不管对方提什么问题，我们都能有条不紊地给以答复或者批驳。如果敌人提的问题，我们事先没准备，这也不要紧，就向对方提出暂时休会，在电话上与李克农或乔冠华商讨对策。

可见，这位使美李代表心神不宁的“隐形巨人”，不是别人，正是李克农。他，就是这场特殊战役的中朝方面的直接总指挥。紧张的谈判期间，李克农家事纷繁，有忧有喜。

赴朝不久，他收到了老父亲不幸去世的电报。当时，大家正在议论工作，坚强的李克农没有告诉别人，他强忍泪水，将电报揣进了口袋。夜晚，李克农独自走到帐篷外，在黝黑的天空下，面对着西南方鞠了3个躬，以遥祭父亲的在天之灵。想起自己一生在外奔波，全家老小跟着受了不少苦，1946年母亲去世时，他正在北平军调部紧张地工作。这次父亲病逝，他又远在异国他乡。想着想着，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从此

直到谈判胜利结束，素爱整洁的李克农没有刮过胡须，以此纪念自己的父亲。

喜事也有，1952年8月，他的孙子平安出世。

也许是开城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给孙子起名就叫“凯城”（开城谐音）。据说，南日大将听说李克农添了孙子，特表祝贺。李克农请他给孩子起名，南日说：“我们舌战在开城，就叫开城怎么样？”李克农觉得这名字很有意义，当即同意。谈判夹杂着战争，战争推动着谈判。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到了1953年7月27日。这一天，板门店外格外热闹，世界各地记者云集会场，朝鲜停战的签字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

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和哈里逊从东西两侧走进会场，这两个充满敌意的军官彼此未说一句话，也没有正眼看对方一眼，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各自签字完毕便扬长而去。

长达3年之久的朝鲜战争至此终于落下了帷幕。

为防异外事端发生，确保签字成功，早在7月26日，李克农就提出：双方司令员不到现场签字，而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生效，然后再各自向本方司令官送签互换文本，因为从汉城传出消息，李承晚很可能派人来板门店搞刺杀活动。美方对李承晚似乎也有点不太放心。因此，这一锦囊妙计被双方接受。

彭德怀司令员是在开城签字的。7月28日上午9时30分，身材高大、面色黝黑的“彭大将军”，倒背着双手，大踏步地走进开城来凤庄签字大厅，胡子刮净的李克农领着杜平、乔冠华、张明远、肖全夫、李逞瑞等人跟随走进会场。

日内瓦会议的会前工作

中共中央赋予的朝鲜停战谈判这一重大使命胜利完成了，而李克农却陷入极度疲劳和虚弱之中，他两鬓雪染，面容消瘦，已有垂暮之兆。

1953年2月7日，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保健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专门就李克农的病况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称：

李克农自1943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病状，每年发作一二次。去年则加重了，每月发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并曾晕倒，昏迷了五六分钟才清醒。今早苏联大夫和黄树则同志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0.2毫克，他竟服过0.8毫克，我已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下去有中毒的危险。

周恩来闻讯十分焦虑，他立即将报告转给毛泽东。3月4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尚昆同志：

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状的处理是很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决不可那样服药法。毛泽东三月四日

李克农的病状，显然引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与不安。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以后，美国和南朝鲜李

承晚集团仍然不断在朝鲜战争遗留问题上制造事端。同时，美国还力图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印支战争，是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达到重新控制印支地区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印支战争的结果，使法国损兵折将，伤亡惨重，政府内阁频频更迭。美国则利用法国的窘境，混水摸鱼，加强对印支战争的干涉，逐步代替了法国在印支的地位。朝鲜战争后，印支战争便成为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主要事件。为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苏联政府建议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讨论印支问题。

1954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的建议，并宣称：“许多重大问题，首先是亚洲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不能解决的。”苏联的建议和中国的声明，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要求迅速结束印支战争的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况下，1954年1月至2月，美、英、法、苏四大国外长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由苏、美、英、法、中及其他有关国家参加的日内瓦会议。

这次会议对中国来说，非比寻常，因为它是新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展示出自己的形象。

李克农——这位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果敢的外交才能和灵活的应变能力的外事活动家，自然被中央列入参加会议的主要人选之中。

而李克农却提出，不参加会议，其理由有三：一是“情报部门的三个部门年计划刚通过，需贯彻实施”；二是自己“无国际知识，不懂外文”；三是“身体不健康”。

但中央还是决定：李克农参加由周恩来率团的中国赴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看来，这次会议不能没有李克农。

周恩来决定：会前的准备工作，由李克农抓总。关于代表团的人选，“告李副部长先行讨论，3月2日上午提出名单”，关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请李副部长决定”，关于会议对策、编印资料、业务分工等，“请李提出方案”。另外，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人选，均由李克农全权决定。在3月3日到4月19日这一短暂的时间里，李克农投入了紧张的会前准备工作。

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李克农对会议可能涉及的各种问题、各种情况，分别列出详细的预案，报送周恩来审定。他还指示有关人员就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拟出29篇发言稿，作为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的依据。

此外，李克农还组织外交部、对外联络部、军委联络部、军委情报部、外贸部等单位，就朝鲜问题、印支问题、中国的基本情况以及内外政策等，编写了长达1700多万字、共计12大本的资料。这些资料，在以后的会议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的还被提供给了苏联、朝鲜、越南代表团。

3月初开始，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相继到北京集中，进行培训。李克农又指定专人向大家介绍外交礼仪，介绍瑞士的风土人情、法律法规。为加强保密工作，李克农还亲自给大家作了有关报告，对译员、机要员、打字员、速记员等都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对未出过国的司机也作了相应的培训。

抱病出席会议

原国民党外交部起义人员刘泽荣提出，应注意全权代表证书的格式和应设立代表团对外发言人。这一建议被李克农采纳，李克农组织代表团发言人黄华、随行记者以及当时常住北京的外国友好记者贝却敌等，多次举行模拟记者招待会，做到心中有数。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李克农特别指示中国驻瑞士使馆为周恩来及代表团主要成员预租一座别墅，为一般人员预租旅馆，并安装了由日内瓦到国内的电传打字机，保证通讯联络迅速、安全、畅通。代表团工作员共有 200 多人，安全问题显得格外重要，马虎不得。公安部为确保周恩来的安全，特地准备了一批小白鼠，被周恩来发现后，他吩咐从飞机上搬走。但李克农还是安排了侦保、化验人员随同前往。

医务人员除保健医生黄树则外，还有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周尚珏。本来，傅连璋向周恩来建议，将李克农的保健医生史书翰也带去，因为“史随李克农同志在朝鲜将近两年，工作认真小心，对克农身体甚为熟悉”。而黄树则更建议最好派一名苏联大夫陪同。因为“李克农同志多年来患肺气肿，并时常发生气喘及左胸前区疼痛。……在热度较高时均有明显的心前区疼痛”。他很担心李克农的身体能否适应长时间的空中飞行。

李克农闻讯后连连摇头，“死不了，让李连水照顾我就行了。”李连水一直担任李克农的警卫员，在李克农鞍前马后已经工作很多年。

中国代表团于 4 月 20 日离开北京，24 日下午抵达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安顿完毕，即广为散发事前印就的周恩来中文和英文简历，这份简历由李克农主持起草，未经周恩来径直报中共中央审定。简历内容长达 5 页，其中第一段这样写着：

周恩来，生于一八九八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李克农认为：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这段话，可能是第一次使用“最亲密的战友”的提法，反映了李克农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

4 月 26 日，日内瓦会议正式开始。4 月 26 日至 6 月 15 日，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印支问题的会议从 5 月 8 日开始到 7 月 21 日结束。

李克农除参加会议外，还负责和有关代表团进行会外接触，并做好与来访的各国人民团体的接待工作，任务相当繁重。

为及时掌握会议动态，李克农还组织人员以自己的名义编写了《每日简报》，电告外交部并抄送中共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其内容多是各国代表团及外国舆论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反应以及对外接触时所了解到的重要情况，很有价值。

例如，4 月 30 日，莫洛托夫宴请周恩来和英国外相艾登，由于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的首次接触，李克农非常重视，在 5 月 1 日的《每日简报》上，李克农摘录了周恩来和艾登的谈话要点：艾登：联合王国承认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承认联合王国。

总理: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而是联合王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艾登:不知周恩来先生是否愿意指定一人，由我们的杜威廉先生和他联系。总理:我们的西欧司司长宦乡就在这里，他过去常和杜威廉先生接触。

艾登:那好极了，我是特意把杜威廉从北京调来的，看来我们是想到一块去了。

艾登(指着桌子上的水果):什么水果都有，就是没有菠萝。

莫洛托夫:但是中国有，中国是极其富有的国家，艾登先生应该到中国去一次。

总理:欢迎艾登先生到中国访问。

艾登:我非常愿意。我想告诉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和我同伍的一个军官叫哈蒙，他在战争中牺牲了。上星期他的弟弟给我一封信，要我信任周恩来先生的每一句话。他说他熟悉周恩来先生。

莫洛托夫:美国行事特别冲动，英国应该施加影响，你们有共同语言。

艾登:一个剧作家曾说，英国和美国除语言共同外，别无共同之处。

类似这样的简报，语言生动，又能说明很多问题，其内容往往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6月20日至7月12日，与会各国首席代表休会，周恩来利用这段时间，先后访问了印度、缅甸，并与胡志明会谈。张闻天、王稼祥也离开了日内瓦，周恩来委托李克农代为主持代表团的工作，并协助越南代表与法国代表商谈印支问题。

这段时间，李克农加强了住地的安全保卫工作。为防窃听，他指示专人利用周恩来别墅边的马厩，建起了一个内部会议室，还安排放映过几场卓别林主演的电影，丰富了代表团成员的文娱生活。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

侦悉毛人凤的阴谋

中国、越南、苏联三国代表团利用这次会议，始终坚持和平协商的方针，对于美国阻挠解决印支问题的种种阴谋活动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周恩来则在会议期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政治活动，大力贯彻“求同存异”的方针，利用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争取多数，孤立美国，推动会议取得成功，显示出一个新中国外交家的卓越才能。

会议最后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订了关于在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交战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印支和平问题终于达成了协议。

日内瓦会议彪炳史册，抱病出席会议的李克农劳苦功高。会议结束回国后，李克农双颊塌陷，嘴唇乌青，身体久未复原。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又将另一副重担压在李克农的肩上。16日深夜，周恩来请李克农到其中南海西花厅的住宅，向他布置一项重要的任务。一份电报递了过来：

亚非会议将于今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请允许我以缅甸、锡兰、印度和巴基斯坦5个发起国总理的名义，向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阁下发出庄严的邀请。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 1955年1月14日

周恩来对李克农说，这次会议十分重要，我们决定出席。而你的任务就是要准确而又及时地掌握情报，使代表团顺利抵达万隆。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

亚非国家的代表们将济济一堂，在没有西方大国的参与下，自己讨论自己的问题，讨论世界大事，他们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这实在是现代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次史无前例的创举。

很自然，西方大国的某些领导人有些心理失衡了。特别是对新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更是有着本能的敌视。

他们发动宣传机器不停地散布：此次会议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他们耍弄外交伎俩，想方设法对有关国家施加压力，造成诸多不利于会议成功的因素。

一时间，反华逆风扶摇直上，而于1955年4月11日由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精心策划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则将这股妖风刮到了顶点。

是年3月，当中国代表团正在为出席会议紧张筹备之时，李克农获得情报：“蒋特已布置人对我代表团进行破坏。”这一破坏行动由毛人凤全权负责，其核心是：刺杀周恩来。

由于建国初，我国无大型客机，尚未开通飞往印尼的国际航线，国家领导人出国只得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是唯一的办法。为此，中国代表团定下了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主机，出席万隆会议。中印双方约定，4月11日上午，该机作为正常航班飞往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飞往雅加达。

4月上旬，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夕，缅甸总理吴努发电邀请周恩来赴仰光暂住两天，商谈与会议有关的问题，待会议结束后，约周恩来与他同机前往印尼。

周恩来接受了邀请，随即与陈毅一起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行昆明，再启程去仰光，并由仰光直飞雅加达。为安全起见，此行对外严格保密。

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按原计划由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径飞雅加达。

“中共代表团已定下印度民航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主机，出席万隆会议”。这是毛人凤接到的可靠情报，对周恩来将先行赴缅甸一事，毫无所知。他立即派人定做了一架飞机模型，仔细研究密谋炸机。

李克农的情报机关很快侦悉了这一阴谋。在周恩来临上飞机前，这一重要情报送到了他面前。周恩来指示：请转给在京有关领导办理。

再次挫败毛人凤的阴谋

4月9日，邓颖超再次给李克农打来电话，要求他高度注意香港飞机的安全。

李克农不敢怠慢，迅速向中共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向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报告此事，邓小平指示采取外交行动，立即妥为处理。外交部得到指示，向英国驻华临时代办社通报，提请他们务必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已到香港的代表团成员得到命令，提请香港当局对启德机场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严格检查。

香港警方迅即行动起来，对启德机场进行了严密的防范。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于当时启德机场内部缺乏检查定时炸弹的安全防护仪器，同时对机场内部员工缺乏必要的戒备，使毛人凤手下的特务钻了空子。

“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后的调查表明：这一炸机行动是由国民党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是暗害周恩来。该案主犯是：主谋周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健夫，参与筹划者沈齐平。炸毁飞机的定时炸弹是由台湾“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秘密运至香港，然后由国民党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从张祖顺的住处取走，再由另一特务转交给周驹。

周驹，香港航空工程公司清洁工，住香港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好色之徒。案发前，周驹常去一个名为“就记电料行”的商店，该店表面上经营一些电器设备，实为国民党特务设在香港的秘密联络站，由特务头目张耀灵负责领导。一天，张耀灵邀请店老板关就记喝咖啡，并介绍他结识了一位姓吴的神秘人物。吴某通过关就记的关系，找到了关的朋友周赞如，因为周赞如有一位同族人——周驹，就在启德机场工作。在周赞如的牵线下，吴某秘晤周驹，他对周驹说：“我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托你帮个忙，事成之后，可得60万港币的奖金，并负责安排你去台湾，保证你的安全。”周驹问道：“什么重要任务？”

吴某说：“破坏一架共产党要员所乘的飞机。”

周驹听了为之一怔，脱口而出：“这，这，太危险了！”

吴某见周驹有些犹豫，便说：“60万港币，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老兄，再想想，想清楚再给我回话。”

贪财的周驹几经考虑，终于被毛人凤“钱弹”击中，接受了炸机任务。在台湾特务的安排下，周驹接受了爆破训练，学会了安放定时炸弹的方法。

4月11日，周驹将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带进了飞机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机场后，他乘着打扫卫生之机，将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

当时机场外围有一些警察放哨，而机场附近除了领班在场外，则无人防守。

周驹谎称手中的西药是给人捎带的，骗过了领班，顺利作案。随后，不等下班，他便匆忙由铁丝网下

爬出了机场，登上台湾特务接应他的汽车，迅即逃走。

对此，香港警方一无所知，还以为警戒严格，平安无事。一纸电文悠然传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检查完毕，将于4月11日由香港直飞雅加达。

飞机腾然升空，而周恩来高度敏感的神经却一直关注着这架飞机的动向。

11日下午，北京电话通报周恩来：“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启德机场起飞，安然无恙；

下午6时，第二个电话传来：飞机失去联系，去向不明；

当晚，第三个电话由李克农亲自来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毁，机上中国代表团成员李肇基等8人和波兰、奥地利记者及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共11人全部遇难。

周恩来闻讯色变。这的确是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国际政治阴谋事件！次日，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毛人凤刺杀周恩来的炸机阴谋破产了，而他们这种灭绝人性的表演却大白于天下。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毛人凤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仍将一个数十人的暗杀团秘密派往印尼。

暗杀团的行踪已被李克农掌握，由于代表团对外交涉，对内防范，致使暗杀团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的独立大厦开幕，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平安步入会议大厅。

蒋介石慌了，美国人也干瞪眼，中国——作为亚洲的一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确立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第十篇

“要记住，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这是李克农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所领导的中共情报机构之所以能在中国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功勋卓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视人，重视干部，珍惜人才。

严抓干部问题

建国后，李克农在干部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显示了一位中共情报战线上的领导者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和超凡胆识。

“要记住，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这是李克农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所领导的中共情报机构之所以能在中国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功勋卓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视人，重视干部，珍惜人才。

李克农工作非常认真严谨，对部属要求也相当严格。一次开会，个别单位有同志到会迟了一些，他当场就以严峻的口气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时间犯。”这个新鲜的词汇，让来晚了的同志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廖承志有一次开会也迟到了。一进门，只见李克农正沉着脸同其他已经到会的人一起，鸦雀无声地坐着等他，廖承志的面部顿显紧张的神色。李克农严肃地问道：“你为什么迟到，要让这么多人候你的大驾？”

廖承志一声不吭，气氛很紧张。

还是罗瑞卿出来解了围，轻声地对廖承志说：“小廖，这一回碰上克公，受批评了吧！”这才将气氛缓和了过来。

批评归批评，李克农向来对事不对人。初次见到他的人对他都有点望而生畏，相处久了，才知道他真正是个爱惜人才、关心干部的好领导。

对当年和他一样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李克农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特殊情感。李白，这位曾经从延安出发、秘密潜入上海架设电台中共中央联系的烈士形象，就常常浮现在李克农的脑海中。解放后，李克农时常对人谈起李白英勇献身的故事，不忘抽时间去慰问李白的家属，去上海万国公墓为李白扫墓。他曾经和记者黄钢谈到李白：“你们文艺工作者应该歌颂这些真正的英雄，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上海的解放，也不会有全中国的解放。”

李克农建议和支持黄钢把这位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搬上电影银幕，黄钢等人深受启发，创作了著名的电影剧本《永不消逝的电波》，剧中男主角李侠的原形即为李白。

鲍君甫，这位 30 年代李克农在中共中央特科时的情报员，解放后生活一度较为窘困，李克农得知鲍君甫经济拮据、年高体弱、牙齿脱落的情况后，立即写信给罗瑞卿，建议“可给以破格照顾”，提出“由公安部告南京市公安局每月津贴他 150 元至 200 元，并帮助他镶配一副牙齿”。

解放后，钱壮飞的夫人和子女居住在上海，李克农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并寄钱给他们。一次，钱壮飞的大女儿到北京，李克农特别交代给了她几百元钱作为生活费。

李克农坚持原则、关心干部、保护干部的品质，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潘汉年案件”和保护沙韬的事情上。

1955 年春发生的“潘汉年案件”，是一起长达 27 年之久的大冤案。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内部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

高岗，1905 年出生于陕西横山，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起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1933 年被派往陕甘宁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1935 年 2 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年 9 月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高岗曾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和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代理政委。1945 年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参与领导了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1949 年后，高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饶漱石，1903 年出生于江西临川，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去英、法、苏留学，回

国后任北满共青团省委书记、代理中共东北地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1935 年赴苏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战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第三野战军及华东军区政委。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从二人的简历不难看出，高、饶都是中共老资格的党员，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自 1953 年高岗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后，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联合起来，进行了一连串分裂党的活动。毛泽东本来是很信任高岗的，他们阴谋活动暴露后，毛泽东非常气愤。1954 年 2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高岗拒绝党的教育，于 1954 年 8 月自杀。

1955 年 3 月 21 日至 31 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开除了高、饶二人的党籍。

“潘汉年案”

在会议讨论期间，一些受过高、饶影响的或是与他们有牵连的人，相继作了自我批评，交待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表示肯定，同时指出，高级干部中如果有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的，都应主动地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来不及讲的，或是会上不便讲的，会后还可以想一想，写成材料，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否则罪加三等。

“潘汉年案”就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发生了。

潘汉年，1906 年生于江苏宜兴，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期间，他辗转于南昌、上海、武汉等地，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文化战线上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及其文化“围剿”政策的斗争，成为一位活跃的左翼作家。

20 年代，潘汉年参与了“创造社”的工作，由于经常干一些诸如捆书籍、跑印刷厂和邮局之类的事务性工作，大家都叫他“小伙计”。到 30 年代，他和杨杏佛、杨度等当时的社会名流打起了交道。这期间，在中共领导下，他参加发动了左翼文艺运动，并主持了“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成为 30 年代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自 1931 年起，潘汉年离开了文化战线，成为中共秘密战线上从事对敌斗争的一名战士，他当时的代号是“小开”。“小开”是上海话“小老板”的意思。1933 年至 1934 年，他以江西中央苏区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同陈铭枢、蔡廷锴等领导的福建人民政府以及陈济棠的广东地方军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谈判。1935 年潘汉年在长征途中，受中共中央委派，从川黔边境前往苏联莫斯科，以沟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间业已中断的联系；1936 年，潘汉年奉命回国，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秘密谈判，奔走于南京政府与陕北之间，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开始后，潘汉年以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在上海、淮南等敌后地区主持情报工作，屡建奇功。解放战争期间，他以香港为阵地，开展情报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成为中共与国统区各民主力量间一条最重要的联系渠道。1949 年全国解放后，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治理大上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潘汉年确是一位情报战线上的杰出战士和优秀领导人。

在毛泽东提出高级干部应讲清历史的号召下，潘汉年心事重重地来到这次会议的华东组组长陈毅的住处，向他道出了自己一桩埋藏多年的心病：

那是 1943 年初，已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的潘汉年，在来不及请示中央的情况下，于南京被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

李、胡二人的目的无非是想向汪精卫表明，他们有能力拉拢中共方面，借以博得汪精卫的倚重。而汪精卫急于见潘汉年，也是为了向他的日本主子显示他在政治上的能量，以增强日本人对他的信心，同时他还针对周佛海与重庆方面搞热线联系，造成国共两党彼此间的磨擦和矛盾。

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汪精卫对潘汉年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殊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最后，汪精卫对潘汉年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和汪精卫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谈话本身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毕竟这是一次政治性的会谈，而且就潘汉年本人而言，这次会谈竟成为他政治历程上一次重大的转折。

这段经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未向中央汇报。此时，他把实情告诉了陈毅，并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送毛泽东。毛泽东在材料上大笔一挥，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平反“潘汉年案”

“潘汉年案”发生后，党内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情报部门内部人心惶惶。为稳定人心，周恩来曾专门就此案向情报、保卫人员讲过一次话，他说：“要相信绝大多数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无论公安也好，情报、监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绝大多数好人同极少数坏人作斗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周恩来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因为潘汉年长期在情报部门工作，周恩来指示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就中央情报部的有关档案以及 1939 年到 1948 年潘汉年和中央的来往电报进行审查，搞一个审查报告。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责成专人审查了解放前潘汉年的全部档案材料，于 1955 年 4 月 29 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在报告中，李克农以超人的胆识提出了有力的 5 条反证材料：

一、中央屡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潘汉年利用李士群、胡均鹤等的情况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为中央提供了大量决策性的情报：

1.潘汉年于1941年6月13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该报告中央于6月20日收到；

2.潘汉年上报了侵华日军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

3.潘汉年上报了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一情报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极大关注；

4.潘汉年所参与、了解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5.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所知道的。

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他认为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材料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李克农的报告并未受到重视。1955年4月，49岁年富力强的潘汉年以所谓“内奸”罪被捕，遭受不白之冤，并株连了一大批人。“潘汉年案”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也是建国后发生的最大一起“反革命案”。

经过长达8年的预审期，1963年1月，潘汉年以所谓“内奸”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7年，潘汉年因病在长沙去世，终年71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潘汉年一案的复查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中央纪委书记陈云亲自过问了此事。陈云和潘汉年在十年内战时期，有过两度共事的经历，对潘汉年有很好的印象，现在他作为中纪委书记，在倾听了有关“潘案”的反映后，感到有责任把这一案件弄清楚，以对党和潘汉年本人负责。

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陈云指示办公室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说他要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请公安部当天下午就将“潘案”的最后定案的全面材料送到他那里。

10天后，陈云办公室的秘书又给公安部打来电话，请公安部迅速整理一份有关“潘案”处理过程的梗概材料，送交中纪委。陈云还找了过去对潘汉年比较了解的同志，如廖承志、夏衍等写材料，把他们对潘汉年的了解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交给中纪委。1981年1月16日，公安部在中纪委和陈云的督促下，写了关于潘汉年一案的概况材料，如实地反映了潘案的处理全过程，特别是将1945年刘少奇、康生给饶漱石的电报(以说明潘汉年和李士群等汉奸的接触，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做的)和1955年6月李克农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为潘汉年案件提出的5条反证材料，一并向中纪委作了汇报。

这两份材料，为潘汉年案的再次复查和最终平反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和证据。

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努力复查，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很老的党员，在党内外历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过许多重要贡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知》还宣布：

一、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二、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疾病中的李克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晚年的李克农仍然在情报、保卫工作战线上辛勤劳作。

1955年5月，流亡美国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幕僚程思远，由香港来北京，谈及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和李意欲归国的情况。李克农非常重视这一信息，当即报告周恩来。

5月7日，周恩来约见李克农，李克农积极向中共中央建议，争取李宗仁回国，此后李克农一直关注着这件事。

正在李克农为党努力工作的时候，病魔却又一次侵蚀着他的肌体。1957年10月25日中午，李克农忽觉头晕，想出门走走，不料刚刚迈出门槛，就失控栽倒在地上，立即陷入昏迷。

消息传到中南海，中共中央十分关切，周恩来亲往北京医院，指示组织全力抢救。他对医务人员说：“你们大胆治，只要尽了力，没有理想结果，不要你们负责。”

经北京医院全力抢救，昏迷长达8天的李克农才苏醒过来。经确诊，他患了脑溢血重症。由于大脑严重受损，几乎丧失了记忆。大家都劝他安心休养，他却对自己的儿女说：“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工作。”

在病中，李克农仍然不断地过问争取李宗仁回国的工作。中共中央采纳了李克农的建议，后几经周折，最终使李宗仁夫妇于1965年7月由美国返回，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中共中央对此事甚为满意。周恩来说：“公安部和调查部办了两件大事，公安部改造了一个末代皇帝，调查部争取了一个国民党代总统。”

1960年，为确保李克农养病，中共中央决定让他离开工作岗位，但李克农却很诙谐地说：“我们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是不舒服的，能驮多少，就驮多少。”

1961年，在大脑有了一定恢复、病情稍有好转的情况下，他给杨尚昆、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尚昆同志并小平同志：

我因病休养已近四年，最近医生已同意我可以逐步进入工作。现将我拟做的工作，特报告如下，请你和安子文部长、罗瑞卿总长二同志商决批准。一、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这事是很不简单的，需要时间，估计要一年左右，始能初步办到。二、工作方法:先收集，后集中，再分类编写。打算去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南昌、合肥、北京……等，借地方组织协助，比较易行。如同意待我行动时再报告批准。三、干部问题:先在中调部抽调陈养山、潘芳二同志随行，另在总参二部和三部各调一名不脱离职位的干部(秀才)，担任编写、访问、档案等工作，此事如能由中组部、公安部再调一二名干部(知道过去地下斗争历史的)，更欢迎；四、这一组织不超过十人。我正式开始工作，暂定1961年8月15日开始。

以上各项请审阅批示。此。李克农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他为能继续工作感到由衷的高兴。1961年8月28日，李克农一行离开了北京，开始了上海之行。10月28日，李克农返回北京。几十天的奔波，使他的身体元气大伤，剧烈的咳嗽伴随着严重的气喘，使他整夜难眠。

病逝

1961年1月6日，一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妻子——赵瑛因病去世，这令李克农悲痛万分，不能自己。

李克农的女儿李宁曾经用这样深情的笔调谈及赵瑛:母亲早年即伴随父亲从事地下斗争，走过了坎坷的道路，经历了艰辛的岁月。她对革命无限忠诚，对同志充满着爱，对自己要求严格，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不图虚名、不谋私利，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她除做好本职工作外，父亲的生活全由她照料，有时还协助父亲处理些棘手的杂事。如解放后，大批亲友纷至北京，认为父亲当了“大官”，都想来谋个“一官半职”。母亲即根据父亲的授意，热情地接待他们，耐心地向他们讲清共产党的“官”不同于国民党的“官”，是不能任用私人的。并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除个别过去对革命有过贡献，按政策通知当地政府给予适当安置外，余均婉言相拒。并从父母的工资中给他们路费，妥善地处理了这些问题。

母亲在退休和患病期间，仍关心国内外形势，参加组织生活，思想始终注意着党的事业的进步。一九六〇年，她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癌症)之后，她想到的还是别人。她郑重地对医生说:“我的病已无法治了，请不要浪费了，把这些药给其他患病的同志用吧”，并拒绝用药。谁料到，时间是这样无情，仅仅六个月的时间，母亲就溘然长逝了。在她逝世后，我们整理她的衣物，发现她有些内衣内裤打着补丁。我们都相对无言潸然泪下。母亲!你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困难时期，你熬过了艰辛的岁月，解放后，你仍不忘党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持着克勤克俭的美德。……

她去世后，同志们悲戚地称颂她:“坚毅忠贞，历尽艰辛，终生为党的事业奋斗；教育后代，无限忠诚，一家人献身革命。”父亲在母亲逝世后，也深情地称颂母亲为“母仪典范”。

然而，被李克农称为“母仪典范”的赵瑛的病故，给了这位被夏衍誉为“最好丈夫”的李克农以异常

沉重的一击。据原李克农办公室副主任徐炎庐回忆：“赵瑛去世后，李克农吩咐他的子女将赵瑛生前的卧室布置及物品都按原样放好，李克农每天临睡前总要到赵瑛的床前默默地坐一会儿，而后再深深鞠一躬才去安睡。”时隔两月，另一个噩耗又传了过来：他的老上级、老战友陈赓不幸去世。当时，李克农正在上海，当他得知陈赓去世的消息后，无限伤感，他坚决要去向陈赓的遗体告别，女儿劝阻无效，只好扶他前往。此后，素有“酒豪”美誉的李克农常常感慨地说：“陈赓死了，酒也没有味了！”

1962年1月30日，由7000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李克农抱病参加了会议。他过去发过几次心绞痛，不少人劝他不要再去开会，而李克农却仍然坚持要把会开完。

可他的病体，已不再给他这样一次机会了。2月7日，李克农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2月9日晚21时，李克农停止了呼吸。

窗外，大雪纷纷扬扬，苍天无语，大地垂泪。李克农那颗充满睿智、勇气和力量的大脑，停止了思考，他过早地走了，脚步匆匆……李克农逝世后，遗体移至北京医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前往医院向李克农的遗体告别。

经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设置李克农灵堂，以便各界和各国驻华使节前来吊唁或瞻仰。

2月13日，公祭李克农大会在中山堂隆重举行，前排摆放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陈云、林彪、邓小平、董必武等人献的花圈。首都各界共2500多人参加了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担任主祭，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乌兰夫、陈伯达、罗瑞卿、习仲勋陪祭。

悼念李克农

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悼词全文如下：

我们在这里以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卓越的革命战士，我们的亲密战友李克农同志。李克农同志长期在革命工作岗位上同病魔作斗争，终于不幸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九日与世长辞了。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都为这一重大损失而深感哀痛。

李克农同志在五四运动时期即已参加进步活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正值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他参加了在上海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参与了苏区和红军中政治保卫工作的建设，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等职。西安事变前后，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团秘书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委员兼秘书长。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部长和中央军委的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

为中央委员，并历任第一、第二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李克农同志是我党我军政治保卫工作的组织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建设和组织党和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了解敌情、保卫自己、镇压反革命方面，作了艰巨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在外交工作、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国防的斗争中，有显著成绩。李克农同志在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交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西安事变前后，在对友军的统战工作和同国民党的谈判中，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和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中，对党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抗美援朝和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斗争中，团结了朋友，打击了敌人，对朋友坚持了国际主义原则，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李克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斗争中，英勇顽强，坚定机智，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埋头苦干，实事求是，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李克农同志入党后，在党的领导下，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的战斗的一生和忘我的劳动精神，是全党全军同志的学习榜样。我们要继承李克农同志的革命精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三面红旗，为建设和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奋斗！

亲爱的战友李克农同志安息吧！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将永远记着你。你所献身的事业将永远胜利发展。

李克农的骨灰被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号院正中大殿的正面，和后来去世的朱德元帅、彭德怀元帅的骨灰相邻。

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宣布休假3天，以庆贺这位强有力的对手消失。这在美国的情报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李克农生前曾说过：“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这虽是他的自谦之言，也确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

李克农的去世，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朝鲜、保加利亚、苏联、阿尔巴尼亚、越南、蒙古、波兰等国驻华大使、代办和外交官员，以及各国驻华武官都先后到李克农灵堂吊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金光侠大将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徐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等发来唁电，对李克农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对李克农的亲属致以亲切的慰问。

李克农逝世的第二天深夜，国家副主席、76岁高龄的董必武，为李克农赋诗一首，以表哀悼之情：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天不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箕裘克绍芝兰秀，高举红旗障落霞。

世人对李克农的哀思连绵不断，青山长在，绿水永流，而李克农那大智大勇、多谋善断、忠贞为国的传奇般的一生，则必将像故乡的长江水、黄山松一样，浩荡巍峨，英名长存，永载史册！

第十一篇

作为安徽人，我们觉得将李克农的一生介绍给广大读者，上可告慰英烈在天之灵，下可略表同乡的哀思之情。因此，经过近十年的准备与思考，眼前这本《李克农传》问世了。

附录一：李克农将军生平

1899年9月15日(农历己亥年八月十一日)，生于安徽芜湖。祖籍安徽巢县火同汤河。又名泽田。曾用名稼轩、曼梓、峡公、天痴、震中。兄弟3人，二弟克裕、三弟克襄。父李哲卿，曾在芜湖海关工作。

1905年入私塾读书。

1909年在安徽巢县初等小学读书。

1910年在芜湖安徽公学附属小学读书。1914年在芜湖教会学校圣雅阁书院读书。

1917年在北京《通俗周报》做发行工作。同年9月，与芜湖丰华照相馆老板的女儿赵彩英(后改名赵瑛)结婚。1919年任安庆《国民日报》副刊编辑。1920年任安徽省政府职员、秘书。

1921年任安徽省六安县政府第二科科长。

1925年芜湖爆发反对教会奴化教育的学潮，为解决教会学校退学学生重新就读问题，于8月同宫乔岩、阿英等人一起，创办民生中学。

1926年8月，任安徽省外交后援会委员。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任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宣传部长，并奉中共命令，打入青帮组织。4月18日，芜湖发生反革命事件，李克农等中共党员安全撤离。8月至9月间，回芜湖续办民生中学，使之成为中共安徽省临委的秘密据点。11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悬赏5万大洋，通缉李克农。李克农被迫逃往南京。

1928年2月，由南京至上海，被编入中共太阳社支部(即春野支部)。9月至10月间，相继创办《铁甲车》、《老百姓》两张报纸，均被查封。是年底，调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

1929年经胡底介绍，与钱壮飞结识。12月，报经中共中央批准，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先后担任广播新闻编辑、电务股股长。是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为组长。

1930年中共党组织关系正式转入中央特科，由顾顺章领导，与陈赓联系。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李克农与钱壮飞等一起，将消息紧急上报周恩来，并协助周恩来、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共产国

际在上海机关的安全撤离。12月，转道进入江西苏区。

1932年先后任中共江西省保卫分局执行部部长、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

1933年红军保卫局改为红军工作部，李克农改任红军工作部部长。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李克农任中共中央驻地卫戍司令，负责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地面侦察，保卫中共中央安全。

1935年参加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纵队干部会议，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支持“北上”方针。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联络局成立，李克农任局长。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等协助其工作。

1936年2月，与国民党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会晤，达成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和通商问题的口头协议。3月，与张学良秘密会晤，商谈了约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的问题。4月9日，陪同周恩来赴延安与张学良秘密会谈。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赴西安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1937年2月，主持西安七贤庄中共办事处工作。3月，任上海红军办事处处长。8月，赴南京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12月，赴武汉任中共长江局秘书长。

1938年4月，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借祭黄陵出走武汉，李克农等奉命同张国焘作斗争。11月，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

1941年2月，由于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李克农奉命撤往延安。3月，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9月，任中共中央情报部副部长。

1943年兼任延安西北公学校长，并参加延安整风审干运动。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委员兼秘书长、代表团总支书记。

1949年3月，随中共中央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村迁往北平。4月，参与在北平的国共和谈工作。8月，负责和协调“两航起义”。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12月，护送毛泽东赴苏。1950年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李克农奉命赴朝负责停战谈判代表团中朝谈判事宜，任中共方面的党委书记。195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1954年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协助周恩来工作。

1955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并被批准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是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9月，参加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7年10月，摔倒造成脑溢血，后经治疗恢复健康。

1961年1月，夫人赵瑛病故。7月，写信给杨尚昆、邓小平，要求专事总结情报工作，得到中央批准。

1962年1月，抱病出席在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2月，因病痛发作，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2月9日晚，在协和医院病逝。2月13日，首都各界2500多人在中山堂举行公祭大会，主祭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悼词由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宣读。

后记

李克农是中共秘密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和卓越领导人，他在情报战线上功勋卓著。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在他去世后的数十年中，他那传奇般的一生却鲜为人知。近些年来，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文章在报刊杂志中偶有披露。作为安徽人，我们觉得将李克农的一生介绍给广大读者，上可告慰英烈在天之灵，下可略表同乡的哀思之情。因此，经过近十年的准备与思考，眼前这本《李克农传》问世了。

本书所用材料全部征引公开出版的书籍、报刊。在此，我们对所有被征引文章、书籍的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对支持该书撰写的有关同事，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经国家安全部办公厅审核批准。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李克农将军之子李力、李伦两位同志大力支持，他们详细阅读了样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补充资料。同时，安徽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的王传厚同志，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材料，给予了有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安徽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不可能这么快地与广大读者见面，感激之情不足言表。

限于水平和学识，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读者指正。

作者

中国红色特工的“前三杰”和“后三杰”

半个世纪前的国共斗争，始终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是正面战场一是隐蔽战线。在地下隐蔽战线上，斗争形式多样，手段灵活，但无疑，间谍战是互相角力的最重要一环。在双方几十年斗争中，共产党很打了几次漂亮的间谍战，最精彩的两次，其要角就是周恩来大为赞许的“前三杰”和“后三杰”。

前三杰解救周恩来

“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北风，关键人物是钱壮飞。

钱壮飞通过何种关系进入中统，难以确知，有说是因主办西湖博览会结识徐恩曾，有说是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配至中统，总之在三十年代初，徐恩曾负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时，钱已成为徐的亲信担任其机要秘书。

时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周恩来，指派李克农与钱建立联系。李由钱的介绍，也打入调查科，派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另一“杰”胡北风，则在调查科天津机关电台任职，就这样，一条直达国民党中央机关情报线建立完成。自此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情况、其时国民党围剿江西苏区的军队动向情报，源源不断送到了共产党手中。钱壮飞情报通过上海李克农，转中共中央机关，再转往江西苏区，共产党军队打破国民党前几次围剿，与钱情报不无关系。

钱壮飞等人的最大贡献，还是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及时发出警告，使上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机关负责人得以及时转移。

顾顺章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并负责中央机关保卫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他从上海护送张国焘往鄂豫皖苏区，回程中在武汉被叛徒**被捕。顾被捕后即刻叛变，并要求立即面见蒋介石，因顾知道钱壮飞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卧底，故不愿向低层人员透露，顾还想向蒋介石建议，由其出面说服共产党“归顺”中央。

武汉警方不敢怠慢，立刻用专轮送顾往南京。顾第二天早晨抵南京后才说出钱壮飞卧底事，可钱昨晚已从武汉紧急来电中得知顾叛变事，立刻发电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此时已离开南京扬长而去了。国民党根据顾情报立刻在上海抓捕，周恩来等人已安全转移，只抓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共产党另一损失，就是顾交代出当时已被国民党抓入狱中却化名蒙混的恽代英。倘若没有钱壮飞及时告警，周恩来等人肯定难逃厄运，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势将被全部摧毁。

顾顺章出面说服共产党“归顺”，当然不可能，蒋介石深知这一点，顾一自首也就失去在共产党内影响。蒋见顾一面，即交由中统“相机指导运用”。抗战前顾在中统中不得得意想另投门庭，被徐恩曾借口杀掉了。顾所付的代价还不止此，为惩罚顾叛变，据说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将顾一家大小数口全部活埋，顾曾在上海大报上刊登捉拿周悬赏启事，这成为国民党攻击周恩来的一大口实，也成为许多同情共产党、崇

敬周的人深感遗憾的事。

“前三杰”中，胡北风情况不清楚，李克农以后成为共产党保卫部门最高负责人之一。钱壮飞转去江西苏区后，参加了红军长征，途中战死在乌江。钱女儿黎莉莉是上海三十年代电影明星，钱的儿子钱江是电影摄影师，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厂长，今年四月刚在北京去世。描述钱壮飞间谍生涯影片《金陵之夜》，即由钱江所编导。

后三杰攸关大决战

“后三杰”为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主要人物是熊向晖。三人都潜伏在胡宗南部担任职务，熊向晖担任胡贴身副官、机要秘书长达十二年。

熊是清华学生，在学期间加入共产党。抗战之始，熊参加流亡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适逢胡宗南部在服务团招收学生，熊被胡亲自选中。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与申健陈忠经三人就构成一张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最重要间谍网。

熊进入胡部时，正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时期，外敌当前，国共间虽常有摩擦暗斗，但究不是大规模兵戎相见，即使这样，熊还是送出不少情报。周恩来对熊指示，准备长时期潜伏，熊之角色就相当于国共对弈中共产党所下的闲棋、布的冷子，到时自会有用。

果如周之所料，对外枪声刚停中原硝烟又起，抗日胜利不足一年，国共之间重开大战。经八年抗战，共产党军队已不复是当年“游击队”“土八路”，谁都能看出，此番开战，要么不打，要打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了。

胡宗南是蒋介石嫡系，长期屯驻西北，已发展为拥有几十万军队的西北王、蒋介石倚为股肱的方面大将。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自是胡宗南承之大任，连带着熊向晖也就真正发挥大作用了。

胡部进攻延安前，熊原已脱离胡部，受胡支助准备去美国留学，想不到胡“如同鬼摸了头”又将熊紧急召回帮忙，于是，进攻延安之计划部署悉经熊手转给了延安。兵马未动粮草未行，而一切却已为对手知悉，此仗焉能不败？于是，胡宗南虽占领了延安，却扑进了空城；虽有几十万大军，却找不到对敌之处之机，反被共方吃掉几个旅。毛泽东周恩来带领中共机关在山沟里转悠，近在咫尺的胡军却茫无所向。人赞毛泽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个百万大兵是应将胡军一起算上的。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晖三人的作用相当于三个师，从胡部受挫对大决战全局影响，共产党由此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再转为战略进攻来看，熊等人作用又岂止是三个师？

熊向晖“后三杰”间谍案，最后还是为国民党破获，可此时熊已在美国读了大半年书，远不可及了。由于胡宗南与军统的老关系，保密局并未声张悄悄压下了，却不敢不报蒋介石。胡宗南最后败退西昌，蒋却不许胡去台湾，直到参谋总长向蒋力争道：送一员大将给对方不符合指挥道德，胡才得以在最后一刻登上飞机。蒋对胡的愤怒于此可以想见。事情还没完，胡到台后，陕西籍监察委员李梦彪领衔联署四十五人上文弹劾胡，这是国民党去台后的第一次弹劾案，指责胡带部队离开陕西是受匪谍虚声恐吓，虽未明写熊

向晖事，却明指“其总部多有共区份子渗入”。胡提出答辩，只是自保而作的勉强应付了，胡当然早就明白，熊向晖是潜伏身边的**间谍，熊此时已从美国毕业直接去了北京。

间谍战的道德问题

胡宗南因身边渗入间谍不自知，蒋介石气愤得不让去台湾，蒋部下有人提出这不符合指挥道德。自熊向晖近年公开自己十二年间谍生涯，有人也提出熊的道德问题。

胡对熊可谓厚矣，自招熊在身边担任副官、秘书后，胡不但予以信托，注重培植，而且照顾其全家生活，多次为熊家人安排职业，最后并助熊妹与熊一同去美留学。有人愤慨难平斥熊不讲信义，致误老长官一生事业功名。当年同为胡之部属的张佛千为熊辩护，指出，熊参加共产党在先，到胡身边工作在后，要讲忠诚信义，熊只能是忠诚于共产党，“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

熊向晖真可称得上古今中外最出色间谍，不但圆满完成间谍使命，立下卓著功勋，而且毫发未损全身而退，更且让对手出钱出国深造，最后又学有专成归队为共产党工作，直做到部长级高级干部。征诸古今中外间谍史，几乎是绝无仅有之特例。间谍能完成艰巨使命的，往往难逃暴露真相的危险，即使九死一生最后归队，一般也就此打入冷宫投闲散置，因为间谍一旦暴露真实身份，也就失去其利用使用价值。而熊之高段，竟然由对手出钱往美国留学，学有所成而再服务于共产党外交界。胡正如民间所谓：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

熊之间谍没有道德问题，那么共产党间谍战是否有道德问题呢？

敌我相争相斗，往对方派遣间谍往往是优先考虑的重要一着，问题只在于派得进派不进、派得深派得浅，不存在派不派的问题。为了派得进派得深，老谋深算有长远眼光的，总要预作布置提前考虑，提前五年十年乃至一二十年都是可能的。用周恩来的话，就是下闲棋布冷子。那些隐蔽至深的间谍，要说无事可能也就浪费，可一旦有事地位又恰当，那其作用就未可限量了。这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是各方都默认和接受的应有之义。

可这只限于相斗相持之时。如果是友好邻邦、合作伙伴，单方或双方来这一手，那就上不得台面了。一旦揭穿，是会影响双边关系的，特别是单方面的过度作业，一旦为公众所知，更在道义上要失分。熊向晖间谍案难以名正言顺说得通的是，熊在胡部潜伏时，正当抗战时期国共第二度合作，双方名义上是友党友军。

共产党来这一手，对国民党顽固派或许不是问题，因他们遵守的也是同样的行为逻辑，在竭力往共方派间谍，但对其他人则要有所交代，至少要有一个说得过去上得了台面的理由。周恩来是政治大家，深谙其中关系，熊向晖从美国到北京后，周恩来曾邀集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前国民党和谈代表聚宴一次，专为他们给这位昔日熟悉的“熊老弟”作背景介绍。周首先说明，熊不是起义而是“归队”，今后准备派熊出任外交方面工作，然后向众人道出熊做胡部卧底间谍的前后，最后，周正色加以解释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报。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国民党机关、部队里建党

组织。可是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毛主席早就公开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

周恩来这番道理，好在不会引起争论，聆听对象都是刚入新朝的前国民党人士，但周恩来还是说了，这当然要的是道义分。

间谍战情报战，国民党也输了

在周恩来说词后，张治中曾有一番感慨，张说：以前只知道国民党蒋介石政治上、军事上不如共产党，想不到在情报战上，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不管真情还是虚应，张治中说的却完全是事实，国民党情报战也输给了共产党，而且输的还不是一点点。

对此，多数国民党人也认识也承认，而且将情报战的失败看作是国民党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更有人将国民党失败完全归之于情报战、间谍战的失败，认为经济方面是由于孔祥熙、宋子文重用潜伏共产党人冀朝鼎，扰乱了金融政策；军事方面，则由于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秘密投共，将军事计划悉数透露给对方。

这一说法无论如何太过分，如果不是为自己或某些国民党派系集团推卸责任，就是见木不见林的浮泛之论，而且所依据事实也不对。刘斐亲共，以后更投共，但指其将大决战军事计划透露给中共不是事实，这是将后日行为妄推前此原因。即以指刘为“匪谍”最力的胡宗南参谋长盛文，也不能将胡部攻打延安失利推给刘斐，因为刘斐当时尽管是管作战参谋次长，对该计划却不得与闻，是蒋介石本人与胡宗南和他三人商定的。泄露计划的另有其人，盛可能为免连带责任不说熊向晖而妄诬刘斐。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失败，情报战、间谍战远不是决定性因素，国民党整个大局输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更输在民心向背上，情报战、间谍战只在局部具有关键性作用。但不管怎样，国民党的情报战总是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共产党人都是情报战行家里手不消多说，周恩来是领导情报战老手，以上两次漂亮的间谍战可说都出于其直接领导和策划。可令人惊异的是，共产党其他高层人物对搞情报布间谍，似乎也都是行家里手，一点也不陌生。这里仅以三人董必武、朱德和刘少奇为例，至少在一般人印象中，这三位共产党高层人物，与情报间谍一类事是扯不上关系的。

先看董必武。熊向晖在武汉被胡宗南亲自选中任用的当晚，熊即往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有事外出，这第一次谈话就由董必武出面与熊谈的。董首先向熊说明，派其打入胡部是出于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的考虑，未雨绸缪先走一步，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如果说这些只是董的转达，以下间谍工作的具体指示则完全是董自己的了。董向熊提出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组织自会与他联系，不管多长时间都要忍耐，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胡宗南反共也要表面同胡一致。第三，在国民党内，为人可略骄，宁亢勿卑，

但也要掌握分寸，无论何时何地必须谨慎，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最后，董让熊按时渡江回驻地，以后不要再去八路军办事处，也不必见其他人，这一次谈话，要管几年。

再说刘少奇。抗战之初，另一共产党人赵荣声在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身边任秘书。卫部驻扎山西，积极抗日，与陕北八路军友好，赵是卫从八路军处要来到身边服务的，但赵的共产党员身份则是秘密的。由于卫立煌放手，赵等人在卫部中模仿八路军做法，搞了许多宣传活动，并在卫部秘密建立了共产党支部。三八年年底，刘少奇从延安到山西找赵秘密谈话。

刘首先讲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约定不在对方党政军中建组织的约定，命赵立即将支部解散。然后对赵作出具体布置，要求赵停止组织联系，保留党籍，长期隐蔽下去。赵的潜伏为绝密，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记录，将来归队由刘给他们证明。刘更具体指示赵，要真正成为卫立煌心腹，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要作长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只要能在卫身边待下去就是成绩。以后不许找地方党组织，不许找八路军办事处，有事刘会派人找赵，而赵不需要知道刘在哪里。刘最后往新四军工作临行前又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等等。

刘不愧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对情报间谍非常内行，对一切细小之处都不放过。当卫立煌部疏散出一批秘密党员时，刘不让他们去延安而去苏北新四军，刘认为去延安的人多复杂，年轻人又好吹牛，对仍在潜伏中的赵荣声等人不利。一位党员名叫陈其，刘认为名字不妥，一看而知是共产党人名字，亲自为其改名陈其五（此人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朱德此前也曾到过卫立煌部一次，对卫作正式拜访。赵荣声等人在卫部所作的抗日宣传工作本以为能得朱夸赞，想不到朱非常生气，与其作秘密谈话时朱大为光火，怒责赵这样搞法太明显，所有做法一望而知出于共产党人之手，朱指责赵不要把工作一天做完，使自己被国民党发觉后连根刨掉。朱虽是行伍出身的总司令，对秘密工作却也有着缜密的头脑。

无论军统中统，统统打不进中共

共产党注重情报战，国民党又何尝不注重？共产党高层人物多是搞情报行家，国民党高层直至蒋介石本人也绝不是外行生手。如果说，共产党由于多年受打压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吃了大亏，因而步步小心处处设防，那么国民党的优势在于其执政地位，拥有体制上一切便利条件，拥有充裕的人员、经费、装备来建立各种公开的、秘密的组织机构来对付共产党。

国民党有两大特务组织，一为中统一为军统，军统历史虽较中统为短，却借抗战之机急速膨胀，成为一时拥有直接工作人员几万人的最庞大、最张狂的特务组织。但无论中统军统怎样分工，对付共产党是两组织的最根本宗旨，也无论国共合作或对抗，中统军统有多少方面的工作，最重要工作就是与共产党进行情报战，情报战最有效手段，自然就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间谍战。可积几十年之功，无论中统军统，这方面几乎毫无建树，统统打不进共产党。

抗战之前，据沈醉所言，军统上海地区的中心工作，就是打入中共地下组织和其他反蒋集团中去活动。可最不容易打入的是中共组织，只能在一些外围组织中找一点线索便进行破坏，却无法深入。最容易打入

的是一些反蒋集团和地方军阀派系。抗战时期，军统内专设有中共科，另有张国焘主持主要由共产党变节者组成的特种问题研究室，专门设计和指挥向延安等地的渗透。戴笠还亲自领导一个特别侦察组，想派人打入重庆的中共组织，要求哪怕打入一个能当《新华日报》印刷工或卖报报童都算是成功。可军统这部分工作基本是白费心血，徒劳无功。

抗战以后，军统转制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亲自面授指示，要求保密局的外勤人员社会化，每个人要有公开掩护的职业，以便打入社会各阶层中去进行活动，设法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最主要的任务则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共产党各地组织，以便彻底消灭共产党，巩固后方。国民党高层不可谓不重视，中统军统也不可谓不努力，也做出过不少成绩，如三十年代顾顺章案，抗战以后军统破获共产党北平地下电台，由此追寻出各地共产党地下组织以及潜伏间谍，熊向晖等三人真正身份，也就是在这次行动中被揭露的。

尽管如此，国民党的情报战仍输给了共产党，最重要的就是，无论中统军统，都无法打入共产党内部，国民党积几十年之功，始终就没有过一个打入共产党要害部门如前后三杰那样的出色间谍！共产党步步进逼，国民党处处被动，个别局部的抓捕，其功用焉能胜过深入核心的间谍？国民党的情报战不能不输。

国民党间谍战输在何处？

认识上，双方没有差别，国共高层都对间谍战给以高度重视，都不惜代价处心积虑地想打入对方。共产党处于在野受打压地位，因而聚敛锋芒，时刻保持警觉以求出击，是其长处。国民党执掌政权，拥有军警宪特、特别是中统军统两个庞大特务系统，能以制度的名义和力量对共产党进行围追堵截，是为国民党的优势。两相比较互相抵消，双方至多也打个平手。

共产党成功在间谍打得久打得深，国民党失败在间谍打不进打不深，这就需要从间谍工作本身来加以考虑。

一个间谍要能成功打入对方核心，并且能安全稳妥地潜伏下来，长期发挥刺探军政情报的功能，涉及三方面因素：第一，间谍个人素质；第二，打入对方阵营方式的便利与否；第三，对方阵营中的环境，这涉及到间谍能否长期安全地潜伏下去。将此三因素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作比较，很显然，共产党都要优越于国民党多多。

间谍个人素质，可以包括政治信念、知识程度、勇气胆略、坚忍的意志、随机应变的机智等等。诸多条件中，知识程度是前提，政治信念是根本。知识程度不够，即使打入对方阵营，也只能做基层大兵，无法进入高层核心，也就无法接近情报源。所以，当年周恩来选中清华大学生且有官宦家庭背景的熊向晖，就是综合这多种情况才加以决定的。挑选间谍，当时无论国共，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都是最合适人眩政治信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左倾右倾，在中国外敌当前、内部连年军阀混战期间，青年知识分子多是左倾的，这里必得还需加上忠于共产主义、忠实于共产党，若没有这一条，其他都谈不上。而一般左倾青年，加入共产党或参加国民党都是可能的选择，国民党为执政党，是所谓“正途”，可以论功行赏、论资排辈做官，而加入非法**，或长年流窜在荒野山凹，偏处一隅，或秘密潜身于白区昼伏夜出，冒杀头危险从事地下活

动。试想谁更可能具备坚定的政治信念？

第二个因素，是间谍打入对方的方式，这一点也对共产党有利。国民党既为执政党，控制着全国政权，共产党名为非法，红色割据着一块块局部政权，除此之外，所有共产党活动都处于地下隐蔽状态。作为间谍要打入对方，在国民党是从大范围到小区域，从全局进入特殊局部，在共产党是从小区域到大范围，从局部融入全体。哪一方更有利于顺利地进入和融合，是不待言说的。

最为关键，间谍存身的环境

第三点，间谍打入对方后的存身环境，是最为关键的因素。间谍打入对方固然难，但间谍要能在对方阵营中隐蔽身份长期潜伏，而且能发挥作用，在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送出情报，那就更难。设想一下，国共双方间谍进入对方后，国民党环境和共产党环境哪一方更利于长期安全地潜伏下来，并待时而动送出情报呢？

国民党环境，共产党间谍已有前后三杰事例在，提供了很好的证明。而且更妙的是，这前后三杰最后的身份暴露，都不是出于国民党自己察觉，出于中统军统的直接侦破，而是其他共产党人叛变以后的连带暴露。可以相信，如果不是这样，象熊向晖这样已潜伏了十二年的间谍，潜伏到四九年底胡宗南部队彻底垮台，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共产党环境又如何？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内由于对国民党政策有过或左或右的分歧，结果在国民党分共清共时吃了大亏，这一教训，共产党人是牢记在心，无时无刻不在警惕着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的下闲棋布冷子，刘少奇的后发制人等等，都是由此而来。共产党对派出打进是行家里手，对自己这一面的警惕防范，可想而知也绝不会掉以轻心的，刘少奇不让卫立煌部撤出的秘密党员去延安，就是出于当时延安人多复杂的考虑。

无论军统还是中统，对派遣间谍可说不遗余力，也确曾派出不少人员混进延安作潜伏，可从未能成功地打入要害部门，更谈不上接近共产党上层。就是许多混入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无足轻重的小间谍，也或迟或早被共产党清除一空。这不是军统中统无能，也不是他们不了解共产党，完全不是这样。军统中统中许多专事对共产党进行间谍战的，原就是共产党变节分子。而且，说来令人惊异，军统中统训练人员的方法，主要也是依照苏联秘密组织“契卡”和“格别乌”一套体制进行的。可国民党就是不行，不但打不进共产党，反被共产党打入，早期如中统的钱壮飞，后期重庆时期的军统，竟然被共产党间谍在内部发展了一个组织。

为什么？这就涉及到共产党的思想、体制和作风了。

简单地说，由于共产党宗旨、奋斗目标和理念的设置伟大和悬诸崇高，由于共产党斗争环境艰难凶险、夺取政权路途的漫长，更由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所经历的挫折和伤害，还有就是当时苏联共产党内斗争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就必定使得共产党最为注重党内建设，注重党员思想的统一和党的队伍的纯洁，注重党员个人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否则是无法达成其近期目标和远程理想的。而要达到这些要求，一个最为常用的也是极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思想整风和组织整顿。所以，尽管大敌当前，四面遭困，

斗争环境极为艰苦险恶，江西中央苏区以及其他红军根据地，共产党内部仍然开展了大规模的整肃 AB 团和托派分子的运动，抓了一大批，杀了一部分，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看见口袋上插一支钢笔的就会指为 AB 团，列为整肃对象，往往无须多少坚实的证据，也没有必要的程序，就可以拉出去砍头。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斗争环境虽然较为缓和，延安以及其他根据地，前后又搞过“抢救运动”和全面整风运动，这次吸取了以往的扩大化教训，但也同样抓了一大批，杀了极少数。试想，在共产党内部，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几乎涉及所有人的拉网式过关的运动中，间谍即便侥幸打入，但可能有长期容身之地吗？共产党自己的许多忠诚同志，都被怀疑为内奸和间谍，被冤枉地整肃，那些来路不明真正的国民党间谍会有可能安然潜伏下去，并送出什么情报吗？面临这样的整风，需要讲清楚革命来路，说明白祖宗三代，交代出亲朋好友各种社会关系等等，许多忠贞共产党人尚且人人自危难以应付，那些心怀不轨的间谍看见这样的阵势，还不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如果还来得及的话。

归总而言，国民党亡命台湾后也开始整肃

国民党自被赶出大陆、偏处台湾一岛之后，国共间谍战也就基本告终。小打小闹也有，特别是隔海对峙的最初几年，国民党有空投有海运还有从港九一带陆路进入，但根本不成其气候，小动作捣点乱有之，想派间谍潜伏下来进入核心部门，连门都没有。大陆上残存的国民党人员，经过肃反运动，基本上清除无余，万一有幸存身下来的，大陆上每隔若干年一次的政治运动，肯定也给整得灵魂出窍，噤若寒蝉，更何谈什么长期潜伏刺探情报？

从共产党一方说，却也不再能像以前那样，往台湾岛打入间谍。台湾岛地理上与外隔绝，两岸之间官方民间不通来往互为封闭等等，都是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那就是国民党也如共产党，在岛上开始了内部整肃运动。

这与国民党败退台湾一岛后的惧骇心态有关，也与岛上几番政治军事变化如“孙立人兵变”事件有关，当然更主要还是出于国民党总结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

国民党刚败退台湾，即成立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加以整党，另一方面则是吸取共产党间谍渗透内部的惨痛教训，对党政军系统进行全面整肃。国民党败退台湾，地盘小了，各类组织系统缩编，可“情治系统”却并未随之缩小，原军统演变的国防部情报局、原中统演变的司法行政部调查局都保存延续下来，一九五四年又成立安全局加以统筹，由蒋经国亲自主持整个台湾的情特工作，在岛上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广泛而细密的清查**、揭露匪谍的整肃运动。整肃不仅涉及一般民众，更涉及党政军各界，连情治单位本身保密局、调统局也不得幸免。整肃中最经常使用的罪名就是“匪谍”，教师中有“匪谍”，军人中有“匪谍”，连老资格军统高干、当年北平站站长的乔家才少将也遭到“匪谍”指控，被抓捕入狱多年。从近些年所批露材料来看，当年的抓杀整弄错了许多，殃及无辜无数。不过，不言而喻，共产党如果真地有间谍派往台岛，在如此环境中也就难以存身了。

间谍战的代价

共产党的间谍战打得漂亮，打进清出都漂亮。

民党要想往共产党内打入间谍，潜伏下来，极少可能。

秘密战线上的红色特工--李直峰传奇

万东

打入敌人内部，进行革命工作，这在我党的历史上不胜枚举。但打入敌人心脏，隐蔽十多年的还不多见。家父于改革开放后调入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工作，为了撰写有关中统的文史资料，经常与原中统人员相聚在一起探讨、回忆。其中有一位老者，慈眉善目，谈吐不俗，不仅对中统内情了如指掌，对共产党的情况也非常熟悉，经过详细交谈，才知道他竟是一位打入国民党中枢，隐蔽了 13 年，有着传奇色彩的红色特工——李直峰。

破译密电弃阎投杨

李直峰，山西人，生于 1908 年，1925 年就读于山西法政专门学校。1926 年在校入选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政治部宣传大队，先后在共产党人大队长吴玉章、政治部主任郭沫若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这期间，他阅读到许多革命书籍，如《共产主义 ABC》、《帝国主义论》等；又系统学习了国民党“一大”宣言、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等文献，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思想觉悟提高很快。1928 年底，他被阎锡山领导的北伐军第三集团军召回太原，分配在电讯电报处任职，在一次该处组织的电讯电报基础理论考核中，成绩突出，受到阎锡山的赏识，又被派往天津专门深造密电密码的侦收破译技能。由于他的勤奋和天赋，不久便能熟练掌握，并独立主持密电的侦破工作。

中原大战期间，凡被他侦收到的密码讯号，皆被破译，阎锡山视之为破译密电的“天才”。“九一八”以后，李直峰从一份份被破译的密电中，深感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极富民族气节和民主精神，不由得心向往之。这时，一个大胆而美好的念头突然从他的脑海中迸出：“我要弃阎投杨。”

为杨虎城筹组密电室

1930 年 10 月，倾向革命的杨虎城开始主持陕甘军政，先后任命左派人士南汉宸（实为中共地下党员）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续范亭为驻甘肃行署参谋长等。李直峰获悉后，便直接与南续联系。通过近一年的准备，1932 年秋，李直峰悄悄离开太原潜往西安。南汉宸一面热情接待，一面嘱他化名李致远，将他介绍给杨虎城，名义上任西安绥靖公署上校机要秘书，实为杨虎城组建密电研究室，专责检译和侦破明的、暗的无线电密码电报。

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命令成立西安绥靖公署侍从室，将李直峰领导的密电研究室划编为侍从室第一

组，李以机要秘书身份兼任第一组组长，再将办公地点由绥署直接搬入杨虎城官邸。在事变后的 30 余天时间里，李直峰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破译着何应钦所指挥的 30 个“讨伐师”进攻西安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口令信号”、“陆空联络符号”等，并随时报送杨虎城，为西安方面采取应变措施提供了准确的依据，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周恩来器重参加革命

西安事变期间，绥署侍从室多次奉杨虎城之命，将破译的密码电报内容送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参阅，遂引起周的关注，在得知这些电报皆为李直峰领导的密电室破译时，周指示南汉宸择机秘密指引李于中共代表团驻地相见。当南汉宸将李直峰介绍给周恩来时，周起身相迎，亲握李手，慰勉有加。周恩来说：“你 1926 年就在武汉加入我党的统一战线，现在革命更加需要你，你破译工作做得如此之好，说明你有一颗爱国救民的心，我希望你能加入到我们这个革命的行列中来。”李直峰动情地说：“感谢周副主席的嘉奖和援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效力，是我梦寐以求的夙愿，我坚决服从周副主席的指示，不怕艰苦危难，努力完成任务而终身不渝。”周恩来遂命在隔间等候的李克农、曾希圣进来指示道：“这位是李直峰同志，是杨主任的机要秘书，已经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现将他交由你二人领导，布置工作。”当时李克农和曾希圣分别是中共中央情报部的正、副部长。

顺利潜伏“特工总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李直峰在南汉宸的巧妙安排下，与助手武子明及随员十人，由同乡、国民党陕西省党书记长郭紫峻的公开介绍，来到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 号军统局第一处找到处长徐恩曾，呈上盖有公章的介绍信。徐心中暗自高兴，但表面上不露声色，却在私下里命亲信、时任情报科长的张国栋进行政治和业务上的双重甄别，经过近三个月的明查暗访、跟踪侦察、书面询问等，李直峰顺利过关。

特工总部内部有着严密的分工和管理制度，收发电报由电讯总台负责，翻译电文由情报科译电股负责，李直峰仅担负密码的侦听和破译工作，所以这段时间李直峰是难以获得情报的。但李本职工作做得极佳，侦破许多密电，尤以桂系、龙云系、刘湘系的居多，阎系次之，得到徐恩曾的信任和嘉奖，至于共产党密电一件也没有破获，但也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这里有个小插曲，当时徐恩曾又招了一个叫池步洲的留日爱国青年，即以后破译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密电的那位，分配到李直峰的密电二股，李见他淳朴、爱国、善良，便有意不让他填写所谓的“特工志愿表”，也不让其参加所谓的“宣誓仪式”，以至八个月后池可以自由离去。1952 年，池还是因这段历史而被捕入狱 12 年，出狱后始终背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改革开放后，池在上海街头巧遇李直峰，听其泪述后，李立即为他书写了一份向法院说明原委的证明，终使池被改判无罪释放，并摘去“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感动得池痛哭流涕。

潜入“军委会”冒险赴延安

1938 年 7 月，蒋介石为整合密电资源，命包括中统局在内的所有部门的密电人员全部交给国民党军事

委员会，由毛庆祥统一领导。就这样李直峰又顺利进入国民党的最高军事部门。具体职务是“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副组长”，后该组扩编为技术研究室，简称“军技室”，李直峰被任命为该室第六组副组长兼该组第一科科长。

这个在大撤退时期成立的“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天天辗转迁徙，还要遭受空袭，再加上懂日文的不多，侦破工作久无进展，而军委会则天天催着要日方情报，一帮人虽倾其全力，亦束手无策。此时又一个大胆而美好的想法在李直峰脑海里冒了出来，“到延安去，直接为党工作。”深思熟虑以后，他以寻找破译资源为名，向毛庆祥建议：“派人到各大战区去搜集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密电码本，将会有助于日本密电的破译，至少也会有参考价值。”他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并被任命为军委会少将参议，于1939年夏，怀揣着蒋介石的手令，在各大战区转了一圈后，悄悄带上妻儿，来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在延安他找到直接领导他的曾希圣，请求转呈周恩来副主席批准，让他留在延安公开为党工作。正当党中央准备批准他的请求之时，毛庆祥打电报到处找他，鉴于他的身份没有暴露，中央令他先回重庆待命。

1941年1月，曾希圣调任新四军七师政委，来到重庆密约李直峰于复兴关见面，传达我党隐蔽战线对敌斗争的方针，即“长期隐蔽，等待时机”。并批示李，除了继续为党提供情报外，还必须完成三项任务：一、利用老关系争取原助手、现留任中统局的武子明为党做情报工作；二、将所在军技室所有人员的姓名、职务、籍贯列成清单抄报一份；三是设法利用获得的情报挑起中统、军统之间的争斗，以削弱两个特务集团的反共力量。此后李直峰为完成这些任务而竭尽全力。他曾数次将获取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叶剑英等，为此，党中央特别来电嘉奖，令李直峰感动不已。

抗战胜利后，军技室解散，因李直峰是从中统局来的，只能回到中统局。而此时他的同乡郭紫峻已升任中统局副局长，在郭的关照下，李直峰又捞了个专员的头衔。1949年上海解放，李直峰公开了身份，在华东区公安部社会处机要组任职，1950年调北京中央公安部七局任副组长。1957年随老首长曾希圣赴合肥任安徽省人委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改革开放后，调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市政协委员。1983年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过着幸福而快乐的晚年生活。

《江南时报》(2005年12月06日第二十一版)

白色恐怖下的特殊警卫部队--中共中央特科



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周恩来

卷首语

中共中央特科，这个机构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还相当陌生，甚至闻所未闻。

特科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如果说，人们所熟悉的中共中央警卫团，这支人民解放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是负责直接保卫党中央的特殊警卫部队，那么中央特科则是在一个特殊历史环境下保卫党中央的另一支特殊警卫部队。

所谓“特殊”，就在于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处境极其险恶：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随时都处于可能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

同样，肩负着保卫党中央的重大使命的特科，也处于极其秘密的状态，也是随时险象丛生。

时间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三年。

就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这点而言，中央特科可以说就是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机关的第一支警卫部队。

中共中央特科是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部队”。特科的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特科藏龙卧虎，精英荟萃，它的成员中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大将和上将，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以及共和国的副总理和部长们。

中央特科那真实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斗争历程，惊险曲折，动人心魄，足以令那些刻意杜撰的侦探间谍故事黯然失色。

正因为有强悍而高效率的中央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险，遭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挫折，但身处虎穴龙潭之中的中共中央机关却始终安然无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支白色恐怖下的中央警卫部队的创建者和最高负责人——就是后来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第一章

大江东去，江雾迷茫。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运木船离开汉口码头顺流而下，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

这艘货船属于英商祥泰木器行，经常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之间。本来，货船是不搭载乘客的，但一位姓陈的舵手却把几位乘客悄悄地带上

了船。在其他船员看来，姓陈的舵手大概是在“捎黄鱼”——船员私载乘客捞点外快的事在船上公开的秘密。在一艘船上，舵手的地位虽不能和船长、大副相比，毕竟也还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舵手要带上几位客人搭乘货船并非难事。

从九月上旬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姓陈的舵手接连带了好几批乘客上船。这些不去搭乘舒适的客轮却跑来挤在既阴暗又闷气的货舱中的乘客，从穿着来看倒是生意人的模样，但大都文质彬彬，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不过这些乘客随身大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却也象是跑生意的样子。然而，这些“生意人”就象约好了似的，无一例外都是从武汉前往上海，似乎那里有什么生意特别值得去做。

沿江的各大码头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以及身着便衣的密探在严密地盘查过往船只。鹰犬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张脸，竭力想在乘客中发现被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差不多每个人的头上都悬有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警察、宪兵和密探们谁也不想放过这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

祥泰木器行的货船是一艘运木船，船上的货物一目了然，尤其是货船的桅杆上还悬挂着一面英国国旗。因此，军警和密探们要么是没有去注意它，要么是不敢去碰它以免自找麻烦。总之，他们没有想到要上船去搜查一番。即使是那些不时在江上游弋的巡逻艇也是匆匆地从它旁边疾驶而过。因此，祥泰木器行的运木船一路通行无阻直达上海。

国民党的鹰犬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竭力想要搜捕的共产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正是藏身于这艘货船

之中从他们眼皮下安然通过。并且这艘货船上还藏有中共中央的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药，这些东西就装在这些“生意人”随身携带的“货物”里面。

祥泰木器行运木船上那姓陈的舵手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一九二六年五月以来，这艘船成了中共中央在上海与武汉之间的一条秘密交通线。武汉“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中央机关主要就是利用这艘运木船，避开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搜捕，秘密地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

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骑警的巡逻马队疾驰在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有如雷鸣一般；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警察仔细的搜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一幅厚厚的窗帘将屋子外面的白色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室内充满了呛人的烟味。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讲话时都尽可能地压低声音。从十月九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

开会的屋子附近，蹲着几个卖香烟、水果的小贩。他们的目光警惕地打量着街口的动静，他们的货摊下面藏着子弹早已上膛的手枪。不时还有肩挑馄饨豆腐脑担子的小贩吆喝着从开会的屋子前面走过——这些都是负责保卫会议的武装警卫和流动哨。一旦警车在街口处出现，他们将一面拔枪抵抗，一面掩护中央领导同志迅速撤离会场。

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只有二十八岁，皮肤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去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召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创造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

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突然袭击。

“同志们，眼前这点挫折算什么！”瞿秋白的脸上看不到有丝毫沮丧的神情，他那苍白的面孔因激动和激愤而染上红晕。他挥动着有力的手势：“敌人越是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我们坚信，在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潮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

.....

周恩来的发言，冷静而务实，与大多数与会者愤激的情绪恰成对比。他面庞清瘦，大病初愈。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磨难。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南方进军途中，部队被优势兵力的敌人打散，周恩来不幸身患恶性疟疾，高烧和伤寒的轮番折磨，使他时常处于昏迷之中。最艰难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叶挺、

聂荣臻两个人。此时，周恩来的警卫堪称“规格”最高：给他担任临时“警卫员”的，一个是北伐名将、未来的新四军军长，一个是未来的共和国元帅。然而，此刻周恩来的处境却是极端危险的，他们三个人只有一支手枪！而国民党的军警和地主武装在巨额赏金的驱使下正在拼命地搜寻他们的踪迹。

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等人的护送下，历尽艰险辗转到达香港。在那里，他接到中央的通知，就立即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乘船赶到上海。在这次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罗亦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的安全。这是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帝国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就必须完善党的各项保卫工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的世界中，中央机关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此后，在白色恐怖之下保卫中共中央的千斤重担就压在中央特科的肩上。特科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

第二章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枫林桥。

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就赶到这里。卡车刚刚停稳。在一阵“快！快！赶快！”的催促声中，从车上立刻跳下几十个人来。与此同时，摄影机和几个沉重的道具箱被七手八

脚地迅速从车上搬了下来。

几分钟后，摄影机已经架设在公路边上，一副抢拍外景的架势。偏僻荒凉的枫林桥顿时热闹起来。……不过，这支外景队的心思并不在拍摄电影上面。无论是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导演、衣着华丽的男女主角、扮演三教九流的众多的配角，还是头戴鸭舌帽的摄影师和场务，个个都显得神情紧张，都在不时焦虑地向水仙庙方向张望。

一些“碰巧”路过的行人也在驻足观看，不过，他们似乎对拍摄电影的场面没有多大兴趣，老是在东张西望。实际上，这是中央特科摆下的一个“劫法场”的阵势。化装成导演、演员、摄影师和行人之类的各色人等，都是中央特科人员。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藏有驳壳枪、左轮枪或白朗宁手枪，所有手枪早已子弹上膛。道具箱中还藏有机枪和催泪化学手榴弹以及开启镣铐的工具。

附近不远处的岔路口上，还隐蔽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囚车出现，这辆卡车将突然冲上去将公路拦断，迫使囚车停下，到时候卡车上的大米包就将成为机枪射手的掩体。远处，还有几个摆摊的小贩也在不时张望，那是特科布置的警戒哨。

中央特科严阵以待，只等来自水仙庙拘留所的囚车在公路上出现。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严密控制下的大上海，中央特科却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不惜一切代价竭力要营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

囚车上押送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以及杨殷等几位中央军委的重要领导干部。

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获得的可靠消息，八月二十八日这天早上，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将把彭湃等从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决定，在水仙庙通往龙华的必经之路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曾赞誉说，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这两个“王”，一个是湖南的毛泽东，一个就是广东的彭湃。

彭湃，广东海丰县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和毛泽东都是以搞农民运动而名闻天下。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并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随后，彭湃在海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彭湃自任敢死队队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中共中央迁上海后，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彭湃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闻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风驰电掣而来。转移已经来不及，会场被武装巡捕包围了。彭湃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以及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同时被捕。

巡捕房和警察局动作如此之准确，可见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显然党内出了叛徒。

这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要主持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而幸免于难。

彭湃被捕后，最初用的是化名，但因叛徒出面指认，彭湃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上海警察局久闻彭湃大名，担心这样一个共产党要人关押在水仙庙拘留所会出意外，决定于二十八日将彭湃等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情况非常清楚：彭湃的身份既然暴露，再采用聘请律师辩护或向敌特机关要人行贿之类的通常营救手段已经无济于事。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武装劫救！

然而，可供准备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

“为了保证营救的成功”，周恩来目光如炬，语气坚决果断，“这一次不仅红队全体出动，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参加行动！”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平时，各科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为中共中央提供安全保卫。一九二八年四月特科成立之初，中央就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培训特科人员从事秘密工作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训练班每期二十天，绝大部分特科人员先后参加了培训。周恩来、项英等中央

领导向学员们做了多次政治报告，顾顺章、陈赓等人则把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向学员们做了仔细讲解。

总务科为特一科，科长洪扬生，他从特科成立之初到一九三一年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一科最初被称为“总部”，它的职责是：负责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络点，置办各种必要的家具和办公用品；每当中央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议，要负责安排会场。此外，总务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并且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可以说，中央的日常大小杂务全部由总务科总揽下来。所以，一科可以说是中共中央的“总务科”。

特二科为情报科。它的前后两任科长都是中央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陈赓和潘汉年。周恩来曾经把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六位情报人员誉为中国共产党情报的“前三杰”和“后三杰”，“前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都是在陈赓直接领导下工作。而潘汉年则是“后三杰”之一。情报科的任务，是掌握敌人动向，以便抢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行动，以保障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向苏区通报军事情报也是情报科的职责。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利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或打入敌特机关内部，或在敌特机关发展内线建立特情关系。

特三科的正式名称是行动科，由顾顺章本人担任科长。不过，这个科却以“红队”而著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之简称。在特科内部，红队又称为“打狗队”。顾名思义，这个科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叛徒，震慑敌人。

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党内的叛徒。面临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白色恐怖，党内不少的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纷纷退党，一时之间退党声明或反共启事充斥各大报纸的版面。这类人如果只是脱党，对党组织并无多大危害，那不过是大浪淘沙，反而使党组织更加纯洁。但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进而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不惜用昔日同志的头颅作为自己在国民党那里的进身之阶。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的。

通常，由情报科提供关于叛徒的情报，处决叛徒则由红队执行。

红队是一支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除了惩治叛徒，红队还要与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的重要会议。

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淞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四十多名行动队员，每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带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枪。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

特四科为交通科，科长是李强。这个科最初的职责是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以及护送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从一九二八年起，特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秘密无线电台，沟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和各个苏区之间的通讯联络。后来这个科改为无线电通讯科。

按照中央特科内部的分工，武装行动通常只是由红队担任。但这一次，为了营救彭湃等重要领导人，特科人员几乎全部上阵。

枫林桥。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然而，令人望眼欲穿的囚车却始终没有出现。“他娘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一脸油汗，烦躁不安，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狠狠蹭了几下。

顾顺章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中央特科科长，他直接带领红队。这一次，他是“劫法场”的现场总指挥。

顾顺章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政治保卫干部之一。顾顺章，原名顾凤鸣，上海吴淞人，一九〇三年生。顾顺章最初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过钳工，后来成为公司的事务员，也有材料说他后来升为“拿摩温”（工头）。“五卅”运动之前，顾顺章加入中国共产党。

顾顺章身材矮壮，人很精干，头脑灵活，可以双手开枪，枪法很准，使刀弄棍也有两下子。另外，他还会耍魔术，魔术达到专业水平，曾在上海大世界等处多次登台献技。顾顺章属于两头冒尖的人物。他过去入过青帮，吃喝嫖赌都来，在他的身上流氓无产者的习气颇为突出。另一方面，他在工人纠察队中表现勇敢，很有一股子冲劲，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他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早在一九二六年，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准备建立政治保卫机构，并开始培养政治保卫干部。这年十一月，顾顺章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派遣，前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同时被派往苏联受训的还有陈赓和陆留。从苏联回来后不久，顾顺章就开始干上了政治保卫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党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一九二七年五月，党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王一飞任秘书长。中央军委下设两个科，一个是组织科，另一个就是特科（又称特务科）。

特科的出现，标志着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的正式建立。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中央军委并不象后来那样直接指挥军队，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没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最初的中央军委主要做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向军队派遣党员士兵和干部，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以及从事军事情报和政治保卫等方面的工作。

此时的特科，也不象后来的特科那样专门从事对中共中央机关的政治保卫，最初的特科还兼有其它的职责。

特科下设四个股。即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和土匪股。其中，土匪股就是专为打击土匪而设，它的职责显然并不直接服务于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而是服从于当时斗争的特殊需要。在当时，汪精卫还打着

“左派领袖”的旗号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赤都”武汉，中央固然需要政治保卫，但安全问题还不象后来那样突出。

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顾顺章，被任命为特科科长。顾顺章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机遇。

“四·一二”之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根源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强调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加强工人成分。顾顺章算是工人出身，正好赶上这趟车，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顾顺章一起被“加强”进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一位叫向忠发的老工人。向忠发当时四十六岁，担任过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成员。

此后，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迅速上升。

“五大”之后不久，经中央常委决定，顾顺章进入由周恩来等七人组成的中央军委。“八七”会议上，顾顺章又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顾顺章由中央委员变成了政治局委员。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之后，周恩来受命对中央机构进行组织整顿，以适应白色恐怖环境下的斗争需要。

在中央，建立一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在特委之下设中央特科。特委是决策机关，特科是执行机构。周恩来主持特委工作，直接指挥特科。经过整顿之后，中央特科将原来的四个股改为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顾顺章仍然担任中央特科科长。

顾顺章搞特科工作，还是象他过去搞工人纠察队那样，喜欢聚众而来，呼啸而去，大打出手，打它个稀里哗啦。让他率队武装拦截囚车，他觉得来劲。

现在，等了几个小时仍不见囚车的影子，顾顺章不耐烦了。“劫法场”的人们也开始沉不住气了。

“是不是囚车已经过去了？”

“我们出发时间太晚，很可能错过了。”

特科的这次武装劫救行动，所有环节都作了周密的考虑，但二十八日这天早上临出发时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当接到武装劫救的指示后，特科连夜紧急准备。因为参加行动的人多，特科现有的枪支不够，于是派人临时向洋行购买。

按照预定计划，特科人员将在二十八日一早赶到枫林桥。这天早上，参加行动的人们在同孚路特科机关集中，等待一辆摩托车把枪送来。当打开箱子一看，才发现里面的手枪全都涂有一层厚厚的防锈黄油，必须擦掉黄油才能使用。于是马上派人上街去买煤油。大伙心急火燎地好不容易才将几十支手枪擦洗出来，但已经使出发的时间推迟了一两个小时。

枫林桥一带人渐渐多起来了。“外景”队呆在这里时间太长会引起怀疑，不能再等下去了。看样子，

拦截的时机已经错过。

顾顺章再一次抬腕看表之后，悻悻他说了声：“撤！”

果然，内线的情报很快就证实：就是因为临时擦抢耽误了时间，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在特科赶到之前，已通过枫林桥开往龙华去了。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同志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从容就义。押赴刑场途中，彭湃等一路高呼口号，视死如归，彭湃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对于这个无耻叛徒，特科必须坚决予以处决！”

周恩来浓眉高扬，神情激愤，平时那柔和的苏北口音此时变得异常严厉。彭湃，杨殷等同志牺牲，全党极其悲痛。周恩来含泪写下《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谁不知道广东有彭湃，谁不知道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一切反革命污蔑他是杀人放火的凶犯，但广大工农穷苦群众，尤其是几万万农民群众却深深地知道他们是他们最好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

现在，如果还让出卖彭湃的叛徒逍遥法外，不仅难以告慰烈士英灵，而且还会继续给党的秘密组织造成威胁。

就在彭湃等被捕的当天下午，特科的情报科就通过内线查明，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就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一九二七年曾在叶挺的二十四师教导营担任过党代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白鑫随部队撤到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汇合，被提升为团长。一九二九年初白鑫随同部分中央领导人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早在一个月之前，白鑫就已经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情报处长范争波秘密自首。白鑫作为军委秘书，对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想将中央和江苏省军委作为一份厚礼献给国民党，以换取巨额的奖金，并且作为自己今后飞黄腾达的垫脚石。

不过，范争波并不急于动手，而是一直在暗中等待机会。范争波的胃口相当大，他想要利用白鑫将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负责人一网打尽，尤其是想抓到周恩来和彭湃。

范争波所要等的机会，就是乘军委开会的时候动手，这样才可能一网打尽。

要寻找这样的机会并不困难。当时，中央军委经常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会，周恩来作为军委书记通常都要主持会议。而每次开会，都是由军委秘书白鑫负责通知开会时间、地点和开会的人员。

机会很快就来了。

八月二十四日这天，中央军委的会议就在上海沪西区新闻路六一三弄经远里十二号二楼白鑫的家里举行。

巡捕房的搜捕行动就象事先经过演习一般，准确无误。包围楼房之后，巡捕和包探进入房间，按名捕

人。为了掩人耳目，在逮捕彭湃等人的同时，故意将白鑫夫妇一起带走。范争波还想再度利用这个叛徒。

白鑫得了一大笔赏钱，但却终日心惊肉跳，坐卧不安。他自知罪大恶极，干了这种事情，特科绝对饶不了他。并且红队镇压叛徒的利害，他素来是非常清楚的。

白鑫只好乞求他的新主子给予保护。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披露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遇难的消息时，同时也发表了一条关于白鑫的报导，称：白鑫“曾在黄埔军校学习毕业，以前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带罪立功，以观后效。”云云。

这是国民党当局故意放出的烟幕，目的在于掩盖白鑫告密的罪行，并造成白鑫已经离开上海的假象，以保护这个叛徒逃避镇压。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特科立即着手侦察白鑫的行踪。特科情报科根据在上海特务机关的内线提供的情报，了解到白鑫根本没有离开上海，就躲在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公馆内。

此外，特科还通过一位叫柯麟的地下党员了解白鑫的动向。

当时，柯麟化名柯达文，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了一家“达生医院”。这家医院是一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每月要在医院内开一次会。过去白鑫也经常到柯麟的医院看病，不过由于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白鑫并不知道这位医术高明的柯大夫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这家医院的底细。

彭湃被捕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白鑫叛变的警报。事发的第二天一早，柯麟还在住家的五洲药房楼上，关向应就已经匆匆赶来敲门了。当时关向应是中央军委委员，团中央书记。后来关向应担任过红二方面军总政委、八路军一二〇师政委。在去苏区之前，关向应一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关向应让柯麟注意，白鑫最近有可能到他的医院看病，因为白鑫正在患疟疾，而他一向是相信柯麟的医术的。特科要求柯麟作好准备。

接着，陈赓又来通知柯麟：特科已经在五洲药房附近设立了联络点，一旦白鑫出现，就立即去找联络员。陈赓临走，还留下了他在新世界饭店的房间号码，让柯麟无论有无情况，每天晚上都要去饭店汇报。

果然，几天之后白鑫突然来到五洲药房。这个叛徒不敢去医院看病，直接找到柯麟家中。和白鑫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老婆和两名保镖。柯麟一边看病，一边考虑如何设法脱身。开了处方之后，柯麟借口下楼找药，迅速从后门去了联络点，但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人去楼空。就象老鼠一般，叛徒白鑫深藏巢穴之中，偶尔外出，行动也是相当诡秘。

陈赓听了柯麟汇报，决定让柯麟继续照常营业，同时在医院和五洲药房附近布置了红队的武装力量，昼夜埋伏，准备捉拿白鑫。

“如果听到枪声，你就马上跑开。”年轻的情报科长对柯麟医生说。

但红队整整等了一周，白鑫也没有露面。陈赓判断，白鑫担心出事不敢外出看病，但很可能会请柯麟

出诊。

两个星期之后，柯麟果然接到白鑫的电话，请他到法租界白官饭店看病。柯麟去后，发现在场的不仅有白鑫的老婆，保镖，并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也在坐。范争波与白鑫是同乡，白鑫叛变就是由他牵线，现在他又充当起这个叛徒的保护人了。

下一次白鑫再打电话请柯麟出诊，地点又改在范争波的公馆里了。大概白鑫觉得离开公馆一步都有危险，还是躲在里面最安全。但这样一来，反而使柯麟搞清了白鑫藏身的准确地址是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四十三号。

特科马上对范争波的公馆严密监规。柯麟按陈赓的指示，在白鑫所在的弄堂的最后一家租房住下。陈赓自己则在紧靠范争波公馆的一幢楼房租下了三楼的房间。

这里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俯视四十三号范争波住宅内的动静。

白鑫尽管住在范争波公馆里，昼夜有持枪的警卫保护，仍然深感处境危险，惶惶不可终日，并且老是躲着不露面也不是办法。于是他请求让他出国，去意大利躲过风头再回来。

白鑫秘密作好了出国的准备。而特科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已经掌握了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并且知道范争波将派汽车送他去码头等情况。

中央特科决定在白鑫动身这天将其处决。

十一月初的一个下午，陈赓来到圣彼德教堂。这是一座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造的著名大教堂。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期，这里是中央特科的一处秘密联络据点。教堂的佣人、花匠都是地下党员，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等都曾在这里开过会。

圣彼德教堂的主持牧师董健吾，浙江青浦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董健吾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担任过“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秘书，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央特科，以牧师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董健吾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美国进步作家埃施加·斯诺的笔下，他被称为“红色牧师”。一九三〇年，他在上海创办大同幼稚园，收养并保护烈士遗孤和中央领导人的后代，包括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以及蔡和森、彭湃、杨殷的儿子、恽代英和李立三的女儿。

.....

在处决叛徒白鑫的行动之前，陈赓来圣彼德教堂找董健吾这位红色牧师，是要他前往白鑫隐藏的和合坊，侦察周围地形，把进退路线摸清楚。

在和合坊，范争波已经加强了戒备，不但在公馆内增加了保镖，而且在和合坊弄堂的两头都加派了武装人员日夜站岗巡逻。只有身穿法衣的牧师出现在那里不容易引人注意。

第二天，董健吾就将一张和合坊一带的详细地图交到了陈赓手上。

白鑫临行这天，范争波公馆里人员进进出出，显得非常忙碌。范家的佣人从外面买回许多水果，迹象表明，内线提供的关于白鑫在十一月十一日离沪的情报是准确的。

这天晚上，躲藏了几个月的白鑫终于在范公馆门口出现了。在夜幕掩护下，白鑫由范争波及其兄弟和几名武装警卫陪同悄悄向汽车走去。送白鑫去码头的汽车就停在距公馆门口不远的地方。白鑫面无血色，战战兢兢，极度的紧张。恐惧和兴奋使他几乎无法自持：几个月以来象躲在老鼠洞中一样终日提心吊胆的日子眼看就要结束了，只要车到码头，船一开就远走高飞，从此摆脱噩梦，逍遥自在。他一看见汽车立刻就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跨上车去。

车门刚刚拉开，正要俯身上车，突然一声“不许动！”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白鑫等人浑身一抖，顿时惊呆了。

七八个人影象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从四周包围上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白鑫等人。红队在此已经等候多时了。

不等范争波的保镖掏枪，红队已经开火了。枪口在黑暗中喷射火光，枪声在狭窄宁静的弄堂内震耳欲聋。一名保镖当即栽倒在地，白鑫等人立即四下逃窜。

白鑫一边向范公馆大门狂奔，一边拔枪企图抵抗。几名红队队员在后面紧追不舍。复仇的子弹“嗖嗖”作响，追上了白鑫，钻进了他的身体。白鑫扑倒在地，红队队员赶上来又是几梭子子弹，叛徒的身上顿时成了筛子，充满腥味的血污流了一地。

枪战短促而激烈。特务头子范争波和另一名保镖受伤倒地，范争波的兄弟当场毙命。

红队迅速撤离现场。刚到弄堂口，在那里巡逻的一名巡捕开枪拦截，立刻被迎面而来的子弹扫倒在地。在距和合坊不远的蒲石路重庆路口，停着一辆引擎早已发动的汽车，红队队员们跳上车，汽车立刻绝尘而去，消失在十里洋场之中。

第二天，蒙蒙细雨之中，报童们在街头边跑边喊：“看报，看报，看霞飞路特大血案……”处决白鑫的行动成为上海各报的头号新闻。在几十种中外文报纸上，白鑫一案被详细报导，描绘得有声有色。

白鑫事件，使红队在上海威名大振，令叛徒和敌特谈虎色变。同时也使租界当局如临大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紧急增加巡捕人数，公共租界还从美国高薪聘请美军高级情报军官罗斯，担任总捕房政治部主任，专门对付共产党。

就这样，在二十年代的末期，国共两党在整体力量的对比上中国共产党尽管处于绝对的劣势，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自身的政治保卫上，在情报和特工方面却占据了先机，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正因为有强悍而高效率的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险，遭受了一次次重大挫折，但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共中央机关始终安然无恙。

第三章

一

中共中央迁到上海以后，就藏身在租界里。这是一块国民党势力无法直接插手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殖民政府”，公共租界的“政府”叫做“工部局”；法租界的“政府”叫做“公董局”。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上海外侨义勇队”，

还有自己的警察。法院和监狱。

租界的警察局叫做巡捕房，隶属于工部局或公董局的警务处。公共租界设有中央、老闸、新闸、虹口等十三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六千多人（据一九三七年统计），每年所花经费经常占工部局全年预算的将近一半。法租界设有中央等六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二千多人（一九三六年统计），所花经费经常占公董局预算的三分之一。巡捕和侦探中有英国人、法国人，他们大多是各级头目。

经常在街头路口巡逻的多是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缠着包头巾的印度人（属于公共租界）和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即越南人，当时的上海人多这样称呼他们，属于法租界）。不过，无论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大多数巡捕、侦探还是中国人。

租界的法庭最初叫领事法庭，后来又出现所谓“会审公廨”，民国年间，又成立所谓“特种法院”。这些法庭名义上由中国当局和租界当局共同主持，但实际上却成为工部局的附属机构，既不受中国当局管辖，也不适用中国法律。

上海租界内，人口众多而复杂，鱼龙杂混，又不实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查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租界的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这些，就为设立党的秘密机关，进行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

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巡捕房和上海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公安局狼狈为奸，互通消息，共同缉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是，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共产党人的“安全系数”也为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

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状况，加之这里是中国产业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上海作为自己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二大。四大都是上海举节的。现在，当中国共产党陷入空前的危险状态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又一次选择了上海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

“茫茫人海一身藏”中共中央隐蔽在大上海的哪一个角落里呢？

二

如今的上海市中心，也就是原来的公共租界中心地带，有一条福州路。这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在解放前

叫做四马路。四马路与云南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座天蟾舞台。无论六七十年之前，还是九十年代的今天，天蟾舞台都算得上大上海响当当的大剧院。当然，今天的天蟾舞台早已翻修一新，非旧日面目了。

当年的天蟾舞台，东面隔壁有一幢那个时代上海常见的广式里弄住宅，住宅门开在云南路上，门牌是“云南路 447 号”。这幢住宅的主人是谁，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不过，房东的名字倒有记载。此人名叫周贻生，是个开业医生。他租下了这幢楼，在一楼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招牌是“生黎医院”。开私人诊所用了多少房间，周贻生便将二楼的三间屋子转租出去，当上了二房东。

租下二楼屋子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湖南人。他在这里开了一家经营家乡湖南土布土纱的商号，招牌上写着“福兴字庄”。这位“老板”看起来似乎有些钱，因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却娶了一位年仅二十上下的“老板娘”。老夫少妻，在那个时代是有钱的象征。

然而，就连楼下的二房东周大夫也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这对白天看起来恩爱和睦的老夫少妻却分床而眠……

这一老一少夫妻俩是一对“怨偶”吗？不是。他们其实是一对假夫妻，是两个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坐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福兴字庄”的“老板”，真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很相似。

“老板娘”叫朱端绶，是熊瑾玎的小同乡，也是湖南长沙人。她虽然比“丈夫”小了二十二岁，但是党龄却比他长两年——一九二五年就入党了。

这对假夫妻开的“夫妻店”，就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大脑”——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藏身之地。

所谓中央政治局机关，就是政治局常委们经常碰头和处理日常事务，以及政治局成员开会的地方。那么，“福兴字庄”刚开张的时候，经常“光顾”这里的是些什么人？换句话说，中共中央刚刚迁到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

一九二六年，是中国现代上一个大动荡的年头，整个中国都在激烈地动荡，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也不例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着，变动着。

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闭幕时，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

在九个政治局委员中，又选出三人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这三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一个新的班子代替了。

六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一大以来一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因仍然坚持右倾错误，被停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了五大选出的李维汉和张国焘以外，又增加了三个人。他们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

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他在会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并指定这位新的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位后来居上的常委就是瞿秋白。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

“七一五”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在风云突变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的一幢西式公寓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六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改组。会议重新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在两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推举出由三人组成的常委会，他们的排名顺序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又有两人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周恩来和罗亦农。三常委变成了五常委。仅仅半年时间，周恩来在政治局里的身份就这样升升降降，由委员而常委，由常委而候补委员。再由候补委员而升为常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便一直处于在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中，直至他离开人世。

经常光顾“福兴字庄”的，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政治局成员之外，还有一个人，此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他随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当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瞿秋白、周恩来等常委处理中央工作。每逢政治局开会，都由他作记录。许多日常事务，也是由他处理的。所以，他来这里的时间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要多。

“福兴字庄”是由熊瑾玎一手建立起来的。熊瑾玎接受任务后，立即以商人的身份四处觅房。几经周折，最后找到天蟾舞台隔壁的这三间房子。这个地方很适合秘密工作的需要：它同天蟾舞台相连接，从戏院的楼梯可以直接到达房间。楼下是医院，每天前来求医问药的人很多，来这里联络接头和办公的人员混在其中，一点也不引人注意。房背后另有楼梯通向一条僻静的弄堂，出弄堂就是繁华熙攘的汕头路，遇到紧急情况时转移起来十分方便。

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这样建立起来并很快开始启用。作为掩护，熊瑾玎挂起了“福兴字庄”的招牌。当上了商号“老板”。

既然是“老板”，就应该有一位“老板娘”。否则，一个正当盛年的老板长期鳏居，会引起旁人的怀疑。何况，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自然少不了机密文件，以及各种办公用品，包括洗抄机密文件的密写药水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专人保管和整理。熊瑾玎要管理机关，还要兼任他的中央会计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中央就给熊“老板”择了一门“亲事”。为他配了一位“老板娘”。这位“老板娘”就是朱端绶，她是从千里之外的汉口“远嫁”而来的。

中央政治局机关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后来出了叛徒，才被迫放弃。这在当时为数不少的中央秘密机关中，是不多见的。

一九九〇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登门看望了还健在的朱端绶。老人向她谈起了当年开会的情景：

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一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土枪土炮怎么打得赢？当时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一点本事也没有，你爸爸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到过法国和苏联，知道的东西多。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的成员们常常在“熊老板”家吃饭。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长黄介然老人后来回忆说：

朱端绶做的一种鸡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有说有笑。

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三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上海。

清早，震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蓄着胡须，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朝着学院方向走去。站在路口值勤的是一个印度巡捕，当时的上海市民把这些肤色黝黑，头缠红色包巾，专在街上路口巡逻的印度巡捕称为“红头阿三”。看见这位颇具学者风度的男子走过来，这个身材高大的“红头阿三”下意识地对他微微点了点头，以示礼貌。

几个月来，每个礼拜总有几天早晨，都会看到这位男子向震旦大学走去。在他看来，这人一定是那个大学的教授，此时正步行去学校上课。

那个懂得尊敬斯文的印度巡捕并不知道，每次“教授”走到震旦大学的门口，都没有进校园，而是径直向前走。因为，这位受到他敬意的男子并不是教授，他就是受到国民党当局重金通缉，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们千方百计想捉拿到手的周恩来。

周恩来擅长化装以骗过敌人，多年来一直为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地下党员们津津乐道。他是众所周知的

中国共产党领袖。是蒋介石悬重赏捉拿的“匪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过国民党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不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国民党内的许多人也都熟识他。因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的处境就格外的危险。

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个把月，有时只住半个月就搬家，最长的一处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换一个住处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七点以前和晚上六点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搬到震旦大学附近。为了适应环境。他便装扮成学者的模样，久而久之，就连街头值班的巡捕也要向这位“教授”颌首为礼了。

走过几条街道，周恩来来到同孚路柏德里，这条里弄的七〇〇号是一所常见石库门房子，两楼两厅。这是中共中央一个重要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要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当时党内的人都把这个地方称为“中央办公厅。”

通常，“中央办公厅”的事情繁多，前来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等候。不过这一天还比较清闲，下午三点以后，工作就已处理完了。周恩来便来到坐机关的王根英的屋子。他当过陈赓夫妇的“月老”，彼此间的关系亲密而随便。

正巧，陈赓这天回家来了。虽然同在上海，又直接受周恩来指挥。但陈赓能见到他的时候还是不大多。见到老上级和老朋友，大家都很开心。

坐了一会儿。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交给陈赓，向他：“你看看这是谁？”

陈赓端详着照片上那个头发从中间分开，戴着一副眼镜的中年人，想了许久，只觉得此人似曾相识，但就是说不出来到底是哪一个。

周恩来见这个素来以眼光敏锐，善于识别人而自得的情报科长都被难住了，忍不住提示了陈赓一句：“是黄埔军校的。”

陈赓又看了一会，仍然摇摇头：“实在想不起来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在下！”周恩来忍不住开怀大笑。

“什么？是你！照片上的人比起你来起码大了十岁。”陈赓这才恍然大悟。“照这样的化装像作什么用？”

“自有妙用。不过，连你这个常在我身边的情报专家都认不出来，那一定万无一失了。”

二十年后，担任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普曼采访时，他还饶有兴趣地讲了这一则当年的轶事。说到这里的时候，周恩来的眼前似乎浮现出陈赓当时

懊恼的窘相，禁不住开怀大笑。

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几年里，周恩来曾两次去苏联。每次出国，都是以合法的身份正式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周恩来照这张化装像的“妙用”，是要用它去办出国护照。因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要动身前往苏联。

就在“六大”代表们准备动身的时候，一次突发事件震惊了全党。

四

四月十五日上午，一个年约二十五六的青年男子来到公共租界戈登路路口的一家住户。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年纪相当的年轻人也走进了这家的大门。后来的这个人身材比较矮小，他就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他之前来到的那个男子，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即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

罗亦农是党内声望很高的年轻领袖，他是湖南湘潭人，一九〇二年出生。一九二〇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在苏俄学习了五年，回国后担任过江浙区委书记，并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一九二七年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此后又担任过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一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即受中央委派出巡两湖，几天前刚刚回到上海。

邓小平是受罗亦农之约，来这个用于中央组织局的秘密机关商量处理一件事务的。两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很快将事情处理完毕，邓小平便离开了。按照地下工作的惯例，两个人应该一先一后离开机关，所以邓小平就先走了一步。

邓小平从机关后门出来，走到弄堂口，习惯地看了一眼摆在街头的修鞋摊。他知道，这个“鞋匠”是特种的人，化装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邓小平楞了一下，他看见那个“鞋匠”漫不经心地向他作了一个手势。这是一个暗号——“出事了，赶快离开！”他不敢停留，赶紧加快步子。在穿过街口的时候，他迅速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几个身穿便衣的包探已经堵住了机关大门。

前后只差了一分钟时间！

邓小平消失在人群之中。罗亦农晚走一步，不幸被捕了。

一个小时之后，周恩来便得知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顾顺章，命令他负责组织营救，并照顾好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

当天下午，一名特科的工作人员来到罗亦农的住处，要李文宜立即到愚园路亨昌里的一处秘密机关。在这里她见到顾顺章，获悉丈夫被捕的噩耗。顾顺章还对她说，原来的住所很可能暴露，不能再回去了，已经为她安排好一家旅馆。此后几天，李文宜每天换个住处，提心吊胆地等待丈夫的消息。

四月二十二日，顾顺章来到李文宜的住处，对她说：“你马上到龙华去，在文治大学的那个马路口右边的第一根电线杆上，去看看贴了什么样的纸条。”

李文宜疑虑不安地望着顾顺章，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不便追问，便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往龙华去看个究竟。

在顾顺章所说的那根电线杆上，她果然看到了丈夫的消息。

这不是一张纸条，而是一幅布告，上面怵目惊心用朱笔打了一个大勾。

奉蒋总司令命，共党要犯罗亦农着即枪决。

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

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来，罗亦农被捕之后，只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关押了三天，就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了。在劝降失败后，蒋介石下手令将罗亦农枪决。从被捕到牺牲，前后只有六天时间。特科的营救未能成功。

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李文宜还是被这噩耗击懵了，在布告处木然呆立了很久。绵绵的春雨逐渐浇醒了她的头脑，这个勇敢的女人决定马上寻找丈夫的遗骸。

龙华是当年上海人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窟，李文宜很快就打听到丈夫就义的刑场。这是一块面积不大的草地，当中有一滩鲜红的血泊，在血泊旁边丢着一根贴在竹竿上的纸标，人们通常把它叫做“斩标”。上面赫然写着“共党要犯罗亦农”，“罗亦农”三个字上还划了一个猩红的圆圈。李文宜看到丈夫的名字，顿时两眼发黑，双腿一软，昏倒在地。醒过来时，她看见周围站着几个当地的百姓，便向他们打听，这个被枪毙的共产党的尸体移到哪里去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向她作了一个手势，默默地领着她向前走了不长的一段路，在一丛灌木的前方有一个黄土孤坟，老人用手指了一指，就默默地离开了。这是一个草草堆起的新坟，没有墓碑，周围没有任何标志。坟里埋的究竟是不是亦农？是谁掩埋的，是自己的同志，还是专行善事的经善堂用薄木棺材埋的？李文宜站在坟前想了好久，最后决定回去向组织汇报后再来查明。

第二天一早，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杨庆兰找到李文宜的住所，要她立即转移到新的住所。到了地方才知道，这里的主人是牺牲于广州起义中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的遗孀王一知。当天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到这里看望两位烈士的遗属。

李文宜含泪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一支手枪，亲手杀掉出卖丈夫的叛徒；第二，查看罗亦农是否已经掩埋，如果是经善堂的草草掩埋，要另行安葬；第三，请求去苏联学习革命理论。

周恩来回答李文宜，中央理解你的心情，也相信你的决心，但是你没有使用手枪的技术，这事万万不能由你去做。处理叛徒由中央负责，要不了几天就会见分晓。其他要求不成问题。

草草料理了罗亦农后事，李文宜就同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结伴同行，前往莫斯科。杨之华是去出席“六大”的。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年轻领袖罗亦农，就这样同他曾经英勇战斗过的上海大地融为一体。

可以告慰罗亦农英灵于九泉的是，他还关在巡捕房的时候，中央特科就提前为他报仇雪恨了。

五

位于北四川路 and 老靶子路交界处，有一家“三民照相馆”。这是中央特科的一处秘密机关。

罗亦农被捕的当天下午，顾顺章和刚刚担任情报科长不久的陈赓一前一后来到照相馆。中央政治局常委被捕，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周恩来立即命令顾顺章和陈赓全力处理此事。

罗亦农被捕时的情景十分蹊跷。带队前来捕人的是戈登路巡捕房的捕头洛克，他用德语同“坐机关”的贺芝华交谈了几句后，当即将罗亦农逮捕，并且直接了当地说：“你是罗亦农，我就是来抓你的。”除了罗亦农，在场的其他人都未被捕，放在办公桌抽屉里的秘密文件也没有被抄。这种值况，是从未有过的。

显然，内部出了奸细，是他出卖了罗亦农。

这个出卖罗亦农的奸细到底是谁？顾顺章立即派人找到巡捕房的内线打听。现在，他和陈赓正在照相馆焦急地等候着消息。

巡捕房就是租界的警察局，它同那个时代中国各地的“局子”一样，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罪恶渊源。巡捕分为西捕（西洋人，公共租界主要为英国人，法租界主要为法国人）、印捕（印度人，法租界则由越南人充当）和华捕（华人）三种。巡捕房的各级头目大都由西捕充当，但人数最多的还是华捕。无论是盛气凌人的西捕还是甘当外国殖民者鹰犬的华捕，大多灵魂空虚、惟利是图，心中既无国家民族，更没有理想信仰。华捕的待遇很低，工资只有同级西捕的七分之一。因此，他们的收入更多的是靠收受贿赂和敲诈勒索而来。而西捕尽管收入已很优厚，但仍欲望难填。无论是谁，只要给钱，就可以向他出卖情报，通风报信，如此种种，就为特科获取情报，保卫中央领导和机关提供了许多方便。

旧时的上海，可以说是帮会的天下。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控制的青帮几乎渗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使是外国人控制的租界也不例外。从租界警务处长、总巡，到普通的西捕和华捕，许多人都与黑社会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华捕们更多为青红帮的各级喽罗。顾顺章原来就是青帮的活跃份子，主持特科工作后，便利用这些关系与各巡捕房的西捕、华捕们建立了联系。许多巡捕都定期接受特科的津贴，充当特科的“线人”，如果提供了特别有价值的情报，还有额外的“奖金”。

因此，巡捕房出动缉拿共产党人或破坏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特科往往能在一小时或半小时前得到消息，从而避免了许多损失。

但是，这次罗亦农的被捕，事先特科的情报人员竟毫无所知。因此顾顺章格外恼火。他立即派情报科的一名工作人员火速与戈登路巡捕房的内线联系，一定要打听出个究竟。

顾顺章和陈赓等了很久，打听消息的人终于回来了。他带回的情报果然证实了大家的猜测——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的。

来自巡捕房的消息说，当天早上，有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漂亮女人主动找到总捕房政治部，

自诩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而且其中多数是参加过南昌暴动的各级负责人。只要捕房答应给她两张出国护照和二万美金，让她到她所想去的国家，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以把名单全部交出来。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她可以先提供线索。今天上午就可以抓到共产党总负责人之一的罗亦农。上午十点左右，西捕头洛克突然带队出动，不久，就把罗亦农抓回来了。

听了汇报，顾顺章和陈赓几乎同时想到了两个人——主持这个秘密机关的何家兴和贺芝华夫妇。

贺芝华是四川人，曾随何家兴一同到苏联东方大学留过学。从苏联回国后，双双被分配到中央组织局，在罗亦农领导下作秘书工作。他们主持的这个机关，是组织局的一个中心机关，主要是联系参加南昌起义后从潮汕和香港等地辗转来到上海的同志，为他们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作为组织部的秘书人员，他们的手中当然能掌握数百人的名单和住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中央的负责人。

情况紧急！现在的问题不仅是打探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必须迅速落实情报，避免更大的损失，这关系到几百个同志的生命安全。

情报很快得到证实。出卖罗亦农的果然是何家兴夫妇。

何家兴和贺芝华，素来爱慕虚荣，贪图享受。从国外回来后，仍然迷恋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经常出入茶楼酒馆、舞厅剧场，并且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有时外出很晚才回家。罗亦农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非但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当时，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二十元，以当时上海的物价水平，这个数字足以维持普通市民的生活用度，但要想常常出入酒馆舞厅，就远远不够了。

何家兴夫妇早已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们本可以象当时的许多人那样，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互不妨碍。以当时险恶的环境，这样做最多被人视为胆小鬼，也无可厚非。无论当时或后来，都不会受到追究。然而，他们却丧尽天良，处心积虑地要用自己同志的生命来换取一笔丰厚的赏金，以便能远走高飞，享受优裕的生活。

四月十五日早上，贺芝华与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初步达成协议后，总房就通知戈登路巡捕房随时准备出动。按照约定，罗亦农一到机关，他们就派机关的烧饭娘姨送信给站在戈登路和爱义文路口的华捕。捕房西捕头洛克一接到消息，立即带队出动，罗亦农正准备出门，就被逮捕了。贺芝华在同洛克交谈时，还送给他一枚钻石戒指。

情报落实了，顾顺章和陈赓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机立断，尽快处决叛徒，夺回那份关系重大的名单！

四月十六日凌晨，何家兴夫妇的寓所门外突然燃放起鞭炮。在震耳的鞭炮声中，“红队”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踢开房门，冲进房内。何家兴夫妇还躺在床上，已经被手枪逼住，被迫交出了名单。这时狗男女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不断求饶。队员没有理睬他们，几声枪响，两个叛徒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完成了任务的“红队”队员们在鞭炮声中安然离去。

事后才知道，何家兴当场毙命，而贺芝华只受了重伤，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后来得知她被送到广慈医院治疗，因为防范很严，难以下手，加之名单已经夺回，她已无法作祟，“红队”便饶了她的性命，让她

回到四川老家乡下去了。

罗亦农的在天之灵已得到安慰，中央领导人和数百名地下党员也转危为安。

第四章

一

位于南京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民国初年曾是江苏省议会。每天进出中央党部大楼的都是一些身着黑色中山装头戴礼帽或布履长衫的党棍和政客。这些神态俨然的人物在楼梯或走廊上相遇，彼此点头哈腰，笑容可掬，然后收起笑容步履匆匆而去。他们各怀心事，各有目的，到这里来无非是钻营仕途，追逐名利。

在一九二八年，这些匆匆出入于中央党部大楼的人们，很少有人注意到大楼西南角二楼的两间并不起眼的办公室，不知什么时候在门口钉上了一块“调查科”的牌子。

党部大楼二楼是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区。组织部是掌管人事大权的地方，到这里烧香拜神的人特别多，各个办公室常常是门庭若市，香火旺盛。只有调查科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相形之下这里似乎成了冷坛破庙。

然而，人们没有想到，后来国民党最大的两个特务系统之一的“中统”，最初就是从这两间无人问津的办公室中开始发端的。

三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特科的一个最凶恶的对手，就在这间办公室内悄然降生了。

当初，即使在中央党部内，也很少有人知道这调查科的来头不小。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也有调查科。那时的调查科只是收集党内各种资料，如党员成份、经历、动态之类，有时也作一些一般性的社会调查。总之在人们心目中，在组织部内部，比起那些可以直接任免干部、决定仕途进退的部门，调查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无关痛痒的清水衙门而已。但自从陈立夫于一九二八年亲自担任调查科主任之后，调查科的地位就今非昔比了。

二

“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颇为流行的一句话。所谓“陈家党”，就是指二陈兄弟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控制。二陈者，“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也。

陈果夫生于一八九二年，陈立夫生于一九〇〇年，两兄弟相差八岁。二陈是浙江吴兴县人。吴兴县在清代为湖州府。“苏湖熟，天下足”，苏，指苏州；湖，即湖州，皆为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膏腴之地。湖州地处东南，得风气之先。辛亥革命前夕，这里也是革命党人特别活跃的地区之一。

陈果夫、陈立夫还在童年时期，其父的两个兄弟就已经参加了同盟会的反清活动。特别是二叔陈其美，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风云人物。而陈其美的经历对于他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后来的政治生涯有

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并且构成了二陈兄弟在国民党内飞黄腾达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陈其美青年时代正值中国甲午战败，清廷对日割地赔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陈其美放弃原来商业救国的思想，加入了哥老会，开始秘密的反清活动，并逐渐成为上海青帮的大头目。后来，陈其美东渡日本，先入警监学堂，后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期间，他见到了孙中山，很快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中坚分子，并且成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陈其美结识了一位刚刚来自浙江的小青年，此人就是蒋介石。

陈其美和蒋介石都是浙江同乡人，加之二人意气相投，因此一见如故，大有相识恨晚之慨，于是陈其美和蒋介石很快就结为拜把兄弟。陈其美比蒋介石大九岁，被蒋介石尊为大哥。此时的陈其美在革命党人中尤其是在会党中已经是响当当的头面人物，而年纪还不满二十岁的蒋介石不过是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而已。

小兄弟自然要靠老大哥提携。在陈其美的介绍之下，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陈其美手下的主要亲信。随后，陈其美又介绍蒋介石加入青帮。一九一三年，经陈其美引荐，蒋介石在日本第一次受到孙中山的单独召见。

与陈其美的结识，奠定了蒋介石政治生涯的基础。日后蒋介石受孙中山之命入主黄埔，进而总揽军权；蒋介石在上海靠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相助发展势力，追本溯源都全靠把兄陈其美当初的引进之恩。因此，蒋介石一生都把陈其美奉为恩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在上海联络会党、防军举兵响应，攻克清军的主要据点江南制造总局，随即占领上海。陈其美在上海的起义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两省的独立，给武汉的革命以强有力的支持。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府都督，立刻任命自己的小兄弟蒋介石为沪军第五团团长。

在南京，孙中山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席不暇暖，辛亥革命成果就被袁世凯篡夺。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很快就暴露无遗。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起兵讨袁，失败后，随孙中山流亡日本。不久陈其美返回上海筹划起义。蒋介石协助陈其美刺杀了袁世凯的湘沪镇守使郑汝成，并发动“肇和”号军舰起义。不料就在这时，袁世凯派遣的杀手溜进了陈其美寄宿的法租界萨坡赛路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

两颗子弹洞穿了陈其美的头颅，陈其美顿时丧命黄泉。

蒋介石闻讯，痛哭失声，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将陈其美的尸体载回自己在上海的秘密寓所入殓，并撰写祭文悼念。

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失去了一个重要助手，于是对陈其美的亲信蒋介石信任有加，逐渐委以重任，蒋介石遂得以发迹。蒋介石则把对陈其美的感念之情移注于陈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身上。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不仅年龄相差较大，而且从小志趣各异。老大陈果夫很早就表现出从政的热情；老二陈立夫最初却不问政治，一心想当一名采矿工程师。然而，陈氏兄弟最后却殊途同归，携手从政，同为国民党党魁。

陈果夫热衷政治是受其二叔陈其美的影响。辛亥革命前，陈果夫就读于浙江陆军小学时，就参加了驱逐陆小总办的学生风潮，并成为学生领袖。武昌起义爆发后，陈果夫很快就加入同盟会，后来又跟随陈其美从事反袁起义，并在这时认识了蒋介石。

陈其美死后，陈果夫与蒋介石交往日益密切。从一九二〇年起，陈、蒋二人与戴季陶、张静江还在上海搞过一阵证券交易所的投机生意。蒋介石去广东，将正在上海读书的儿子蒋经国托付给“果夫哥哥”照顾。蒋介石筹办黄埔军校，陈果夫就在上海替蒋介石采办军服、马匹等物资，并罗致军官、军医、无线电人才和其他技术人才。一九二六年四月，陈果夫离开上海前往广州，马上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开始从事党务。

陈立夫则是绕了一个圈子之后才进入政界的。当陈果夫和蒋介石等人在上海滩的证券交易场中盈亏增损、升降沉浮，在广东为孙中山的革命政府紧张奔忙时，陈立夫正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潜心苦读。此时的陈立夫两耳不闻窗外事，成天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一门心思地攻读矿冶工程学位，对哥哥陈果夫从事的政治活动不屑一顾。

一九二五年，陈立夫以优异成绩获得矿冶工程硕士学位，本想留在美国继续深造，但在陈果夫的一再催促下只好启程回国。陈果夫之所以让弟弟离开美国，那是因为急于替蒋介石物色人才。

此时的蒋介石正在扩张势力，培植党羽，急需一批既忠实可靠又有能力的人才。陈氏兄弟是陈其美的侄儿，自然是最佳人选。并且蒋介石特别看重自幼聪明机灵的陈立夫，一心要将他网罗到自己麾下。

陈立夫虽然经兄长反复劝说，仍然犹豫不决，对于一向倾心的工程技术难以割爱，迟迟下不了从政的决心。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面，一再致电陈立夫，说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以开革命之矿。

陈立夫终于拿定了主意。一九二五年底，陈立夫带着陈果夫给蒋介石的信，在细雪纷飞之中登船从上海前往广州。

从此，在中国矿冶工程界，一面本来大有希望的新星中途殒落了；在民国政界却升起了一颗光芒有角的黑煞星。而对于肩负保卫中共中央重任的特科来说，则多了一个非常险恶的敌人。

陈立夫容貌清秀，又刚刚喝了几年洋水，西装革履，更加显得气度出众。蒋介石一见大有好感，立刻安排陈立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机要秘书，让他跟随在自己身边参与机要。而陈立夫不从政则已，一旦从政，立刻显示出极大的政治能量，甚至超过他的老兄陈果夫。

陈立夫刚刚当上机要秘书没有几天就遇上蒋介石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

和“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声称要出国修养。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为发展个人势力，与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以及与汪精卫之间矛盾日益尖锐。正如蒋介石后来三番两次玩弄的辞职把戏一样，这时提出辞呈其实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要挟手段罢了。不料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并未如蒋介石所期待的那样予以挽留，这就使蒋介石无法下台，只好派人购买船票，带着陈立夫准备离开广州去上海，然后出国。

陈立夫尽管初涉政坛，政治直觉却相当灵敏，他感到如果蒋介石此时离开广东很可能从此大权旁落，因此竭力劝说蒋介石留在广州与共产党斗。但蒋介石已经势成骑虎，只好仍然乘车前往码头。

“干，手上有兵为什么不干？”初出茅庐的小秘书在车上仍然对蒋介石陈述厉害。车到码头，轮船已经升火待发。蒋介石身披黑色大氅立于朔风之中，沉吟良久，最后断然将手一挥：“回去，不走了！”

一周之后，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震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这是一起现代“白虎堂”事件，蒋介石借口中央舰擅入黄埔，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并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随后利用陈独秀和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妥协退让，迫使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此后，蒋介石加快了夺取军权和排斥打击共产党的步伐。

二十多年后，周恩来在分析当时国共关系时，谈到了陈立夫在“中山舰事件”

中所起的恶劣作用：“张静江、陈立夫都于一九二六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的原因，也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中山舰事件使蒋介石对陈立夫大为赞赏。陈立夫很快就被蒋介石提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长。

对于蒋介石来说，陈氏兄弟既是自己的恩人陈其美的侄儿，又颇具才干，并且对自己忠心耿耿，于是对二陈更加另眼相看，视为心腹，倚为股肱；而陈果夫，陈立夫也把自己的政治赌注全部押在了蒋介石的身上，决心与蒋介石同荣辱共沉浮。

“蒋、宋、孔、陈”之中，蒋、陈最先结盟。

一九二七年“六一五”之后，尽管蒋介石、汪精卫以及国民党其它派别都一致联合反共，但争夺中央领导权的矛盾却日趋激烈。当时，除了蒋介石在南京、汪精卫在武汉各有一个中央党部，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也搞了一个中央党部。一时之间中国出现了三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宁、汉、沪三方的争夺中，蒋介石树大招风，成为众矢之的，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蒋介石只好宣布下野。

蒋介石的下野促成了宁、汉、沪三方合流，三方代表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接收宁、汉、沪的中央党部，暂时行使中央职权。

陈果夫虽然被任命为代理组织部长，但二陈兄弟暗中却在为蒋介石的复出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陈果夫、陈立夫联络拥蒋政治力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其英文C e n t r a l C l u b 的缩写是C C，所以该组织简称C C。

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执政。二陈兄弟是患难之中的忠臣，拥戴有功，因此格外受到重用。蒋介石将党务交给陈果夫经营，由陈果夫、陈立夫负责主持“清党”反共。从此国民党中央党部成了二陈兄弟的禁地，开始了“陈家党”的时代。

二陈兄弟把持党务，炙手可热，权势熏天，自然趋附者众，于是在国民党中逐渐自成体系。因陈果夫、陈立夫的英文拼写第一个字母都是C于是人们便将过去“中央俱乐部”的C C移花接木，解释为陈果夫、

陈立夫的英文名字的缩写 C C。以二陈为首领的派系也就被称为 C C 系。

以二陈为首的 C C 系通过对各级党部的整顿和改组，控制了从中央到各省市的各级党部，成为国民党内一个庞大的派系。C C 的核心是中央组织部。而在中央组织部，由“二老板”陆立夫亲自担任主任的调查科则是最为要害的部门。

三

陈立夫堪称国民党特务的开山祖师。

当陈立夫于一九二八年草创特务机构时，戴笠当时是黄埔六期学生，毛人凤则是一个县政府内终日伏案抄抄写写的小秘书。这两个后来著名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此时还是无名小卒而已。而这个时候，陈立夫已经在着手建立国民党的第一个特务组织了。

陈立夫亲自主持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之后，对调查科的职能作了新的规定：

调查科除了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之外，主要的任务是搜集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的情报，配合国民党警宪机关破坏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的秘密组织。

这样一来，组织部调查科由原来的党务部门，变成了一个专门镇压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异己力量的特务机构。调查科就是后来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之一的中统局的前身。

建立特务机构，这正是蒋介石的意图。蒋介石经过下野到重新上台的一番折腾，深知要建立对党、政、军的独裁统治，就必须严厉镇压国民党内的各派异己力量。但国民党至少表面上还是“五权共和”，蒋介石还不能肆无忌惮地公开动用国家机关来打击他的政敌，这就需要建立惟领袖之命是从的特务机构。

不过，蒋介石建立特务机构更主要的目的还是对付共产党。

“七一五”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销声匿迹，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但各地的起义和城市暴动却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足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仍在有效地活动，并且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在进行指挥。共产党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寻。面对中国共产党严密的地下组织，国民党的警察和宪兵几乎是两眼一抹黑，不知从何着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隐藏在上海租界之内，又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加以保卫，就更加难以破坏。而在租界这个洋人统治的“国中之国”内，国民党公开的警宪机关不便公开进行侦破和搜捕，因此，要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必须依靠秘密的特务机关。

在蒋介石看来，特务活动的成败利钝，关系党国存亡。因此他对于陈立夫草创的特务机构，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尽力加以扶植。

最初作为党务部门的调查科只设采访、整理两个股，有总干事、助理干事共十来个人，几张写字台，如此而已。自从陈立夫入主调查科之后，调查科的状况就今非昔比了。调查科的机构迅速膨胀，陆续增设了特务组和言文股、文书股等机构。

陈立夫特地从中央党务党校和黄埔六期精心挑选了近三十名受过政治警察训练的毕业生，充实到调查

科。

在调查科内，新成立的特务组又是其中最要害的部门。调查科一般的特务活动由采访股等部门担任，而所有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谍报活动、密谋策划以及被认为属于最机密的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等都由特务组负责。特务组的办公室，不但中央党部其它部门的人员禁止入内，即使调查科内部人员也不能随便进入。

过去冷冷清清的调查科，只因成了“特”字号，很快就身价百倍，成了中央组织部内机构最庞大、最为要害的部门。

陈立夫将调查科改造为特务机构之后，就将调查科交给他的亲信去具体负责。

担任调查科主任的都是CC系骨干，这些人在调查科干不了多久很快就可以升官晋级。调查科成了登龙门的终南捷径。

继陈立夫担任调查科主任的是张道藩。张是贵州盘县人，二十年代初期留学法国学习油画。这位学艺术的留学生的志趣并不在形体和色彩，而是醉心于政治。张道藩因为是CC系的高级骨干，被陈立夫选中当了调查科主任。张道藩在调查科只干了几个月就升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后来历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期间曾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

张道藩的后任吴大钧是浙江人，曾留学美国，与陈立夫私交甚笃。吴大钧当了半年调查科主任，就升为中央统计处处长，同时又负责筹备开办中正书局。调查科主任一职交给了叶秀峰。

叶秀峰是江苏扬州人，与陈立夫是北洋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又和陈立夫一起赴美留学，二人私交极深，互相称兄道弟。叶秀峰在调查科干的时间也不长，到一九二九年底就升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以后历任南京市党部组织部部长、西康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中统局局长、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总干事。

担任调查科主任时间最长的是徐恩曾。徐恩曾，号可均，浙江吴兴人，与陈果夫、陈立夫是小同乡，并与二陈有表亲关系；毕业于南洋公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电机工程。徐恩曾特别受陈立夫的信任，主持中统的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在徐恩曾任职期间，调查科逐渐演变定型为后来的中统局。

一九三二年，按照蒋介石的指示，陈果夫、陈立夫在调查科基础上秘密建立了特务工作总部。这个特务组织即使在国民党内也是极端保密的，除了CC系核心圈子，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特务组织的存在。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或其它任何机关的组织条例中都根本找不到“特工总部”这个名称。

特工总部在南京和上海设有行动区，在各省市党部设有特务室。这些行动区和特务室都是秘密的，从不公开活动。行动区和特务室的负责人通常是以“特派员”、“督查员”或“肃反专员”之类的身份出现。特工总部与各地下属机构之间往来电报都是用代号，从不称“总部”或“行动区”，并且代号一年一换，显得极其诡秘。

直到一九三八年特工总部撤消，改为中统局之前，这个幽灵似的秘密特务组织始终是借用公开的行政

机关作为它的躯壳，犹如幽灵附体一般。

特工总部所用的行政机关的名义，一个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这是由调查科扩大而来的；另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表面上看，一个是党务机关，一个是政府机关，似乎互相独立，实际上不过是特工总部的两张画皮而已。特工总部负责人徐恩曾的公开职务便是党务调查处处长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处长。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并非后来由戴笠任局长的军统局。在三十年代初期，除了CC系的特工总部，黄埔系的军统也已经初具形态，因此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设立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以协调这两个互不统辖的特务组织。该局以陈立夫为局长，下设三个处。第一处以徐恩曾为处长；第二处以戴笠为处长，第三处先是由叛徒丁默闿为处长，后由金斌继任处长。到一九三八年，这三个处分别扩大为三个特务组织：第一处为中统局；第二处为军统局；第三处成为军事委员会特检处，专管邮电检查。

特工总部的矛头主要对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尤其是上海行动区更是将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首要任务。然而，无论特工总部行动如何诡秘，其保密措施如何阴森严密，但陈立夫和他的亲信徐恩曾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刚刚成立的特务机构内部，就已经有中共中央特科的人员打入了。

四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爱多亚路（现名延安中路）和成都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家私人医院——牛惠霖骨科医院。

这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医院。医院的院长牛惠霖和他的弟弟牛惠生，一个曾经留学英国，一个曾经留学美国，都是出色的骨科医生。牛氏兄弟不仅医术高超，门第也很高贵，他们同当时中国最高贵的家族——宋氏家族是表亲，中华民国的“国母”宋庆龄，是他们的表姊。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是他们的表妹。有这样的渊源，牛氏兄弟其可以称得上中华民国的“国舅”了。

高超的医术和高贵的门第，使牛氏兄弟自然而然地跻身于上海的上流社会，也给他们的医院带来了众多既富且贵的病人。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员和腰缠万贯的阔佬，都在这里接受过牛氏兄弟的治疗。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这里还经常住着一些来历不明的病人，这些人各有各的背景，院方也不便多问。反正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不该问，或者不能问的，就不必去管它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牛惠霖医院就住进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病人。此人大约二十多岁，中等身材，英俊的面庞虽然因身体受伤而显得有些憔悴，但仍然透出掩盖不住的精明和强悍。

这个来历不明的病人，就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战将，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十员大将之一的陈赓。

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当年也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情报专家。就是他具体指挥中央特科情报人员钻进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心脏，并且还从敌特机关内部拉出为特科传送情报的特殊“情报员”来。陈赓的情报活动令陈立夫、徐恩曾等特务头子惊恐万状，为保卫中共中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五

在为数众多的国共两党高级将领中，像陈赓那样，一生的经历带有如此强烈传奇色彩的人，是极其罕见的。

陈赓的传奇色彩，首先表现在他同中国现代史上的伟人们，都曾有过非同一般的渊源。

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曾经为国共两党培养出众多的高级将领，陈赓就是其中之一。他出身黄埔一期，是这所闻名于世的军校的首批学员。在黄埔军校期间，陈赓当过孙中山的侍卫，颇得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的赏识。孙中山去世后，他仍然是宋庆龄座上的常客。

陈赓的另一件常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轶事，是他曾经在万分危机的关头，救过蒋介石的命。这件事不仅在黄埔传为佳话，也使他一度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并被任命为蒋的侍卫参谋，可以自由出入蒋的居室，翻阅蒋介石的机密文件。

同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风云际遇”，在为数众多的黄埔出身的将领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有如此令黄埔同学艳羡的际遇的陈赓，却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同国民党是如此。在自己的阵营共产党中，陈赓也以其独特的性格风貌为众人所瞩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众多战功彪炳的名将。然而，这些叱咤千军万马的将军们一旦见到他们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一个个都变得像老师面前的小学生一样拘谨，据说，在毛泽东面前，只有两个人“胆敢”高声喧哗，谈笑风生。这两个人碰巧都姓陈，都是以性格豪爽风趣著称，一个是陈毅，另一个就是陈赓。

一九五二年，陈赓从朝鲜战场回国，到中南海急于要见毛泽东，但在毛泽东的卧室门外被警卫挡驾：“请在外边等等，主席刚刚午睡。陈赓心生一计，坐下来开始小声给警卫讲朝鲜战场的故事，越讲嗓门越大，警卫听得入迷，等醒悟过来时，毛泽东已经被吵醒了：“是陈赓在外面吧？要进你就进嘛，在外面搞什么鬼？”陈赓笑咪咪地走进毛泽东的卧室：“主席，很对不起，我惊了你的美梦。”“你呀，鬼点子就是多，声东击西的战术都用到我门口来了。有什么事，说吧。”毛泽东很喜欢他的这位大将的性格。陈赓与周恩来之间虽然是上下级，但两人的个人关系却是亲密无间，情同手足，这种关系是在几十年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中结成的。一九三五年八月，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右路军过草地。途中，周恩来患了严重的肝病，体温高达四十度。毛泽东指定陈赓带领三十名战士专门照顾周恩来，用担架把他抬出渺无人烟的草地。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仍不失风趣地对陈赓说：“当年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如今你又来救我的命了。”

尽管陈赓救过蒋介石的命，但他仍然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从一九二六年春天开始，蒋介石逐渐脱去左派的伪装，公开在军校实行反共政策，要求黄埔军校的军官和学生填表声明党籍，不准跨党。表面上，蒋介石说得冠冕堂皇：“凡在本校本军里的C 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同志，不管是愿意脱离C P，或者愿意脱离国民党，他总要作一个纯粹的党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许多人都身兼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党籍，陈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如此。

蒋介石的这一手，在黄埔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些不坚定份子就此退出了共产党。陈赓的密友和同乡，同他一起报考黄埔，又经他介绍参加共产党的宋希濂，就是在这时退出共产党的。而陈赓则坚定地向人们表承，愿终身作一名共产党员，他毫不犹豫地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同时声明脱离国民党党籍。

一九二六年九月，陈赓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报到，接受新的任务。就这样，陈赓永远离开了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

陈赓秘密离开广州到了上海，找到党中央机关。在那里。他见到了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告诉陈赓，党交给他的新任务，就是到苏联去学习政治保卫工作。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为自己培训专门的政治保卫干部。第一批前往苏联受训的一共三个人，除了陈赓，另外两个人是顾顺章和陆留。

见过总书记的第三天，陈赓一行三人分别来到上海杨树浦码头。在这里，李强用一只小舢板把陈赓他们送到一艘苏联货轮上。两年之后，李强和陈赓成了同在中央特科的战友。

几天之后，船到了苏联的海参崴。陈赓等人在岸上稍作逗留，即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在那里办妥了一切手续后，随即又乘车回到苏联的远东地区。

在远东，陈赓等人被安排到苏联红军的一个特种部队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专门技术。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三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政治保卫干部以优异的成绩在“老大哥”那里拿到了“毕业证书”。

一九二六年二月，陈赓一行回到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长江流域，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了武汉。陈赓在上海稍事停留，便前往南昌。不久，又从南昌赴武汉。陈赓进入唐生智的部队。

唐生智字孟潇，是老资格的湘军将领，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湖南省主席，其部下控制着湖南、湖北和河南南部，是武汉国民政府中权势最大的人。

这个人称“老滑头”的军阀很善于审时度势，在国共合作的高潮中，他一方面率全军加入国民党，同时又向共产党表示友好，甚至提出过参加共产党的要求。

陈赓同唐生智之间也有一段间接的渊源。他在担任黄埔四期步科一团七连连长的时候，连里来了一名特殊的学员，此人就是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唐生明是一个典型的豪门子弟，纨绔习气十足，但为人很讲义气。他在六连的时期，陈赓对他很照顾，两人的私交不错。

因为有这样一层渊源，陈赓顺利地担任了唐生智总部的特务营营长。

特务营是一支精锐的部队，全营共有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人数在一千人以上。这个营的武器装备也特别精良，步兵连都是清一色的汉阳造新式步枪，每个连还有二十支美造汤姆式冲锋枪。部队的士兵绝大部分是安源路矿的工人，官兵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很多，几个连长都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共产党员。

陈赓率领的这样一支部队，实际上成为了中共中央的警卫营。所以，陈赓可以说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任警卫部队的首长。从这个时候起，陈赓就开始从事中国共产党最高机关的保卫工作了。

在指挥特务营的同时，陈赓还指挥着武汉工人纠察队。这个纠察队也是一支颇有实力的武装力量。它在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领导，但实际上由陈赓负具体责任。特务营和工人纠察队两支力量，就确保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陈赓受命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凭着他的机警、干练和责任心，整个保卫工作作得十分周密，保证了“五大”的顺利召开。

中国共产党“五大”以后，局势迅速恶化。与南京的蒋介石遥相呼应，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先后发生了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并对部队内部的共产党员进行清洗。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举行“反共”会议，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同时下令对共产党员进行疯狂的大屠杀。霎时间，武汉三镇被白色恐怖所笼罩。

陈赓被迫将特务营交给唐生明，只身离开。武汉工人纠察队也被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下令缴械。因为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共中央的第一支警卫部队在顷刻之间便不复存在了。

陈赓离开特务营以后，随同中共中央暂时由汉口转移到武昌，专门负责保卫周恩来的安全。大约在七月二十日左右，他护送周恩来从武昌秘密启程，前往南昌领导即将在那里举行的“八一起义”。

在南昌，陈赓担任起义总指挥部的保卫工作。起义胜利后，部队按计划向广东进军，陈赓被调到贺龙的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任营长。南进途中，部队在江西会昌附近遭到钱大钧部的阻击。激战中，陈赓左腿三处中弹，膝盖处的肌腱和小腿的胫骨和腓骨都被打断。在他的坚持下，部队没有把他就地安置，而是抬着他一直到了广东的汕头。在汕头，陈赓终于同部队失散了，历尽千辛万苦，他和警卫员卢冬生辗转乘船到了香港，又从香港乘船到达上海。

在前往上海的途中，陈赓偶遇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共产党员周逸群，两人结伴到了上海，此时已是十月中旬了。这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已经从武汉秘密迁到上海。

陈赓到达上海后，很快找到了他的妻子王根英。王根英是党中央的秘密交通员，所以陈赓很快就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就这样，陈赓住进了牛惠霖医院。

陈赓住进医院之初，牛惠霖大夫怀疑他是一个强盗，以为他的伤腿是在作案时摔坏的，很不乐意为他治疗。虽经反复解释，仍不能消除医生的疑虑。陈赓觉得一味编造不是办法，又得知牛氏兄弟是宋庆龄的表兄弟，且为人正直忠厚，便索性把真情向牛医生合盘托出。这样一来，牛医生对他的态度立刻变得十分友好。因为他同情共产党人，又知道宋庆龄素来爱护黄埔军校的学生。当他得知陈赓是南昌起义的伤员，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上海求医，便决心无论多么艰难，一定要把他的腿治好。

陈赓的腿途中虽经接骨，但是被接歪了。两个月来辗转流亡，艰难奔波，伤势已经恶化。按照通常的情况，只有截肢了事。

但是陈赓坚决反对截肢，牛氏兄弟决定满足他的要求。他们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终于保住了陈赓

这条多处负伤的腿，使他得以日后重返沙场。为此，陈赓对牛氏兄弟非常感激，直到多年以后，每提起此事，对两位心地善良的名医仍然赞不绝口。

陈赓住院期间，宋庆龄曾亲自前来看望。周恩来更是经常派人来探望，其中来得最勤的，就是那个用小舢板送陈赓一行上苏联货轮的李强。

尽管牛氏兄弟对陈赓十分友好，又悉心治好了他的伤腿。然而陈赓终于不辞而别。

事情是这样的，在住院期间，陈赓发现这家医院里住了不少黄埔出身的军官，而且他们在上海的上司也常常来医院探望。陈赓是“黄埔三杰”之一，名气不小。

他怕被认出来，就躲在病房里不出面。就在他的伤腿快要痊愈的时候，一位黄埔同学忽然走进了他的病房。原来，这个人也在医院治伤，他本人倒没有认出陈赓，但是他的马弁却认出了自己长官的这位老同学，向他报告了。那位黄埔同学似乎很关心陈赓，仔细询问了他是怎样受的伤。他刚离开，陈赓就意识到这里再也不能呆下去了，他当机立断，连招呼也来不及与牛大夫打，马上请当时也住在这里的一个同志背着他迅速逃走了。

六

陈赓从牛惠霖医院逃出，回到家里疗养了一段时期。一九二八年初，受伤的腿尚未彻底痊愈，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的时候，周恩来就派人来找他了。

在国民党警察、宪兵，特务和巡捕房的暗探、巡捕遍地密布的上海，中央特科要确保中共中央的安全，就必须建立一支高效率的情报队伍。这支情报队伍必须主动出击，对敌特机关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段，深入到敌特机关最要害最核心的部门，这样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向党的秘密机关发出警报。

中央特科决定建立情报科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情报科人员要深入龙潭虎穴，周旋于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巡捕、暗探以及上海摊的青帮、流氓、三教九流之间，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机智勇敢和献身精神。至于对情报科科长的人选，要求就更高了。

那么由谁来担任情报科长呢？

周恩来想到了陈赓。他认定，陈赓是情报科长的最佳人选。

后来的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第五章

一

在当年的上海滩，有不少这样的人物：无论东洋西洋，白道黑道，官场商界，租界华界，他们都吃得

开，到处左右逢源，八面来风，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党政军帮，路路皆通”，就象陈赓化名的王庸一样。不过，王庸是假

扮的角色，而杨登瀛则是真格的。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广东人，经历颇为复杂。他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同日本商界和新闻界的关系相当密切。他在日本曾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想左倾，一九一九年回国后，参加过“五卅”运动，并加入了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人也有一些交往。“四一二”政变时，他曾遭蒋介石逮捕，后来由身居要职的朋友保释。

从杨登瀛早年的经历来看，他差不多也算得上是个“赤色”人物，不过他后来却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的红人。

杨登瀛参加中统，是由于一个广东同乡的介绍。

在参加“五卅”运动时，杨登瀛结识了广东同乡杨剑虹。杨当时在日本洋行当职员，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杨登瀛与杨剑虹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不久杨剑虹去了广州，投到陈立夫的门下，成了他的亲信。一九二八年初。

中统的前身党务调查科刚刚建立，就把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其工作重点，决定在上海建立情报机构。但党务调查科尚在草创阶段，既缺乏特务工作经验，更缺乏得力骨干。为物色上海机关的负责人，陈立夫、张道藩都煞费苦心。这时，担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想到了他那位同乡杨登瀛，并将地引荐给了陈立夫和张道藩。

陈、张二人对杨登瀛都极为赏识。杨登瀛在上海的交游宽广，与租界当局的交道相当不错，特别是他与巡捕房建立的关系网，更是为党务调查科所需要。陈立夫、张道藩很快就认为杨登瀛是在上海从事反共侦察的理想人选。

不过杨登瀛一开始还并未打算参与特务工作。他这个人生性善于结交，信奉“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处世哲学，愿意与各方面的人拉关系，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搞到一起。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待，声色犬马，无所不至。一来二去，他与陈立夫、张道藩成了莫逆之交。

杨登瀛不仅与陈立夫等国民党特务头子打得火热，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陈养山也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杨登瀛和陈养山早在一九二六年底就已经认识。当时，陈养山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跟杨登瀛学过日语，两人就此成了朋友。一九二八年初，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后到了上海，在江苏省委工作，一度就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家中。杨登瀛虽然已经脱离革命，但对中国共产党仍表示同情，并且他生性豪爽，讲义气，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有事找他协助，他也愿意帮忙。他让共产党员住在自己家中的事，甚至瞒着他那位在党务调查科当总干事的同乡杨剑虹。杨每次到上海活动总要到杨登瀛家作客，每次来前，杨登瀛都及时通知陈养山，让他回避。当杨剑虹代表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式提出要杨登瀛入伙时。他犹豫了，一时拿

不定主意。杨登瀛不是不想做官，不过让他当侦探搞反共，当特务机关的官，这并不符合他的处事原则，他又不大情愿了。当侦探，首先要对付的当然是共产党。他不愿意成为共产党的敌人，这样不但对不起朋友，自己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中共中央特科的厉害他是知道的。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暗中帮共产党做点事，又弄一点共产党的消息去敷衍国民党，这样，既可以在国民党那里做官，又可以不承担风险，岂不两全齐美，何乐而不为？

这种选择很符合杨登瀛的处世原则。于是他找到陈养山，把杨剑虹要他做侦探，准备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建立情报机构，同租界拉关系等情况向陈养山和盘托出，并诚恳表示愿意表面上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帮助共产党，将自己了解到的情报及时向共产党通报。

陈养山在长期的交往中，已十分了解杨登瀛的为人，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便立即向江苏省委作了汇报。中央特科对陈养山报告的情况极为重视。周恩来指示陈赓尽快约见面谈。

第一次同杨登瀛见面，陈赓详细询问了他同国民党人的关系后，当即表示很乐意同他建立关系。他向杨登瀛提出，除了同党务调查科继续保持联系外，还应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取得联系。最后，陈赓问杨登瀛有什么要求，杨登瀛提出，同那些党棍，特务来往，需要花一些钱。另外，如果国民党方面向他索取共产党的情报，应如何处理？对于杨登瀛的问题，陈赓一一作了答复，基本满足了他的要求。双方就此达成了“谅解”。

蒋介石和陈立夫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特务机关刚刚建立，就已经掌握在中共中央的特科手中了。

二

杨登瀛第一次接受党务调查科的任务，是由杨剑虹介绍去见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钱大钧，办理要求英国巡捕房派人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的手续。但是关于搜捕地址，杨剑虹事先却不让杨登瀛知道。当杨登瀛跟随杨剑虹伙同巡捕房前去一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抓人时，他才知道搜捕的地址是在马立新村。因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人员早已转移，巡捕房的这次行动扑了空。事后，陈立夫专程赶到上海，亲自去现场考察了一番。显然，陈立夫等人尽管对杨登瀛非常赏识，但是要将极其重要的上海侦探工作交给他，开始时还是不敢完全放心的。

中央特科决定帮助杨登瀛尽快取得敌特机关的信任。要让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充分发挥作用，取信于敌是一个关键。

陈赓经常与杨登瀛一起研究情况，探讨办法。陈赓有选择地向杨登瀛提供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如公开宣言、传单之类，至于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每一期都优先送杨登瀛十份，让他拿去报功。同时陈赓也供给杨登瀛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这样，杨登瀛既可以作为取信于敌特机关的资本，又可以以此去迷惑敌人。

杨登瀛本来就与杨剑虹是密友，并深得陈立夫、张道藩好感，现在刚一“出山”，就接连提供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对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表现得非常卖力，很快就使陈立夫等人打消了对他的最后的戒备

心理。当然，陈立夫，张道藩之流哪里知道，在杨登瀛背后替他提供文件、替他出谋划策的竟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

杨登瀛与张道藩之间，由于一桩政治交易、二人的关系又更进一层。在国民党官场倾轧中，张道藩因一个政敌与他过不去，深感恼火，于是找到杨登瀛帮忙。杨登瀛利用黑道的关系替张道藩“黑办”了这个政敌，帮他搬掉了绊脚石。因此张道藩对杨登瀛更加信赖。张道藩是继陈立夫之后的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起一把政治保护伞。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杨登瀛的要求是，首先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节，与巡捕房政治部建立密切关系。国民党要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租界当局，因此需要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并且将逮捕的共产党人及时向国民党当局引渡。

中央特科也要求杨登瀛将巡捕房政治部作为工作重点。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蔽在租界内，对中央机构构成直接威胁的正是巡捕房。只有从巡捕房及时获得情报，才能有效地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的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正好巡捕房也想利用杨登瀛帮助办案。巡捕房看重的是杨登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

杨登瀛于是利用办案业务联系与巡捕房人员发展私人感情。他本来就是拉关系的好手，加之有意而为，所以进展非常顺利。很快，英国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就被他钓上了钩。

谭绍良是广东人，于是杨登瀛与他攀了老乡，然后请客送礼，每周星期六约他到一品香饭店，吃饭之后，又抽大烟，一榻横陈，无所不谈。没有要多久，谭绍良已经把杨登瀛视为知己了。

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探长兰普逊（Lampson）接着也上了钩。

一次，巡捕房通过谭绍良找杨登瀛，要他向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有两个码头上的工头是否关在警备司令部。杨登瀛直接找到钱大钧了解情况，等他回到巡捕房，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出来了。谭绍良奉探长兰普逊的命令，拿出二百元给杨登瀛作为酬谢。杨登瀛拒绝了，说：“你认错人了。”杨登瀛此举是做给英国人看的。果然，这事给兰普逊印象极深。

另一次，兰普逊又要谭绍良找杨登瀛替他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

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一个姓茅的副官处长，很快就把司令部所属各侦缉队的印鉴式样全部搞到了。兰普逊非常感激，从此对杨登瀛格外看重。

英国巡捕房得出结论：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

并且，英国巡捕房还发现，在与日本人明争暗斗时，杨登瀛可以作为帮手。当时，英国与日本在上海的矛盾尖锐。日本在四川北路驻军很多，英国人深感威胁。

兰普逊探长知道杨是一个日本通，既精通日语，又是日本问题专家，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还得借助于杨登瀛。

巡捕房对杨登瀛深信不疑。并且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杨登瀛成了国民党方面与巡捕房打交道不可替代的人物。他被聘为英、法巡捕房的顾问，可以在巡捕房随进随出，兰普逊那里的情报、材料，他都可以看到。遇到重大疑难案件，兰普逊还要找他商量。同时，杨登瀛又可以利用巡捕房的牌子到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活动，这一来，杨登瀛真正成了左右逢源了。

杨登瀛这个特情关系建立之后，国民党军警机关或巡捕房要对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采取行动之前，特科一般都能在敌人动手之前获得情报。敌特机关的好几次搜捕行动接连扑空。

陈赓考虑到，如果每次都让敌人扑空，杨登瀛难免暴露。在与有关的同志商量后，为了掩护杨登瀛的情报工作，特科有时也故意留下一些机关或布置一些机关让敌人去破坏，再让他们搜到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或者党内报刊，以增加敌人对杨登瀛的信任。

中央特科为杨登瀛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为了提高杨登瀛的地位，陈赓请示特委批准后，给他买了一辆汽车。于是杨登瀛经常神气活现地驾车出入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公安局、警备司令部以及巡捕房等地，给人的感觉是来头更大了。

三

中央特科建立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就在上海国民党的各军警机关和租界巡捕房有了自己的耳目。前面提到特科依靠内线迅速查清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一事，那个内线就是杨登瀛。此后，特科利用杨登瀛还挖出了好几个出卖党组织的叛徒。

杨登瀛成了党的叛徒的克星。

一九二八年八月，党务调查科特派员杨剑虹向杨登瀛介绍了一个叫戴冰石的人。杨剑虹对杨登瀛说，这人在机会成熟时，会提供重要情报。杨登瀛凭他的经验立刻意识到，这个戴冰石很可能是秘密自首的叛徒。

几天之后，杨登瀛得到通知，让他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封密封公函送往英国巡捕房政治部。巡捕房帮办谭绍良看过公函，立即下令巡捕出动，并约杨登瀛一同前往平凉路去搜查一处共产党秘密机关。杨登瀛要通知陈赓已经来不及了。结果在这处秘密机关有七人被捕。

杨登瀛正打算查证这次告密究竟是不是戴冰石所为，戴冰石就已经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是来找杨登瀛求情的。戴冰石见面就说，这个案子是他告密的。戴冰石称，杨剑虹事先答应过他，为了不使他受到共产党怀疑，捕人时连他的小姨子一齐抓走，等被捕人员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就立即放了她。但杨剑虹把人抓走后就不见下文了。

“杨先生，”这个叛徒愁云满面，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这几天我老婆日夜和我吵闹不休，找我要人，务必请杨先生帮帮忙吧！”

杨登瀛立即将情况报告陈赓。中央特科又进一步详细调查，证实戴冰石确实是破坏平凉路的内奸。为了避免叛徒继续危害组织，红队奉命立即采取行动。

几天之后有人在湖北路安东旅馆附近发现了戴冰石的尸体。

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巡捕房当然明白这是特科的红队干的。但特科究竟如何查出戴冰石叛变投敌的真象，他们却怎么也弄明白了。他们对杨登瀛仍然深信不疑。

以后，又有一些秘密自首的叛徒仍然被介绍来给杨登瀛接头。有时杨登瀛几乎用不着费力去调查，只须守株待兔，叛徒自己就会送上门来。

夏天的一个夜晚，杨登瀛坐在一品香饭店楼下的酒吧间，一边浏览报纸，一边等待巡捕房帮办谭绍良。他们这两个广东同乡经常在这里会面。谭绍良兴冲冲地来了，还带了一个人来。这人一身中式短打，头戴礼帽，见人点头哈腰，一望就知道是在上海滩混饭吃的流氓。

谭绍良介绍，此人叫王松生，对共产党的事情了解得最清楚。

杨登瀛不禁纳闷：一个小流氓怎么会知道共产党的事情？显然还有内幕。

“好啦，以后你有什么消息，就直接找这位杨先生好了。杨先生是顶可靠的人啦！”

谭绍良吩咐之后，挥手将王松生打发走了。

不久，王松生果然有了“消息”。他给杨登瀛带来一包东西，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份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文件代名为《华字通报》，实际上是一份《中央通告》。

“杨先生，这个你要不要？”王松生想拿文件在杨登瀛这里卖个好价钱。

杨登瀛当即付款，买了下来。

王松生没想到杨登瀛如此爽快，顿时来了劲：“如果杨先生还要的话，我手头还有些货，可都是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呀！包管杨先生满意。”

“唔，”杨登瀛故意显得漫不经心，“你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

小流氓四下望了一下，把嘴凑近杨登瀛的耳朵：“不瞒杨先生说，这些货都是一位朋友搞来的。他名叫陈慰年，本事可大啦，你要什么样的共产党文件，他都可以给你弄来。如果杨先生愿意的话，我可以约他和你见面，你们面谈好啦。”

“好吧，你约他来。至于价钱嘛，你告诉他放心好了，我不会让他吃亏。”

几天之后，杨登瀛出面请客，陈慰年由姓王的流氓陪同前来赴宴。旁边一张桌子上，几个生意人也在浅斟低酌，不时向陈慰年这边望上一眼。这些生意人是特科红队队员扮的，他们的任务是认清陈慰年的面貌。

饭后，红队队员跟踪找到陈慰年的住址。第二天，陈慰年住的弄堂口出现一个连环画摊。不用说，陈

慰年的行踪已经被红队严密监视起来了。

与此同时，杨登瀛按照陈赓的指示，加紧调查陈慰年的来历。情况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陈慰年不但是一个秘密自首的叛徒，而且已经成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密探。这家伙为了搞钱，又偷偷摸摸地托一个流氓转卖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

情况摸清楚之后，处决叛徒就很容易了。

陈慰年根本不知道他的真象已经暴露。他还以为找到了大买主，从此财运亨通。这天，正当他兴冲冲地走出弄堂口，突然背后一声枪响。叛徒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已经一头栽倒在地上了。

有时候，根本用不着特科的红队动手，只须杨登瀛借用国民党之手就可以除掉某些叛徒。

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白云观侦缉队拘留所内，有一名在押犯人刚刚抓进来几天，突然在牢房内大声嚷嚷，声称要见大头子，有重要的事情要讲。

这人是警备司令部的侦探从一家旅馆逮捕的。其实，侦缉队对他的身份一时还不清楚，只是认为他有共产党嫌疑就把他抓来了，现在突然听他这样一嚷，觉得这个人非同寻常，于是马上报告给警备司令部。

第二天，这人被提出牢房，带到一间办公室内。一位西装革履戴着墨镜的人已经坐在那里了。

“你不是要见大头子吗？”看守对犯人说，“这位长官就是，现在你有话就向他讲吧！”

这位从警备司令部来的“大头子”正是杨登瀛。他是受警备司令部委托来处理这个案子的。

犯人立刻将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原来，这人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负责人，是来上海开会的。但除了他自己的经历和身份之外，再三追问，他也说不出更多的情况了。

“看来不让你吃点苦头，你是不想说实话！”

杨登瀛把脸一沉，吩咐严刑逼供。他想弄清这个叛徒究竟知道多少情况。

叛徒被打得血肉横飞，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拼命喊冤求饶。看来他了解的情况确实不过如此了。当晚，杨登瀛将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第二次提审时，杨登瀛带来了一位“专家”。这位“专家”是特科成员刘鼎，他是奉陈赓的指示专门去给叛徒拍照的。

中央特委仔细审察照片之后，证实此人确系山东省委书记，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学习班学习过。杨登瀛又再次向他逼问口供，仍然问不出什么，然后告诉淞沪警备司令部说，此人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但利用价值不大。警备司令部见这个叛徒既然留着无用，干脆就将他枪毙了事。

四

一九二八年十月，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楼。

陈立夫打开卷宗，抽出一份委任状递给杨登瀛，神情庄重地说：“这是蒋委员长亲自签署的。望杨先生好自为之，不要辜负党国的重托。”

杨登瀛双手接过委任状，只见上面赫然写着：

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

此令。蒋中正

杨登瀛被陈立夫正式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在此之前，杨登瀛的那位同乡、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兼驻上海特派员杨剑虹因为贪污公款东窗事发，已经自杀身亡。于是陈立夫将上海方面的反共情报工作完全交给了杨登瀛。

中统大老板陈立夫没有想到他正在干一件蠢事。

对于杨登瀛，陈立夫是完全放心的。在他眼中，杨登瀛既忠心耿耿又精明干练，尤其难得的是，杨登瀛还与上海巡捕房有密切关系，简直是在上海从事反共活动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对杨登瀛的要求，陈立夫总是有求必应，要钱给钱，以示信任。

“在用钱的问题上，中央总是依你的。”新任的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特别对杨登瀛强调这点。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兄弟，对于陈立夫亲信的人自然也是深信不疑，极为倚重。徐恩曾还送杨登瀛一部《曾国藩家书》，以示笼络。

“中央特派员”的牌子使杨登瀛身价倍增。在上海的国民党军警机关眼中，他是“中央亲信的人”，在外国巡捕房眼中他是一位在中国官场中可以通天的人物，上海各侦探机关都更加对他另眼相看，什么秘密都不会想到瞒他。

杨登瀛成了国民党中央特派员之后，可以在上海的各侦探机关独立活动，不再受人管束。陈立夫、徐恩曾经常将一些大案要案直接交杨登瀛办理。租界巡捕房有案子也找杨登瀛商量。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甚至还向他表示，如果确有要案急于要办，可以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随时去逮捕就行了。这样一来，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中国共产党的计划，命令，中央特科都能够通过杨登瀛的关系及时了解，事先采取措施，化险为夷。杨登瀛对中央特科的作用更大了。

由于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中央特科在一九三〇年挫败了一起国民党企图谋害周恩来和中央机关的重大阴谋。

这年四月，蒋介石的侍从接到一封来自共产党内的秘密信件。信是写给蒋介石本人的。写信人叫黄第洪，黄埔一期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刚从莫斯科学习回到上海，就秘密写信向国民党自首。

黄第洪在信中向“校长”表示，“学生”因在共产党内不得意，愿意改过自新重新追随校长，恳请校长拨冗接见。黄第洪称，最近周恩来准备会见他，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协助国民党抓住周恩来。信中还附有联系地址，希望让国民党方面尽快找他接头。

蒋介石看了信不禁喜出望外。过去悬赏重金都没有能够抓住周恩来，而现在机会却送上门来了。他立即召见陈立夫，要他务必切实办理。

陈立夫不敢怠慢，马上把徐恩曾找来，让他亲自负责黄第洪告密案，严防走漏消息。徐恩曾深知此事非同寻常，决定选派一名最可靠的人前去与黄第洪接头。想来想去，他选中了杨登瀛。

杨登瀛立即找到特科人员刘鼎，让他转告陈赓：黄第洪已经秘密自首，并准备出卖周恩来作为给国民党的见面礼。刘鼎听了，吃惊之余不禁暗暗庆幸：若不是特科在敌人内部建立了反间谍关系，周恩来的处境就危险了！

刘鼎让杨登瀛先将案子压一压，然后马上报告陈赓转告中央特委。

南京路上，车水马龙，来往行人摩肩接踵。商店橱窗内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着人们的视线，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邮电局门口这样一个情景：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子，手里拿一只皮包和一张报纸在那里来回踱步，片刻之后，另一名衣冠楚楚的男子从街对面向他走来，手里也同样拿着皮包和报纸。两人凑在一起，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走进附近一家咖啡店去了。这两个人，一个是杨登瀛，另一个就是叛徒黄第洪。接头的办法，是按照黄第洪致蒋介石的密信中约定的。

当然，更不会有人知道，这个极不起眼的场面实际上正悄悄地改写着中国现代历史的一页：蒋介石企图抓获周恩来的阴谋已经宣告流产。

黄第洪见“蒋校长”果然派人与他接头，喜不自胜。显然，他的秘密信已受到重视，只要抓住周恩来，从此他的前程不可限量。这个叛徒全然没有料到自己已经落入中央特科的掌握之中。

周恩来得到特科的报告后，作出两点指示：第一，先将黄第洪暗中隔离，切断他与组织的联系。第二，特科继续加紧调查，尽快弄清情况。

黄第洪不久也察觉到风声有点不妙。杨登瀛与他接上头后，又两次约他到指定地点见面，他都没有敢再去。

中央特科经过周密调查，证明黄第洪写信向蒋介石自首，并企图勾结敌人谋害周恩来，对党进行大破坏，情节完全属实。于是，红队奉命出动，将叛徒黄第洪秘密逮捕，予以外决。

间谍最高境界--国民党要员身边的中共秘书和 随从

人们都知道：军事斗争领域离不开情报工作，它是知己知彼，有备无患，先机制敌的必要条件。所以，

从古至今，国与国，对立或者协作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在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文化战线，甚至贸易、商战等领域，总要开辟一条隐秘的战线，以完成通过正面接触和交锋无法完成的工作，获取各种先机制人和取胜的信息。各国、各种政治派别的情报工作机构就这样应运而生，导演了无数传奇，甚而影响历史的进程。

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前苏联的克格勃，以色列的摩萨德。到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军统和中统，以及中共不太为人所知的社会部。后者在国共两党逐鹿中原时功勋卓著，甚至左右了军事斗争的胜负和许多要人的命运，从而从某种意义上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专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和秘书长的周恩来，就以睿智的眼光，卓越的远见，为保持共产党的相对独立和信息畅通，草创了自己的情报系统。于北伐前后，挑选一部分高学历、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忠贞、坚毅而精明干练的党员青年渗透进当时国民党的各个中枢机要机关，担任各军政长官的秘书和随从。当时最著名的几人为**谢和赓**、**王侃予**、**杨达**、**杨崇明**、**王德安**等。

谢和赓：北伐时任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北伐军进入上海后，白崇禧担任淞沪警备司令，“4.12”前夕，白崇禧接到蒋介石清党的手令，电文由谢和赓经手，他一面向白崇禧汇报，一面秘密通知周恩来和党内其他同志作好应变的准备。虽然事起仓促，但是还是为周恩来等许多中央领导及时脱险提供了情报。后来，谢和赓脱离了白崇禧，与共产党员妻子，上海电影明星王莹共事。直到1942年赴美国留学。1954年，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夫妇始因共产嫌疑被驱逐出境，回到北京。文革时，夫妇遭受不公正待遇，双方弃世。

王侃予：四川资阳人，大革命时期入党，黄埔四期生。由军校学生队指导员参加北伐，为第四军教导团连指导员。1927年12月被派往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成为当时的校长李济深的秘书，从而探悉军界高层机密。不久参加广州起义。起义部队退之花县改编为红四师时，担任师政治部主任。1928年被捕，旋遇害。

杨达：1924年同治大学医科专业学习，1925年转入上海大学，同时加入中共。1926年被派往黄埔军校工作，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培德（国民党中央执委，江西省主席）。（继任团长为朱德）秘书。南昌起义时为义军公安局秘书，代局长，起义失败后，于赣江航船中被捕，遇害于南昌。

杨崇明：湖南澧州人，1924年加入中共。北伐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武汉“7·15”政变后转入地下。1927年12月8日被武汉公安局逮捕，18日被害。

王德安：陕西乾县人，1923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1925年加入中共。后回陕西任敬业、乐都等中学教导主任，校长。参加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筹建工作，为省党部委员。“4.12”政变后，加入陕西省清党委员会参与机密。及时向党组织传递情报，使我党许多重要干部免于被捕。1928年4月事泄被捕，6月17日被活埋于西安北门外。

北伐战争后，鉴于血的教训，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加强了中央特科和情报工作，先后以陈云、陈

赓等担任特科负责人，并启用了情报工作著名的前三杰。以李克农负总责，进行电讯侦察，以胡北风（胡底）打入国民党天津电台，以钱壮飞于 1929 年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担任中统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随从副官，并同时兼任情报机关，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负责人，为我党侦探情报。三人通力合作，1931 年 4 月 26 日，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顾顺章人于武汉被捕、叛变，三杰和中央机关面临灭顶之灾时，截获武汉电文，挽救了党中央，也挽救了整个情报工作。1931 年李克农、钱壮飞等相继进入中央苏区后，潘汉年接替了他们的工作，这个江苏宜兴籍的创造社成员，自 1925 年加入中共以后，就舍身为党，自愿绝育，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身份投身于隐蔽战线的斗争，与红军中的李克农、北方的王世英（1925 年入党，黄埔四期生。“4·12”政变后，展转上海、南京、北平从事兵运、统战、情报工作，为中共北方局情报处长）在周恩来指导下，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党的情报工作。（潘汉年后来到苏区担任政治保卫工作，参加长征，中途回上海，重振情报工作。只是在抗战中，与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的一次接触，未事先征得党中央同意，为毛泽东十分光火，建国后在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任上，于 1953 年 4 月 3 日被打为内奸判刑，将后半生交给了监狱。文革后平反。）。包括向陕北党中央传递蒋介石迫于苏联压力和日寇入侵面的扩大，萌生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念，从而使党中央能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中央军委情报部，中央社会部，在周恩来指示下，遴选了一批有相当社会背景和学历水平，忠诚勇敢、不计名利的优秀青年党员，作为战略情报人员，在不同地点、时刻，机遇中以投亲靠友，展转引荐，报考国民党重要军校的方式分期，分批打入国民党要害机关和军政要员身边。这批人，最著名者就是隐蔽战线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他们分别于抗战前期打入胡宗南身边的要害部门。熊向晖甚至担任了胡宗南十二年的机要秘书和随从副官，最终于 1947 年被胡宗南送往美国留学。全身善终，成为中国现代情报界的奇迹。“蒋介石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看到了”（周恩来语）就是后三杰在西安保卫延安，共产党中央的丰功伟业。这一时期，杨奇清（1928 年参加平江起义，翌年入党。为三军团保卫部执行部长，长征后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长，北方局社会部长）参加了情报战线的工作。

在这些杰出儿女、亲人，如傅作义的女儿、邓宝珊的女儿，杨森（四川军阀）的侄女，杨虎城的夫人。国民党要员身边一时挤满了长期潜伏，待机而动的大批中共情报人员。国民党的一举一动，都在我党的掌握之中。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方几乎无秘密可言，屡战屡败，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看看国民党一些要员身边的秘书们的真实身份吧：

王冶秋：安徽霍邱人，1925 年入党，大革命后，在安徽、北平、上海等地从事革命工作，一度失去组织联系。1941 年恢复组织关系后，奉命为国民党第三战区督导长官冯玉祥机要秘书兼语文教师。由是获得重要情报来源，建国后贵为文物局长。

郭惟诚：辽宁义县人，满族。1933 年入党，1934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系，奉命加入东北军，为张学良机要秘书。后为苏鲁战区秘书主任，政务处长，1942 年 8 月与常恩多（东北军一一一师师长，1939 年加入中共）、万毅（东北军旅长，1938 年加入中共）一齐策划了一一一师起义，进入山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我党一支抗日的有生力量。

栗在文：辽宁辽阳人，1935 年加入东北军，翌年入党，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中共东北军工委委员。为张学良倾向于联合红军，和传递相关情报起了重要作用。1939 年，东北军编散后，栗在文来到延安。为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秘书长。

宋绮云：江苏邳县人，1926 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翌年入党。1929 年获组织批准，入西北军十七路军，为其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副社长、总编辑。1935 年任中共西北特支委员，同时担任杨虎城秘书。参与西安事变。1939 年为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总干训班教员。杨虎城出游欧洲归国后的 1941 年 7 月，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49 年 9 月 6 日，夫妻携幼子与杨虎城夫妇同时被杀害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左洪涛：黄埔六期生，1927 年入党，抗战后被派往张发奎第八集团军长官部秘书室工作，任第四战区中共特支书记。洞悉第八集团军一举一动。解放后，能够保全为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政协副主席。

赵荣声：中共秘密党员，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机要秘书，促使卫氏与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合作及对八路军军需的供给。后卫立煌萌生加入中共的念头，被派往与中共联系。

王少春：中共秘密党员，1942 年 6 月，被周恩来派往统战对象国民党 24 军军长刘文辉身边担任机要副官，同时兼顾秘密电台，侦察西南国民党军方情报。我军进军大西南时，及时提供了蒋氏关于西南战局的总体规划，为我军迂回大西南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王少春因功后来担任国家情报总署副署长。从军统、中统特务系统，到南京，上海警察总署，北平军调部，及各个战线，中共谍报人员，全方位的渗透。以及像郭汝瑰这样的前共产党员重新表示靠拢党，从而泄露了大量国防部三厅的机密军事情报；参谋本部次长刘斐有意投靠。以情报相赠等情况，国民党军方再无军事机密可言，只能在战场上处处被动，连战连败，三年时间，损兵折将近八百万，拱手让出了大好河山，非惟战之不利，也是天时、人和使然。

孙子兵法云：“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者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乃是至理名言。

向为共和国献出一切而又默默无闻的人致敬。

记侦破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系统的特务组织“华北督察组”始末

1949 年 1 月 31 日，驻守在北平的傅作义将军顺应历史潮流，同意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

他的部队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布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这意味着五朝古都北平真正地回到人民手中，中国的历史将在这里掀开新的一页。

此时，古都北平穿上节日的盛装，到处旌旗如林，锣鼓震天，市民们笑容满面、欢呼跳跃，沉浸在欢乐幸福的海洋里，并以不同的形式来庆祝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划时代的事件。

但是，提前入城的新政权的捍卫者们——北平市公安局的全体接管人员，深感北平敌情的严重：土匪惯窃肆无忌惮，明砸暗抢，暗杀纵火，无恶不作；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充斥街头，为非作歹。更有甚者，国民党在北平的各系统的特务，秉承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旨意，策划“应变措施”，变换不同的策略和手法，千方百计地寻机潜伏，疯狂地搜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及人民解放军的情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系统的特务组织“华北督察组”就是其中的一个。

北平和平解放后，市公安局侦讯处获悉“华北督察组”这一敌情，遂将其列为专案进行侦查，在局属内二分局和外省公安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几经周折，终将该案的潜伏特务全部查获。

神秘的“景福汽车行”

陈悟生同志系北平人，上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北平地下党，先后隶属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中共北平委员会”下属的“平民工作委员会”领导，后改为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组织上分配他到市公安局内二分局工作，参加对国民党警察局的接管。陈悟生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既高兴，又沉重：高兴的是我们胜利了，我们从“地下”转到了“地上”。沉重的是觉得担子更重了，过去我们搜集敌人的情报，敌人侦查我们。现在敌人搜集我们的情报，我们在侦查敌人。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啊！公安局内二分局局长狄飞办事干练，思维敏捷，是在革命战争中练就的一位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陈悟生报到的第二天，狄飞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悟生同志，你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多年，对北平的情况一定很熟悉，今天请你给我谈谈北平的敌情及治安等情况。”狄飞身着一身合体的灰色军装，右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臂章熠熠生辉，更显得威风凛凛。

陈悟生得知狄飞意图，心里有了底，他太熟悉这些情况了，便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最后，陈悟生介绍说：“据我所知，目前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很猖獗，他们有的在变换和迁移住址，隐姓埋名，就是想潜伏下来，搜集我们的情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是不是还有新派到北平来的？我看很有可能！”狄飞听完陈悟生的话，沉思片刻，果断地说：“悟生同志，你要通过各种关系，注意这方面的敌情，如有情况，直接和我联系！”狄飞和陈悟生对敌情的估计无疑是正确的。

一天，陈悟生在分局办公室里看市局下发的《敌情通报》时，忽然传达室的王老头匆匆忙忙地闯进来，告诉他：“有一个叫韩作文的人有急事找你！”陈悟生一听是韩作文来了，就知道一定有重大事情！否则他不会来找他的。他忙告诉王老头：“让他来我办公室。”韩作文是陈悟生介绍入党的中共党员。他是个老司机，在日伪时期就开公共汽车，在汽车行业的工人中威信很高，工人们心里有话，都愿意和他说。北平解放前夕，韩作文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汽车工人，开展护车、护场以及接送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进出城，工作得很出色。

韩作文向陈悟生报告说：“西单宽街 12 号的景福汽车行的司机陈福录向他反映这么一件事，他的股东张景贤家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名叫俞承泽，说是给张当助手的，但他什么也不干，来汽车行，既不会开汽车，又不会修汽车，每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很是可疑！”陈福录还说，汽车房旁边有一间根本没有人去的屋子，经常发出“嘀嘀哒哒”的声音，他听到就有三四次了。“嘀嘀哒哒的声音，莫非是电台？”凭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凭职业的敏感，陈悟生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应当立即向狄飞分局局长报告。

狄飞听到报告，非常重视，立即指示韩作文继续指导司机陈福录，多接触俞承泽，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该人的情况，并随时与分局联系。并抽调三名侦查员和陈悟生一起，对景福汽车行进行全面的调查。狄飞还特意叮嘱陈悟生，将此情况报告给市局局长谭政文和侦讯处处长冯基平。

刚刚组建不久、专门负责对敌特机关进行侦查的市局侦讯处，以冯基平为首的一批从事隐蔽斗争的领导骨干，正在研究如何贯彻市委的指示精神，在全市进行“肃特”斗争的重大决策。听到内二分局的报告，非常重视，但不知正在活动的特务分子，是属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哪个系统的？冯基平指示侦查科：将此列为专案侦查，掌握情况，并派出侦查员协助内二分局调查。

经查，景福汽车行的股东张景贤，家住西单宽街 12 号，其父是伪国大代表。张景贤本人在日伪时当过县警察所督察。日本投降后，组织过河北省武清县的还乡团。后参加了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新事业建设协进会”、北平“中国公民互助会”。北平解放前夕，张景贤经常和国民党特务们吃喝嫖赌，打得火热，有重大特务嫌疑。俞承泽来历不明，更是可疑。

陈悟生等人，从西单商场内开无线电行的宋某处了解到，他曾为景福汽车行的张景贤修过电台。一个汽车行修电台为何用？情况越来越明朗，景福汽车行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了。

汽车司机陈福录又报告说，车库旁边发出“嘀嘀哒哒”的小屋，虽常年锁着，现又发现车库屋角有一扇门可以通到小屋，但这扇小门外边有一个大柜子挡着，不注意的人谁也不会

想到这个柜子后面还有一个小门通到小屋。看来发报人是从柜子后边的小门内进入小屋发报的。

陈福录还看见，小屋前边有一个葡萄架，葡萄架上缠有铜丝一直到屋顶，这分明是天线！以上情况足以证明，西单宽街 12 号的景福汽车行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的一个秘密据点，并藏有电台！遵照谭政文局长的指示，内二分局派侦查员把该地址严密控制起来。

一定要把电台截获 2 月 21 日上午，陈悟生随西单工作组的两位女同志（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来到西单宽街 12 号，两位女同志的任务是看看市民有没有用金圆券兑换新发的人民币的，而陈悟生则是利用这个机会亲自到此处侦查一下，想得到第一手材料。

西单宽街 12 号，是一个深宅大院，除靠西边是汽车库以外，其他房子排列整齐，朱门灰墙、雕梁画栋，很是气派，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般平民百姓住的地方。陈悟生机警地、不引任何人注意地审视着汽车库旁的小屋和葡萄架……工作组在院里转了转，见张景贤存了大量的煤，一个女同志无意地问了一句：“你们为什么存这么多煤？”也没有留意张景贤怎样解释的，就走出了大院。

就这么一句无意的问话，却把张景贤吓坏了，他以为电台的秘密被发现了，急得简直像热锅之蚁。

陈悟生回到分局，刚刚坐定，就接到报告：张景贤待工作组走了不久，就让俞承泽把天线拆掉了，又让司机陈福录开车把俞承泽送走，俞还带走了一个大皮箱。原来，俞承泽提着皮箱上了车之后，陈福录问俞车开到哪里去？俞不肯说出具体地址，只是坐在司机旁边指挥车去的大致方向。汽车开到景山后街黄化门西口外，俞承泽让陈福录停车。下车后，他提着沉重的大皮箱走进了恭俭胡同。陈福录百思不得其解：这条胡同连大卡车都开得进去，为什么自己提着皮箱走？陈悟生分析，俞承泽把电台转移了！情况紧急，陈悟生找到狄飞分局长，他们认为必须当面向谭政文局长汇报并请示怎么办。狄飞叫上警卫员，和陈悟生一起快步向坐落在教育部街的市公安局办公地址奔去。

当他们走到旧刑部街时，忽然发现一辆没有通行证的美制吉普车(当时汽车必须持有市公安局发的通行证方可通行)停在一个大院门前。

他们三个人来到院子里，院子大而阔绰，也很气派，房子里安有电话。有两个身着西装的中年人看到他们突然进来，很是惊慌，当得知来人是问汽车为什么没有通行证的事，才放下心来。有一个脸色蜡黄、眼窝深陷、自称姓何的人说，他们是刘仁的关系。另一个脸色漆黑、自称姓张的人说，他们认识谭政文局长。狄飞觉得这两个人言行可疑，而且口气还不小，决定让他们开着车，一起来到公安局。

谭政文正在开会，见狄飞和陈悟生进来，知道有急事，便宣布休会。先听狄飞的汇报，狄飞把俞承泽转移电台和在刑部街遇到两个人等情况一一做了汇报。谭政文让带来的人进来，一见面，果然认识，谭政文用严厉的口气训斥了他们一顿，让他们回去了。

谭政文告诉狄飞和陈悟生，这两个人是最近向我们坦白自首的国民党特务，十天前交出了一支手枪、211发子弹，八天前又交出了两部收发报机。

对俞承泽转移电台之事，谭政文态度坚决：一定要把电台截获回来，决不能让俞承泽跑掉！对两个自首的国民党特务，谭政文分析出不少疑点：我们刚进城，敌人就匆忙地交出枪支、电台，为什么还不一次交出？两件事发生的地域都在内二分局辖区，两者有没有联系？谭政文结束了刚才的会议，马上又召开了由侦讯处处长冯基平、内二分局局长狄飞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两起案件的情况，确定了侦破方案，并作出决定，当天晚 11 时，拘捕张景贤，就地审讯，弄清俞承泽藏身地点，追回电台，将这伙特务一网打尽！挖出一个潜伏组，是夜 11 时，月明星稀，宁静下来的北平大街小巷沐浴在银色的清辉之中。这时，几辆汽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一下子把西单宽街 12 号包围起来，谭政文局长亲临现场指挥，他一声令下，侦查员冲进大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张景贤从被窝里掏了出来。

经审讯，张景贤供认，他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组北平 379 情报组”的特务，任电台译电员，俞承泽是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直接派来的电台台长，他们以汽车行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他们在北平受曹中襄领导。但张景贤不知道曹中襄的地址，只是用电话联系，电话是：22727。

当谭政文追问：俞承泽和电台在什么地方？张景贤战战兢兢地说：“今天工作组来了，我们以为暴露了，俞承泽带着电台转移到景山后街恭俭胡同 23 号他姥姥家。”谭政文当机立断：让狄飞带着人到恭俭胡同抓

俞承泽，取电台；由科长孙启民和陈悟生去抓曹中襄。

电话局离张景贤家只有一箭之地，他们很快查清 22727 号码的地址是旧刑部街 24 号院的私人电话。他们赶到该地址一看，陈悟生心里有底了，原来就是白天查汽车那个院，来过一趟，情况多少熟悉一些，他们顺利地抓到了曹中襄，就是自称姓张，脸色漆黑的那个。另一个也在，自称真实姓名叫傅家俊，便把这两个人一起拘捕起来。孙启民、陈悟生返回西单宽街 12 号时，狄飞已经把俞承泽抓捕归案，并取回了电台，还搜出了大量的情报底稿。

经审讯得知：曹中襄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中校参谋，抗日战争期间是一个认贼作父的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军官、国民党特务。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 379 情报组组长，受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组”组长傅家俊领导。

谭政文决定，将傅家俊等四人交市局侦讯处进一步审理。

破获国民党国防部二厅 379 情报组，从发现敌情到破案仅用了 18 天！傅家俊和他的“华北督察组”破获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 379 情报组为侦破“华北督察组”拉开了序幕，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要彻底查清“华北督察组”各个潜伏组并将其潜伏特务送上审判台不是件容易的事，艰苦复杂的侦查工作还在后边。

经审讯，傅家俊详细地交代了“华北督察组”和下辖各潜伏组的人员名单及他本人的情况，并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华北督察组”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设在北平以掌握华北地区情报工作的特务机构，它的前身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华北办事处”，因国民党军事上屡屡失败，“华北办事处”没有人来管。1948 年初，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任命傅家俊、张之程为新成立的“华北督察组”正、副组长，共设 12 个秘密情报组，分别由傅家俊、张之程二人领导。傅掌管北平、天津、石门、沧州、大同、锦州和张恒七个情报组，张之程分掌北平、天津、古北口、榆关和保定五个情报组。北平解放前夕，根据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指令，傅、张分别对自己分管的原情报组布置了潜伏任务，配置了电台、密码，发放了经费，待机进行情报活动。

傅家俊，山东钜野人，时年 33 岁，住北平北新桥新太仓 55 号。其父曾任国民党北平市财政局长和北平市商务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傅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八期学习毕业，历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参谋、上校科长等职。1947 年被派到东北任国防部二厅辽北直属情报站少将组长。长春被人民解放军包围期间，他化装逃回南京，后被任命为“华北督察组”少将组长兼“华北剿总二处”副处长并潜入北平。来北平以前，鉴于时局变化越来越对国民党不利，他耍了两面手法：假意营救了我方一位重要地工人员李某。来北平之后，他便主动和我在北平地下情报关系刘某某、金某某拉上了关系。北平解放后，傅将特务活动不力的天津、张恒两个潜伏组成员名单和两部电台交给刘某某转交市公安局侦讯处；而将其他五个潜伏组隐匿起来，待机活动。傅的两面手法，使侦讯处的侦查员没有看穿他的真面目。从这次缴获的情报底稿来看，傅来北平始终和南京保持密切联系，向南京提供人民解放军围城情况、兵力部署，并受南京之命秘密调查、监视傅作义将军同我方和谈情况，秘密查询在平津战役中苏联红军是否出兵等各种情况。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傅家俊是一个狡猾的、顽固的少壮派特务。根据傅家俊交代的线索，市公安局侦讯处组织力量追查，将潜

藏在北平的十名潜特全部捕获，隐藏在外地的五名也被外省市公安机关逮捕，另有六名潜逃，在以后“镇反”运动中也被揭露出来。傅家俊一手布置的七个潜伏组和七部电台、21名潜特全部被查获落网。傅家俊来北平前，就患有肺结核病，入狱后病情加重。后保外就医，住进北平中和医院，经医治无效，于5月5日病死。

追捕“漏网之鱼”

市局侦讯处没有放松追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组”副组长张之程的工作。据傅家俊交代：张之程布置的五个潜伏组，都是张独自布置的，他对其特务情况一点也不清楚，连张之程本人去向也不知道。傅家俊病死之后，追查的线索中断。

鉴于上述情况，侦讯处处长冯基平指示侦查科，要清理一下“华北督察组”方面的情报线索，研究与分析一些情报关系，深挖细找，一定要把张之程这个“漏网之鱼”捉拿归案！

1949年3月11日，侦讯处审理了由人民解放军某部查获的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谍报组少校组长王衡之、王学桐。经查，王衡之、王学桐是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的重要特务，又是张之程的得力干将，二人很可能知道张之程的下落和他布置的五个潜伏组的情况。但二人供认，他们也不知道张之程的下落。1948年11月，张之程布置王衡之任北平潜伏组组长，王学桐任榆关潜伏组组长。但他们交代说，张布置的潜伏组的成员大多数是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下属的谍报组的特务。

根据王衡之、王学桐二人所提供的情况，侦讯处追查工作转入结合搜捕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下属谍报组特务工作进行。共查获该系统的特务17名，其中有张之程布置的北平、古北口、榆关、保定潜伏组十名潜特。

是年10月8日，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陈海若到外一公安分局检举：有一个叫吴秀珍的妇女是陈父母的朋友，吴的丈夫张之程是特务，吴曾来北平住在陈家，现在又来了，住在前门外第一宾馆。外一分局立即将吴秀珍送市局侦讯处审讯。经侦讯处的侦查员再三交代政策，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吴才交代说，张之程改用化名潜居在上海。张曾派吴两次潜入北京，第一次在1949年7月，她带着国民党国防部的信来京找原北平警备司令部周体仁和刺探国民党101师、103师改编后的情报，以及了解王衡之等人的潜伏情况，因未找到人返沪。这次来京也是这个目的，也未找到人而落入法网。

根据吴秀珍所供，市局侦讯处电告上海市公安局将张之程逮捕。1950年2月28日将张之程押来北京，经市局侦讯处审讯，张供出了他亲手布置的北平、天津、古北口、榆关和保定五个潜伏组(包括五部电台)的组长等23人名单。

原来，北平解放之初，张之程混进了待整编的北平警备司令部，图谋待整编后取得合法身份以长期潜伏，不久，接受警备司令部周体仁的布置，令其南逃找国民党国防部代周“请示办法”。1949年4月，张偕妻逃到上海，后到南京，见到了国防部长顾祝同、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讲明来意后，顾祝同给周体仁写了封密信，命张妥交周体仁。侯腾委任张为上校专员，发给了经费，命张潜入北平重建潜伏组织。张偕妻回到了上海，不敢去北平，派其妻来北平找周体仁联系，均未找到，顾祝同给周体仁的密信，因吴秀珍

藏在鞋底下，已经成了碎纸片，字迹辨认不清了。

根据张之程交代，23 名潜特，除榆关两名暂找不到下落外，其余的潜特连同电台全部查获。市局侦讯处对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华北督察组”特务组织侦破，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超级间谍

董必武给人印象是位忠厚长者，党内尊称“董老”，实际上他却是现代谍报大师，用间之术除周恩来、叶剑英外，中共党内无出其右者。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使用的几名超级间谍，在国共两党斗争中起了何种作用：



董必武



熊向晖

熊向晖，安徽人，1919年生，1936年在燕京大学时加入中共，抗战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1938年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董必武要熊按周恩来“布闲棋冷子”的方针，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关键时发挥作用。1943年，由于熊事先向周恩来密报，使胡宗南第34集团军闪击延安的计划落空。1947年胡宗南率国军23万人进攻延安，彭德怀领共军2万3千人在青化砭、羊马河、范蟠龙镇、沙家店等处连战连捷，及毛泽东敢于留在陕北与胡周旋，亦全仗熊在胡身边。

同年，中共地下报务员李政宣夫妇在北平被捕叛变，其留存电报底稿导致熊身份暴露，然而此时熊已被胡派送美国留学。1949年后熊回大陆，1954年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70年代任共军总参情报部副部长时参与接待基辛格访华，后历任中共驻墨西哥大使、中共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委书记等职。1991年熊发表回忆录《地下12年与周恩来》。熊在中共情报界辈份极高，与中共驻印大使申健、中调部副部长陈中经一起被称为“后三杰”，“前三杰”即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郭汝瑰，又名**郭汝桂**，四川铜梁人，1907年生，黄埔5期毕业，1929年入中共，1930年为躲抓捕，由其堂兄、川军郭汝栋部安排去日本留学，与中共失去联系。1931年12月入陆大10期，1937年5月任54军参谋长，8月任该师42旅代旅长参加淞沪抗战，1938年后任54军参谋长、20集团参谋长、73军暂5师师长，1944年驻英国副武官，1945年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1945年5月郭汝瑰在重庆经任廉儒介绍见董必武，提出恢复党籍，董与郭深入交谈，让郭用实际行动经受党组织的考验并将郭转交中共吴克克坚情报系统。1946年2月郭任张治中随员参加与中共的军事谈判。1946年6月以后

历任国防部 5 厅副厅长、厅长、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徐州司令部参谋长、国防部 2 厅（计划）厅长、3 厅（作战）厅长，参与辽西、徐蚌、平津会战决策，系蒋介石的军事“智囊”。从 1946 年到 1949 年，郭与中共方面密晤 100 余次，提供了大量有关国军的战略战术情报，国军竟未察觉。对郭起疑的是杜聿明，杜妻曹秀清早年曾入中共，杜与郭接触中似有曾相识之感，某次杜去郭家，见客厅沙发有补丁，暗忖，自己在国军中已是廉将，竟还有比自己清苦的，更加深了原有的看法。杜提醒蒋介石注意郭，蒋不以为然，让杜拿出根据，杜有口难言。徐蚌会战中，凡蒋按郭建议下达的作战命令，杜执行时均打折扣。1949 年 1 月，郭任 72 军中将军长，驻军四川泸州，后任 22 兵团司令兼 72 军军长，叙沪警备司令，1949 年 12 月 11 日按刘伯承指示率万余人在宜宾起义投共。1951 年在共军南京军事学院任教，1980 年 4 月再入中共。1981 年 2 月杜聿明在北京临终时郭去医院探望，杜问郭“小鬼(郭汝瑰被称作郭小鬼)，当年你是否为共产党做事？”郭答：“光亭兄，我们只是见解不同，守红必守准呀！”郭否认自己是贰臣，称一生从未改变过信仰。

韩练成（1908—1984），又名**韩圭璋**，宁夏固原人，1925 年入西北军，在国军第二集团当过营长、团长，参加过北伐并秘密加入中共，后历任国军 72 师参谋长、独 11 旅旅长、170 师副师长、16 集团军副军长兼参谋长、46 军副军长、军长。

韩是桂系主要将领，白崇禧的亲信。1946 年韩秘密将南京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接到上海白崇禧公馆，称与客人商谈要事，白夫人不知就里，在外为其望风。董告韩国共和谈肯定破裂，要韩掌握好部队，视机会配合解放军行动。1947 年 2 月，国军向山东共军发起重点进攻，共军华东野战军 9 个纵队进行莱芜战役，将北线国军包围，韩奉陈毅指示命 46 军自围中溃出，自乱阵脚，致共军大获全胜，歼国军 5 万 6 千人，生俘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中将。此后，韩练成又返南京，谎称越狱，白崇禧不疑，将韩调任海南防卫司令，因此冯白驹领导的中共琼崖纵队得以保全。未几，白崇禧外甥、国军师长海竞强当真越狱逃回，指韩通共，而韩此时已去兰州。保秘密局电告张治中抓韩，张却给韩机票，让其飞往香港。1949 年后韩任共军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等职，1955 年授中将军衔。



韩练成

高清，又名高维生，石昌汉，湖北黄安人，1917年生，1929年参加鄂豫皖红军，1930年入中共，历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宣传队队长，西路军骑兵二团代理团长，1939年在新疆上化被选调共产国际，去苏联莫斯科达拉索夫斯卡亚军校学习，1941年潜回重庆，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负责人，任务是搜集日军、伪满、汪伪及国民党情报，制裁汉奸和叛徒，小组共13人，均是在苏联受过谍报训练的原红军西路军营连级干部，分别潜伏在重庆、西安、兰州、北京、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台北、昆明、汉城、及国军赴印度远征军中，此外，苏联驻重庆使馆武官处还为高配备了10多名助手。共产国际的纪律规定，该小组不得与中共发生横的联系。1941年高清重病，不得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就医，董必武利用同乡和中共元老的身份让高清将搞到的情报背著苏联人同时报送中共一份，而在高的助手中，也有两人是由董输送的。

一为张炜，即蔡叔厚，字绍敦，浙江人，曾留学日本，上海绍敦电机公司创始人，人称“蔡老板”，中共特科重要成员，去苏联受训回国后同张一萍（即张文秋，女儿刘思齐、邵华分别嫁给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一起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负责人、大名鼎鼎的佐尔格工作，蔡任报务员。佐尔格去日本（1944年11月7日被绞死在东京巢鸭监狱），其继任华尔敦由于下属陆海防叛变而被捕，蔡即失掉联系。抗战时在重庆，蔡向董必武谈了自己的情况，要求工作，蔡转告苏联武官处。高清到渝后手中同时掌握5部电台，人手不够，蔡又为高当报务员，后蔡转赴新疆，受苏联情报单位新疆边务处领导，曾娶被盛世才、季源薄杀害的毛泽民的遗孀朱丹华为妻，朱又改嫁方志敏堂弟方志纯。不久蔡返沪中共潘汉年情报系统，与蒋介石前妻陈洁如养女陈瑶光的丈夫、中共地下党员、“驸马爷”陆久之一起策反汤恩伯，因蒋纬国赴沪督战，功败垂成。1949年后蔡任上海机电局长，1967年被文革小组专案审查第三办公室按“苏特”逮捕，

1971年死于秦城狱中（1981年平反）。

高清的另一助手是湖北人赵英。

该系北洋军阀肖耀南的姨太太，人称“湘楚一绝”，肖死后赵由北京回武汉。抗战时闲集此地的不少国共要人向其求爱，计有郭沫若、邓初民、董必武、张道藩。日军占武汉后赵随政府撤退重庆。董必武又以同乡的关系说赵投身情报工作，赵不忍再拒。董将赵介绍给阎宝航，阎令赵接受高清领导，赵随倾囊相助，给高提供住处和经费，出入国民党达观贵人之间，为高搜集情报并掩藏电台。自古佳人多薄命，寡妇门前多是非。张道藩求爱遭拒，怀恨在心，适逢汤恩伯自前方返渝，各界举办欢迎会，张借刀杀人，怂恿汤下帖请赵，赵看不起对日作战中丧城失地的汤恩伯，拒绝赴会，汤恼羞成怒，派士兵著便衣入赵家将其打成重伤住院，张再嘱汤灭口，汤又派人将赵抬出医院仍进嘉陵江。赵至死不知自己为共产国际效劳，只知为延安工作，国民党也不知其真实身份。赵英对董必武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受人之托，终人之事，可谓红颜一死酬知己。

高清小组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同时，更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曾提前获悉驻沪日军多摩部队（专门从事化学毒气战的秘密部队）企图下毒暗害山西新军决死队负责人薄一波的情报，及时通报重庆八办。也曾在重庆智除中共特科河谟叛徒、汉奸张阿四。在银川杀中共叛徒、军统银川站站长刘洛，在水杀中共叛徒、军统天水站站长王西扬在西安杀中共叛徒佟建云。佟系中共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女友，被中统西北专员孟真（后为旧金山图书馆负责人）劝降，拟诱捕张浩，为此，高清小组成员黄祺（潜伏于重庆并打入林森卫队，为救高清与国军枪战身亡。其妻1960年饿死于四川农村）、孟燕辉（潜伏于西安，后为大陆山西省公安厅长，文革坐狱去世）、盛星传（又名胜觉，绰号“麻雀”，潜伏于兰州，1957年打成右派，1960年饿死于甘肃省民乐劳改场）3人在赵英掩护下将佟击毙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门前。1941年7月，中共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江西电台台长林生被捕叛变，国民党中统江西省专员冯琦（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叛徒徐锡根）指挥该合骗过南委书记方方，捕中共江南委书记谢玉才（假自首后脱逃向南委报警，但回延安仍被整肃）、南委组织部长郭乾辉（郭潜），郭随即叛变。高清得报后紧急向重庆八办报警。不想竟被周恩来、童小鹏所误。中统展开大逮捕，抓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不屈就义）和廖承志及粤、桂、闽、浙、赣5省中共党员7千人。中共此次损失不下于皖南事变，中统首领杏邗曾弹冠相庆，周恩来则小肠炎气，大病一场。此系周恩来一生为数不多的失误之一。

日降后高清去上海，1947年曾奉周恩来命于燕山别墅杀张国涛，因张提前离去，只杀了张的4名军统保镖。

高又同苏联驻宁使馆副领事、苏大使罗申的女婿、格别乌少校贾不候（1919-1986）一起追杀此时已当上了中统上海区组长的郭乾辉（后为台湾国民党调查局副局长），却错杀其弟郭乾耀。1949年高以上海《大公报》记者身份去台北，同行二记者是吕德润（后为大陆国务院参事）、严庆澍（笔名唐人，由在香港的乔冠华领导）。高在台搜集国民党情报并用电台密报海参崴苏军情报部，1952年台破获李朋等苏谍案，而高又在日月潭巧遇张国焘并被认出，遂自行撤回大陆。周恩来让高再度返台，高不从，周即密令制造车祸除高，然执行者不忍下手，飞报徐向前。徐向前、董必武、李先念出面劝阻，外加苏联国家安全部写的证明，救下高清一命。

此后，高陆续在东北公安部、中央调查部工作，1965 年底被周恩来、康生以“苏特”罪逮捕，关押 10 年，妻子跳楼自杀，1977 年落实政策，同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中调部长罗青长却不让高回部，让其在关押地河南平顶山就地安置。罗系周恩来、邓颖超的红人，文革出当过杨尚昆专案组组长，文革后又秉承汪东兴旨意，对平反冤假错案不甚积极，顾遭胡耀邦的厌恶，导致中调部于 1983 年被撤销。

前面提到的**熊向晖、郭汝瑰、韩练成**是利用自身在国军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利用了胡宗南、蒋介石、白崇禧的信任，近水楼台。这种先天优势成了他们后半生用不完的存折，保他们能出将入相，人大政协，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只有高清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早年三过雪山草地，血战河西走廊，后投身隐蔽战线，端的是从事刀头上舔血的勾当，晚年蒙恩赐，成了河南老干部局管理的副局级离休干部，平日粗茶淡饭，看书下棋。其间，曾与当年的对手，被特赦住在南京的原中统干事张文（张国栋）交流，双方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93 年河南作家于天命的记实小说《红色间谍——代号巴山》一问世即被抢购一空，人们被高清奇特的经历所吸引，所感动，此书被誉为“当代《红岩》”，它的出版也打破了平顶山的宁静。先是台湾方面要以 6 万港币购买在莫斯科受训的高清等 24 人名单，然后台湾再雇人盗去该书原稿，幸被大陆公安追回。随后高清一家又不知去向。一说高清于 1995 年去世，一说高被台湾绑架，还有说高被软禁，更有说高被暗害的。有人说高去了祁连山，他要和牺牲的战友相伴余生，另有人在湖北红安见过他，他已在故乡安度晚年。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则说，在原克格勃的高级公寓里，有位带湖北口音的中国老头正在写回忆录……

综上所述，无论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羽扇纶巾之辈抑或鸡鸣狗盗之徒，皆为董必武所用，可见董深得用间指衫。孙子曰：“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只有在政治上高瞻远瞩的人才能成功地驾驭和指导谍报斗争。因此，历史上国共之争，主要不是输在军事上，而是输在政治上，应是不争之论。俗语说得好：上有九头鸟，下有湖北佬。指湖北人做事超出常人，当年只有毛的亲密战友、湖北黄冈人林彪敢杀他。董必武的家乡湖北黄安（现红安）亦有人杰地灵，文革前共军有 62 名将军是黄安人，就连董必武的儿子董良驹现亦是共军总参谋部的少将。董必武不是将军，但他是将将之人。董必武未带过兵，但他指挥的熊、郭、韩、高等人，个个当得 10 万兵。

中共历史上的三位红色女特工(组图)

张露萍：打入军统的女情报英雄



在我党杰出的特工中，年仅 18 岁就打入戴笠军统局内部的张露萍是一位情报巾帼英雄。

（一）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 年，16 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 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

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天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信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由叶剑英领导。起初，延安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统战工作。余家英的到来，正合叶剑英的需要，叶剑英对她的工作作了安排，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钉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二)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

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共产党员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

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

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三)

在看守所里，因毛烈(戴笠的小老乡)与张蔚林等认识，而且毛烈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体情况，于是张露萍就要张蔚林利用这个机会送50块大洋买通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

毛收下钱后，果然照办。等戴笠派特务去搜捕时，我秘密机关已人去楼空。戴笠为此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毛烈枪决。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里面来了，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徐慧琳，地主

军阀余安民是她的亲戚，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一无所得。

“军统电台案”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戴笠认为，一个 19 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却不想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 7 人死刑。

1941 年 3 月，张露萍等 7 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 年 6 月下旬，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军统局长戴笠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 7 人一同杀害。

1948 年 7 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发动起义，趁机逮捕了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随即将其押往已解放的重庆，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关押审理，受到了人民的严惩。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由于当时敌我情报斗争激烈、复杂，加上我方打入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了名字，因此，张露萍等人的事迹在上世纪 80 年代才大白于天下。

陈修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市委书记



南京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曾活跃着一支秘密力量，他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取情报、瓦解敌人、策动起义、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这就是由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的地下情报组织。

(一)

1946 年 3 月，中共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在淮安召见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陈修良，宣布这

位 39 岁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曾任向警予、张太雷的秘书，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的女市委书记。

南京，曾被蒋介石称为是国民政府用刺刀大炮围箍而成的“铁桶一般的城市”。当年南京市共有 96 万人口，而国民党、政、军、宪的机关工作人员却占了 11 万，光南京警察厅的警察系统的警察在册就有 9700 多人。

自 1927 年国民党“清党”以来，中共南京地下党连续遭到 8 次毁灭性打击。尤其是在 1930 年 7 月的第六次大破坏中绝大部分都被捕被杀，200 多人的地下党只剩下了 47 人。1932 年在王明路线危害下造成的第七次大破坏，更使得 300 多人被捕、100 多人被杀，致使 1934 年 2 月之后，南京已经没有了党的组织。1937 年 11 月南京被日军攻陷之后，整个城市连一个党员也没能剩下。

南京是名副其实的虎。这个虎已经吞噬了 8 个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年轻的生命，陈修良会不会是第 9 个呢？

1946 年初，原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发展有地下党员约 140 人；苏南区党委系统有党员 40 多名；淮南区党委系统有 30 多名。摆在陈修良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发挥这 220 名党员的作用。

首先要做的自然是召开重组后的南京市委第一次会议。

那时候的南京市委仅 5 个人：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委员朱启鸾、方休、王明远。地下党党员张杰的父亲是一位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他在磨盘街 45 号有一座独门独户的小院，于是这个静谧的后院便成了重新组建的南京市委第一次委员会召开的理想场所。会议开得简短紧凑。陈修良在传达华中分局对南京市委的指示之后，便根据毛泽东、刘少奇确立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对南京市委组织机构与工作方法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建议。

两军对垒中，情报的灵通、准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的重大意义早已为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所瞩目。作为 1933 年即参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队伍的陈修良，对此当然有着深刻的理解。1946 年 5 月南京市委建立伊始，她就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在市委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1948 年又专门设立了以沙广威为首的策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她单线联络，由她直接向上海局报告。换言之，市委书记亲自领导这两项生死攸关的要害工作。

要在国民党配备有 8000 名职业特务的南京截取敌人的机密情报，其艰险程度不言自明。

陈修良靠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临危不惧，胆大心细地深入敌人内部搞情报。

有一天下午，她戴着一副墨镜，来到市委委员方休的家中。方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一见面，方休立即悄悄地告诉她：“我一个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他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住我家，我们说话小心点儿。”出于职业习惯，陈修良当即询问了那特务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休告诉她，妻弟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并且提出想把房子挪一挪，与一个特务长住一起总不大行，万一出个破绽不是闹着玩的。

陈修良毫不犹豫就否定了方休的提议。几天之后，陈修良再次造访方休。见面伊始，方休就迫不及待地说：“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个手提包，妻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包军事密码，这事该怎么办？”

陈修良当即郑重地说：“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方休自然允诺，让妻子把提包拎了出来，一看，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

“方休同志，这份东西我需要借用一下，让情报部门的同志抄一抄，你看行吗？”“可以。不过只能用半天，下午他就要回来。”

她紧紧地握了握方休的手，她知道方休做出这个允诺需要多大的勇气。

南京市委负责情报的卢伯明在妻子和助手的帮助下，连续抄了3个小时才把密码抄完。下午陈修良将密码“完璧归赵”的同时，卢伯明也跨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

几个月之后，党中央给陈修良发来嘉奖令，中央高度评价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所起的重大作用。

在上世纪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

(二)

1947年末，蒋介石策划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之后，中共的领袖们把目光投向“策动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起义”这一战略目标上。

南京市委负责策反的主帅是陈修良，其中具体组织指挥策反的是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大将沙文威。

1948年9月，上海局发布了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要求市委“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南京市委立即建立了一个由沙文威负责的策反系统，并通知南京各情报人员，凡是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有起义线索的，一律集中到策反系统。策反系统由市委联系，直接对上海局负责。一个个策反对象被筛选出来，而首先纳入市委书记视野的，正是被人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一个飞行员俞渤。

首先注意俞渤，并成为俞渤好朋友的是沙文威领导下的特工林诚。

林诚是国民党空军第四医院中尉航空医官。作为航空医官，为驻守南京的空军军官们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与飞行员谈话聊家常，自然成为他的职责范围。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他发现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俞渤很可能成为策反对象。

俞渤是广西人，少年时代是在桂林度过的，当时的桂林汇集了许多“左”倾的文化人，俞渤所在的中学就有好几个，在这些进步文化人的影响下，俞渤对于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桂林失守后，俞渤考入中山大学，只读了一年便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这时他闻知国民党招收空军飞行员的消息，便毅然远去重庆考上国民党空军。1945年春又奉命前往美国训练，归国后便担任了轰炸机八大队的飞行员。当时的内战战场上，国民党陆军哗变者已屡见不鲜，但空军系统驾机起义还不曾有过先例，如果策反成功，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士气定会产生巨大影响。几经接触，当林诚试探着把谈话引入实质时，俞渤毫不犹豫地

表示答应，并且告诉林诚，他这个机组共5个人，其它人平常都与他友好，完全可以争取他们一起。林诚的喜悦可想而知。可是，当俞渤提出驾机起义前入党的要求时，林诚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也没有这个权力。

问题提给了陈修良、沙文威。陈修良有点儿犹豫，不管怎么说，考验的时间到底短了一点儿；沙文威却认为，俞渤准备起义，这是用行动表明他能经受考验，有什么不能入党？

陈修良接受了沙文威的建议。不久，刚入党的俞渤又发展飞行员郝桂桥、轰炸员周作舟参加了共产党。同大队的飞行员陈九英、领航员张祖礼平日就与俞渤关系密切，紧要关头自然表态：跟着大哥一块干！俞渤等人驾机起义后，接着国民党驻宁部队先后又有4架最先进的B24轰炸机飞往河北解放区。

策反空军起义成功后，陈修良、沙文威相信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的时机也已经成熟。经过研究，他们决定把策反目标锁定为国民党军最先进的巡洋舰重庆号，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局等领导也介入策反工作。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地中海的旗舰，它是国民党海军中装备最精良的军舰，拥有各种先进的炮火装置、无线电通讯设备及精密的航海仪器。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派，在士兵中颇有威信。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上海局以及南京市委等情报策反部门多渠道积极工作。舰上的南京地下党员毕重远于1946年进入国民党舰艇士兵训练班。1948年8月重庆号回国后，南京的党组织就派人与他联系，要他团结士兵，相机行事，策动起义。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奉命离开上海，在吴淞口外停泊。当获悉敌人要该舰逆江而上，到江阴与海军第二舰队配合，阻止解放军渡江的消息后，舰上的“士兵解放委员会”主要成员决定拒航，把起义地点改在吴淞口。

1949年2月25日凌晨1时，“士兵解放委员会”拘禁了包括邓兆祥在内的所有在舰军官。邓兆祥原有起义思想基础，但不知下层士兵已在酝酿哗变，当他得知这是在中共南京市委、上海地下党领导下进行时，毅然参加起义，下令开航，使军舰顺利驶向解放区。

(三)

1949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着生命危险过江到达合肥人民解放军前委司令部，送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岩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数量表》等重要敌情资料，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作出了贡献。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天下午，一向主张进行“京沪杭大决战”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做出了弃守南京的决定；不过他同时又命令撤离前务必炸掉港口、火车站、机场和重要仓库。4月22日，敌工兵营长带领爆破小组炸毁了下关火车站部分设施之后，又去破坏老江口火车轮渡栈桥。这个栈桥是南北交通的咽喉，栈桥工人竭力阻止，但手中没有武器，情况危急。这时，在老江口水上警察局岗楼上守望的地下党员潘逸舟一面喊话示警，一面用机枪扫射，阻止敌人破坏。分工负责保护栈桥的中共党支部委员林大宗立即带领起义警察奔向栈桥援助，敌人狼狈逃窜。从3月国民党宣布“封江”之后，长江上的大小船只便统统被赶进了内河，解放军在江北根本找不到任何船只。百万大军，被滔滔江水阻隔，关键时刻南京市委显露身手。4月23日夜晩，下关电厂、下关机

务段轮渡所工人驾驶着“京电号”、“凌平号”过江到达浦口；24日中午，被策反的水上警察局二号巡艇也开到浦口；紧接着，南京市委又组织民船和停泊在下关沿江一带的公、私营轮船公司的大小机动船只一齐出动(老江口的火车轮渡，一次能装载一个团的部队、战车)。

24日凌晨到中午，经过轮渡往返不停地运输，停留在浦口一带的解放军三十五军全军人马顺利过江。经过激烈战斗，悬挂在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来了。这天下午，设立在励志社的解放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军部门前，一辆吉普车嘎然而止。为首的一位中年妇女告诉哨兵，她需要去见三十五军何克希政委。

哨兵犹疑满腹，他不知道这位穿着旗袍的老百姓凭什么资格要见军首长。可是，当他把中年妇女通报的姓名转报值班室后，何克希却立即跑了出来：“陈修良同志，我正在到处找你！我正在到处找你！好啊，我们胜利会师了！”

会谈结束后，将军又立即派两个警卫员护送陈修良到寓所搬取行李。当军用吉普停在一间普通的民居前时，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穿着朴素、一天到晚外出“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共产党的南京市委书记！

4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决定重组南京市委：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宣传部长、陈同生任统战部长、陈士渠任卫戍总司令。不过陈修良没在这个岗位上干多久，1950年她被调往上海，从此就离开了南京。

朱 枫：牺牲在台湾的女情报员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戒备森严的台北马场町刑场上，一位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当代特大间谍案”的女主角身中7弹，倒在血泊中。她就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朱枫。这一年，她年仅45岁。朱枫的牺牲在岛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说起她的牺牲，还要从“炮击金门事件”说起。

(一)

1949年5月23日，上海战役接近尾声之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电示华东野战军：要求其迅速提早入

闽，争取在两个月内占领福州、泉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为解放台湾扫清外围。

此后，华东野战军首长很快将所属的第一兵团在上海战役还没有结束时就移师福建。上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所属第九兵团开往浙江，部分开往福建。

7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解放台湾问题。会议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于1950年解放台湾，最迟不超过1951年。此时，毛泽东把解放台湾的计划大大提前了。毛泽东提前解放台湾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方面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反动派赖以发动革命内战的军队几乎丧失殆尽，解决逃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已不需要花费多大的气力，解放台湾已是指日可待；另一方面是考虑尽快解放台湾，防止美国直接出兵干涉。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了建立渡海作战部队的设想，他指出：“我们必须准备进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仍可以考虑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飞机组成一支攻击部队……”1949年7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刘少奇在与斯大林会谈中，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帮助建立空军的问题，并说明了准备进攻台湾的计划，要求苏联提供200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中共的请求，不过对于中共要求苏联在作战时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的要求，斯大林表示难以赞同，他说这样做的结果必定会引起美国的介入，从而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此后，中苏通过谈判，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就适当时机解放台湾进行必要的准备。有了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承诺，中共开始把解放台湾作为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3个军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台作战准备，成立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总指挥部；在空军建设方面，人民解放军抓紧从苏联购进作战飞机，突击训练飞行员，训练出两个歼击机团和一个轰炸机团的全部地勤人员。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福建沿海地区只剩下金门、东山和马祖等几个岛屿有待解放。当时解放军等十兵团按原计划命令第二十八军迅速攻克金门，以完成漳厦金战役。

(二)

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乘胜追击攻击金门古宁头，由于情报失准，战斗连连失利。

11月5日，三野七兵团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也因情报失准而严重受挫。连续两次失利，致使中共高层领导决定，在海域作战非同于陆地大兵团行动，应尽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

1949年10—11月间，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最大的内线是被称为“密使一号”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为取得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受中共中央指示，时任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的舒同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联系。

朱谌之，1938年投身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名朱枫，后调到情报战线做地下工作。

11月27日午后，朱枫乘坐的海轮在台湾基隆港靠岸。朱枫这次赴台，是以探望女儿一家为由作掩护的。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

记“老郑”(蔡孝干),另一人是吴石(吴墨非)。到台湾的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与曾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郑”在台北“双十路”茶食楼接上了头。她向“老郑”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老郑”也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为接应我军登陆,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朱枫的手中。

一个星期后,朱枫在台北重庆南路又与吴石取得了联系。吴石是身居国民党高位的我党秘密情报员,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在书房里,吴石从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枫的手里:“朱谌之同志!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的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的机群种类、飞机架数……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3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上的一位大副手中。

这些情报通过秘密渠道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由舒同亲自递送北京,交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经一位女共产党员秘密赴台从一位国民党高层的“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一代伟人还诗兴大发,随即在红线格信纸上写下:“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藏)忠魂,曙光迎春早。”

朱枫送回第一批情报之后,又与“老郑”、吴石多次见面。他们又陆续交给她一些重要军事情报,朱枫均将情报安全送回大陆。

1950年2月2日,吴石派副官紧急约见朱枫,对她说,前几天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等处的分部已经被国民党当局破获,“老郑”被捕。现在,他已供出中共大陆过来的秘密特派员就是你朱枫,情况万分紧急,您必须立即转移!

风云突变,朱枫马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然后便迅速离开。由于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危急时刻,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样,她便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2月4日傍晚,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

不料,在抓人扑空后,“老郑”又供出了吴石,并从其住宅搜出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摸清了朱枫的去向。由于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暗中控制,两个星期后,朱枫在舟山被“国防部保密局”特勤处逮捕,随后被送回台北。后来,国民党保密局在叛徒的带领下,抓获了共产党台湾工委领导下的400多名共产党员。在台湾当局多次劝降无效后,吴石、朱枫等人以“共谍罪名”被执行死刑。

(三)

鉴于情报工作的困难局面,1950年6月初,华东军区确定了新的训练大纲,决定从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各兵种分别进行训练,1951年四五月间进行三军两栖作战联合演习,然后准备登陆作战解放台湾。

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中共中央于北京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当前的最迫切任务

是“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在会上也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具体实施步骤和各项攻台作战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当即决定，解放台湾的战役仍由粟裕具体负责实施。

面对情报工作的激烈角逐，震怒之余的蒋介石在台湾当局的战时最高指挥中心召开国防部、参谋本部高级军事会议。他命令：“从中共情报活动看，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不是计划，而是正在实施中的事情，从现在起所有的重要军事设施，都要尽可能做好隐蔽……”蒋介石还自信地讲道：“不久前发生的古宁头一战，登陆金门的共军全军覆没，打破了他们先取金马，后攻台湾的念头。现在他们转而力谋情报进攻，因此在全岛彻查共产党是当务之急！”

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在分析了海峡两岸战时态势后说：“目前阶段的中共，可能是它立国以来最孤立和最危险的时期。美国的‘三矢计划’针对俄共的‘一石二鸟’对我们十分有利。中共的东北是日本、南韩，自朝鲜半岛可进入东北，西南是美国扶助之南越，解决北越之后，可入侵广西、云南。目前中共最害怕的还是国军在福建、浙江一带的两栖登陆……”

正当国共两党欲兵戎相见，海峡两岸剑拔弩张之时，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这使新中国面临着的军事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华东军区要密切注视台湾海峡的动态。原定入闽配合进攻金门的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和炮兵第三师继续按原部署于7月间入闽。7月上旬，浙江前线人民解放军海陆配合，协同作战，攻克了浙江东北部海域的嵎泗列岛和披山列岛。7月下旬，福建前线，我军派出一个营前往金门附近进行武装侦察，为解放金门做准备。但是，随着朝鲜战局的严重恶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于10月1日给毛泽东发来急电，要求中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作战。10月2日，“联合国”军过“三八线”，并很快将战火烧至鸭绿江边，这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把解放军军事战略主要方向由台湾海峡转向朝鲜战场。至此，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被迫停顿。

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曾几次重提解决台湾问题，并表示：“海峡两岸，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他们不要派特务来，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工去破坏他们。”但是由于美国插手，一代伟人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

原载：《文史春秋》2007年第4期

戴笠后代今何在

长子戴善武被枪决

戴笠死后，戴家开始破落。1949年5月，戴笠的母亲蓝月喜病亡。戴笠在1915年与原配夫人毛秀从

生有一子叫戴善武(亦名戴藏宜)，外貌酷似戴笠，挂有少将军衔，任国民党保安乡自卫队主任。1941年5月20日，戴笠电令戴善武，指使特务队长徐增亮和特务蔡刚，在江山双溪口乡山沿，杀害广渡乡乡长、地下党员华春荣，犯下了严重罪行。

1949年5月，江山临近解放，戴善武见势不妙，便携妻儿匆匆南逃，想去台湾。但才逃到相邻的福建省浦城县水北乡，便被国民党水北乡公所武装残匪劫获，搜出美元、金条、美式手枪等。解放军浦城县军管会得到消息后，即派兵击败劫匪，将戴善武一行捕往浦城县城。不料，戴善武在夜间跳窗逃脱，潜回江山县。1949年9月，根据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李丰平(后任浙江省省长)的指示，戴善武被依法逮捕。江山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1月在戴笠老家保安乡，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并枪决了戴善武。到此为止，戴家崩溃了，“戴公馆”也被没收。

戴笠有3个孙子2个孙女，他们分别叫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戴眉曼，还有一个叫戴璐璐的孙女，在寄养时夭折了。

原来在戴善武被处决后，其妻郑锡英将女儿戴眉曼托交给戴笠家的厨师汤好珠收养，自己带着3个儿子到了娘家衢州城稍住，随后，便举家迁居上海。

1953年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派遣军统特务黄铎装扮成渔民，偷渡进入上海。当时，一些敌特分子仍潜伏在要害机关里。黄铎混进上海后，便与暗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黄顺发、陆秉章取得联系，策划接郑锡英母子去台湾。

经过一番密谋后，由陆秉章偷开公安局出口证，郑锡英改名沈凤英，偕戴以宽、戴以昶与特务黄铎一行4人，在1954年1月7日由上海乘快车到广州，然后经香港去台湾。而戴以宏则因户口被黄铎冒名顶替迁出，无法出境，被留在上海。

孙女戴眉曼 生活幸福平静

再说戴眉曼改名廖秋美，寄养在汤好珠家中，当时她才6岁。在汤好珠的抚养下，戴眉曼渐渐长大并念完小学。由于好珠的家庭生活条件较差，戴眉曼从7岁开始就学烧饭、洗衣、采猪草等家务事。小眉曼不仅人很聪慧，而且非常懂事。到12岁，她就穿上草鞋，和男孩子们一道上山砍柴，一捆一捆的柴背回家里，年年都烧不完。

汤好珠有个儿子叫廖长城，人很老实厚道。戴眉曼在他的带领下，开始学干农活。到15岁时，戴眉曼已长高了，不仅身体健壮，而且人也勤劳，各种粗细农活都能干。15岁那年，她在生产队里劳动，一年就挣了2000多个工分，这在当时农村女劳力中，已称得上佼佼者了。

转眼几年过去，戴眉曼已从小丫头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论相貌，戴眉曼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可许多小伙子都因为她的爷爷是戴笠而驻足爱门之外。

有一次，邻居大妈给她介绍了江西省上饶市汽车保养厂的修理工谢培流。谢的老家在离保安不远的廿八都镇，初中毕业后就到保养厂学修汽车，技术过得硬，人长得也帅，待人很厚道。他俩相亲时一见钟情，

小谢还带眉曼上山采野山楂。但这时，有人劝谢培流不要自找麻烦，免得将来背“黑锅”。忠厚的谢培流没有动摇，他说：“戴笠是戴笠，他当特务，眉曼又不是特务，我为啥不娶她？凭啥要背‘黑锅’呢？”

“不要怕，党和政府不会搞株连政策。眉曼从小在贫苦农民家里长大，党是不会对她另眼相看的。只要你们双方有感情，就放心地结婚吧。”乡干部姜浩声、毛进洪非常支持他俩的婚事。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这样做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戴眉曼和谢培流至今仍感激他们。

1960年10月，戴眉曼和谢培流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后，小两口相亲相爱，过了几年平静幸福的生活。

“文革”开始后，戴眉曼怕受到冲击，便和丈夫商量将户口由廿八都公社迁往上饶市。

戴眉曼到江西后，曾在一家小厂工作过，后来工厂倒闭，便一直在家干家务。她生有两子一女：大儿子谢明是火车司机，二儿子谢平是个体运输户，女儿谢佳丽在一家纺织厂当统计员。

孙子戴以宏工作积极

戴善武的妻子郑锡英由上海去台湾时，留下了6岁的二儿子戴以宏，由上海市公安局潜伏特务陆秉章托人照料。陆秉章将戴以宏抚养了3年后，终因特务行径败露，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入狱。自然，戴以宏也失去了生活上的依靠，被陆秉章的妻子送进上海一家孤儿院。

算是绝处逢生。这家孤儿院是由宋庆龄资助开办的，9岁的戴以宏进院后，并未受到冷落，相反，生活条件比陆秉章家还好。住得干净、穿得暖和、玩得开心，有些食品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国际福利组织送的。戴以宏在孤儿院那几年，压根儿就没吃过苦。

戴以宏在孤儿院上完小学后，已16岁了。不久，劳动人事部门将他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棉纺厂工作。当时，中央提出青年人“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戴以宏立即响应，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头一个报名去支援农业第一线。于是，他便由合肥市棉纺厂调往安徽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后来又改当修理工。

“文革”中期开展“三查”活动时，戴以宏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孙子。当时，也有造反派想借此做点文章，但戴以宏反驳道：“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由于戴以宏平时工作积极，也就顺利过了关。

戴以宏1976年在普农山分场与下放的一位上海女知青结了婚。1984年这位女知青返回上海，两人便离了婚。不久，戴以宏又与本场一位女工重新组合成小家庭。后来，他成了名7级修理工，他和女儿生活过得也蛮舒心。

后代台湾聚首

1991年5月6日，戴眉曼专程赴台湾看望了她的母亲郑锡英。戴以宏也于5月24日抵台探亲。母子5人40多年来第一次团聚。那时，郑锡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躺在床上躺着。人老了格外思念家乡，她

对子女们说：“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回去看一看。”

戴笠的长孙戴以宽，也已过花甲之年。大学毕业后又留学美国，获得企业管理学士学位，现供职于美国，身边有一子一女。

戴笠的幼孙戴以昶，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在台湾省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摘自《文史天地》周军/文